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十九世纪末的韶山毛氏家族中，为何诞生了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其中有何内在原因？其秘何在？本书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毛泽东的历史渊源，其目的在于将毛泽东放到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出现可以说是偶然的，但作为一个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伟大人物，他的出现又有着历史的必然。

我们之所以溯毛氏家族之源，并非用以说明毛泽东的“血统”本是如何高贵——“你看，他的祖宗是周文王！怪不得出了毛泽东！”这不过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推论。所谓“血统”，并不一定与造就伟人有关。造就伟人的沃壤是历史，是人民，而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公民，大部分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血统”，可说都是同样高贵，但不见得每个中国人都能成为伟人——有的不但没能成为伟人，反而成了罪人或无耻小人。

为什么历史发展到十九、二十世纪，毛泽东成了黄帝千千万万子孙中的佼佼者？这肯定有着某些重要因素。

我们溯毛氏源流，正是试图揭示这些因素。为什么在中华民族众多姓氏中，唯独选择了毛姓？的确，汉民族各姓氏，都是由共同的祖先发脉而来，但毛姓，是与孕育毛泽东这位伟大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的。因此，我们选择毛氏家族，作为中国各姓氏家族的一个代表。

毛泽东母亲姓文，那么，为什么不选择文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方面照顾了中国的传统习惯——自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结束，以后的全部时日，都是“父系时代”；我们当然不是重男轻女，主要是因为以父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有极大的方便的。试想，若以母系为据，毛母文氏以上（父为文氏、母为贺氏）又如何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各姓氏不断融合，是否还存在特定的“家族”概念？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中国历史，便能发现，直到毛泽东出生前后，家族，依然是牢固存在的。人构成家，家构成族，族构成众多姓氏的集合，众多姓氏的集合而形成国家。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成形式。当然，社会越发展，这种形式便越趋向松散，比如奴隶社会就比原始社会松散，封建社会又比奴隶社会松散。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的渗透，家族制受到重大冲击，然而，除开沿海地区之外，中国内地的人们，绝大部分仍然是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制真正的解体，是毛泽东为首的大批仁人志士领导的革命成功之后的事了。

我们研究毛氏家族的历史，还有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家族”，正是封建制度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代表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根基又恰是毛氏始祖所处时代所盛行的“周礼”）。因此，我们描绘毛氏家族兴衰起伏的历史，可以说正是描绘奴隶制、封建制兴衰起伏的历史，而这种制度的灭亡，又正是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来完成的。正是毛泽东，从捣毁他自己所在的家族——毛氏家族开始，向整个的封建制度发起了全面攻击，毛泽东因此而成了毛氏家族乃至整个封建家族制度的逆子贰臣；他尤其成了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掘墓人和一个新世界的奠基者、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最彻底的反叛者——毛泽东的革命，不同于在他以前，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革命。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是从他

的故乡开始，在故乡取得了稳步的胜利之后，再推往韶山以外的地区，与那些地区已发生的革命汇合，遂成燎原之势——这一点，是毛泽东的革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相类似的地方。例如元末刘福通为首的北方人民反元斗争、清后期太平天国运动等，其开始都是在这些运动领袖人物的故乡。毛泽东的革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根本区别在于，革命从一开始，其矛头就指向了统治中国达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也就是说，历史上所有革命中，只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封建主义的基础——儒家学说之上。如果没有思想革命作基础，毛泽东领导的对整个封建制度——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革命将不可能取得成功。本书的基本点即在于此。所以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毛氏家族的历史，因为毛氏家族可作为中国封建基层单位的一个缩影，而儒家思想的主休，恰恰是毛氏祖先所处时代——自西周时盛行的周礼和以后的孔孟学说。毛泽东的革命，其真正开始，也正是他对他本人所处的家庭——毛顺生“统治”的上屋场，他的家族——毛鸿宾“统治”的毛氏家族的反叛开始的。因此，毛泽东的革命，广义他说来，包括了他1910年以前在故乡的种种反抗行为——不过，这一系列的反抗行为，还停留在本能的，没有明确理论指导的阶段，因而其影响还仅仅限于一个家，一个家族，或他的家乡。直接的结果也仅仅是造成了毛泽东与父亲的对立，与族长的对立，当然，这对于毛泽东漫漫人生长途来说，也是极重要、极关键的一步——但，韶山毛氏家族真正的解体，韶山“毛氏王国”真正的破灭，韶山毛氏王国“宫殿”与“法律”的真正失效，要等到1925年至1927年，毛泽东杀了个回马枪以后。他的这个回马枪，不单使他本人的家族走向解体，而且使他的故乡几乎所有的封建堡垒都走向解体，这种解体的冲击波，进而达到湘潭、湘乡，乃至湖南、中国的全境，无数的“黑手”，高举起沾满农奴血渍的皮鞭，抽向其原来的主人——封建地主阶级！

本书在占有了既有材料的基础上，又发掘出大量毛泽东及毛氏家族鲜为人知的奇闻秘史，既有客观描述，又有分析推论，还兼之以文化人类学的析论手法，把毛泽东放置在一个家族、社会的大氛围里，向人们一步步探示出他的思想历程和成长轨迹。从这个层面讲，本书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纪实类作品，它能对各个层面的读者以最大的满足——这，也正是我们力图达到的、与其它写领袖人物作品之不同所在。

——作者

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蒲苇

第一章 钟灵毓秀话韶山

一、韶山的“风水”——地理状况和历史渊源

湖南省的中部偏东，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中游的丘陵区，湘潭、湘乡、宁乡三县（市）交界的三角地带，坐落着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胜境——韶山。

它的名字源于一个优雅的传说：相传，上古时的舜帝南巡时，携娥皇、女英二妃，来到湘江中游的一个景色秀美之处。这里峰峦雄奇，流水潺潺，奇花异木间，百鸟婉转啼鸣。舜为这仙苑般胜境所陶醉，同乐工即兴奏了一支优美的乐曲，娥皇、女英则轻舒彩袖，翩翩起舞，天上的凤凰为这乐音和舞姿所吸引，也携着百鸟仪汇于此……这支美妙的曲子，就是上古有名的“韶乐”，韶山由此得名。

它的经纬度是，东经 $112^{\circ}24' \sim 112^{\circ}38'$ ，北纬 $27^{\circ}51' \sim 27^{\circ}59'$ 。按直线距离，它的东北，距长沙市城区为 56 公里，东界与湘潭市区——也即距湘江最近点的湘潭市，只隔 35 公里。

这一块小小的陆地，跨经度为 $14'$ ，纬度 $8'$ ，面积 210.38 平方公里，仅仅是中国版图的 $1/46000$ ，湖南省的 $1/1000$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直到本世纪初她一直默默无闻，行政上也无单独建置。

韶山！——这就是韶山！

战国时代，这里是荆楚之地；

秦始皇置郡县，属长沙郡湘南县；到南朝，改属湘西县；隋开皇九年（589 年），湘西县并入衡山县，于是随属衡山县；从唐天宝八年（749 年）起，分属湘潭、湘乡两县。此后，历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年代末，这种旧属未变，即由湘潭、湘乡两县分领其地。1968 年 12 月 26 日，省直辖的韶山区建立，韶山，第一次从湘潭、湘乡两县中析出，又经几次变更，1990 年 12 月 26 日，韶山市——一个山区小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

未到过这里的人们，只要手中有一张《韶山图》，便会惊异地发现：她的形状与中国政区图何其相似——将韶山地图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180° ，与中国地图比较，韶山简直就是中国的缩影！

曾有人说：韶山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温度计。的确，自从毛泽东诞生在这里，尤其在他成为一代伟人之后，我们通过韶山这一个窗口，即能窥见到全中国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在毛泽东出生以前，韶山，也能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特征。因为，韶山的自然与人文发展轨迹，是包蕴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之内的。

韶山，虽然很小，其广为人知的历史也很短，但，它的地质年代却可以上溯到十亿多年前的晚元古代。它的大地构造位于新华夏系第二复式沉降带，沅山——衡山弧形构造中的“套弧”地带，即韶山——花明楼弧形构造带上，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两位巨人的故乡——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位于同一地质构造带（相距仅 20 公里）。

这里出露的岩石，从最古老的上元古生界到新生界第四系，按地质年代的远近，由西北向东南排列。

最古的地层，在毛泽东外祖家大坪乡和他自己的故居所在地韶山乡韶山冲。韶山冲的边缘，环绕着一列庞大而绵延的大山，遂构成巍峨的韶山山脉；

以韶峰为中心的这组山脉，其内部全为坚不可摧的巨石，在韶峰、云富坵、车箩埂、木梓山、龙头山、黑石寨，均有嶙峋出露。伟大的造物主，在十亿年之前，似有意创造了韶山冲极其雄奇峻拔的型貌。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最原始而又最真实的状态。

在这些巨大的山峰之间，是深深的峡谷，这是造山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断裂——可想而知，当年，地球的内部，在这里曾发生巨大的升降、扭曲，在一阵阵震天动地的轰响过后，山峰与山谷显现出来。这些大断裂中，韶山冲基本呈封闭型，而杨林——银田断裂，则斜亘韶山全境，西北端于杨林乡、东北端于银田乡伸出境外，走向为北西——南东。韶山冲断裂和杨林——银田断裂在清溪镇附近相交。

这就是韶山地质历史上最初的状态。此后，经过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年，韶山山脉诸山较软弱的地方，逐渐被风雨雷电或新的地质运动分化出层层表土；植物也生长起来，韶山，这位本来裸露着强健筋骨的巨人，开始披上了绿装，由雄伟中显出秀丽。而那些深不可测的大断裂，也逐渐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泥土填塞而变成低平的谷地，只留下最为幽深的地方，作为水流的通道——这便是韶河（云湖河）。

在韶山，松树是植物界的骄子，它以庞大的“兵团”，以最伟岸的身姿，以最深沉的翠绿，占据了韶山所有的山头阵地——而且，愈是岩石重叠的地方，它愈是挺拔向上；它以其盘根错节，紧紧扣住山岩的肩膀，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奇观：在山峰那巨人一般的肩头，高耸起一个一个黛色的铁拳，仿佛都在向天宇呐喊、示威。

二、韶山夫如何？历代文人如是说

湘之西有韶山。山峻以复，泉洁以长；茂林修竹，云气往来。中可烟火百家，田畴沃壤。循流而下，至铁陂，两山相峙若门。然毛氏聚族于此，传十数世，风俗醇厚，储蓄殷饶。古传桃源莫过焉。若使在中原贵游之地，其不入道子之画，柳州之记乎？何韶山一区，有似乎脱颖者，为之卜筑也？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韶山，最初只是一座山的名称，并非一个行政区域。《读史·方輿纪要》八十《长沙府·湘乡县》中载：

“韶山，县南四十里，西有三峰；其山绵亘百余里，湘潭、湘乡、宁乡诸山皆其麓也。”这是《辞源》的转述，言简而意赅；不过，它是站在湘乡县的角度来记述韶山的。风水形家们，历来认为，韶山其脉，乃是由南岳衡山而来，“千里来龙，此处结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我们从《湖南地形图》上，也的确能理出南岳衡山到韶山的一条隐隐约约的线。南岳衡山，巍然拱起，巨大的身躯，虎踞龙盘，眈眈所视，在遥远的北方，于是高度骤降，急往北奔，每到风景秀绝处，便郁成一个大结，此结一解，依然北行，至湘乡西界，已是100公里，突然高耸，而成其第七十一峰——韶峰，正是：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韶峰，即韶山之峰，为方圆数百里最高、最奇、最险的一座山峰。它如同擎天之柱，直插苍穹，又似巨鲸涌海，喷起水柱万丈。早在宋、元时代，即有人登山临水，并给后人留下了优美的诗篇，同治刊《湘乡县志》载：

韶山，在治西北四十里（四都），鸭桥水出焉。山绵亘百余里，湘潭、宁乡诸水皆出其麓。宋·周行子《韶山》诗：潇湘云水梦中来，犹记蓬莱进酒杯。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昔年辛苦读丹经，梦里瑶台月自明。玉洞桃花今寂寞，风音亭下竹风生。元·陈邦光《韶山》诗：女郎遗迹寄山隈，灵凤亲传玉札催。彩翮已随仙驭去，危亭今向绀园开。天长望阔云踪远，林密阴清竹影筛。坐览行吟难尽兴，日斜归去首频回。邑人易祖槐，庭有《韶山》诗：

步履来山顶，孤筇破晓烟。
峰高青碍目，树远翠迷天。
采凤台犹在，丹炉火未燃。
神仙虽怪诞，千载到今传。

这里的“四都”，即湘乡县凤音乡四都，“凤音”之名，即缘于“韶乐声声，引凤来仪”。此处乃是湘乡与湘潭相邻处，而“韶山”其山，乃由湘乡四都，湘潭七都所共有，因为，它正处在这两县的交界线上。故此，两县的人们，都将“韶山”当作是本县的山而载入县志。韶山群山之中，秀美的风景点颇多——湘乡一边，有悬钟石，黄竹歧，鲤鱼峰（又称鲤鱼寨）……湘潭一边，有滴水洞、登龙台（东台），桃花洞、抱子石、八仙吹箫……最有魅力的当推韶山八景：韶峰耸翠，仙女茅庵；胭脂古井，塔岭晴霞；凤仪亭址，顿石成门；石壁流泉，石屋清风。比较起来，韶山及周围群山，大部分地域在湘潭县地，加以经大学者王闿运先生的生花妙笔的描绘，“湘潭韶山”扬名远近了：

西北山之首曰韶山。西界湘乡，东为书堂山。云湖水出焉，东南流七十里入于涟。其中多竹、兰、石炭。

旧云：韶氏三女山居学道，凤衔天书至而仙去。山上有凤音亭，其阴有东台、桃花洞。

其下则书堂山，与长沙山同名。临湘欧阳信本所居疑此，亦率更别业也。

云湖水出山下，而东流，过连益桥。桥东山行可十里，为罗仙寨；东北则宁乡之地——宁乡，故益阳所分，“连”则连道，桥盖汉县之疆，取二县为名也。

云湖水又东，稍南流，经高桥，有小水出铁石坳，经矮桥而入云湖水——“高”、“矮”相对而名矣。又东南得天子岭水，韶山因虞巡得名，故此名天子。

自岭东北，皆宁乡地，靳水东流而入于湘。岭南则云湖入涟。二水之间，山冈起伏，形家 以为县脉所行也。

云湖水又东南，得梅湖水，又南得仙女山水，下为小韶山，与韶山相望。云献参差，翠微双秀，其地皆在湘乡。下四都别有仙女山，旧图谓之仙女峰，非此山也。

山水东流，百三十余里，至下云桥，得灵神寨水；北有上云桥，跨云湖水。或又皆为“营”字，云前代团练屯营之地。

灵神寨水东七、八里，经清溪寺，又得一水，交流东注，至石坝桥南而入云湖水。

南流东折，经狮子山，上有石盆，夏旱不竭；洞多蛰燕，因谓之燕子洞。水屈东南，得球山水，山形正圆，西连狮子山，水出永义亭，经翟家山，为白玉泉。今县无翟姓，或改为“侧”。

又南得岩鹰坝水而届银田寺……

自此通舟，拨船转运，送租贩米，日夜往来。云湖船有三部（埠）：银田、灵宫及桥上也。舟载十斛，才用一人榜之，不须帆楫，惟持一篙，无阻风波，刻期而赴。或霜清春丽，命舫独游，亦临泛之别趣矣。 王闿运（1833～1916年），又名开运，字纫秋，又呼之壬秋。中国近代大儒，古文经学家、方志家、诗人。他壮岁奔走大江南北，与清廷重臣肃顺过从密切，又曾为曾国藩门下贵宾，晚年回乡，修志吟诗。王先生的家就在距韶山冲40多里的七里铺（距韶山银田则仅20多里）——韶山冲为七都七甲，七里铺为七都十甲。祖宗世居其地的王闿运，对韶山一带山水自然是非常熟悉的。王闿运因为修了名志《湘潭县志》而享誉方志界，殊不知，也正是因为他亲历韶山，以与《水经注》类似的笔调描绘了韶山，才使该志熠熠生辉。王闿运赖有其对韶山一带的细致观察，才写出如此纯朴秀美的文字，韶山，也因了这位大学者，在毛泽东诞生前四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就开始引起了一些文人学者的注意。当然，真正了解韶山的，还是韶山当地的人们。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第一次修族谱，其主持人毛尔达邀请附近湘乡籍的“布衣”周定宁，一同游历韶山冲，写下《韶山记》：

韶山，楚南一名山也。祖西华，面南岳，《盘古舆图》按：轸宿在玉衡；天文昭曜，其辰在巳，星在荧惑，五行在丙，天市在西垣，次舍在鹑尾，细度在轸十六度也。

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濛濛地涌，水飞雪浪之花； 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

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凤音亭，丹凤含书；胭脂井，紫龙吐沫。

上麓天马凌空，岱上灵鱼不老。褒忠，贞女来朝，相随鹏山白鹤；崩护，石人抱子，引将东骛凤凰。

乌台石盆，草衣崖畔，湘西狮子，石羊入山。

左湘潭，右湘乡。风云际会，前金后紫，龙王雨露同沾。登望而咫尺星沙，转盼而韶山罗列。

青草湾，金鸡观，秀丽花园；铁陂塘，枫梓山，恢宏乌石。平地斑竹，竹山青葱四季。南岸创石，石洞雄壮。

长天，黄田，白田，月城，山之保障；黑泥，花桥，桃树，山之前朝。

钓水洞，鲤鱼寨，鱼龙变化；青山寨，文林寨，虎豹风生。太乙观，中夜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女仙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

九天韶乐，时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依圣境。

果然特地乾坤，信道崭新日月。不仙不道，眉山、盘谷风规；产乐产花，桃洞、天台景象。皓月是长明公不老，白云乃不速客频来。绘动风常清，山麓松垂露，轻洗妖氛。

惟阅此山，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四时之景，恒周一道，同风永

远，乃述题数语，聊缀七言：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

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韶山记》是一篇骈赋，虽然这种早在隋唐已渐失去生命力的文体，多少限制了周定宁的思路，但此赋乃是历史上全面、细致、准确地从风景的角度描绘韶山冲的第一篇文章。

在周定宁的笔下，韶山的位置，来龙去脉无不备述；山形山势，跌宕生姿；神话传说，信手拈来；风景点，动人处概而括之。比如崩护山（即石人抱子，在滴水洞），狮子山，石羊，花园冲，铁陂塘，枫梓山，南岸，石洞冲，太乙观，白莲庵，韶峰庵，仙女庵，桃洞，天台……均是人们今天到韶山犹能见到，或有遗迹可寻的胜境。

虽然自古以来，常有文人墨客翰墨淋漓于韶山风景，但数千年里，韶山在人文领域一直默默无闻，“韶山”，并没有真正走出韶山——韶山之为普天之下瞩目，则是在毛泽东诞生以后。

这位中国巨人自韶山脱颖而出，后文将详述，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毛泽东，也曾以散文笔调描绘他的故乡。

1916年6月下旬，毛泽东闻母病，心急如焚，急欲回韶山探母时，却又逢天不作美，阴雨绵绵，更可恶者，南北军阀混战，兵士充塞于途。但他归心似箭，于26日清晨急忙自长沙赶至湘潭，然后步行往韶山。

到韶山境内时，天气放晴，他喜不自禁，他觉得他母亲——慈祥的文氏似乎就在他面前了，他放眼望去：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图画。”这是毛泽东到达银田寺——韶山的东大门，他提笔在黄昏的微光中，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上写的，让他也来分享游子归家的这一份快乐。这成了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

篇写景散文。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又回到阔别32年的家，他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登上父母的葬地，站在溪上小桥，看着巍巍韶峰，尽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浸泡在滴水洞内那一汪碧清的灵泉里，洗卸他数十年的戎马风尘，看山，味水，思人——晚间，他睡不着觉，秉笔写下了这样一首咏故乡的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三、韶山古文化的见证：雷公铲、古陶、 欧阳询的书堂山以及关公斩妖的传说

韶山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类？关于舜帝在此奏韶乐的传奇自不必说。在韶山冲群山南麓，有一个大坪乡，那是毛泽东外祖母家所在地——毛泽东的根一半在那里。大坪乡有座山寨，据说雷公和电母曾在此显灵，所以当地人称之为“雷祖”。人们在山间翻地耕种时，千百年来，总能见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什物——许多石头，不像天然生长，而呈刀形、斧形、铲形——这，莫非是雷公留下的遗物吗？“雷公铲”这个名儿便出现了。

人们哪里晓得，这些雷公铲，经专家鉴定，竟是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

还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韶山就有了人类。

这，正与大舜南巡至韶山的时代相吻合。莫非，这些磨制石器，正是舜帝时留存的？

也许，大舜不但在这里驻听韶乐，而且，他还留下了他的农官，将中原的耕作技术带到了这里。……

舜帝南巡，是汉民族文化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传播——舜帝所经过的区域，大致是汉民族领有的区域。舜帝老死苍梧，即今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其地在湘、粤交界的五岭，这告诉我们，四、五千年之前，汉民族文化影响的南界止于今湖南。舜帝大致是沿了东经 112° ~ 113° 线，跨今三个省份 1050 多公里（直线距离），由汉水下湘江，入洞庭，再溯湘江而至湘南——湖南境内舜帝的神话及有关的遗迹，如洞庭湖君山舜帝二妃墓，都在这个范围内。而韶山也正在东经 112° 与 113° 间，舜帝到此的传说，当不会毫无根据。

舜帝死后，已受禅让的禹，成为汉民族各部落的统领。相传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韶山正处在荆州之域。历夏、商、西周，至战国，乃属于楚国。虽然舜帝已于此前一千多年给韶山带来了人文之气，但到此时尚是原始的“南蛮”之地。屈原放逐，曾至沅湘，忧愤至极，作“怀沙”而沉汨罗，由屈子《涉江》可以知道当时三湘之地的落后：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诸而反顾兮欷歔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擊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入淑浦余僵偃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韶山比沅湘两岸人烟还要稀少。那时，它属于由荆楚向“苗蛮”的过渡地带，几乎没有汉族人居住，只在其边缘有极少的人迹活动。

但是，距离韶山只有 30 多里的湘乡县城，战国时却已聚居着不少人口。

1958 年，湘乡城郊牛形山发现一庞大战国墓群，从东北往西南绵延 10 余公里，计 5000 余座，出土除农耕器具、生活用品外，主要是戈、矛、剑、镞和车马器。已清理的两座中型墓为 2 停 3 棺，有宽敞的墓道，墓坑为 5 级、9 级台阶，墓主为卿大夫一类贵族。

无疑，湘乡文化对韶山产生了最切近的影响。

1985 ~ 1988 年，湖南省博物馆，湘潭市文物队，来韶山实地勘察，也发

现了一批古墓葬，出土了大量古文物。其中，在永义乡白玉村黑皮冲一个长约 100 米的山岗上，两个高 2 米、底径 12 米的半圆形封土堆内，发掘出陶鼎残片，几何纹、钱纹青砖，鉴定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这证明，韶山人类居住的历史至迟可上溯到战国或西汉。

到了东汉，天下大乱，战事频仍；尤其汉末，三国鼎立，时属荆州的湖南，成为重要战场，长沙城数易其主。建安二十年（219 年），孙权袭取了荆州。

民间传说，蜀国大将关羽策马由长沙方向而往西南，望见一处地方茅封草长，无路可寻，但他不顾路险苔滑，望山深处而入，正行间，山冲内窜出一头蛇形巨兽；关公略一惊，随手拈弓搭箭，猛发一矢，那兽咆哮一声，呜呼倒地。云长朗声一笑，将劲弩甩向东南，提起青龙偃月刀，继续前行……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斩蛇灭妖的英豪，便在他立马射箭的溪边小山嘴（韶山嘴）上筑庙，叫关公庙；溪上建桥，称关公桥。关公所遗之弯弓犹存，那就是毛泽东故居附近的弓箭牌山。

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东汉时，战争的确对韶山发生了影响。这是因为，这里与长沙城的直线距离不过 50 多公里，而湘江就在 30 多公里外蜿蜒；蜀国大司马蒋琬的故里湘乡更近……当战火蔓延到湖南中部时，人们纷纷逃离本乡，寻找避难之地——韶山，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的这个多山林密的地方，成了最理想的所在。不但贫民百姓逃至此，而且富人与官户也来到这里。试看东汉墓葬的发掘情况便可以知道：

就在距传关公射箭处仅几百米的新塘山上，便发现了一处东汉墓。同时代的墓葬，在韶山境内共发现 25 处之多。

在这些东汉墓中，出土了几何纹、钱纹青砖、布纹硬陶片及青瓷碗、壶碎片，甚至还有完整的陶罐、铁斧架、铁斧和剑。

要知道，经过 1900 多年，多少人文陈迹为时代之潮淹没，这 25 处先民遗址，应当是极能说明问题的。

这些墓葬分布的地域，更是有耐人寻味的特点：

只有韶山村新塘山、朝阳村大冲两处位于韶山的中心地带，其余都在与邻县（尤其是湘乡县）交界的地方。由东汉墓分布方位与邻县接近的特点，可知韶山的边缘地带曾直接与战争发生联系。1990 年 5~8 月，银田乡槐新村出土 39 件东汉文物，极能说明问题：1 号陶缶，胸围 64 厘米，颈围 42 厘米，口径 15 厘米，底围 55 厘米，高 31 厘米，呈红褐色。类似的陶缶共有 5 个，其中两个红褐色，一个灰色，两个白色。圆形陶制酒杯 1 只，胸围 17 厘米，口径 4 厘米，底径 2.5 厘米，高 2.4 厘米。铁剑 5 把，内完整的 1 把，长 67 厘米，腰宽 2.6 厘米，颈宽 2.3 厘米，刀尖宽 0.7 厘米，椭圆环柄直径 5 厘米。3 足铁香炉 1 个，3 足瓢状铜壶 1 把。……看了这些，一幅三国时代群雄角逐湘中的图画可以勾勒出来了——随着人喊马嘶的嘈杂声，蜀军仓惶失措，撤出长沙，慌忙往西南奔逃——东吴已卡住湘水、长江扼口，蜀军只得取道湘中，经今宁乡、韶山、湘乡退入贵州而回巴蜀。一队人马，搅得满天灰尘，驱赶了大量百姓避往韶山的林中。蜀军登上槐新水口山，回望长沙城，已在百多里之外，方停下脚步。一位将军命搬出三足香炉，他亲手点燃线香，以壶酌酒于地，仰天长叹：“唉，老天亡我！”将军举剑，涕泪涟涟，把 5 柄宝剑分置于缸中，然后掘一洞，埋入土内，算是对战死者的祭奠……韶山，这块由湘西南往湘西北，或由湘东往湘西的捷径之地，屡屡受

到战争的冲击。三国归晋后，社会趋于稳定，战争也减少了；韶山，重归静寂；人烟，复又萧条。这一时期墓葬，仅在大坪乡大坪村黑门桥山和韶山乡朝阳村毛田山各发现一处。

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以后。南北朝时期，战事虽甚，却多发生于中国北部和东部；南朝宋、齐、梁、陈虽有更替，对韶山一带影响并不大。

而盛唐灿烂的文化，却强烈地辐射到了韶山。韶山冲滴水洞附近有一座书堂山，正是因欧阳询而得名。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长沙）人。因父犯了谋反之罪，朝廷要斩草除根，据说欧阳询便逃避至此，在八亩田筑草庐，练书法。后来，顺着山间一条小溪，往东南而去，辗转来到了长安，在唐太宗身边做官。后人便把他隐居过的那座山叫“书堂山”，其下山沟称为“书堂冲”，沟内流出的小溪，命名“官港”。

另有古墓葬及出土文物，证实唐代韶山的情况：

杨林乡善扶村蒋家湾，樟木坵和磨石村唐代墓葬中，出土了素面青砖，青瓷小缶，粉盒及开元通宝，经鉴定，均为唐代文物，证明唐代文化在韶山也显示了它折射出的光芒。

由战国、东汉墓的兵器，到唐墓的生活用具与钱币可推知：居民已从避难者（甚或就是战争参加者）演化成了一般的商人、富户，而且由短留而变为长居。

1989年9月，又在清溪寺遗址（今韶山市政府所在地）发现一块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重修该寺时所立的石碑，碑文言：

湖广长沙府湘潭县三十九都清溪山法海寺……伏以清溪福地，乃唐朝上吉之造。

可知，佛教也在唐代传入了韶山，韶山最早的公共建筑即是清溪寺了。

而如意乡综合场村，远在一千多年之前，就有了陶瓷制造业。这里的曹家坝，留存着一处面积5000平方米，文化层0.1~0.3米的唐窑窑址；虽未见完整的唐三彩工艺品，却有绿釉、豆青釉，黄褐色釉瓷片，呈碟、壶等形状。显然，这里曾有过一个手工业作坊，烧制各种器皿。烧瓷制陶延续至今，这里的如意陶瓷厂，曾用20口陶缸，装上故乡的土，栽了故乡的桔树，运往北京毛泽东纪念堂……

1989年，杨林乡白鸽村出土了四件重要的宋代文物：

一个外径10厘米，厚0.2厘米的青铜镜，背面有两道浅圆圈；

一把铁剪，长34厘米；

一个锥形双龙陶瓷瓶，高45厘米，最大直径27厘米，口径15厘米，颈口径6厘米，底径8厘米，厚0.6厘米，重4.85公斤，深褐色，饰七道荷叶波浪式花纹，瓶肩部有双龙。

同时出土数枚熙宁通宝和元丰通宝，这是北宋神宗（1068~1085年）时的货币，此时，距唐末还只有一百多年。

宋代，虽然经济与文化相当繁荣，但在军事与外交上几乎一无可取。少数民族不断南侵，宋王朝自汴梁南迁至临安，这就苦了北方的人民，他们不得不抛弃定居了数百年、数千年的黄河故土，而扶老携幼，跨过黄、淮，而至陌生的南国。

宋代发生的空前规模的人口大流动，虽然是在战败后不得已的背景下发生的，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尤其是中原人民给南方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因此，至元代，南方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从北方南迁的“宋人”，元时遍布江浙，也有继续西迁者。宋末的移民，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而不是像大舜南巡一样，由汉水入长江，进洞庭，上湘江。韶山因处在尚未开发状态，迁来的人口并不多，大部分是前代就已定居于此的人们（比如清溪寺僧）。他们赖自然之封闭，物产之富饶，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生活。

四、老和尚的怪梦与朱元璋陈友谅之战， 明初的大移民与韶山的大开发

光绪刊《湘潭县志·赋税第六》载：

“自元以前，户口无纪。延祐二年（1329年）分拨赐户，湘潭六万五千户，计更有来拔赐者当不下十万户。”若一户按4人计算，湘潭县人口在元代至少达到了40万；其时，今韶山大部分隶属湘潭县，估计人口在100人以上。奇怪的是“明洪武初，（湘潭县）计户才四千六百五十三，男妇二万零五十三口。”与元时相比，明初人口只有原来的1/20！也许有一个神话能解出明初人口暴跌之谜：说的是云湖边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庙，庙内有个老和尚。一天夜里，和尚忽然梦见一白衣秀士向他求救，僧人恍然惊醒，却已不见其人，便四处寻找，终不可得。次日，徘徊湖滨，仍觉狐疑，猛见湖中浅水处，两头巨牛，一黑一白，正拼死相击。白牛年迈体衰，渐渐气力不支。僧人急忙拦住一过路农人，问道：“这是谁家的牲畜，任其在此角力？”“哈哈！”农人朗声大笑，“这牛已在湖里斗了三天三夜，哪里有什么主人？！”老和尚回想晚间梦境，这才大悟。急回寺内取出他的防身绝器，奔到湖边，使出平生练就的功夫，奋力望湖中一掷，一颗弹子直向黑牛飞去；哪料黑、白两牛在激战中瞬间交换了位置，弹子误中白牛，一声哀叫，白牛瘫入水中。黑牛失了对手，欢呼雀跃，在云湖间上窜下跳，搅得湖水似沸腾了一般。忽然，猛听一声巨响，湖堤溃决，一泻千里。从此湖水干涸，人们失去了鱼虾之利……

这个神话，颇耐人寻味。后为王闾运先生采入县志。另有《云湖郭氏族谱》“古云湖”诗下部分记道：

秦时夕照汉时村，大明天启众张日。
山水浸渍日泱泱，白云深处白龙乡。
湖翁一梦两龙斗，夜中摩索月中戕。
悸梦悸见真慄惶，一发倾倒血元黄。
白茫溢起蓝桥水，乾坤动荡改天方。
仙人有石关山远，地轴翻处海波强。
湖内湖外高低一，一溃湖倾湖尽出。

神话，本产生于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的不可理解和猜想，但有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事不能直说，而又不能不说，于是借事寓意，暗含影射。

这个神话，是不是反映了明天启时，这一带曾发生特大洪涝或地震呢？

不可能。洪涝与地震，到了明代，中国人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可以秉笔直书，而毋须再借助神话来表现。

事实上是，这个神话当属对朱明王朝的“讽喻”。

元末，南北方人民不堪忍受元统治者的沉重压迫，纷纷揭竿而起。在长江以南，形成两大对立的农民起义集团——朱元璋集团和陈友谅集团。朱元璋占据了江浙一带，陈友谅囊括湖广，江西成为他们的拉锯地。至正二十二年（1363年），朱、陈大战鄱阳湖，朱拥兵20万，陈号称百万，结果是陈友谅大败，他本人“中流矢而亡”。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湘潭、湘乡一带曾纷纷响应，至正八年（1348年），湘乡人起来，杀了知州王文彪，至正十二年（1352年），易华起义，其势发展至邻邑七县四十八寨，而且与陈友谅相呼应，时陈为汉王，授易华为湖广

参政。易华成为元末湘中地区最出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

至正十五年（1355年），易华两次向陈友谅提供饷粮十万八千石。此事在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并降服易华之后被发现，朱元璋得了陈友谅的粮册，知道了湖南人曾大力资助他的敌人，恨得咬牙切齿，便按当年易华向陈友谅提供的粮数加倍征取，永远照纳，以示惩罚。

人民不堪重负，在易华领导下再次起义，邻近各县纷纷响应，反抗朱元璋暴政的烽火燃遍三湘。时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

次年，吴王朱元璋大举北进，在这之前他认为湖南人有意违抗他的命令，遂遣大军西讨，所经过的地方疯狂残杀，湘潭、湘乡一带尤其惨烈，人口急剧下降，湘潭由此便只剩下两万余人了！

湘潭、湘乡一带的民众，尤其是惨遭屠杀后幸存的人们，久久不能忘怀明初的鲜血淋漓。从感情上说，湖南人是偏在陈友谅一方的——当初帮助陈友谅，或许是出于盲从，当朱元璋血洗湖南之后，人民便鲜明地倾向陈友谅了。但陈友谅已死——人们只得杜撰两牛（即龙）相斗，误杀白牛来讽刺朱、陈相争。

酃阳湖，被湘中人民似真似假地搬到湘潭县西北韶山一带来了。

这个神话另一重要内容，无疑是反映了湘潭、韶山一带大自然的一次极重要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又是与朱元璋密切相关的。

朱元璋战胜了陈友谅，以及随后对支持过陈氏的湖南人民进行了报复，使人口降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为此，朱元璋即帝位十七年后，即1385年，他下令向湖南移民，以填塞人口之不足。于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由朝廷主持，规模宏大的、由东向西的人口迁移开始了。

朱元璋破坏了湖南中部及韶山一带的桃花源式的封闭生活，却使这里获得了大开发。

湘潭、湘乡以及这两县交界处的韶山，今天最主要的姓氏，都是在元末明初迁入的，且以原籍江西的居多，这从各姓氏所修族谱可以知道：

刘姓原居江西南昌丰城、安福，元末明初经湘乡林家湾及宁乡入迁今韶山如意、杨林等地；

苏姓原居江西泰和，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迁入韶山；

周姓祖籍江西庐陵，明洪武初入迁今韶山杨林乡周家湾；

庞姓本居江西玉山，明永乐（1403~1424年）经茶陵到湘潭，迁入今韶山清溪镇老屋湾；

彭姓原居江西安福，明永乐年间入迁今韶山乡花园冲；

李姓原居吴西，明永乐五年（1407年）入迁湘潭，后迁韶山石洞冲；

罗姓原居江西，明代迁湘潭云湖；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湘中地区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入和大自然的开发，正是从明初开始的。在此之前，东汉、三国虽然也给韶山带来了人口冲击，但那不过是战争的不正常影响，来到这里的只是一些富豪——他们作为避难者暂居，或者是一些将士，在这一带展开血战，而留下了他们的尸骨与兵器。

东汉至元末，韶山多少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大自然——不仅仅是西北部的山林，还包括山间的河谷，都没有得到大开发。当众多姓氏由朱元璋（明太祖），朱允炆（明惠帝）、朱棣（明成祖）驱使着来到这里时，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远处，朦朦胧胧的大山，山内层林密布，鸟兽出没，类似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一个又一个的山冲，冲内，茅封草长；山冲的

外面，山脉缠来绕去之间，是开阔的谷地，长年积水；地势低洼的地方，形成大面积的沼泽，沼泽连片，而为串串湖泊；尤其是春夏之交，这一带的黄梅雨和地形雨，绵绵不歇，达数月之久，常常引发山洪，向东南部贯注；由于古云湖河七弯八曲，又无其它排水设施，水流不畅，整个山间谷地，泱泱一片。这多雨季节积存下来的雨水，可以保存至秋冬，只是在旱季，湖水要少许多，一些地方露出浅底。

大片沼泽的存在，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潜在的资源。唐、宋、元移民给韶山带来了手工业生产技术，但这些人们，还远未向原始森林和大片沼泽举起拓荒的锄头。他们为了逃避猛兽巨兽，不敢进入大山；为了不受洪涝之苦，他们又远离水滨——这几个时代的人们，选择了大山与沼泽之间的高地筑室而居，从已发现的几处古窑址看，都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要知道，他们是最早给这个偏远的地方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手工业作坊，并敢于长期定居下来的人们。

明朝中期以前，迁入韶山的人员不多，尚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或以狩猎，打柴为生，或籍捕鱼捞虾为业，也在水源充足，又不致受涝的地方开垦少量稻田。但是，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繁衍，使吃饭成了大问题，渔虾、猎物当不了粮食，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湖泊——本来，云湖其实并非洞庭、鄱阳那样的深水湖；它的大部分地区，除了洪涝季节，只能称为沼泽；旱季，积水便不很多，这不多的积水又是水稻所需要的。因此，只要解决了雨季排水问题，这云湖就能成为粮仓——而且，这也是唯一的选择，——云湖两岸的山头（山冲低地除外）是不可能出产粮食的。

这样，人们——迁入的，与原居此地的，开始了他们艰辛的拓荒。他们使用着简陋的生产工具——锄头、篾箕，以各自为政的形式，在沼泽中间，开挖出一条条沟壕，将积水排出；各家各户，还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地势高低，垒起一条一条弯弯曲曲的田埂；埂内便是适合水稻生长的地方。杂乱的水草被拔除，沼泽内的毒物用石灰除去……这样，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山间与沼泽，出现了一丘一丘形态各异的良田。这些田地，既有较好的蓄水条件——水稻抽穗及壮籽之前，将田埂上的活动缺口用泥巴塞住，田内便汪汪一片，正是稻秧所急需；它又具备良好的排水条件，缺口挖开，积水注入沟壕，归入云湖河——云湖中一条最深的天然河。

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大片良田出现了，而长数十里，宽数里的云湖却渐渐干涸，只留下一条蜿蜒的云湖河以及纵横交错的河汉塘坝……云湖驳子（一种小木船）在云湖河荡漾，将这里出产的谷米运往涟水，直下湘江；又从湘潭、长沙运进布匹，食盐……

不单云湖得到了大开发，而且，西北部山区也迁入不少人口，其中毛、李二姓成为韶山冲的主要姓氏，他们在韶河（古云湖河）上游河谷，垦植了大片良田。韶山冲真正走出荒凉，也是由此开始的。在韶山学校田径场出土的一面铜镜和师公符铜印——斩鬼土印，确证元明时代这里不但有了居民，而且出现了师公之类的迷信职业者。

大自然既然得到了开发，社会经济便较快地发展起来。明代之前，还只有清溪寺和几处窑址为居民较为集中的地区，到了明宣德十年（1435年），即明朝建立后67年，在古云湖北岸，云湖河中游，兴起了一座江西会馆（后称万寿宫），明初从江西迁来的人们来此聚会，以慰乡思——由江西会馆，足可见云湖两岸江西老依人数之众。

过了4年，在江西会馆西南半里处，来了一些僧人（可能是由清溪寺来的），为了收尽终日涕泣于云湖上空的成百上千的冤魂，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来化解明太祖与湘中人民结下的冤仇，他们倚山傍水筑起一座庙宇——取清静平安之意为静安寺——当大片田园出现，寺僧希望它能永保平安，故易名宁田，后又改为银田（现为韶山银田镇）。

江西会馆与银田镇，正处在由湘乡县经湘潭县、宁乡县往长沙的捷径上，又有云湖河水运之便，远近物资——韶山冲的柴薪、木材、猎物，古云湖上的稻谷，都在这里进行交换，或者下河运出县境，久而久之，环绕银田寺，形成了一个集市，称银田镇。它成了保存至今的韶山历史上第一个集市，也成潭、湘、宁三邑交界处一个重要墟场。

银田寺内，植于明代的一株古银杏，因为与“宁幸”偕音，几百年来，备受人们爱护，至今撑天立地，郁郁葱葱。

五、久经战乱，“反民”后裔成了“顺民”； 追随着曾国藩，这里冲出一股杀气腾腾的湘军

明末到毛泽东诞生前后，韶山的自然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明末清初，湘潭、湘乡一带成了明兵与清兵络绎之地。顺治四年（1647年），清兵攻取潭、湘，五年八月，明将陈友龙来此，接着，马进忠、牛万才数十万人马，从常德方向经韶山溃退至湘乡，分驻四十多里，焚掠三月，次年在湘潭与清兵遭遇，千村血洗，万灶烟寒，四乡无一片干净土，甚至于韶山冲那样幽秘的地方，也遭了战争洗劫——滴水洞外木梓山下的竹山大屋，乃是毛泽东四世祖毛震所砌，明末竟为“八贼所毁”。

而另一方面，经过众多姓氏数百年的艰苦努力，云湖河两岸，乃至各个山冲角落里，都出现了一片片的水田。荒凉的山谷，也不是动物们的领地了，而住进了三三两两的农人。人们的吃饭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商业繁荣起来。只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韶山，又将是一个世外桃源。

但到了清朝后期，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地主和有军功的退休官佐们大量收头、兼并土地，随着国力的衰竭，朝廷捐税日益加重。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内外交困，软弱无能，地方官横征暴敛，人们受着双重压迫，终于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势如破竹，大举北进，湖南，便成为起义军出桂之后不可逾越的第一站。

可惜的是，中国的这个内陆省份——湖南，似乎还没有感觉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清王朝的不可救药，除了部分响应太平天国的之外，更主要的是从这里杀出一伙湘军，挡住起义军的去路，为首的正是湘乡（与韶山相邻）的曾国藩。

曾氏生于1811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不久的1853年3月，受清廷之命，担任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主要是湘乡、湘潭、韶山一带募兵，以镇压太平天国；次年2月，一支17000多人的水陆湘军，杀气腾腾地向洪秀全奔去……

湖南人中，本有一句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如今，却被曾国藩鼓动起来，于是，又有了另一句话：“无湘不成军”，人们——包括一般的老百姓，竟视参加湘军为光荣，纷纷投笔从戎，弃耕从军。

这也许反映了从江西等地来的移民的后代们，默默地当了几百年“顺民”之后，出于一种封建正统思想的熏染，他们也想去建功立业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作为钦差的团练大臣，曾氏以一整套律令强制人民参加到湘军中去，光是湘乡一县，至咸丰六年便有数万人从军，前后死亡两万人；而与湘乡紧邻的韶山，也介入到这股狂潮之中——这是这个地方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

满清的统治，在湘军的大力撑持下，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短时间的回光返照；而作为为此建立奇勋的湘军，上自曾国藩，下自一般将领，也因此门楣生辉。

比如湘军的老巢湘乡，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除了曾国藩、曾国荃等最显，以武勋叙官见于志者，文职总督以下356人，其中总督1人，巡抚4人，布政使4人，按察使5人，道员31人，知府41人，知府以下271人；武职提督以下7533人，其中提督180人，总兵404人，副将569人，参将

564人，游击939人，都司1138人，守备1538人，千总1200人，把总1001人；各次战役阵亡和军中病死共达21044人。

单是韶山210.38平方公里上，提督、总兵一级的高官即有26位，平均每个乡镇就有三、四名。当然，真正大发战争横财的，在这些人中间也是少数。

胡裕发（1825~1890年）、人称胡胜七。咸丰元年（1851年）入湘军，转战湘、鄂、赣、皖，因功升五品。1852年，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次年，攻打江西湖口梅家洲坚垒，获“骠勇巴图鲁”（勇士）称号，升副将。1853年，攻破太平军江西九江府城，升总兵；1859年，石达开围宝庆，胡解围，任湖南桂阳营参将，胡胜七未就任，返皖；1862年，升湖南镇总兵，9日，同治帝下诏，称赞他“智既深沈，才兼恢杰”，授振威将军，湖南提督；4年后回乡。1890年死后，其墓葬气派豪华，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韶山。

成涤泉（1828~1878年）名定康，涤泉为号。咸丰十年（1861年），充任左宗棠幕僚，转战浙、赣、皖、鄂、由训导升至知县、知州、知府，赏戴花翎；同治七年（1868年），任陕西绥德知州，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为左宗棠悍将，因剿义军李金生、刘永正、徐永发有功，升陕西延榆绥兵补道，后任甘肃甘凉兵补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等，获“吉勒通阿巴图鲁”（勇士）称号。光绪三年（1877年）卷巨款回韶山。

何龙轩（1820~1865年），名泰辰，字云从，咸丰八年（1858年）随湘军将领萧壮果往茶陵、攸县及江西，攻城数十，保参将，赏花翎，1859年，追击石达开入桂，从太平军手中夺兴安、灵川、桂林；1860年，入川，镇压滇，川起义，攻陷河坝场、牛腹渡、大邑县，火烧连营七十座，攻眉州，青神，擒周郇；升正一品提督，赐“御勇巴图鲁”（勇士）号，补甘肃肃州挂印总兵。1865年死于任上。

还有张伟卿，咸丰元年（1851年）入湘军，1865年任总兵，1867年，受左宗棠之命，率楚军前路克陕西鄜州、绥德、云岩、羊角城，1869年升为提督，封“勇士”号，诰封三代，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谭拔萃，年青时入湘军刘松山营，同治初，在攻打安徽休宁、黔县太平军时，赏五品顶戴，1867年入陕镇压西捻军，升副将衔参将，1868年随刘松山镇压东捻军，升提督衔总兵，封“策勇擒寇”号；1870年返陕，镇压回民，深为左宗棠赏识，荐为代理宁夏总兵，赏黄马褂。1876年随左宗棠出玉门，驻甘北，攻达坂、吐鲁番，取乌鲁木齐诸城。章合才，咸丰三年（1853年），入湘军，转战湘、鄂、赣，围剿太平军，赐花翎与“振勇巴图鲁”（勇士）号；1865年与刘松山等在苏、鲁、豫等省镇压捻军，升提督；1876年任江西九江镇总兵，1883年后驻澳门，次年驻守吴淞，抵御过法国军队。

在毛氏家族中，则有两位因军功被授以高级将衔，一位是毛正明（1832~1901年），字恒忠，派名恩坎。咸丰十年（1860年）入湘军，同治间曾参与对外作战，并得提拔，此后镇压太平军、西捻军、回民起义立功，封勇号，升为花翎提督、补用总兵。晚年回乡。一位是毛有庆（1834~1924年），因镇压太平军，升为总镇，1866年，随左宗棠平回民起义；1876年参加讨伐阿古柏叛乱，阻止英俄侵略新疆，钦赐提督，授“建威将军”。晚年在韶山度过。

小小的韶山，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然出现如此多的将级人物，真是“群星闪烁”，可谓人文鼎盛空前。他们几乎经历了十九世纪中国所有的

重大政治风云——有太平天国、陕甘回民、捻军的大起义，有曾国藩、左宗棠（亦湘乡人）等人的镇压起义，有外国侵略与清王朝的屈辱，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而这些人，一律地在外做了大官，他们中除极少数几个随左氏参予抵御外寇，捍卫过祖国尊严外，大部分人的所谓事业，其性质是可想而知的。

当他们中一些人回到故乡韶山，带回了大笔财富，便大量买地圈宅，给当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开始失去土地，大片良田，流入白银张着的大口，到了少数大官僚手中，这些官僚因此而成为大地主，并且荫及子孙。

这些大官僚地主中以成氏最盛。一品荣禄大夫成涤泉，在绥德为官，侵吞巨额救灾款后潜回，以云湖驳子装载着金银，运到他的老家石湖塘，开始振兴他的家业。不料事发，清廷派人前来追查，成涤泉装扮成一个养猪的，蒙混过去，而以其妹夫代他斩首。

成氏在这片沃野边缘，筑起他的大庄园。石湖塘是他的大本营，他又将他的几个儿子及若干孙子，派驻大团湾、山下岭、北岸、大方塘、大桥湾等处。这几个地方，处处是高宅大院，两层三砂混凝土，掺和糯米筑成，高达十多米的围墙，将一块有现代一个半足球场大的土地圈入其中，两墙之间，掘有月塘，相当于一座城堡的护城河，既可防盗，防火，又可居家提水；墙角设数道槽门，门内蹲伏着大狗，有些还修了炮楼，箭孔……在两墙护卫的最深处，便是成氏豪华的居室，高低错落，门楣纷杂，一律的青砖青瓦、马头墙、照壁，里头形如迷宫……

今天来到韶山，可看到清末、民国初大地主庄园保存还较完好的遗址，如石湖塘、桥湾里、何家塘、勒马山、山下岭、大塘湾等。

以章合才的颜家湾为例，便足可见其何等气派：

颜家湾在今大坪乡，原为颜姓产业，同治三年（1864年），为湘军将领、提督军门的章合才购得。

章氏将颜家湾大大扩充了规模，光是内墙之间便有九十米见方，外墙之内的范围便可想而知了。

大院分前、中、后三进。每进居中为厅堂，两侧为书房、卧室；上厅悬匾额曰：丕振家声。中厅题：家栋国干。这是清代兵部尚书彭玉麟所书赠。其左为餐厅、厨房，其右有畜舍、牢房、杂屋；又有花园，园内设假山、亭台、池榭。

全院有108间房，伞柱就达108个。

据统计，在韶山，仅占人口6.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68%的土地，而占人口71%的贫雇农，却只有5.8%的土地。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报私仇，血洗湖湘，人民敢怒不敢言，只得借助两牛相斗的神话加以讽刺，而过了数百年，被明太祖迁来的江西人之后裔，眼看着十几代的人们辛劳垦殖出来的大片肥田，被成氏之流血淋淋地割去，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得又构想着一个神话：

“卧湘潭，厨宁乡，吃湘乡”的狮子山复活了，它从石湖塘那边踱过来，蛮横地霸住在韶山中部，每当清晨，湘乡金鸡观的雄鸡报晓时，它便伸伸懒腰流着涎水出来吃禾，一口

第二章 追溯毛氏家族的源流

一、毛伯——周文王第八子郑，以封地而得姓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放到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将会发现：他的思想之根，得之于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哺育，他的产生，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述，汉民族的祖先，五帝之首的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生了25个儿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长子玄囂，因居姬水而取姬姓。玄囂又生蚘极，蚘极生高辛，高辛即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之时，有一位女性，叫姜嫄，一日，姜嫄在野外行走，突然看见一行巨人的足迹，这足迹一直往很远的地方延伸而去；她的心瞬间感到一阵震颤，继而产生一种极大的愉悦，她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足合上那巨人的足迹，也跟着往前而去……过了许久，她怀了孕，生下一子。因为是“践迹而孕”，她认为所生的孩子不吉祥，于是将婴儿丢弃在一个窄窄的巷子里，哪知那孩儿生来神异，牛羊经过，看到地下呱呱啼哭的婴儿，都躲开来，生怕踩着他。姜嫄又想将孩儿放到树林里，林内正有许多人，只得走到小河边，将孩儿放在冰上。几只鸟飞来，用翅膀温暖孩子。姜嫄终于知道，这是个神孩，她便重新抱起，自己抚养起来。

“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个美丽的神话，见于《诗经·生民》，西汉司马迁又据此在《史记》中加以发挥铺陈。

那么，如何理解这个神话？

原来，姜嫄就是帝喾的“元妃”，即第一个妃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姜嫄则是黄帝的曾孙媳了。

为什么不直接讲弃就是黄帝的第四代孙，亦即帝喾的儿子呢？

弃，其实就是帝喾与元妃姜嫄生的孩子。不过，帝喾与姜嫄是在野外“自由恋爱”结婚生下弃的。帝喾的时代，尚是一夫多妻制，到了《诗经》的创作年代——西周中叶，周礼已十分盛行，男女之德尤其重要，周人以诗记述其祖，不大好明讲帝喾“自由恋爱”事。

所谓“巨人足迹”，其实就是帝喾的足迹，姜嫄履其足迹，生下一子，不能抱到宫庭去，遂一波三折。

弃就是后稷——中国农业生产的鼻祖。

《史记》说：“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

弃自小热爱农业生产，于是，被召为尧的农官。尧老，禅让于舜，舜又让于弃，弃不受，仍任司农之职。于是，舜对弃说：“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这样，弃又被称为后稷。

后稷之后数百年，他的第十四代孙建立了周。周人的兴起是直接导源于后稷的；下面是由黄帝到周文王的基本发展线索：

黄帝——玄囂——蚘极——高辛（帝喾）——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西伯，即周文王）。

周人尊后稷为太王；周的名号则是因其居周原而名。《地理志》曰“左扶风美阴县岐山，在西北中水县，周太王所邑。”即今陕西武功县西北。

后稷死后，其子不窋未能做官，原因是夏政衰微，不重农事，于是，只得北上戎狄，改事牧业，到公刘，才又继承后稷大业，重务农业，“务耕种，行地宜”，并开始南下，“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的儿子庆节，终于在豳（今陕西栒邑县）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周。

到古公亶父，周国更加强盛，他有三个儿子，长太伯，次虞仲、少季历；季历生昌，古公很喜欢他的孙子，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昌的伯父太伯、虞仲知道父亲想让位于季历以传昌，便跑到荆蛮去了。季历便顺利地当了古公的继承人，他死后，昌继位。昌即西伯，为殷商的诸侯王，曾被纣囚于羑里，后返归西岐后，遂率部向纣王发难。到他的儿子发手里，完成了灭商大业；发就是周武王。

武王崩，成王即位，尚年幼，武王弟周公旦代理朝政，分封天下，文王诸子及功臣皆有封地；文王第八子，亦即武王七弟叔郑封于毛，史称毛伯，即毛国首领之意。

直至毛伯郑，黄帝子子孙孙，皆以“姬”为姓。周初大分封之后，才分出其他众多姓氏。

《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载：“毛氏，周文王之子毛伯聘之所封，世为周卿，士食采于毛，子孙因以为氏。”

《姓源》也说：“周文王第八子郑封于毛。《左传》：“周大夫毛伯是也，后因氏。”

《广韵》说：“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后以为氏，本居巨鹿。”

《中湘韶山毛氏族谱》二修一卷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

这里所引资料，基本统一：毛姓确乎始于周王的亲属封于毛；不过，是谁封于毛，略有出入。

毛伯、毛公自然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什么关系？原来，毛公是毛伯的舅父（亦即周文王的妻弟）。他随外甥一同来到毛国，人们尊其年长而称“公”。

这样看来，“毛伯”并非一个人名，实为官号、职称，“伯”有“长”之意，毛伯即毛地的长官（诸侯王）；又因其为周成王叔父，故又有称“叔郑”的。

同样，毛公也不是郑之舅父的名字。其姓名已不可考了。

周成王封给其叔父郑的这块小采邑——毛，在京畿之内，距首都不远，但其地位远不及周文王其他儿子所得的封地那样显赫，这说明，郑在灭商兴周中也许不曾起很大的作用，故仅得一处小小的毛国。当然，此地距京城近，又说明朝廷还是注重亲疏的。

按中国传统习惯，依父系为氏，则全中国所有毛姓的始祖，是毛伯，而不是毛公。

毛氏家族的原始居地，则是在毛——即今河南省宜阳县境。

关于毛氏的始居地，《百家姓》注为西河郡，清代文豪毛奇龄，也以郡望称“西河”，韶山毛氏家族修谱时，郑重其事地在扉页赫然印上“西河堂家藏”。

其实，这与毛氏得姓之地——河南宜阳并无大的矛盾。

西河，古称黄河上游南北流向一段，《书·禹贡》曰“黑水西河惟雍州”。《传》曰“西距黑水，东据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

到了春秋时，则是指卫国之地，即今河南浚县、滑县一带；战国，又指属魏国的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

这样看来，西河是指黄河中游今陕西、河南交界的一块区域，这是与中华民族，周人及至毛氏发源地基本相一致的。

二、故国已亡，毛姓人如风飘絮般纷纷择地而居，并出了毛遂、毛亨、毛延寿等名人

周初的大分封，为春秋、战国的周天下之四分五裂埋下了祸根，然而，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来看，又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周王的后代及臣子，据此拓宽了各自封地的疆域，人口也向各地迁徙，这极有利于人民的大融合。

周初分封的 72 国，仅有 6 国达到相当强大，又加上南方的楚国，遂成战国七雄。毛国，当初是与诸国并立的，后来却日渐衰落，以至于在史书中几乎难寻它的名字。对此，可以这样解释：毛国处于周天下的中心，无论距西都镐京（今西安西南），还是东都洛邑（今洛阳）都不远，毛国的人们，上至诸侯，下至百姓，对于他们的祖宗周文王都很忠诚，并不想称霸一方；或者，因为毛国始封时，其地狭小，国力不强，又处于周王的最近监视之下，所以没有成为春秋一霸，也未能变成战国一雄，终至于泯灭，为其他国家并吞。

战国时代，有两位名不可没的毛姓人，都属赵国，可能是毛国为赵国灭亡之后的遗民。

毛遂，平原君赵胜的食客。赵孝成王九年，秦攻赵，平原君求救于楚，毛遂自荐随往。既至楚，平原君与楚王言合纵，迄日中不决。毛遂按剑迫楚王，晓以利害，定纵约归。平原君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遂以为上客。（见《史记·平原君传》）。

这样看来，毛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来到楚国——湖北，湖南一带最早的毛姓。不过，他并没有定居下来，仍旧回到中原去了。

另一位毛姓是毛亨。他是战国时赵人（一说鲁人），传《诗经》者，有齐、鲁、韩、毛四家，而现在仅存毛一家，所以《诗经》又称“毛诗”。值得注意的是，齐、鲁、韩、毛均为当时国名，又作姓氏，则可知，《诗经》曾为齐（姜尚的封国），鲁（周公旦的封国），韩（韩景侯的封国），毛（毛伯郑的封国）四个诸侯国的人们所传。

《诗经》本是由周朝廷派采诗官采集整理而成，变成竹简（书）后分藏各诸侯国，然齐、鲁、韩均失，独有小小毛国的《诗》得传，毛亨功莫大焉。

毛亨即大毛公，传为古文诗学“毛诗学”的开创人。其诗学传自子夏，曾作《毛诗故训传》以授毛萁（小毛公）。汉末郑玄《诗谱》说：“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

历史上毛公有好几位，除了周文王妻弟和周宣王时的制作毛公鼎的毛公鼎外，战国时还有一位毛公。

他是赵处士，秦兵攻魏，他与薛公共劝寄居赵的魏公子信陵君回国救援，击败了秦兵。

到汉元帝时，出了一名画家，叫毛延寿。传说，汉元帝妃子太多，于是命令毛延寿等人将宫女们的形象画出来，以供皇上选择；诸宫女都争相贿赂画工，以求元帝宠幸，只有王嫱王昭君不肯干这样的事，结果她未能见到天子。后来，汉与匈奴和亲，王昭君被选中，准备前往塞北为匈奴之妻，临行时元帝召见，发现其貌为宫人之最，但既已答应匈奴，却也只能忍痛割爱；后来元帝仔细侦查此事，遂将毛延寿等人统统斩首，弃于街市。

此事见于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之二，其中情节未必全部真实，毛延寿其人却当是存在的。

毛延寿是杜陵人，杜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汉宣帝在此筑陵，故名。如此看来，西汉时，毛姓已没有全部固定在古毛国（今宜阳），而已散处各地，但基本足迹仍在黄河流域。

《后汉书》载，东汉时，庐江（今安徽中部合肥一带），有个毛义，家中十分贫困，但特重情义，以孝见称。南阳张奉听说，便前往与毛义相伴，以察真假。事实果真印证了传闻，他便将毛义的品行禀告州府，州府来了一纸公文，让毛义前往安阳（今河南安阳）担任县令，毛义喜形于色，张奉见状，以为毛义是个近利小人，很看不起。后来，毛义的母亲过世，他忽然辞官回家；朝廷用公车征召，也坚辞不往。张奉叹道：“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也’”。

毛义是庐江人，看来，东汉时，在安徽一带已有毛姓。

魏晋南北朝时代，天下时分时合，战争连绵不息，人口的颠沛流离便相当明显，毛氏家族的迁徙也在情理之中。在这种人口流动中，原来比较固定的家族结构常常遭到破坏，战争冲击波下，很难找到那聚族而居的庞大家族，除非这个家族有巨大的凝聚力，又选择了一处世外桃源。因此，这一时期，中原一带，各姓往往是杂糅相处的。直到社会重归稳定，战争平息几十到上百百年，姓氏才又扩充为族，封建的家族形式又以地域为中心形成起来。然而这一长达 360 多年的时间里，史籍中差不多寻不到毛姓，这说明，毛姓散处各地，未能涌现出著名人物。

可以肯定的是，东汉以来，由于南北方烽火连绵，毛姓与其他姓氏一样，更广泛地向各个方向渗透。但其基本活动区域仍在北方。这个家族之不得不南迁，是在北宋末年民族压迫来临的时候。

无论北宋、南宋，外交上几乎无胜利可言，大片国土沦亡，以至首都不得不由汴梁迁至临安。北方人民也背井离乡，纷纷跨过黄河，进入长江流域，南北文化互相影响，先进的生产技术由中原传入，“南蛮之地”得到大规模开发。

毛氏家族宋代亦到达了长江下游，江浙一带，至今，江苏、上海、浙江仍分布了许多毛姓。

《中湘韶山毛氏族谱·源流记》载：

“……吾族派接西江，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

可见，宋代，在三衢确乎住着一支毛氏家族。三衢，即今浙江衢县，唐武德四年改旧属婺州的信安县为衢州，因境内有三衢山，故又以三衢称衢州。现三衢为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距江西不过 100 公里。

根据《宋史》记载：“毛渐，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进士，知宁乡县。”这说明，起码毛渐及其上辈是居住在浙江衢州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渐“知宁乡”，则他在宋时就已到达邻近韶山的地区——宁乡县。

《宋史》还记载了另两位毛姓。毛安舆，嘉州（今四川乐山）洪雅人，是个孝子，9 岁便死了父亲，他“负土为坟，庐于其侧三年”。又，毛询，吉州吉水人，天圣二年进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因母亲去世，他竟也悲痛而死。天圣二年，也就是北宋仁宗时的公元 1026 年，这告诉我们，到北宋中期，江西吉水（今吉安一带）已有毛姓，而这支毛姓，恰是毛泽东的祖先。

三、洪武年间，毛太华带着八个孩子中的两个来到湘乡，这一支，才是毛泽东的嫡系祖先

《宋史》记载：毛注，字圣可，衢州西安人，宋大观时举进士，知南陵、高苑、富阳等县，皆以治辨称，后升殿中侍御史。这段记述，正与《毛氏族谱·源流记》所说相符：

“吾族派接西江，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生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让公就养，占籍吉之吉

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的（嫡）派……”

这里，只人名略有出入，毛让当是毛注之误。那么说，毛姓之所以由浙江衢州西迁江西吉州，是因为毛休去吉州做官的缘故。

毛氏家族再度迁居，是在元朝末年。

元代，毛氏家族没有显宦，及至末叶，黄河流域——毛氏家族的发祥地，腾起一只冲天大鹏，使元统治者瞠目结舌。他就是毛贵。

公元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等在颖州的颖上县（今属河南）举起义旗，起义军头束红巾。

毛贵是红巾军的一员大将，他率领东路军，势如破竹，于1357年初攻取海州，即今江苏连云港；由海道入山东，1358年2月克济南，占领山东大部，在益都设行中书省，毛贵任平章；随之，进入河北，克蓟州（今河北蓟县），前锋到达离大都仅百多里的枣林（今北京通县西南）等地，使元朝心脏受到极大震动；后因后援接济不上而退。虽如此，元统治者还是受到了沉重打击。

起义军内部，在蒙古族统治基本摧垮之后，发生了纷争；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水战，战争闹得江西人心惶惶。在吉州吉水，有位毛太华，为避战乱，便率毛命传等人以及蔡姓的人们，往西而去。《毛氏族谱》这样说：

“粤自吾祖太华公，元至正年间，避陈友谅之乱，由江西吉州仙茶乡迁云南，与乡人蔡姓共躲澜沧卫……”

这里只说避陈友谅之乱，看来，毛氏西迁，直接原因是逃避陈友谅的“兵乱”，其时，江西及其以西地区，基本上都在陈友谅的控制之下，所以毛太华等人竟一直远避到云南去了。

由江西吉水到云南澜沧，横跨江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五省，长途跋涉万里。比起毛姓由黄河流域之南下，艰辛更巨，河南到江浙，可顺大运河乘舟直达金陵，陆路也一马平川；可是，江西往云南，则是千山万水，层峦叠障，困难就大多了。

而毛太华等人所到达的云南澜沧江两岸，即使到了六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中国最偏僻的地方，那里人烟稀少，气候湿热，猛兽巨兽出没。

毛太华却以他的刻苦耐劳挺住了一切困难，在那里住下来，并娶了妻，夫人姓王；他们生了8个孩子，以“清”命名，“清”字后再注排行。由此推断，毛太华在云南呆了10年以上，直到1367年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之后。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云南还未完全平定，政权仍把持在蒙古贵族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手里。明太祖劝降不成，即令傅友

德、沐英、蓝玉率 30 万大军横扫云南，毛太华、毛命传等人投入到明太祖的西征军中，并立下功劳。

毛氏《族谱》二修一卷载：

“……明洪武十三年庚申，（毛太华）以军功拨入楚省。”前面已谈到，朱元璋占领湖南，为了报复当初这里的百姓对陈友谅的支持，血洗三湘，结果，湘潭人口由元时的数 10 万剩下仅 2 万 5 千人，朱氏为填充人口之不足，遂从邻省（主要是江西）迁入大量人口。毛太华虽然本是江西人，但他稍稍不同，他是经云南而来的。这样，毛太华带了 8 个儿子中的 2 个，即毛清一、毛清四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夫人和另几个孩子大概留在了其它地方。毛太华人湘，到达了哪些地方？有一处可以肯定，那就是长沙。至今，长沙市仍有不少毛姓“土人”，并留存着毛词巷、毛家桥、毛家垅、毛家冲这些显然与毛氏家族有关的地名；《毛氏族谱》中亦附有一些毛姓在长沙的墓葬图。这样看来，毛姓自滇入湘，约略是乘舟顺长江而入洞庭，上湘江，至长沙、湘潭，由涟水，到达湘乡的。毛太华一生，在江西吉州吉水龙城住了二、三十年，又在云南澜沧躲了近 20 年，入湘后 10 多年，大约 60 来岁，死于世道业已平稳之时。毛氏家族发展到明代，其族人已遍布中国南北，黄河流域是其发祥地，长江流域也已成为他的居住地，甚至澜沧江流域也有了毛姓的足迹——这个家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巡视了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三大源地——黄河中游，长江下游和云南澜沧江河谷。如果仔细翻阅《明史》，就会发现，毛氏家族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这一时期，竟有 10 多位毛姓占据了《明史·列传》的显要位置，数量可观，地位颇高。试举其要如下：

毛玉，云南右卫军家子，弘治十八年（1505 年）进士，任南京吏科给事中，多有政绩，死于狱中，赠光禄少卿。其先祖当为元末从吉州避往云南省，极可能是毛太华之后，因毛太华迁湘时，只有两个儿子随往。

毛伯温，字汝厉，江西吉水人，正德三年（1509 年）进士，任御史，大理寺丞，工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见《明史》5239 页）。《毛氏族谱》说“二十一世，传至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可见他与韶山毛姓有渊源关系。这里的“二十一世”，是从江西吉水毛氏始迁祖、宋工部尚书毛让算起的，从毛让到毛伯温（北来到明中后期），其间约 500 年。

毛恺，浙江江山（属衢州）人，嘉靖十四年（1536 年）进士，御史，太子太保（《明史》5666 页）。

毛士龙，江苏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进士，杭州推官，刑科给事中，左佥都御史（《明史》6386 页）。还有湖北公安县的毛羽健，浙江余姚的毛吉，河南邓县的毛弘，江苏昆山的毛澄，山东掖县的毛纪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在朝廷里任过要职。

明末还有一位大学问家毛晋（1599～1659 年），常熟人。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少游钱谦益门，博学强记。好搜罗图籍，建汲古阁目耕楼，藏书达 84000 余册，多宋元善本。喜刻古书，所刊《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及《津逮秘书》等皆手自校勘，为历来私家刻书最多者。汲古阁版本，亦称为毛本。又好钞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其子毛扆，号汲古后人，继承其父收藏，校勘出版事业，颇有贡献，见《辞源》和《中外历史人物词典》。

毛晋这位刻书家，是否与《毛氏族谱》的印刷艺术水平高超有一定联系？

从以上所列毛姓人物，能发现，明代，毛氏家族颇为朝廷器重（据说曾

为朱元璋赐姓朱)，该家族内也颇有奋力仕进者；他们主要分布在江浙，豫、鄂、滇也有，湖南毛姓却未出名。

尽管毛氏家族在明代颇有朝中重臣，来到湖南的这一支，却并不显赫，他们面临的首先是生存问题，直到最后定居韶山冲，安稳地过了几百年后，有几位才藉湘军而发迹。

毛氏历代部分名人表

四、六百年前的某日，毛太华的长子寻觅到这个远离战乱的仙境般山冲时，便再也不想走了

“韶山”这个概念，有一个演化过程。在几千年历史中，不是作为一个区划名称出现的，而是指一座山，即舜帝曾驻足听韶乐的那座美丽的山。关于它的位置，毛氏《族谱》，《同治刊湘乡县志》，《光绪刊湘潭县志》均有记述。王闾运先生还绘有地图，从图上可知她在湘潭、湘乡交界线上，故此，这两县县志均作记载。也就是说，“韶山”，在今韶山冲滴水洞处。民间的“韶山”则指几处地方，一是韶峰，即韶山冲南缘，《毛氏族谱》持此说；一是指毛泽东故居西一里处那个形如龙头的秀美小山，又叫韶山嘴，《湘潭县志》称“小韶山”。把县志与族谱及民间的说法综述起来，“韶山”演变成一个地域概念，则是指韶山冲而言；这个概念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毛氏家族离开湘乡城之后，便是来到了这里。《族谱》二修一卷说：

“……（居湘乡）十余年后，清一、清四两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开种韶山。铁陂、乌塘、东塘等处，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毛清一、毛清四来到韶山，居住的区域有所不同。毛清四及其后代，在韶山冲东南入口，即铁陂一座大山下面筑室而居，在这一带便形成毛氏家族深公一房。

《深公房祠记》云：“铁陂距韶山十里许。韶山，界潭、湘两邑之间，右水出龙城，左水出铁陂。胡以‘铁’名？以两山对峙，石壁穿插，交锁横拦成陂故耳。天造地设奇观也。吾房祖。

深公，卜居陂之下，游麟振振，螽斯蛴蛴至今，铁陂还有不少毛姓，虽然深公祠已无存，毛家大屋、毛家坳这些地名还是留存下来。毛清一却未随他的弟弟留居铁陂。他带着他的子孙继续入山，“相吉于韶峰之左，枕山而立祠焉。”（《祠堂记》）。他为什么选择了韶山冲呢？动乱之后的人们最大的期望是安定。毛太华元末长途跋涉万里，横跨5个省才将战争远远抛在后面，他刚到云南澜沧尚是青年，他在那里结婚生子——虽然气候湿热，生存条件比故乡恶劣得多，但那里山高皇帝远，元朝在大理派有梁王，也鞭长莫及，战争当然也就难骚扰到了；故而，毛太华及妻儿们，在澜沧江河谷很是过了一段平和的日子，他们只图安安然然，没有人出外求官。大约过了20年，朱元璋大军攻入云南，与毛太华同族的兄弟毛命传耐不住寂寞，参加了这支从故乡开来的雄师。此后，毛命传等因立下军功，使云南的毛姓得以“拨入楚省”，毛命传最先到达韶山，但他并未进入韶山冲，而是到了湘潭县三十九都五甲（即今韶山杨林乡善扶村），而毛太华到了湘乡。很显然，毛太华的广泛阅历与饱经沧桑，使他深深认识到湘乡城绝不能作为久留之地。因为此地处东西与南北之要冲，是连接湘东北、湘西北与湘西南的必经之路，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人民多次遭受兵戈之苦。这里与毛太华的老家吉州吉水龙城（湘乡也叫龙城）极为相似，城伴水而建，周围无大山作屏障，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毛太华不想让他的后代重蹈他万里奔波的覆辙，所以他在世时便已叮咛正是青春年少的两个儿子。儿子当然也明白老父一番苦心，虽然他们对湘乡城不无留恋，但在父亲去世后，便打点行装，另择新居——他们要去寻找一个能一劳永逸的地方。他们走了二、三十里，先到了与湘乡交界的湘潭县三十九都七甲（与毛命传居地相距10多里）。毛清一显然比弟弟毛清四更有远见。清四在与湘乡龙洞一拢相望的铁陂造屋，不想再

走了。从后来的结果看，这是他的失误。因为这里仍然地处交通要道，往湘西北与湘东南必经此地，后来，从明清到民国，这一带都有大军经过，并留下战争创伤，甚至1944年，日军的铁蹄也践踏了这里的青山绿水——这是后话。总之，毛清四的后代在此处远没有毛清一的后代兴旺。

毛清一表现得比弟弟有见地，独自又走了十多里山路，终于觅到一个极幽静之处——韶山冲！

韶山冲四面八方都是峻岭崇山，尤以南面、西北形如屏障，加以山中密布原始森林，更令人神秘莫测。入韶山冲仅有两个口子，一在铁陂，宽不到10米，小溪一弯，从冲内漾出；一在井湾里，是一个深涧，夹在两山之间，后来被叫作湖提涧，由此往东北，行三四里，即到毛命传定居之处。由此两冲口至韶山冲中心，差不多都有10里。

韶山冲不只是单一的一个大冲，它由无数个小冲组成，形成一个连环套：在冲内，有几条较平坦的谷地，其时虽然茅封草长，但若开垦出来，是够几千人赖以生计的。

我们可以想象，世道如若再发生大变，韶山冲可保无虞：首先，外地陌生人很难发现这个大冲（甚至在毛清一刚到铁陂时，也是在无意中如武陵人发现桃花源一样，顺小溪而入方豁然开朗）；其次，这个大冲有两个入口，此口被封，可从彼口而出，若两个口子都封住，则又可循入那连环状的小冲，或者密不透风的丛林；最坏的也是最后的一步，也不至于山穷水尽，可以翻山过坳，出了韶山冲，南与西南是湘乡，北与东北是宁乡……而以后的事实，让人们惊诧不已：韶山冲极少遭到外部干扰！造成湘潭、宁乡、湘乡人民惨祸的明末清初大兵祸，几乎未曾影响到韶山冲；日寇在韶山不到两年内杀死数百人，但他们只到达铁陂，而未能发现韶山冲——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重要敌手毛泽东的故居所在地。

总之，韶山冲的自然环境有些与云南澜沧相似，但气候、水文、食物条件要好得多。它得天独厚的地形地势，使得毛氏家族在这里安定地过了好几百年，而且，使得原来很松散的家族，在此形成日渐稳固而类似小王国的结构，从而为诞生伟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然而，毛氏家族刚到韶山时，这里还是原始状的荒凉。自古以来，这个山冲几乎无人居住，它只是森林的王国，动物的王国。云湖河的上源，由滴水洞、滑油潭和韶峰山麓漾出，永远幽幽地唱那古老而淳朴的歌。

山头上，是密密的树木，自然地生长，自然地死亡；老虎、野猪、蟒蛇，或咆哮，或蠕动，震得麻鹰、山鸡扑楞楞地飞。

河谷低地，长长的茅草腐烂了，又生出来，又腐烂，于是，变成肥沃的湿地；小溪中，垒着从山头冲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头……

郭姓、彭姓、庞姓、汤姓、蒋姓、张姓及别的姓氏，他们大都依山傍水，居住地前，是较为开阔的泥沼地，只要将积水排干，然后围湖造田，便可成为粮仓；可是毛太华的两个儿子，因为在湘乡城耽搁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到韶山时，除铁陂前有一大片坡地外，就只有山间小河谷了，毛清一将铁陂让给了弟弟，自己进入韶山冲。冲内最大的优势是木材与烧柴充足，山内又藏着各种动植物资源，除此之外，是从林子里淌出无数的淙淙流水，这些流水汇成一条较大的小溪，就是云湖河源头之一。小溪两岸地势比高山当然低得多，但尽是山洪暴发时冲下来的大小石头；由小溪往两侧，渐次升高，而成为山坡，坡上生满杂草灌木。

毛氏族人及与之同处的其他姓氏（如李姓），进入韶山冲，所见到的便是这一番情景。

虽然原始社会后期舜帝便曾到此，驻听韶乐，并赐以美名；东汉时，也曾有过人迹，据说三国关羽还在此搭箭射猛兽；唐宋又有师公之类的职业迷信者在此活动，但直到元末明初，这里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居民。毛姓，李姓，便成了韶山冲最早的开发者。

经过两百年以上的艰难开拓，到明末清初，韶山冲基本上已形成陶渊明曾描绘过的桃花源那样的境地。其时，毛清一以下已发展到第八代，即大约到了毛泽东以上第十代，估计毛氏族人已达数百人，李姓也有了人口，加上其他姓氏，韶山冲人口已在五百人上下。于是，绿油油的田边，青葱葱的山下，一栋一栋茅草盖顶，土砖砌墙，木窗木门的农舍，时时冒出缕缕青烟；隔山隔水，有狗吠，有鸡鸣，人们和和乐乐，起初，也基本没什么贫富悬殊，当云南、江浙、河南一带的毛姓，有不少人在发奋苦读中了进士当了大官的时候，与他们本属同宗的韶山毛氏，却正在韶峰下面过着男耕女织、怡然自得的日子。

五、久居山冲的毛氏家族在几近与世隔绝的数百年里， 遂形成了自己的小王国，并有了自己的“法典”

此后，朝代之更替，世道之变异，对于韶山冲的居民——毛氏家族影响并不大；他们差不多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的人们一样：“乃不知有秦汉。”

这里的人们，专心地开发着自然，自然也保护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无须与外界交往，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到了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他们也悄悄地在兴建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小小的“王国”是几乎完全不为外人所知，而且是完全汉族式的。直到清朝建立很久，毛氏族人才不得不也留起了长辫子——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在精神，依然是彻头彻尾的汉族形式。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已回复到他们的鼻祖——周人的时代。

明显的例证便是韶山毛氏家族建立了严密的家族结构。

毛氏家族初到韶山，与两千多年前周文王第八子郑初到毛国时有些相似，但也有很多的不同。

毛伯郑受王侄周成王所封，一开始，地位便相当显赫——他是一份采邑的主人，那个地方又处于中原的心脏地带，距京畿很近；一切，都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毛清一、毛清四，则是经过战争骚乱奔波万里而至韶山，颇有“隐居”的意味，而且，这不是士大夫式的隐居，而是农民的“隐居”。

毛伯郑得周武王所赐之地，似乎便已十分安然，故而在历史上未留下任何业绩，其家族内部结构当然也无从考证。

韶山毛氏家族，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和清初时，其家族内部结构便已形成。尤其到了清乾隆以后，更从理论上确定了这种结构。我们试分析如下：

韶山毛氏是以毛太华为始祖的，这实际是他们的始迁祖，当然，毛太华以上，也奉毛让，毛休为祖，更往上溯，则至毛亨、毛伯郑。毛太华妻为王氏；下面有8个儿子，8个儿子中只有两个随父入湘（王氏可能带着另6个儿子留居云南），因而也只有这两个儿子名字可考，即毛清一，毛清四；清一，清四又生了若干儿子。《中湘韶山毛氏族谱》（二修）齿录载：

一派

始祖：太华，始妣：王氏。

二派

华公子二：长，清一，配昌氏。次，清四，配段氏。

三派

清一子二：长，有恭，配金氏。次，有信，配易氏。清四子三：长，有伦，配杨氏。次，有智，配李氏。三，有诚，配胡氏。

四派

有恭子三：长，震，配彭氏次，铎三，瓚有信子四：长，瑞次，鉴三，铭四，海有伦子一：翔有智子一：深

从4派开始，韶山毛氏分成震、鉴、瑞、深、石犴5大房，房下各有子孙。5房中，前4房以人名命名，第5房以地命名（即毛命传一支），且前四房为毛太华嫡系后代，石犴房则是毛命传的后代。

为何韶山毛氏仅分为5房？毛清一，毛清四的孙子共有9个，但惟有毛震、毛鉴、毛深、毛瑞留居韶山，其他都星散各地，到处流离，没能形成固定的家族，结果为时代之大海淹没而无所闻（如毛有伦的儿子，即毛清四的

长孙毛翔，即奔波于长沙，死后“葬长沙府城南门外皇坛岭”）。震、鉴、璠、深定居韶山，通过共同的营构才形成稳固的毛氏家族。而其中，璠房人丁稀少，到后来也渐渐无据可查。至于石玗房与韶山冲毛氏关系较为疏远，修族谱时，差点忘记了它，事实上，它后代也稀疏，难成体系。

如此，到毛泽东出生时，韶山毛氏家族最主要的就是震、鉴、深三房了。三房中，以毛太华长子毛清一的长孙（即毛太华的曾孙，毛有恭的长子）毛震后代最为繁盛；毛震公及后代世居韶山冲最幽深的地方——今滴水洞外。毛泽东就是毛震的第 17 代孙，如果从毛太华算起，则为第 20 代孙。

其次是毛清一子毛有信生的第二个儿子毛鉴。他和他的后代居于韶山冲中部那块平地的边缘，即今毛泽东纪念馆一带。这里距震公居地有七八里地。

毛深的居地在韶山冲冲口，即毛氏家族从湘乡最初到达的地方——铁陂，这里其实已不能纳入韶山冲的范围。毛深一房显然远不如震、鉴兴盛，这大概是由该处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震、鉴、深三公后代，依次往下排列，从他们以下的第 3 代开始按“派系诗”取名，从而达到“一丝不乱”。其派系诗是：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可以肯定，当初毛伯郑统治毛国，除遵循周礼、周法之外，自己也有一套国法。

郑在韶山的后代，也建立了他们的“法典”，这就是“族谱”。

这“法典”，初创于清乾隆丁巳年（1737 年），1738 年完成。制订这部“法典”的为首者是毛尔达、毛彝生。可惜毛氏家族第一次修订的“法典”韶山现已失传，使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全部内容。

光绪辛巳年（1881 年），即在毛泽东出生前的 12 年，毛氏家族再次修订族谱。

韶山“毛氏王国”制订的这第二部“法典”，是在第一部基础上加以完善的；意义深远，它制订时，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已经 11 岁，因此，这一部“法典”将深远地影响毛顺生，乃至支配他的一生，而毛顺生，又将以其来规范他的儿子。

1911 年，毛氏“王国”又第三次修订族谱，但这部“法典”成于宣统皇帝溥仪下台的这一年，又是毛泽东离别他的故乡与背叛他的家族的第二年。

至于毛氏四修族谱，则成于 1941 年（民国 30 年），其时，毛泽东早已远离故乡，他正在毛氏家族最早的故土——周人的发祥地陕北，指挥着抗日战争，他的名字，不单早已为中国各地所知，而且由斯诺等人介绍给世界。故此，四修的族谱也极为恭肃而又十分小心地将毛泽东录了进去，并说他是：“阍中肆外，国尔忘家”。

修谱，并非韶山毛氏始，远在南北朝时代，即毛氏家族尚居住黄河流域的时候，门阀制度盛行，时人特重门第，讲究出身，于是谱学繁荣；若更上溯，则自孔孟儒学产生始，因为中国族谱（或家谱）实则是儒家思想在家族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和形象体现，所以，谱属于“儒书”。此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唐太宗对儒、佛等兼收并蓄，他的一切方针、政策却是“儒”的；宋代理学大盛，儒家思想遂达到至高无上，并由理学家们在理论上大加阐释，从而更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至满清时，儒学及汉文化

被加以吸收，儒家正统思想更加根深蒂固。毛氏《族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订的。

据《韶山毛氏族谱》载，当韶山毛姓修谱时，恰有江西“宗人”寻来。这一方面说明韶山毛氏族谱肯定参照了江西吉水毛氏族谱，比如编排方法，指导思想等，甚而韶山毛氏，正是在翻阅了江西宗人所持之谱后有所启发，萌生修谱念头的。

韶山毛氏与江西毛氏同宗，江西毛氏又与江浙毛氏同宗，他们都来自黄河中游，故此，清代大学者毛奇龄称“西河”（见《辞源》），而韶山毛氏族谱，扉页也赫然标注“西河堂家藏”。所谓“西河”是指黄河南北流向一段，即陕西东北部；它又是“西河郡”的简称，“西河郡”便是毛姓的起源地。

韶山毛氏《族谱》，正是以上述思想贯串始终的。它不但在《源流记》中对此反复说明，而且在《序》、《跋》里也多次提到——这一切，明确地说明：之所以要修订族谱，就是为了使族人不忘祖宗，不忘祖籍，不忘数千年来所历艰辛；也就是为了加强族人的团结，造成一种以族为中心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就是为了使族人明白上下、长幼、尊卑——这正是孔子所传“周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之重要一环。毛氏《族谱》最根本的东西便在于此。试看毛氏派系诗，便能清晰地认识此点。

毛珊公以前，因为毛氏四处流浪，来到韶山后，首先面临的又是如何开发这一片荒地以求生存的问题，所以其它便一时顾不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家的尊卑观念在人们心中似乎较为淡薄，至少还未在形式上得到明确，大家埋头于垦荒种田，哪还顾得这些？所以，在毛珊公及以前，族长之类的人物大概是不存在的。毛珊公以后就不同了，毛氏族人碰到一起，则须小心为妙，若是陌生者，必得先弄清其辈份，然后斟酌语气，长者有长者语气，幼者有幼者语气，长者尊，幼者卑，卑万不可冒犯尊。何以为冒犯？有儒家教诲在，孔孟说的即是标准。长幼、尊卑又不一定是按年龄大小——纵使一个3岁毛孩，其辈份可能比一个60老翁还大，若比老翁大一辈，老翁则须叫他叔父，大两辈，则须叫他“叔公”——这并非天方夜谭，有派系诗为据。派系诗分“原订派系”（见前文）和“续订派系”。

毛氏家族二修族谱时，唯恐“原订派系”不够用，又“续订派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光。

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派系诗在形式上的意义是，它不是随意编造的，只要从字面上一分析，我们将发现，派系诗中的字眼，都是极讲究的，实在是从“儒学字典”中精选出来的，例如：立：含有建功立业之意。显：名声显赫，光宗耀祖。荣：荣耀。朝：朝圣。士：读书取仕。又如孝、友、本、忠、良、敦、圣、学、风、雅……无不深寓儒学意味。若将毛氏家族前后所订的两首派系诗译成白话则更明朗：

“先辈创下了显赫的功业，其伟绩荣耀朝廷及世家，诸子孙文可龙飞凤舞，武能运筹帷幄，内外一片祥和，祖宗恩德，甘霖雨露，泽润四方，传之久远——我毛氏家族将世代继承，繁荣昌盛！”

孝顺父母，友善族人，本是传家之本；忠心报国，善良做人，那才光荣之至。人生之初，多读圣贤之书，才能在来日风流儒雅，名传青史！”比较起来，续订派系比原订派系的“儒味”要淡一些。这倒是颇有趣——毛氏家

族发展到毛泽东，他将毛氏家族中的一切清规戒律统统破除了，所以他以后的子孙，至少从“代”字派起，几乎再也没人按派系诗取名了，自然，续订派系也就失去了意义。

六、毛氏“王国”的“法典”概览

周人的祖先（亦毛氏的远祖）后稷，以从事农业生产而享盛名，并因此成为尧和舜的农官。后稷的子孙继承了他的遗志，周朝建立，乃至儒学产生，一直下延至毛姓定居韶山，中国社会皆以农为本，奉后稷为农业之神，毛氏家族亦以他们的实际行动遵循这一传统。所以，我们说毛泽东祖先世代务农，是非常准确的。而这正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当初孔子本人却是轻视体力劳动的，他的重视农业，是要求奴隶们去从事这项工作。韶山毛氏却是个个身体力行。说毛氏家族继承了儒家思想，主要是指其继承了儒家对人们言语行动的所有要求与限制。这集中体现在毛氏家族的“家规”、“家戒”、“家劝”上。它们的作用，与一个国家的“法律”相当。试看毛氏《族谱》二修二卷中的《家规》所引用的毛氏“王国”的“法律”——它异常详细而全面：

（一）孝悌，为百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劳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弟。苟或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

（二）兄弟本天伦之乐，固人生之最难得。兄当克友于弟，弟当克恭于兄。岂容以世故末务，同室操戈，残伤骨肉。凡我族中，或有因产业，听妇言，不重手足，不睦兄弟者，族公惩之，不服理论，送官究治。

（三）夫妇为室家之望，固妇道之所宜修。孝敬翁姑，恭顺夫子，为重女红中馈之勤犹后焉者，或有恃爱怙势，不敬不顺，不守妇道，不遵夫训，请凭族长戒饬，如或悍妬不改，即屏之母家可也。若夫妇果无亏；夫或无故凌辱，设意屏出，族长传祠，从重责惩。不服，禀官究治。

（四）尊卑为族纪之表，固恩谊之所由敦，即同族服制已尽之。尊长务宜隆以礼貌，方不至有于名犯义。苟有冒犯尊长，不顾伦纪者，传祠责戒，父兄以失教论。而为尊长者，或偶因细故，辄加以无礼，则无论恃尊凌卑，有例，亦公论之所不容。

（五）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故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凡我族人于子弟知识稍开，天真未凿之际，提撕训道以保天性，及长，教以正业。如有听其游荡，放辟不加约束，先以容纵处父兄，后以不肖治子弟。

（六）士、农、工、商皆属正业。专一足以谋生，如或不务本业，则失计无聊，势必流为博徒，为优人，为僧道，为皂隶，为窃匪，为奴仆，生不齿于人，死不入于庙。实足玷辱祖宗，吾族永宜禁止，有一于此，责归父兄。

（七）冠、婚、丧、祭，称家有无。俭嗇太过，鄙吝失之固，骄奢靡丽，侈浪失之浮。惟其不固不浪，乃得之中，则于礼无悖，于人无议，且足以风世。愿我族人酌而行之，凜而遵之。

（八）好生乃天地之德，尤人生之所当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似续所由重也。则女子而敢自我生之，自我杀之乎？且“律”载：溺女与故杀儿女同罪。故近世州县乡村，莫不饬建育婴堂。如有擅行溺女，绝灭人道，从重理处。不服，禀究，我族人尚体遵之。

（九）孤儿寡子，最为苦楚，无论亲支同族，务宜一体体恤，无事则共相顾，复有事则力为扶持，方不愧亲亲一本之谊。如或乘其孤弱可欺，谋占田产，搬剥家财，族长传祠，追回财产，从重处究。

（十）妇人少寡，克励冰操。朝廷尚旌其节，实足增族党之光，有子者，

当为辅助，无子者，务为立继。如或窥其家财，伺其年少，欺嚼、侮辱、夺志、阻继，族长传祠责惩外，公为择继保全。不服，稟究。

（十一）邱墓乃祖宗瘞玉之所，尤孙子之当亲。每年清明、大寒，公坟及无后孤冢、着值年经管动用公费，带工挂擢，私坟该各家长亲率后生祭挂修擢，庶前传后，度不敢遗失。如有不亲挂擢，堆冢荆棘，碑墓崩蹋，即以不孝论，经管即行罚革，家长即行传祠责惩。

（十二）报本莫大于祭。凡属入祠祀祖之日，理宜整齐衣冠，雍肃礼仪以昭诚敬。即或家无美冠华服而小帽长衫亦可。交神明，敬如有。蒙垢不洁，科头跣足，以不敬宗论，即行逐去，不许与祭。不服，立即责惩。

（十三）祠祭之日，除筹办公事外，凡属私事，概不许藉祭入祠，横中争论，即或有万不得已之事，亦须另约日期，邀请族长、户首一千入祠理处，如违，公同议罚。

（十四）词讼最为无益之事，实居家之所宜戒。一时不忍，激成讼端，用费多金，终归乌有。纵有不平之事，亦宜听人劝解，不必坚执，万难冰释，曲直自有公论。毋得一朝之忿，忘身及亲友，仅罹三尺之法。凡我族之人尚曲谅之。（十五）公项银谷，除供国课办祭费，妥公用外，或有赢余，任听经管掌理出入，每年恁众清算，开除若干，实存若干，记载公簿以示清洁。如有肆意侵噬，浮开数目，除追还赔偿外，立行斥革论罚。（十六）凡各祖坟山，理宜蓄禁，不得砍伐，以存先冢之荫护，——以壮往来之观瞻。如有私行判伐，擅行砍伐，取任各祖坟下经管子孙，动用各公公费，传祠理处。经管徇容受嘱，论罚论革。（十七）进葬各祖坟山，除永禁进葬外，亦必昭穆相当，牵骑无碍，庶无两相乖舛。如有妄听术人，贪谋风水，不论尊卑昭穆，骑头牵脚，甚或破墓伴葬，穿插盗截，族长验实，传祠理处，押令起迁，以息讼端。（十八）祠庙礼法森严，尊卑名分之地，凡属公事，祀事，入庙务宜衣冠整肃，堂规严肃，尊卑次序，礼貌相隆，则九族昭雍穆之风，一家敦仁让之俗。上对宗功祖德而无惭，下顾孝子仁人而可乐。抑何盛欤？尚具信之。上述这 18 条“法律”对毛氏族人的行动之种种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们如果仔细加以分析，能发现这 18 条中，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反映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道德，而且至今仍为中国人民所遵循；同时，又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封建糟粕，这些糟粕也的确曾带来许多不良影响。

积极方面的，如孝养父母，重兄弟之情，幼敬长，长爱幼：父兄对教育子弟所负的重大责任；务正业；适当开支婚丧礼仪费用；反对溺杀女婴；提倡体恤孤儿寡母；主张息事宁人等等，这中间，孝养父母，兄弟和睦，教育后代，反对浪费，反对溺婴尤有现实意义。

我们很难将这十八条简单地下个“好”或“坏”的定义，是因为它本是精芜并存的。比如将“孝悌”强调到“为百行之原”显然是狭隘得太厉害了，过去，有不少人，本来才华横溢，却因囿于此，便辞职返家归养父母，结果大志难得施展。又如，将“弟事兄长”与“孝养父母”并提，是不恰当的；兄与弟，属于同辈，不用说父尚在时，二者无尊卑之分，即或父不在，也不可如俗所云“长兄当父”。当然，第二条强调了兄弟不应为了产业而“同室操戈”，的确颇有见地，然而却又将“残伤骨肉”的原因归于“听妇言”，这是对妇女的不全面评价。

在论夫妇之道时，有重男轻女倾向，明确提出妇应“恭顺夫子”，而未正面谈及“夫”亦应尊重“妇”。

“十八条”的中心，其实就是孔孟学说的尊卑观念，在第四条中，已相当明白，“尊卑为族纪之表”，所以前面三条中所提到的父子，兄弟，夫妇，其尊卑即是父为尊，子为卑；兄为尊，弟为卑；夫为尊，妇为卑。于是，“十八条”由此向下延伸，指出“苟有冒犯尊长，不顾伦纪者，传祠责戒。”将尊卑的概念划得如此之清，当然并非毛氏家族使然，几千年前的西周就是这样了。毛氏家族在强调尊卑之分的同时，也附带补充了尊长者也不可无故“凌卑”，但这常常只是空话。

“十八条”中唯一无可挑剔的是第5条。而第6条中，将“博徒”“优人”“僧道”“皂隶”“窃匪”“奴仆”不加区别，并认为都是“生不齿于人，死不入于庙，实足玷辱祖宗”，这是过分的。比如“优人”“僧道”“奴仆”就不见得如此。

9、10条都是谈如何对待孤儿寡母的问题，均符合人道主义原则。10条之后，家规花了不少笔墨特别强调了“邱墓”的保护，修葺与祭扫，祠堂祭祀之整肃，这是历史的局限决定的。至于所谓“祖坟山”“永禁进葬”外，“亦必昭穆相当”“牵骑无碍”则更没什么积极意义可言了。“十八条”中，强调戒“词讼”，有息事宁人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同时又与清代法律之腐朽有关。

总的看来，毛氏《家规》从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家与家之间的关系，生人与死者，后代与祖宗的关系等方面，对“王国”的每一位“公民”，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慑于“十八条”中每一条末尾“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之类的话，几百年来，绝大部分毛氏族人，在这一部“法律”面前，一直小心翼翼，直到毛泽东出生后，这部“法律”才算第一次面临着挑战。

作为家族“法律”的补充，韶山毛氏家族又制订了《家训十则》。这十则比较起来更有积极性，而又颇能打动人心。即：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弟兄、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可以说这10条是毛氏“法律”中的精华，它对少年毛泽东发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渗入其思想，使之受益终身。

此外，“家戒”为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为胥隶、为僧道、谋风水、占产业。《大清律例》放在全谱之末，可见其更重自己的“法律”，而不太以“大清”法律为然。

七、祠堂——毛氏“王国”的“上层建筑”， 事实上的“衙门”或“金銮殿”，它最初 的设计者，却是周天子和孔圣人

虽然已经过了三、四百年的辛勤劳作，到毛泽东出生时，韶山冲仍然未出现非常富裕的阶层。清王朝最后的一百年中，的确有一些人做了高官，比如毛氏家族中的毛有庆、毛正明（正一品提督），但即使这些高官，发财的也不多，除了成涤泉因“夜草”而肥，其余的只略微有些收入，而毛有庆、毛正明这些较清正的人物，基本上保持着参军前那种清贫。

所以，在韶山冲范围内几乎没有大地主庄园，个别人充其量只达到富农或小地主的地步，绝大部分还挣扎在贫困线以下。也正因如此，人们的居住条件是很简陋的——只见各个山角落里，这里，那里，是一座座茅草盖顶，土砖砌墙的房子，也偶尔可见几栋瓦房——这便是毛氏家族中的“贵族”居地了。但是，在群山之间，有三座建筑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毛氏宗祠，毛鉴公祠和毛震公祠。它们与韶山冲的其他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不啻为韶山“毛氏王国”的宫殿。说这三座祠堂是毛氏王国的宫殿，首先在于它们不同一般。那庄重肃穆的青砖墙壁，那雕梁画栋的外形，以及高大的门楼与牌坊，五彩的壁画，大门两侧的石鼓，与屋檐上龙、狮的雕塑，无一不使人觉得它们是宫殿。当然，这些仅是其外形，而内部结构与陈设，则告诉我们，这里，本是毛氏家族的宗庙。这便是这个“王国”制订律令和执法的机关。“法典”——《毛氏族谱》，是在这里制订的，“法律”——家规，家戒，家训……是由此发布的，而且，“犯法”者也在此接受“审判”。

可以说，祠堂，是韶山毛氏家族明清时代唯一的公共集会场所，人们定期到此“参拜”列祖列宗，并接受族长的训导，因此，它也就成了家族权力的象征。

韶山毛氏祠堂共有4座：毛氏宗祠，位于韶山冲的中心，是韶山毛氏家族的“大祠堂”，它祭祀毛氏族人的共同祖宗毛太华及毛清一、毛清四，又是全族——不论震、鉴、瑞、深，哪一房的公共活动场所。乾隆二十年（1756年）春天，毛在阳、毛体仁“看得（毛）价人住宅下首荒屋基一只，连住熟田三分，正银一分二厘”，他们便以全族的名义，由李 文作中人，用24两银子买下地皮，接着大兴土木，毛氏宗祠便建了起来。

从毛氏宗祠所处的位置及其规模，便可知它在“王国”诸殿中的地位。它坐东南，朝西北，背靠十八罗汉山，正对卢家湾（今韶山宾馆处），南为韶峰、云富坵，西为黑石寨，由毛氏宗祠四面望去，群山环绕，门前，是毛氏家族及其他姓氏明代以来开发的梯状水田，傍卢家湾，有云湖小溪，自韶峰山麓与滴水洞而来。

4座祠堂，以毛氏宗祠最为宏伟。它采用左右对称结构，内分三进。进门是戏楼，作演庆之用，集会时，族长常高踞戏台，俯视群下。第二进是一个宽敞的大厅，“纵横堪布数十席”，族长或“经管”办公，族人商定协约，以及祭祀之后的宴会均在此进行。厅壁内嵌有石碑，厅后部高挂屏、匾，廊柱上则“制有镂金联语”，这些石碑，屏、匾、联语，其文字内容，无非就是毛氏王国“法典”的内容，意在教育族人，使之为人正派，或遵循儒家礼法。

祠堂最里一层，亦是最后和最重要的一部分，即第三进，叫“敦本堂”。

“敦本”二字，集中概括了毛氏家族兴建祠堂的根本目的，就是敦促子孙不忘其本，追本溯源。此处安放历代祖考（男性）的神位；而从主座下的小门进去，则为“内享堂”，燃着一龛香火，历代祖妣（女性）的神位在此。

至于毛震公祠，毛鉴公祠、毛深公祠，除它们比宗祠规模要小，只由两进组成之外，其余大致相同。

从修建的时间来看，毛氏宗祠最早，在乾隆二十八年春（1764年）。过了3年，即乾隆三十一年秋，又建起了毛震公祠。毛深公祠、毛鉴公祠历史稍近，修建时间已到了19世纪，即毛泽东出生的那一个世纪——咸丰时建深公祠、光绪丙戌（1886年）建鉴公祠。

祠堂建成后，又往往要进行重修，以扩大规模。重修次数最多的是毛震公祠，即毛泽东所在一房的支祠。毛泽东出生以前，至少重修了3次。由毛次琦，毛克相，毛体仁倡修的这座祠堂，于道光八年（1828年）“修横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增其粉饰”，光绪戊寅（1878年）再次修缮。

研究了毛氏“王国”的宫殿，会发现它与儒教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它以四平八稳，左右对称，既庄严又肃穆的外形，最形象地向毛氏族人昭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这几座“宫殿”大至门楼台柱，小至片瓦游丝，无一不符合“对称”“中庸”的原则，毛氏祠堂，就是由许多小“中庸”组成的“大中庸”。

其二，毛氏祠堂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奋发向上的精神。屋脊龙、鳌的雕塑，屋顶宝瓶内剑、戟的形象，门前竖立的大石鼓（有的是石狮），无一不是这种精神的象征。即使墙上的彩绘，也不同于佛教和其它宗教的彩绘，走廊上的钟、鼓，也不同于佛寺或道观的钟鼓。

其三，不是虚无，而是务实。虽然毛氏祠堂以数百年前的先祖神灵作为祭祀对象，带有虚的成分，但与佛寺相比，则又是务实的。因为先祖之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先祖毕竟是存在过的，这与佛的虚无大不相同，而且，祠堂也仅以一块木牌，牌上写有名讳作为灵位，比起佛寺塑造的各种菩萨，显得节约多了。与佛事活动相比，毛氏祠堂安排的活动也实在得多，即使焚香跪拜，也仅是礼仪，而不象佛事那样大加渲染。跪拜的时间不长，之后是饮祖先之“福”，鱼肉酒食，无所顾忌，其间穿插的一些活动如商议公事，处理争端，惩处罪人，无一不是务实的。

其四，祠堂担负的重大使命，如修谱、制订族规、族法，解决矛盾，皆在此进行。在本族中它甚至充当了司法机关的角色，从订法，到督法，到执法，三位一体。因此，毛氏祠堂实在是封建族权在韶山冲的集中体现。

在仔细分析了韶山毛氏家族的“法典”之后，再与三千多年前西周的宗法制度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儒家学说相比较，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毛氏家族很大程度地继承了周礼和儒学。

周朝建立后，周王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毛国的人们也不例外），他是最大的族长，既代表社稷，又主持祭祀，为了后者，建立了宗庙，称“太庙”，祭祀自始祖以来历代祖先，庙内享堂列祖宗牌位，左昭右穆，始祖居中，第二代为昭，第三代为穆，第四代为昭，第五代为穆，如此类推。

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其他诸子或封诸侯，或在畿内分得采邑，诸侯及采邑得主，也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分成若干别宗，各有“氏”号（如“毛氏”），受封的“别子”（周王长子之外的儿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

又是别宗的族长，其地位仅次于周王。别宗以下还可继续分封，从而构成西周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度。

我们看韶山毛氏家族的“宗法制度”，正是对其始祖郑所处的时代——西周的继承。毛氏宗祠，是毛氏王国的“太庙”，祭祀元末以来毛氏始祖毛太华，及他的儿子毛清一，毛清四，以及毛清一，毛清四的儿子毛有恭，毛有伦等，他们的灵位设置与西周宗庙完全一样，左昭右穆，始祖居中。整个毛氏家族以族长（如毛泽东出生前后的毛鸿宾）为首领，他是韶山所有毛姓中的权威人物，他在全族中辈份最高（但不一定年龄最大），地位相当于毛氏“王国”的国王。毛氏宗祠以下，分设5房，即震、鉴、瑞、深、石狺，各房又建有房祠（相当于西周诸侯国的宗庙），于是有了毛震公祠、毛鉴公祠、毛深公祠，这三座祠堂又分别祭祀各房的祖宗，如毛震公祠即祭祀震公一房的祖宗（毛泽东的上17代祖先毛震）。

再从韶山毛氏家族反复向族人灌输的思想意识来看，也是与西周一脉相承的。

西周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立庙设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了尊奉其祖先，使人们树立牢固“尊祖”、“敬宗”观念。因为正是他们的祖先栽下了“国家”这棵大树，才使后人得以“乘凉”，比如周人祖宗上至后稷（弃），中至古公亶父等，下至周文王，正是他们，为姬姓得到天下奠定了基础。同样，毛姓的人们，也是因为赖有周文王之子郑，才得其姓，并向各地发展。

第三章 毛泽东出生前后的祖家和外祖家

一、普通的背景——为养家糊口而操劳终生的祖父们

从韶山毛氏的先祖毛太华起，至毛泽东出生前，其间约五百年，毛家除个别人外，基本上都没离开过这个山冲，终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虽然，日子过得仅仅是果腹而已；去世后，后人们再选吉日葬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祖家的背景在中国的农民阶层中，普通得没有一点夸耀之处。

按家谱序列，从毛太华到毛泽东共经历了 20 代：

毛太华 毛清一 毛有恭 毛震 毛从文 毛珊 毛立尧 毛显暘 毛荣项 毛朝巍 毛士翱 毛文邦 毛方淳 毛运选 毛际耀 毛祥焕 毛祖人 毛恩普 毛贻昌 毛泽东。

毛家到了毛泽东的曾祖父、毛太华的 17 代孙毛祖人手里，有茅屋 4 间，水田 10 亩，旱地一亩，山林两块。由于生产力低下，亩产并不高，每年的收成缴去赋税后，年成稍不好，糊口都困难。

毛祖人，字四端，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 年）九月三十日，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十月初三，葬于滴水洞龙头山上。由于家贫，毛祖人从未上过学，农活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除了种好自家的地，还经常“砍柴做零工”。结婚后，在他 18 岁和 23 岁的时候，其妻周氏先后为他生下了两个男孩，即长子毛恩农、次子毛恩普。又过了十几年，毛祖人就先后为两个儿子操办了婚事。大儿媳罗氏（元配）、庞氏（继配）；二儿媳刘氏，并且几年后均生有子女。所以，毛祖人的晚年可谓儿孙满堂，但因为人多田少，住房拥挤，借了不少债。毛祖人 52 岁那年，横下一条心，借银数百两买下了土地冲上屋场的房屋和土地。到 1878 年恩农、恩普分家时，毛祖人的家业已发展到茅屋两处共 9 间半，水田 32 亩。然而，兄弟分家时，谁也不愿意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居之地东茅塘而去住远房作吊田。作为一家之长的毛祖人权衡再三，最后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来裁决。即背着当事人，事先在两张纸条上分别写上尽量搭配均匀的房屋的住处，田亩数量，并搓成砣子，然后让俩儿子去抓，抓中者为其所有。结果，毛恩农抓得东茅塘的屋和田外加上屋场的 7 亩田，共得田 17 亩。毛恩普抓得上屋场的屋和 15 亩田，因为多分房屋一间半，所以才少分 2 亩田。又过了几个年头，也就是 1893 年 10 月的一天，他的曾孙毛泽东出生前几十天，操劳一世，负债一身的毛祖人便去世了。身后留下了东茅塘和上屋场的家业，留下了满堂的子孙。

毛恩农，字嘉宾，号德臣，毛祖人之长子，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九月初一，葬于滴水洞之北牛形山上。毛恩农在东茅塘毛家故宅度过了 66 个春秋。他终身以农为业，读过两年私塾，还会看风水。元配罗氏，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十二月三十日生，卒于同治四年（1865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年仅 24 岁，葬于滴水洞筲箕墚。生有二女。继配庞氏，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民国五年（1916 年）五月初二。生有三子一女，其中长子毛贻盛就是中帼英豪毛泽建烈士和现在健在的毛泽连老人的父亲。

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毛太华 18 代孙。毛祖人次子，毛泽东之祖父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四月二十七日辰时。毛翼臣久患眼病，同其父一样，为人忠厚老实，以种田、打柴、做零工养活家口。其妻刘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八月初二，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 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有一子二女。子名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长女适张，次女适贺，因

无子孙，族侄孙贺凤生过继与之为嗣。毛翼臣先后在东茅塘和上屋场生活了58年之后，于1904年11月23日病逝，葬于滴水洞之大石鼓山上（即现在的虎歇坪），并立有墓碑。1986年12月28日从地下挖出来的墓碑，便为当年所刻。碑文曰：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 鑄，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内辛山外戌山东男贻昌孙泽铭敬立淋“贻昌”即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的派名，“泽铭”即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泽淋”即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

二、祖坟风波——毛德臣毛翼臣争葬宝地， 结果弟弟先亡而早占；26年后，蒋介石打红军 老吃败仗，何键指派亲信副官来破毛家的风水

墓葬和碑文引出了两个疑问：一是从毛翼臣 1904 年去世到 1912 年上半年下葬立碑，为什么其间相隔 8 年之久？二是好端端的墓碑不立在墓前，为什么深埋地下呢？

这里涉及到两起有关“风水”的风波。

关于风水？晋朝文学家、古训家郭璞这样解释：“葬者，乘生气也，乘气风则散，界水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施有之，故谓风水。”就是说，住宅基地，坟山的风向，水流和地势的好坏，都关系到一家人的祸福兴衰。姑且不说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反正社会上从古代就出现了一些看“风水”的从业人员，称之为“风水先生”或“阴阳先生”，上文提到的毛德臣便是当地知晓风水的一员。毛德臣的父亲毛祖人本来葬于韶山的茆蒿冲，后来便由茆蒿冲迁葬龙头山。据传，龙头山上有一条神龙，身藏山内，横贯南北，其首高昂于千山万壑之中，其尾直插云盘山下。山中有一股常流不断的泉水，这便是“龙涎”。“龙涎”的出口处常常是“早生雾气午生辉（即彩虹），冬暖夏凉不枯竭。”若向水中投石，便有无数气泡泛起，经久不息。龙头山又名护山，山后有一块形如人状的巨石，俗称“观音抱子”。

兄弟俩把毛祖人迁葬龙头山后，过了许多年，毛德臣、毛翼臣又选定了两块“宝地”，即牛形山和大石鼓（即虎歇坪）。大石鼓位于滴水洞之北山，古木参天，花奇草异，怪石林立，于是德臣、翼臣都盯上了它。相争不下，便达成了“先死者葬，后死者让”的协议。德臣自然心安理得，暗自欢喜，因为他占了比老弟长 5 岁的优势。然而，生命的短长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偶然性恰恰在德臣、翼臣之间发生了。毛翼臣 58 岁那年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久治不愈。10 月中旬的一天，他用最后一口气吃力地叨念出“大——石——鼓……”之后，便长眠了。

那时，安葬必须择定吉日良辰，更何况是往“美穴地”安葬。而毛翼臣安葬的吉日良辰不是近日，也不是近月，竟是 8 年之后的夏月某日。于是，只好将其灵柩安放在大石鼓墓基上面，因为墓基之土石不能挖动。所以，又只好用晒垫、稻草之类覆盖其上，再磊石覆以薄土保护之。时过 8 年，终于到了下葬的日子。下葬的这天，人们纷纷而至，揭开灵柩上的覆盖物，棺木色泽光亮，完好如初。破土挖穴，则穴位皆土，四周俱石，于是众口哗然。据说，这块形如鼓状的大石头，在葬坟之前，敲之咚咚作响。而自毛翼臣之墓安葬之后，再也敲不响了。

如果说德臣、翼臣“宝地”之争是“内部矛盾”的话，那么，26 年后的又一场祖坟风波，其性质却上升到“党国”的高度，在崇尚科学的现代，愤慨之余，颇令人有点啼笑皆非——1930 年 10 月，国民党部队在江西围剿红军连吃败仗，湖南省省长何键认为败就败在毛翼臣长孙毛泽东身上，因为江西红军是他为首领导的。于是，何键召见参谋长、把兄吴凯南共商对策。懂点“风水知识”的吴凯南沉思片刻之后，便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之所以败在毛泽东的手下，是因为毛家祖坟山地风水好，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硬气，系坟山贯气所至也。要想打赢毛泽东，最后剿灭共匪，非挖掉毛泽东的祖坟，断掉其龙脉不可！”经过周密策划之后，何键指派了亲信副官熊道乾统率一

个连的兵力，前往韶山挖掘毛家的祖坟。那是一个黑沉沉的晚上，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匪兵，首先来到了湘潭西二区国民党党部。在听取了区长李性恂关于毛泽东祖坟墓址的调查情况汇报之后，便鬼鬼祟祟地向滴水洞方向进发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步入韶山冲的时候，山上山下“呵嗬”声、放铳声、锣鼓声、洋油桶敲击声，突然四起，而且一阵紧似一阵，蒋军不知所措，吓得四处逃窜。过了许久，他们才3个一群，5个一伙地逃到了韶山的永义亭集结听命。当奸细告诉他们，那鸣锣、放铳和呼喊之声是夜里在山上守红薯的农民发出的，是为了驱赶野猪。匪兵们明白过来后，这才依旧手持刀枪，肩负锄头，战战兢兢地窜进了韶山冲，爬上了滴水洞的大石鼓山上。几乎同时。写在一块白布上的一行大字映入他们眼帘：“前面一座大石鼓似的坟堆就是毛泽东的祖坟”。于是乎，他们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挖了起来。挖呀，扒呀，终于挖出了棺木，刨出了惨惨白骨堆……熊道乾满怀“胜利”喜悦之情回到了长沙，受到了省长大人的祝贺与重赏，好不威风。他还把捡回的骨骼装在酒瓶子里让人欣赏，说：“十年的骨头和百年的骨头有区别……”然而，回来不久，熊道乾一闭眼就做起了恶梦，梦见那白惨惨的骨堆在跳动，那圆圆的颅骨在哭泣……。他白天黑夜都心惊肉跳的害上了恐怖症，最后，便疯疯癫癫地回到了他的沅陵老家。解放后，终于被人民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镇压了。

若干年以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说：“何键叫做有办法，打不赢就挖坟。”

何键恐怕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1930年挖的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地主毛俊贤家的祖坟。原来，父老乡亲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早就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即先将毛泽东祖父的墓碑推倒并深埋土中，再将墓堆推平后栽上树，种上草，使之与周围环境一模一样，不现任何蛛丝马迹，并且拟定了大张旗鼓的“驱赶野猪计划”。不过，谁也不曾想到，时过半个世纪之后，这块长1米，宽0.5米的普普通通祁阳石墓碑，竟在修游道时无意中被挖了出来。

有次，毛泽东曾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关于他家祖坟风水的往事。记者问及毛泽东：“听说你家的祖坟风水很好，你认为是这样的吗？”毛泽东风趣地答道：“过去帝王将相埋的地方一定风水很好，不过我小时候听说我的曾祖母的坟地风水好。”

三、勤俭继世的楷模——与毛家同中有异的毛泽东外祖家

毛泽东童年时经常住在外祖家，因而外祖家的成员对毛泽东的成长起着很大作用。

毛泽东外祖家姓文，世居湘乡大坪乡唐家坵，距韶山冲仅 10 多里。毛泽东母亲嫁前叫文七妹。

关于文姓的起源，据《风俗通》记载：“周文王支庶，以谥为氏。”这就是说，文姓，得自于周武王追赠其父的谥号“文王”之“文”字。可见，毛、文两家有着一个共同的始祖。

有趣的是，韶山一带的文氏家族与毛氏家族一样，原也世居于江西。北宋大观元年（1107 年），文辉璋落籍于湘乡长田坪（比毛姓早 274 年来到湘乡）。明成化十六年（1480 年），文辉璋的后裔迁居高冲（在今湘乡白田区）双井湾，因为大坪与高冲为邻，所以，现韶山市大坪乡的文姓都来自高冲。

更为有趣的是，毛泽东的家境与外祖家，又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都是先人从极度贫困的凄惨生活中，通过勤劳、节俭，精于操持，才慢慢好起来的，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并且都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先后中落下去。

文作霖是毛泽东的外曾祖父，即文七妹的祖父。外曾祖母贺氏十四岁嫁到文家时，上有高堂，又没有什么田产，靠佃种人家的地养家糊口，“君窘甚”，“拮据艰虞，殆难言状”，5 年以后高堂大人去世，小两口“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休”，辛勤地佃种人家的几亩水田，苦度时日，由于不堪生活的重压，当文作霖 27 岁这一年，即 1797 年 9 月 19 日，便过早地匆匆辞世。当时，其大儿子绵芳才 10 岁，略晓人事的他跪在父亲灵前失声痛哭，3 岁的绵薰望着僵硬的父亲乱哭乱叫，在贺氏的怀里，还抱着一个才 10 个月的婴儿绵姜，另外，还有连名字也没有的小女孩。

年轻丧夫，这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然而，贺氏并没有被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和落在身上的重担压垮。本来，在她嫁到文家时，由于公公年迈，婆婆早已去世，丈夫终日在外辛劳，她早就揽起全部的家务了。而现在，她成了全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她精明能干、勤俭持家，节衣缩食到了几近苛刻程度。丈夫谢世后，她仍艰难地佃种着原来的那几亩薄田，并先让大儿子替人家放牛，每年只图攒得几担谷的收入，大儿子稍大以后，她就安排他改打月工，让二儿子接替大儿子看牛，后来三儿子也大了，便让他接替二儿子的活儿，又让二儿子打月工，大儿子做长工。在 3 个儿子都年轻力壮后，她便安排他们贩田耕作，每年竟也有 30 多担稻谷的血汗收入。

贺氏的节俭持家传遍戚里，遐迩闻名，她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绝不浪费每一粒粮食，她一看到猪吃完食后，嘴巴上沾着一粒米饭，也要用水把它洗下，牢记乡间“好吃当小赌”的古训，规定家里每天只准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晚饭，并且，在农闲季节，只能吃上一顿硬饭，一顿只喝稀饭。“三年烂饭买匹马”，慢慢地，家里略有节余，3 个儿媳也先后娶进来，但她的节俭之风，未有丝毫放松。

当时，男人们在外打工，媳妇们在操持家务之余，全都替人用摇纺车纺纱织麻，从中攒点棉花布头，作为工钱，贺氏有了孙子以后，媳妇们更加辛劳，既要抚儿育女，又要纺纱织布，还要做家务，而婆婆尽管疼爱她的儿子、儿媳，但从不让她们有稍多的歇息，她规定她们每天得纺多少纱，织多少布，如不能完成，则要遭到责备，儿媳们的劳累可想而知。婆婆每天吃两餐的习

惯并不因她的家境稍为好转而改变，这样，儿媳们颇有些受不了，尤其是夏天的日子又长，她们忍受不了辛劳之后饥饿的折磨，于是，有一天，儿媳们商量，在每天煮饭时，稍微多煮一点，瞒着婆婆和丈夫，悄悄地藏在一只水桶里，并在上面搞好伪装，待到每天晚上洗衣服或纺纱织布时，以做活为掩护，每人偷偷地吃上几口。

这样的日子倒也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但是，一个纯偶然的“事件”被丈夫发现了。

文家养了一只狗，一天，这只狗引来了另一只狗，两只狗在屋内打起架来，“不小心”将藏饭的水桶打翻了，不巧正被从田间归来的大儿子碰上，他颇感到奇怪：“水桶里怎么会有这些饭呢？”在他的再三盘问之下，媳妇们只好如实相告。

体贴妻子的绵芳只好硬着头皮将这事禀告母亲，并请母亲开恩：“现在条件好些了，晚餐的粮食已不成问题，您老看，是不是现在起每天吃三餐呢？这样，吃饱了，也好多干活啊！”

贺老夫人善解人意，她欣然同意，这才改变了已坚持30年的老例规。

就是靠这样的辛勤劳作和节衣缩食，文家日积月累，后来居然购得些田地，并买下了唐家托房屋一栋。贺氏刚嫁到文家时，全家年收谷仅数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20多口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的大户人家。

贺氏的二儿子文绵黛就是毛泽东的外祖父。贺氏影响了文家几代人，她带领这个大家庭不但创造了一笔在当地颇有名声的家产，而且留给后人一片赞誉。

与勤劳和节俭一样，她的乐善好施同样远近闻名，为乡间所称道。在文氏富起来之后，少不了有些乡邻戚友为生计所迫前来借债，其中有的家道中落，无力偿还，贺老夫人总是予以体谅，把他们请来，茶饭相待，并且当场焚毁借券，永不追还。遇到年荒谷贵，贺氏倡议举家食粥，节省下来的稻米，则送给那些饥肠寸断的穷人，“凡此落落大端，直烈丈夫所为，岂鄙吝一流所可同日语哉？”

由此可见，贺氏的孙女，也即毛泽东的母亲以及毛泽东本人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21年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教育全家弟妹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国家，动员他们毁家兴邦，离开韶山前，也把与他家有经济往来的乡亲请来，把自己欠人家的债一一如数奉还，而别人欠他们的债，则宣布一概作废，并要当众把借条烧毁。其中有一个人怀着感激的心情，笑着对他说：“润之先生，感谢你的大恩大德，不要我们还债了。但是，请你用墨笔在借约上圈了再烧，免得我们死后，到阴间还要还给你父亲哩！”毛泽东爽朗地笑道：“银子都不要了，划几个圈还不更易。”随即将几张借约圈了圈然后付之一炬。

清光绪八年七月初六，即公元1882年8月19日，贺老夫人“无病而终”，享寿88岁，儿孙们感念她的功德，请来道士，择吉地，选吉日，不惜山高路远，重金买下风水先生选中的吉地——毛泽东故居东北面不足一公里远的龙眼塘，将贺氏厚葬于此。

四、毛泽东“0岁”时，家庭和社会赋予他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降生前夜，祖父和父母都做了一个怪梦

查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年表，在公元1893年这一栏目里，12月26日这天，都毫无例外地留给了毛泽东！

他诞生在一个充满忧患和动荡的时代里，而1893年，却是一个在动荡的缝隙中难得的平和之年。

1892年，沙俄出兵帕米尔，清朝又吃败仗，沙俄遂强占了新疆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100个韶山市），朝野震动，国民大哗。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攻占旅顺和威海，烧杀无辜，国库已空的清政府又被迫赔偿上亿两白银，人民在离乱和繁重的赋税面前苦苦挣扎着。

而在湘潭，1888年曾发生地震，随之而来的瘟疫又使许多人丧生；1895年，这一带又发生大旱，庄稼无收，到处是逃荒的人群。

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湖南人以参加“湘军”为荣，曾出现的从军狂潮，至1893年始平静下来……1893，难得的1893！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母亲文氏结婚很早，在生毛泽东之前，先后有两个孩子夭折在襁褓里。怀上毛泽东这年，毛顺生23岁，文氏26岁，按现代优生学的观点，他们均在最佳生育年龄。

文氏初孕的时节，正是春暖花开之日。这年的2月3日（阳历）立春，17日春节，从农历看，春来得特别早，竟在上年的十二月十七就到了。毛泽东在母腹中经历了四时的更替，到冬至后的第五天才呱呱堕地。

据传，文氏在临产前一天的夜里做了这样一个梦：时逢初一的一天，她照例来到了堂屋在摆有酒肴供果的神龛面前，专心致志的将折好的纸钱一张接一张地往火苗里丢。接着点燃一把香后双腿跪地，双手合十，连连叩了3个头，然后起身前往祖神牌位去装香。她抬头一看，猛然见神龛上缠着磨盘般大的花白相间的大蛇，身粗犹如碗口，身长一丈有余。它正翘首望外，鼓目而视，时而吐吐舌头，时而张口喷气嘶嘶作响……。文氏被梦吓醒，连连推醒了睡在身边的丈夫毛顺生，并将上述梦境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毛顺生说：“刚才我也正在做梦，梦见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从天上掉下来，落进了我的茶杯里。一下子，我的茶杯就变成了一个通明透亮的灯，灯光照得大地发亮，映红了天边。”翌日一早，顺生、文氏夫妻双双向父亲毛翼臣述说昨天晚上做梦的情况。毛翼臣听后，竟然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昨晚的梦况：“我梦见了一个身披金甲长袍的大将军，在我们家的堂屋里来回巡视不止。我上前恭问‘将军大人有何贵干’？将军回答说：‘受天尹之命来此保护你家祖神位的。’”讲到这里，年逾花甲的毛翼臣乐呵呵地接着说：“孩子，昨晚我们3人做了3个梦。这是三个恶梦，梦是反的，是个好兆头，就是天神保佑你们要生贵子了！”毛顺生边听着，喜形于色地望妻子，文氏面带羞色地含笑着走进了房间。到了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辰时（1893年12月26日），毛顺生在上屋场的横屋里焦急不安地来回走动。文七妹则在卧室里承受着临产前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婴儿顺利降生后，毛氏夫妇对这个白胖胖的男婴自然万分珍爱，生怕再像前两胎那样夭折。应该说，毛泽东良好的体魄，在襁褓时，甚至在母腹中，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第四章 父亲：毛氏家族淳朴而精明的传人

一、当兵，这位从未走出过山冲的汉子虽未捞到什么官职，却长了不少见识

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五日，是毛翼臣的独生子，毛太华第19代嫡孙。这位对毛泽东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父亲生在东茅塘，长在东茅塘，“圆房”成婚也在东茅塘。仅留下的一张照片上可看出他高大的身材，头上留有一条长长的发辫，面庞略为清瘦，两眼深邃而有神，饱经风霜的面容，显示出他的质朴和精明。

还是在毛顺生10岁那年，父亲就为他从湘乡四都唐家坵娶来了一个比他年长三岁的童养媳——文氏。这大概是他父亲按照“女大三，抱金砖”的习俗惯例而为之吧！5年后，即1885年正式“圆房成婚”。1887年，毛恩普就把掌管家业的权交给了年仅17岁的儿子毛顺生，就是上屋场那5间半茅房和两块柴山、15亩田的经营管理；祖父、父亲、母亲、妻子连同他自己5口人衣、食、住、行的料理；以及购田买房所欠下的几百两银子的债务。与其说父亲给他的是掌管家业的“大权”，还不如说交给他的是一副沉重的生活担子。毛顺生就这样挑起了这副担子，在成就家业的道路上逼迫他过早地成熟了。

毛顺生成就家业之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专事农桑”阶段；“弃农从军”阶段和“亦商亦农”阶段。

农桑阶段是始于他接过家长之“印”后到毛泽东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其间，毛顺生这位年轻的农夫，在闭塞的韶山冲里，其足迹除了岳父家唐家坵再未向外延伸，他起早睡晚地拼命种田、砍柴，每每从田间回来，还要察看一下谷仓上的锁锁得牢不牢；检查一下农具好不好；看看牛栏里的牛肚子吃得滚圆不滚圆；把从外面随手扯回的一把草往猪圈里一丢……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然而，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家境却丝毫没有好转，这使毛顺生感到气闷。更有甚者，不顺心的事接连发生——妻子为他连产下两个男婴都在襁褓中天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对家族思想浓厚的毛顺生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到了第三个男婴毛泽东出世时，毛顺生才心中生喜，因为毛家的香火总算有人接了。

就在毛顺生感到郁闷和无望的那些日子里，他苦索着如何改变家境。当时，时有与毛顺生命运相同的同龄人先后投奔曾氏创办的湘军，个人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什么“打长毛”、“剿捻子”，大多是想讨个一官半职的，或能挣点银钱。因为那些平民出身却因入了湘军成为显贵的人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诱惑。毛顺生耳闻目睹，在想了许许多多之后，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毅然外出当兵去了。无疑他当的也是湘军。

对毛顺生当兵的具体时间，安营扎寨驻地，又到过何处何方，部队番号，是否参与战事以及军饷待遇等详细情况，虽然渺无可考，但是根据有关史料可以推断得出如下几点定论：一是当兵是肯定无疑的，其动机完全是为生活所逼，为企望升个官爵或发财而为之，而不是所谓去“报效”祖国，为大清皇帝效力；二是当兵的时间至少在两年以上，而且没能捞到一官半职；三是到过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诸如湘潭、长沙之类的中小城市；四是严格的军营生活使他更为精明强干，变得既不信神，也不信邪。据传，有一次，毛顺生做生意回来。是时，天色朦胧，深山一派宁静，他独自在羊肠小道上走着。陡然间，一头猛虎从草木相间的丛林中窜出，几乎与毛顺生碰了个满怀。此

时此刻，毛顺生并没有受惊害怕之感，心里只是一怔而又很快地平静下来了。没想到受惊的却是那头老虎，它一怔便很快地翻身跃入林中，接着又是几声咆哮，之后就没影了；现在，已不好考证毛顺生是在哪年哪月退伍的，也不知道退伍的原因和带回多少银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获得了一份特别的报偿——即萌生了商品经济思想。正因为如此，所以毛顺生回家之后，一改过去那种稻谷加稻草“单打一”的经营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手种田，一手经商。摆在毛顺生面前的现实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大量“洋货”的涌进，一方面增加了对原材料、肉食、粮油的需要；另一方面，迫使家庭手工业破产后的农民出售部分农产品以换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首先又表现在“商品粮”的增加上。于是全国各地形成了多处“粮油贸易中心”，湖南“长沙粮油贸易中心”就是其中的一处，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湘潭也自然成了洋货商品，粮食原料的集散之地，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市场。当时凡是从外国运进来的货物到了广州之后，就要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往内陆各地；中国外运出口的丝、茶、粮食等也往往先在湘潭集中装箱之后，再运到广州下水放洋。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十分繁盛，仅陆路肩货的苦力工人就在10万以上。这种商品化之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悄悄地吹进了这个穷乡僻壤的韶山冲。至毛顺生时代，仅“米店”、“肉食”、“南杂”之类的店铺门面就有10家之多，毛顺生办起的“毛义顺堂”，不过只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家罢了。

二、亦农亦商，精打细算，毛顺生赖此很快发了家

毛顺生经商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刚退伍后的那几年家人五口，有田15亩，年收谷约60担，除了自食35担左右外，尚有20多担结余。这结余部分就是毛顺生经商的原始资本。凡是到过“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的人都知道，就在故居后院右前方的一间房子里，陈列着石碓、磨子、推子、风车之类原始古老的稻谷加工工具。“开业”之初的商品大米就是毛顺生及其妻、儿在这里加工而成的，经常在当地零售，从中获利。后来，又从韶山、湘乡买进了一些谷子，请人加工，雇工运往银田、湘潭、长沙等地出售，从中获取剩余价值。毛顺生除做米生意外，还兼做猪生意和牛买卖。猪生意也是从出卖自己家里喂养的一两头猪入手的。而后由少到多，由自养出售到买进卖出，既买进仔猪，也买进肉猪。肉猪常常送到离韶山30里地的银田寺“长庆和”去出卖。与猪生意不同的是，牛生意是采取“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进行的。就是毛顺生把母牛买回来之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牛死了，则由两家平均分担其经济损失。此外，毛顺生还印发了“毛义顺堂”纸票，以促进资金周转的畅通，加强业务关系往来。他先后与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杨林的“毛重庆”、永义亭的“李福胜”、银田寺的“长庆和”、唐家坵的“吉春堂”、章公桥的“彭厚锡堂”、湘乡的“钱家米店”、湘潭的“裕盛米店”等上10家店铺门面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因而他的生意可谓是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活。

虽忙于经商，但毛顺生并没忽略了农事，而是亦商亦农。关于这段生活情景毛泽东有如下一段回忆：“我刚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每月十五对雇工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可见，在亦商亦农，事多人少的情况下，毛顺生采取的是自己带头干与妻、儿帮着干，自己家人干与雇请零、长工一起干的办法来处理农、商之间矛盾的，从而事农经商两不误。他这种“以农为本、以农促商、以商带农、克勤克俭”和“亲者严、疏者宽”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谓是至深至远。

纵览毛顺生发家和治家的动力和动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摆脱穷困，振兴祖业。毛顺生从出生到去世整整50年。乡村山童时的毛顺生我们且不去评说，只说从17岁掌管“家权”以后的毛顺生。他此后的33年三易其职，即农民、士兵和商人。终于告别了穷困，迎来了富裕，即贫农——中农——富农。其间，贫困没有使他气馁，挫折没有使他退缩，而始终信心十足，一干到底，即使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显而易见，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而支撑毛顺生发家、治家的内在驱动力，应该是“毛氏家族”的“家规”、“家法”和封建正统思想。“家规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皆属正业。”可见，毛顺生走的条条是正道，干的行行是正业，所以他才始终不渝而为之。

其二，严抠细算，富而不奢。毛顺生的晚年生活是比较富裕的，毛泽东称之为“富农”。其家有田22亩，后来出卖1亩多给谢家屋场，扩建房屋又

占用了几分，实际只有 20 亩。按每亩收谷 4 担，每担 50 公斤计算，年收谷在 4000 公斤上下。又按照“一身一口七担二斗”的习惯算法，全家 5 口人，年耗粮在 1700 多公斤，尚余谷 2000 多公斤，再加上生意利润，租赁息金等资本，至少在 3000 元以上。这在当时来说实属一笔可观的资本，在当地是相当富裕了。操劳一生，辛苦一世的毛顺生本可以坐享其成，享受一番了。但是，他从来不给孩儿分文零花钱，不给鸡鸭蛋，更不给他们肉吃，因为非婚丧喜庆和逢年过节他是很少买肉或者根本不花钱去买肉吃的。

毛顺生的支出大致如下：一是全家 5 口人的消费开支；二是支付零工、月工、长工的工资，因为他家除了雇请临时工即季节工、月工之外，还雇请了一个长工，一直雇了好几年；三是偿还债务，包括父亲欠下的和毛顺生早些年借的全部偿还清楚，真可谓“既无老债，又无新帐”；四是购置田产，1904 年一次就买下了毛菊生的 7 亩田。他在田产增加到 22 亩的时候，他便不再买田了，而只是给他人押佃钱或者租佃钱，从中获取利息；五是支付毛泽东的学钱，这大概就是唯一的一项“智力投资”；六是房屋的修缮费用；七是做了一些公益福利事业。

从上述诸项开支中可以窥见到毛顺生其人某种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和热心于“公益福利事业”的思想。这种思想竟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一个乡村农民身上，实在难能可贵。“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冲上屋场的房子就是他修建起来的。这里原是 5 间半茅屋，“半间”就是指堂屋，是指两家共用，各自半间。原来这是一栋一进两横的“一担挑”的乡村农舍，以堂屋正中为介，东、西两头各有四间房子相对而立，东头房家主人是叫毛正光。1878 年毛祖人买的就是毛正光的房子，时为长子毛德臣居住。其间，房子失火被烧一次，在修复过程中，除少部分换成瓦房外，其余茅屋依旧。毛翼臣及其父亲、母亲居于东茅塘，其母刘氏已于 1884 年 4 月病逝。1887 年德臣、翼臣兄弟分家时，翼臣分得上屋场。于是年过花甲的毛祖人跟随其次子毛翼臣、孙子毛顺生、孙媳毛文氏一起走出了东茅塘的茅房，又一齐挤进了上屋场的茅房，并且在这里度过了数不尽的凄凉时光。“韶山强人”毛顺生接到手里时，他按照其岳家唐家坵住房的布局格式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又经过几十年的添砖加瓦，在将原来 5 间半改成瓦房的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毛泽覃卧室、毛泽民卧室等 9 间瓦房。于是一栋土木结构、青瓦盖顶的 13 间半山乡农舍拔地而起，这是毛顺生“成就家业”的重要标志。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毛顺生沿致富的台阶往更高处走时，天灾人祸接踵而至：1916 年房子起火，1917 年败兵抢劫，1919 年妻子病故，1920 年，毛顺生刚及半百便过早长眠。更有甚者，1929 年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其房，家具、农具、遭到严重破坏，房约地契抢劫一空……

这幢经风沐雨的普通农舍，既是旧中国一户平常农家惨淡经营的见证，又是田园生活的缩影。许多年后，曾经有人问及毛泽东：“主席！您家的房子要不要另外起过？至少也要修缮一下吧？”毛主席带着浓厚的乡音严肃而又亲切地说：“不要起了！给我建房子做什么？给我起房子，还不如起个招待所好！上屋场我家的房子也不要修了，给人家去住，不要搞坏就行了，韶山人多田少嘛。”

三、既热心于公益事业，又吝啬而不轻易施舍， 毛顺生身上体现了中国农民看似相悖的两个方面

毛顺生致力于公益事业，仅据文记载就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修谱”，二是捐资修桥。上文讲过，引人关注的《韶山毛氏族谱》创撰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次年成谱，称为一修族谱，亦称“老谱”，老谱已在韶山失传。以后经过了1881年的“二修”，1911年的“三修”和1941年的“四修”。显然，毛顺生参加的是第三次修谱。因为，“一修”他还未降生，“二修”年仅10岁，“四修”已去世21年了。据文记载，毛顺生是三修族谱的“修谱司事”成员之一，主管房修项目，名排第三。他不仅直接参加修族谱司事工作，而且捐谷立会：“自乾隆年倡捐八十祭会，把期清明；逮同治倡捐通族祭会，祀期小阳之朔，乃始议齐族目规矩，森然创置，祀产恢宏，我等因春冬两祭之外，又倡立秋祭会，族众翁然同心，每名捐谷四斗正，合计八十二名。捐名立后：震房竹溪支简臣、少齐、元芳、祿庭兄弟、顺生……宣统三年辛亥冬月刊。”（见三修族谱卷六）如果说，捐修族谱之类的事是毛家族内的公益事业，作为毛氏家族的成员毛顺生、身体力行，尽职尽责是在理之中的话，那么，“修河治水，架桥铺路”之类的社会公益事业，足以说明毛顺生对公益事业之热心。毛泽东故居前面有一条自西向东缓缓而流的小溪，那便是现在的韶河。就在韶河的那边有座长满青松占木的小山包，因为它是巍巍韶峰的落脉之地，故名“韶山嘴”。“韶山嘴”，与上屋场隔河相望，以桥相连，那座古老的“韶麓桥”便是毛顺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佐证。“韶麓桥”建于1919年的上半年，立有石碑。时过70余年，如今这块石碑仍然完好无损地嵌在石桥之北端的韶山咀上，碑文清晰可认，碑文如下：

韶麓桥碑韶山之麓一张桥，众志成城阔又高。磊石成梁关口固，明堂聚气物华饶。高车驷马行多便，题柱吟诗兴倍高。地境阴阳资保障，同登彼岸乐逍遥。

修人题毛敦本堂拾陆圆毛成拯四圆洋银毛八十会拾陆毛堂阁陆周祖胜公
捌圆毛银国拾毛务本堂捐洋银拾叁圆毛顺生捐洋银四毛介溪公 拾
张煦清

毛襄卿公洋银拾毛金 蛟 各一圆圆毛玉 碕毛震中元公 叁
毛星挠民国八年己未夏月 日立可见，韶麓桥是由七个集体和八名个人捐款集资修建的，一共集资银洋104块。其中毛顺生捐银洋4块，居个人捐款数的第3位。据当地老人回忆，4块银洋当时已经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数字了。显然，这与毛顺生“从不给孩子一文钱”之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据老人回忆，毛顺生还参加过修桥铺路的义务劳动。尽管无从考证当时修桥耗资的具体数目，但集资捐款是肯定无疑的。既然有集资的真实性，那么就有“集劳”的可能性。“韶麓桥”很可能就是通过“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的办法修成的。不难看出，这种办法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出钱的不一定出力，出力的就不一定出钱。而年届半百、身体很可能已经患病的毛顺生，既出钱又出力，真是老当益壮，尽心尽力了。

而同样是一个毛顺生，为了自家过日子，在下雨天里，当毛泽东没有抢收自家的谷子，而帮邻居毛四阿婆抢收时，毛顺生便对着儿子火冒三丈，连声训斥；堂弟毛菊生为生活所迫，典卖七亩水田，毛顺生却没帮他，反把七亩田乘机买了过来……这些，与他热心于公益事业看来是相悖的，这也许是

旧中国农民身上并存着的两个方面。毛氏《族谱》中有一条文：“多行善事把钱捐，名声永传，富贵远传”。这也许是毛顺生热心公益事业的理论动机。

四、教子严，爱子深。既舍得花钱送儿子上学， 又先后为他们一个个娶上了媳妇

那是 1902 年初的一天，也就是毛泽东发蒙读书的头一天，毛顺生送 8 岁的儿子毛泽东到南岸私塾，一见邹春培先生头一句就说：“石三，快给邹先生磕头呀！”毛泽东应声磕了 3 个头。邹先生彬彬有礼地回敬：“快快起身，令郎仪表不凡，礼节周全，有朝一日说不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到了那个时候，你这位老太爷自然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和皇上恩泽呐！”毛顺生直言不讳地说：“咳！我这个作田的人才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呢。我们作田人家的子弟只要算得几笔数，写得几句话就要得了！邹先生，拜托嘞！”

毛泽东 8 岁至 13 岁就读于当地私塾，尔后辍学在家，充当了父亲的得力助手，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看书、记帐，为了算得快，毛顺生经常教儿子打算盘。皓月当空的晚上，在上屋场故居的横屋里不时传出“的的答答”的算盘响声，这便是毛顺生在教毛泽东用双手打算盘。毛顺生用双手熟练地打了一会儿之后就说：“三伢子，用两只手打算盘是难得做到的事。但是，只要心静、脑灵、手快，也是可以学会的。来！试试看！”于是毛泽东接过算盘，按照父亲的指点打了起来，过了一阵子，左手自然而然地不动了。毛顺生见状，先是推了一下儿子的左手，然后质问道：“哪个叫你一只手打的呀！”“爹！用两只手打我不习惯。”听了儿子的解释，毛顺生严肃他说：“不习惯也要打习惯，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石三！你要好好地学点当家理财的本事啊！不然的话，等到我眼睛一闭，哪个来管这份家当？”

不难看出，这位合格的父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名登高科，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之类的大人物，而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恭敬祖宗，孝养父母，勤劳本业，发财至上”的孝子贤孙罢了。

教子严，爱子深。毛顺生对待子女一方面是生活上只以粗茶淡饭而供之，而不给鸡蛋吃，不给零钱花；另一方面在学业上只准“苦读正经书”，不准猎及“野史邪说”；在事业上要继传家业，专心致志，不要当“闲游放荡”的“不孝”之徒。

为了早继香火，传家继世，在儿子们才十几岁时，毛顺生就先后为他们操办了婚事。在婚事上，当然是媒妁之言，甚至指腹为婚。1909 年，先为老大毛泽东娶妻罗氏。罗氏生于 1889 年 10 月 20 日，比毛泽东大四岁。1907 年嫁到毛家的时候，正值毛家人财兴旺，家业发展的时期。她在毛家协助婆母文氏干些针线缝补、浆洗茶饭之类的家务活计，直到 1910 年 2 月 11 日病逝。毛泽东一直不承认这门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婚事。后来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4 年以后，即 1913 年，毛顺生又为次子毛泽民娶王淑兰为妻。王淑兰生于 1896 年 2 月 5 日，婚后生有 3 男 2 女，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之外，其余均已早亡。王淑兰既是一位勤俭持家，贤惠能干的农家妇女，又是一位热爱党、热心革命事业的女中豪杰。她在大哥毛泽东的教育下，1921 年参加革命，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被敌人推入铁窗牢笼，出狱后坚持党的地下斗争直到全国解放。1964 年 7 月 6 日病逝。值得一提的是，王淑兰与毛泽民虽属包办婚姻，但他俩感情很好，只是战争年代中断联系后毛泽民才再婚的。三子毛泽覃娶赵先桂为妻，虽然是在文氏、毛顺生去世以后的事，但是他俩的婚事却是毛顺生

和赵蕊香指腹为婚的。上文提到的“吉春堂”的商号老板赵蕊香就是赵先桂的父亲。他与毛顺生不仅有生意业务来往，而且又有亲戚关系。因为赵蕊香的姐姐即赵先桂的姑妈嫁给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瑞（行七）为妻，赵蕊香的姐夫就是毛顺生的七表兄，其姐即毛顺生的七表嫂，因而他俩的关系密切，感情很好。所以毛泽覃、赵先桂还在母腹躁动的时候，就由毛顺主和赵蕊香指腹为婚了。赵先桂 1905 年 9 月 8 日出生，1924 年与毛泽覃成婚。婚后不久，党指派她（1923 年入党）到苏联学习。1927 年 9 月学成回国后，毛泽覃已与周文楠结婚。于是，赵先桂先后改姓刘、姓李，辗转湖南、武汉、上海、天津、济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 年与山东省委宣传部长裴光结婚。1932 年 7 月壮烈牺牲。

毛顺生虽严苛、精细，但生活中时时表现出对儿子的舐犊之情。

在毛泽东 8 岁那年的一天，毛顺生手提竹篮，肩挎搭裱袋子，赶着两头猪从外面回来。还在塘边上的时候，毛泽东、毛泽民兄弟俩就随着“石三！石三”的亲切呼唤声从屋里向毛顺生迎面跑来。毛顺生就不断提醒道：“三伢子、四伢子，慢点跑！别摔倒了！”大概是因为哥哥比弟弟大了三岁而跑得快些，所以还是毛泽东先跑到了父亲面前。毛泽东鞠了一个躬之后，接着亲热地问道：“爹，您回来了！”毛顺生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脑袋，一边蹲下去翻开篮子：“三伢子，你猜爹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毛泽东顽皮地爬在毛顺生背上，搂着脖子，居高临下地看着父亲从篮子里取出了笔、墨和一本《三字经》。当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便蹦蹦跳跳拉长声音说：“噢！……我要读书了！我要读书了！”毛顺生一时只顾和毛泽东打招呼说话而忽略了站在身旁的毛泽民。于是，毛泽民一边扯着毛顺生的衣角，一边亲昵地喊道：“爹！爹呀！”“哎呀！差点忘记了我的四伢子！”毛顺生说着，便把毛泽民高高举过头，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心里乐滋滋地往家里走去。时过不久，毛顺生又带上腊肉、鸡蛋和 4 吊钱等礼物把毛泽东送进了南岸私塾，并用拜托的口吻对老师说：“邹先生，尽管给我严些管。”

有一次，由于毛泽东不满于父亲和老师的打与骂，竟赌气独自出走，3 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到领回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火光点点。毛顺生背着毛泽东在山沟里一步一步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心痛地问：“你在外边走了 3 天 3 晚，累了、饿了！身上还冷不冷呐？”说着便脱下身上的衣服披在儿子的身上后，才又重新背起儿子继续行进。

还有一次，是在 1910 年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即将离开韶山告别父母大人到湘乡求学。上屋场的毛家在忙碌了一阵之后，父子告别的时候终于来到了。送行的除了毛顺生之外，还有母亲毛文氏、弟弟毛泽民、毛泽覃，老师毛麓钟、李漱清以及其他父老乡亲。临行之前，双眼红红的毛文氏一遍又一遍地嘱咐道：“三伢子！装好了的辣椒带上了没有？你是头一回出远门，在外面莫吃冷的，莫喝凉的，要注意加衣服！莫冻着了，到了学校就写信回噢！”这时候毛顺生也深情地接过话头：“石三，你在外面要吃饱饭啰！钱用完了给我来信就是，我会搭来的。”这时候毛泽东的视线由母亲的脸上慢慢地移到了父亲的身上，脸上。然后，依依不舍地话别道：“爹、娘、先生，我走了。”于是转过身去，朝着远去的方向，与替哥哥挑行李的毛泽民并肩而行。毛顺生跟在其后，望着儿子那高高的个头，长长的发辫，在沉思着。走着走着，毛泽民突然拉了一下毛泽东并悄悄地说：“哥哥，爹哭了！”毛泽东慢慢转过身去，果见在爹的那张严峻的脸上，不时淌着滴滴泪水，毛泽东的眼

眶也自然跟着湿润了。于是，他突然跑回来，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接着磕了三个头……

1919年农历十二月初一（1920年1月23日），在妻子文氏过世3个半月之后，毛顺生因伤寒病去世于宅所，时年50岁。毛泽东当时正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覃也没能来送终，只毛泽民守在身旁。

第五章 母亲：心地善良，恪守妇道的信佛女

一、13岁到毛家，冷清、孤独的日子过了许久，许久……

与父亲毛顺生不同的是，母亲文氏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俭持家，慷慨厚道的女性。

文氏于清同治六年正月初八（1867年2月12日）在湘乡唐家坵一户殷实的农家里降生。唐家坵今名棠佳阁，与韶山仅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文氏之祖父文作霖是个勤劳俭朴的庄稼汉，27岁那年去世时，留下了老父、妻子和三个儿子。长子文绵芳10岁，次子文绵薰3岁，三子文绵姜才10个月。一家人在其妻贺氏的操持下，居然使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文绵薰、字芝仪，系文作霖次子，文氏父亲，生于1821年，卒于1888年。婚后生有子、女各三，长子文玉瑞（1853年—1921年）排行第七，配赵氏；次子文玉钦（1859年—1929年）排行第八；三子文玉材（夭亡）。长女适钟，次女适王，三女适毛，即韶山冲的毛顺生。因为她在同辈姊妹中排行第七（旧社会男女不混排，婚不入“谱”）所以人们称之为“七妹”，即文七妹（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根据字音误译为“文其美”）。显然“文七妹”不是她的正式名字，而是时下一个女孩子的乳名或者爱称罢了。因为旧社会的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一般是沒有正式名字的，对外称呼只曰“×氏”或“××氏”，所以文氏是她的对外称呼，出嫁到毛家之后的称呼则为“毛文氏”了。

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的网络下，文氏虽然被其父母家人看得娇惯，但是娇而不重。因此，没有让她上学念书，也没有让她外出干活，而只是让她在母亲身边学纺织，做针线，在炉堂灶屋实践操作家务之本事。田间、外边的活儿自然是大人及姐姐们干的行当了。13个年头过去了，文七妹长大了，长高了，长成了身材苗条，清秀端庄，唇红齿白，圆脸宽额，眉目聪慧的少女了，就在文氏13岁的那年，她跨进了毛家的大门，开始了她的童养媳生活。

那是一个难忘的早上。经过一番收拾之后，懂事的文氏，身不由己地跟在父亲的后面，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姊妹们，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唐家坵的山山水水，而来到了婆家东茅塘。初到东茅塘毛家的那些日子里，除了思念故旧时感到亲切之外，其他一切都是陌生的：古木修竹簇拥下的唐家坵那栋瓦屋没有了，屋前塘中那片亭亭玉立的荷花不见了，地势开阔的平地、贯穿南北那条行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山峻岭，紧锁着的狭长谷地，漫山遍野的深山老林，弯弯曲曲的山道，稀稀落落的住户和这栋千穿百孔的茅屋。娘家，四代同堂，全家老少20余口，欢声笑语，亲切无比。左右邻舍同龄姊妹青梅竹马，好不和乐。而婆家的祖父、祖母、父、母双亲，由于家境贫寒，整天愁眉不展，至于那位年仅10岁的男童毛顺生，由于男女之别和性格的差异，更是寡言少语。就连说话口音也不大一样。在毛家，还要做比家里更多的事，干比家里更重的活。这一切使她感到冷清、寂寞和孤独，远方传来的庙堂钟声，更加重了这种落寞寂寥的氛围。于是，文氏常常哭哭啼啼，吵着要回娘家。有时，父亲偶然来了更是缠着不放，结果只能是无济于事罢了。这种冷清孤独的生活过了好久、好久，才慢慢适应下来，才习以为常。

二、连续夭折了两个男婴之后，文氏开始信佛。 毛泽东还在襁褓里，就特意让他拜了个石头干娘

文氏生于那样的家庭，又身处这样的环境，从而促使了她特有品性的形成，她很自然地想寻找某种灵魂的慰藉和寄托。

前面已经提及文氏与毛顺生是 1885 年在东茅塘正式“圆房”成婚的。就是说经过了选择吉日、迎亲、办席、回门、做酒的完婚程序，从而获得亲人眷属、社会的认可。在完婚的过程中，男方要馈送钱物，女方要打发嫁妆。据老人们回忆，现“故居”父母卧室里陈列的大衣柜、抽屉桌就是当年文氏的嫁妆，是在分家时从东茅塘搬来的。当毛顺生与文氏结婚的时候，新郎年仅 15 岁，新娘也不过 18 岁，真可谓早婚了。对文氏来说，她终于从冷清寂寞中解放出来了。因为她有了一个由自己和丈夫构成的温馨的家，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因此，她开始暗自感到喜悦和宽慰。更值得宽慰的是过了些年头，第一个男婴终于降生了。然而，时过不久，却又匆匆离去。文氏又由喜生悲，愁肠万断，大约又过了一二载之后，第二个男婴又降生了。而万万没有想到他又在襁褓中夭亡了！接连两次，文氏这颗纯洁善良的心灵受到简直使她难以承受的创伤。于是，整天在叹息和失望中生活。她想起了孩儿时代听到长辈们讲过的信仰佛祖和菩萨，可以摆脱痛苦的话语，想起了跟随祖母、母亲到佛教殿堂“白莲庙”拜佛供香的往事，看到“慈悦庵”出出进进的善男信女。联想到自己的痛苦遭遇，使她坚信只有佛祖才能解除她的痛苦，保佑她儿子福大命大。这以后，她成了佛祖一名虔诚的信女。这也是她与丈夫毛顺生最大的一个分歧点。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代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整整 2000 年的历史了。至于何时传入韶山，目前尚未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入了韶山。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事实存在，一是佛堂庙宇星罗棋布。光韶山冲一带就有韶峰庵、仙女庵、慈悦庵、石洞庵、灵官庙、清溪寺、团山寺等 10 余处佛教活动场地。一位曾经在湘军从戎并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韶山人毛兰芳，晚年就隐居于韶峰山顶上的“韶峰庵”中，他终日浪迹林中，吟诗作画，吃斋奉佛，以示对他壮年所创下的“业绩”之忏悔；二是佛教传说早已有之。据传，在唐朝时代就有韶氏三女修身于此。人们常常透过云雾看见她们攀援在悬崖绝壁之上，后来升天而去。后人修“仙女庵”以祀之，如今庵堂旧址依旧留于山中。显然，文氏来到韶山冲之前，佛教盛行已久，这就为文氏信仰佛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文氏信仰佛一事，毛泽东有如下一段史话：“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的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文氏在佛事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自己信仰，百般虔诚。在文氏看来，两个男婴之所以夭折，是没有至真至诚地信仰佛祖所致。当他身怀第三胎之后，便回到了唐家坵娘家居住休养，因为文家的生活条件好于毛家。直到分娩前，文氏才返回毛家。文氏顺利地生下毛泽东后，见婴儿白胖福态，更加确信产前做的那个梦是佛祖给

的预兆。

毛泽民、毛泽覃降生问世的时候，外婆家都来人庆贺料理，料理毛泽覃的是文运昌之妻杨氏，据说是文七妹指名“点将”要她来的。杨氏精明能干，她除了为婴儿洗澡换衣，洗刷尿布之外，还为毛泽东、毛泽民做“猫头娃娃鞋”。杨氏回家的那天，文七妹打发了两件夏布上衣给她，以表达对她精心料理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满月之后，文氏抱着毛泽东回到了湘乡四都外婆家。以为外婆家儿女众多福气大，可托其福、沾其光，使儿子容易养活成人。

外婆自然把小外孙看得十分贵重，认为给孩子取乳名都要取最平常，最普通的，如“牛伢子”、“羊伢子”、“狗伢子”之类最卑贱的动物名，这样孩子才好养。同时还要寄拜干爹和干娘。于是，将毛泽东寄拜其七舅文玉瑞为干爹，文玉瑞便把他与自己子侄并列排行，舅母亦自然将其视若亲生。在距离唐家坵约一公里远的龙潭坵山脚下，有一块拔地而起的天然巨石，石高两丈八，宽一文余。石后，有一股终年不涸，长流不断的泉水从山洞中潺潺流出。据传说，曾有一条作恶多端的妖龙卧于洞中。龙出洞，水变浑，洪水涨，淹良田……为了使妖龙“安分守己”，不兴风作浪，危害良民百姓，人们除了每年杀猪宰羊供祭之外，还在石头上修建庙宇立“杨四将军”，以镇妖孽，人们称之为“石观音”从此，远近的善男信女纷纷前往敬香朝拜。深信“八字”和命运的毛泽东之外婆、母亲，自然看中了这块“神石”，毅然决定让毛泽东拜其为干娘。有一天，贺氏、文氏母女俩，一个怀抱毛泽东，一个带上写有毛泽东的名字及出生年月日的纸钱以及香烛、鞭炮、酒肴之类的祭品来到“神石”跟前，她们又是进香供酒，又是作揖叩拜，扶着襁褓中的毛泽东跪拜“神石”为干娘，以保佑吉祥平安。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名之曰：“石三”。此后，一直到毛泽东离开韶山之前，都管叫“石三伢子”，而不叫他毛泽东。毛泽东由于喜欢石头坚硬的性格，自然喜欢“石三伢子”这个乳名。1923年9月，他在写给在广州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特意指出：“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三，莫写毛泽东。”此外，还曾以“石三”为名发表文章。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工农革命军誓师大会上，就曾经把工农革命军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庞大的军队比作一口大水缸，并且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人民军队这块小石头，将来一定能够砸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那口大水缸。1951年2月的一天，彭大将军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彭德怀同志觉得自己不能同主席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于是谦虚地说：“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毛泽东接过话头强调指出：“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扔向麦克阿瑟。”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宾馆松山餐厅与当地父老乡亲共进晚餐的时候，还诙谐地谈及他的石头干娘：“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有来，是不是还等一等……”

为了寄拜“石头干娘”，文氏还按时论节祭“神石”和天地，敬祖宗，登庙堂从不误时，从来未隔断，真可谓是信佛一生，虔诚一世的神佛信徒。

二是教子信佛，孜孜不倦。文氏向其子毛泽东“灌输宗教信仰”主要包括言传和身教。还在毛泽东发蒙读书之前，也就是1901年正月初的一天上午，文氏把毛泽东带到“石头干娘”的跟前之后，文氏自己立刻双手合十举

香作揖，8岁的儿子站立在旁边，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三伢子，还不快给石观音磕头呀！”文氏见毛泽东无动于衷，便拉了一下他的手催促道：“快点，跪下！”说着自己又磕了三个头。磕完头见毛泽东依然站着来动，文氏焦急地问道：“石三，你怎么还不跪下给石观音磕头呢？”“我不给石头磕头，我只给爹爹和娘磕头！”这时文氏边擦眼泪，边难过地说，“唉，你真是个伢子，一点也不了解做娘的心事。你是老三，你前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了。娘怕你有个三长两短才把你寄拜给石头干娘的。不久你就要上学读书去了，今天来祈求她老人家保佑你平安无事，可你就是……”接着自己又念念有词道：“大慈大悲的石观音，我儿石三明天就要进学堂，祈求您老人家保佑他成就学业，无病无灾。”“娘！莫哭了，我听你的话。”毛泽东说完就跪下向“石观音”磕了三个头；平时，文氏常领着毛泽东在佛堂庙堂里抽签问卦，在家门外边祭拜天地，在神龛前祭拜祖宗。1959年6月26日上午，当毛泽东重返故居时，站在堂屋里指着神龛说：“这就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毛泽东在母亲神佛思想熏陶和孜孜不倦的开导下，变成了一名对神佛深信不疑的男童信徒。还在他15岁的那年，由于母病而须要许愿于神佛菩萨，以求早日康复，毛泽东曾徒步南岳“朝圣进香”。“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边走边念，边念边拜，就这样5步一拜，10步一跪，一直跪拜到南岳庙。当然，随着岁月更替，毛泽东知识的增加，就变得越来越不迷信神佛了，因而常常受到母亲的责备。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三是劝夫信佛，千方百计。丈夫毛顺生只读过两年书，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科学知识的地地道道农民。但是，他侍奉家神甚恭，却不信神佛。为此，虔诚信佛的文氏常常感到难过伤心。她常自己苦口相劝，母子同劝，总想使他转变过来。然而，不仅没有效果，反而遭到他的责骂。当然，在他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也时有烧香拜佛之举，只是并不虔诚罢了。

三、对家人，她是贤妻良母，对邻舍，她以乐善好施享有美誉

文氏在韶山共度了40个春秋。在这40年的沧桑岁月里，她为人处事无不是宽容待人，恭让谦和。首先是“孝敬翁姑”，无微不至，无论是娘家长辈，还是婆家父母，她都是关照周全，竭尽孝心。其次是赤诚待夫，逆来顺受。她深深地爱着丈夫，默默地支持丈夫的事业。每当家庭内部以及自家与外人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时，她总是曲为周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把是非和委屈留给自己。她抚育子女（共生有五男二女，到她逝世时只剩下老三泽东、老四泽民、老六泽覃），操持家务，喂猪养鸡，锄园种菜，事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她的节俭也是远近传闻。餐桌上的饭粒总是粒粒拈起归口，连沾在猪嘴巴上的残溜糠屑也要洗净入槽，让猪再次食尽……她这种勤劳俭朴和默默操劳的精神，对于毛顺生发展家业的成功，无疑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正如当地老人所言：“毛家外有毛顺生之经营，内有文氏之节俭，所以才建立起这样一份可观的家业。”即使对于丈夫某些不顺心的处世态度，她也只是以耐心劝说化解矛盾。有一次，“钱家米店”的老板来毛家谈一笔生意，毛顺生精心地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款待他。当主人恭迎客人入座之后，毛顺生便吩咐道：“石三！快来给钱老板斟酒呀！”毛泽东则一动也不动，只是不高兴地嘟哝道：“我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买卖人。要斟，你自己去斟嘛！”“么子？你再讲一遍……”正当毛顺生要大动干戈的时候，忙个不停的文氏立即丢下手中的活计，跑上前去，一把拉着丈夫的胳膊说：“我给你讲过好多次了，石三已经长大了，做事情他有他的主意，不要硬是要他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嘛。”说完，她给客人和丈夫斟了酒才算了事。

平时，文氏常常开导儿子要孝顺父亲：“你爹的爆竹子脾气你是晓得的，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只要是他定了的，就是几头牛拉也拉不回的。往后，不要犟了，即使是你爹不慈，你也不应该不孝嘛。其实，他常常当面骂你，背后又在夸你。你去跟他顶撞，我做妈的心里不高兴，连那个佛爷菩萨也会不喜欢的。”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毛泽东很久都没有忘记：“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公开反对执政党（指家长父亲）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对待穷人，文氏总是慷慨厚道。她这方面的优良美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孩子们，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一直很拥护母亲之美举，反对父亲的作法。毛泽东说过：“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那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的确，每逢荒年荒月，文氏经常背着丈夫，悄悄地以粮食接济贫苦乡亲。事过数十载，如今韶山冲一带仍然传颂着文氏济苦帮贫的桩桩往事：毛顺生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困不堪，文氏和毛泽东不仅反对买他的田，而且每每逢年过节的时候，便瞒着毛顺生给这位穷亲戚送去大米，送去鱼、肉之类的食物。有一回，一老一少两位衣着褴褛的要饭女人，可怜巴巴地来到了上屋场，见到正在门外做事的女主人之后，长者便有力无力的哀求道：“大慈大悲的主人家，我家有好几天没有揭锅盖了！可怜可怜我这个孙女，给点米回去做顿饭吃吧！”说着老幼双双跪下求赐。文氏见状

立即扶起那位面黄肌瘦的细妹子，用手理了理她的头发后，哽咽着安慰道：“好妹子，快快起来，我这就给你装饭去。”毛泽东一边注视着祖孙二人的举动，一边望着走进厨房的母亲背影，突然转身也跟着进了厨房。母亲正在往碗里盛饭，毛泽东也在帮娘挟菜。“你们快趁热吃吧！把袋子给我，再给你们装点米来。”文氏说完后，母子一前一后又往谷仓那边走去了。文氏撑着米袋子，毛泽东则一勺一勺地往袋子里装米。外边祖孙俩蹲在台阶上，大口大口地把饭往口里扒，往肚里吞……。

毛泽东故居的碓屋曾经是毛家做米生意期间谷米加工的场地。文氏和毛泽东在这里劳动的时候，不时暗暗地从侧门口撮米馈送穷人。每当这时，文氏站在门边“站岗放哨，”一遇到毛顺生来了便以咳嗽为信号，暗示毛泽东立刻终止施舍行动。

对于儿子行善乐助的举止，母亲总是给以嘉赞和支持。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见一个家境贫苦的同学没有带饭，就把自己带去的饭菜分一部分给他吃，因而，每每回家以后毛泽东便是一副饥饿之相。起初，母亲以为儿子饭量增大是苦读经书所致，所以就让他多带些饭去，结果依然如此。当其母问及情由的时候，儿子照直说了，母亲欣然赞许他的举动，每次总是多给他带一些饭。

还有一回，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毛泽东在上学读书的路上遇着一位衣着单薄而又破烂的年轻人，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当了解到他的家境和遭遇之后，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衣服给他穿上。直到第二年春天，母亲翻晒冬衣时，发现儿子少了件夹袄，一盘问，儿子便把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点点头，对儿子丝毫没责备。骄阳似火的盛夏，由于久晴无雨，田间到处是龟裂、苗枯的景象。毛泽东常常是起早睡晚地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苦命人车水抗旱……

类似这样善举，开始是母亲“为头”，儿子参与，后来则是儿子在母亲影响下的自觉行动，是慈母美德的延伸与发展。

四、临终前的文氏，一遍遍呼唤着“石三伢子。”

毛泽东星夜回家奔丧，灵柩前痛作《祭母文》

毛顺生、文氏抚养孩子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慈爱及其人格品质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在寒窗苦读的日子里，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以及在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毛泽东一直铭记心间。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从事革命活动期间，除了回家看望父母之外，还经常致书问候请安。尤其是母亲抱病期间，更是家书频传。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致信同窗好友萧子升（湘乡人，第一师范三班学生。1915年毕业后执教于长沙修业学校）：“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毛泽东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决定去北京之前，专程回到韶山看望父母及其舅父舅母。出发前又写信向七、八舅告别致谢：“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匆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表达了对于舅家照料病母的感激之情。

1919年3月，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在京期间，当他接到“母亲病情加重”的家书之后，于4月初赶回了湖南。此时，毛母文氏已由毛泽民护送到了长沙就医治疗。时任李富春、蔡畅同志家里，因为李、蔡夫妇是毛泽东的世家好友。4月28日又致书七舅、八舅，再次表达了儿辈对其母亲病情的忧虑和舅父家人所作的精心照料的感激深情：“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好转，喉蛾十愈七、八，痲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拘留二十天，四月六日由沪到省，亲侍汤药……”其间，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搀扶着病母到照像馆合影留念，这是他们母子团聚唯一的一张照片。由于医治无效，随后便由毛泽民护送返回故里就地医治。而毛泽覃在长沙继续求学读书，毛泽东则投入了革命洪流之中。

时光一天天在流逝，文氏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到了民国八年八月二十日（1919年10月5日）的这一天，这位操劳一生，俭省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流着眼泪，拉着丈夫的手，望着守护在身旁的儿子毛泽民，一声轻似一声地呼唤着“石三伢子”的声音，逐渐消逝在她上屋场的卧室里……

文氏病逝的噩耗很快传开了，传遍了韶山冲，传到了长沙城。毛泽东、毛泽覃兄弟俩日夜兼程，赶回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屋场。然而，毛泽东再也见不到母亲那慈祥可亲的面容了。而见到的只是她老人家长眠于其中的那副灵柩。一时间，烫脸的泪水挡住了毛泽东这位热血男儿的视线。几天来，他一直守护在母亲灵柩的跟前，面对慈母英灵，思绪万千。在10月8日的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黯淡的油灯光下，含泪痛作《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

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爰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携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思，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并挥泪作灵联两副。其一曰：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其二曰：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祭母文高度赞扬了母亲那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简朴，慷慨厚道的高尚品德。后来，毛泽东又致书同学、好友邹蕴真，再次赞扬其母美德，信称：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又利人的人，他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

1921年岁首，毛泽东风尘仆仆地从反帝反封建的前线回到了韶山。一个黑夜茫茫的晚上，他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王淑兰围火而坐，家常声声，话语不断。毛泽东操着乡音深沉地说：“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誕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接着又面朝毛泽民、王淑兰说：“父母双亲大人的后事全是你们料理的，特别是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是患伤风病死的，棺木还是从唐家坵借来的，你们操心费力了，而我却没有尽到孝敬之心啊！”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于九泉之下父母亲的怀念之情，回到了韶山。这位66岁的人民共和国主席，翌日清早，独自一人快步朝着故居对面的南竹坵山上走去。在父母双亲合葬墓前，献上了用松枝扎成的“花圈”，双手合十三鞠躬，口中念叨着：“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在父母亲卧室里，他深情地端祥着双亲大人当年留下的照片，对随同人员说：“我母亲的颈上长了一个包，穿一个孔，只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要是现在就不会死了。”他的话语讲得很轻，也很沉重，饱含着对父母亲缅怀深情。

第六章 无忧的童年和倔强的少年

一、外祖家，“石三伢子”在一群表兄弟们中间度过了乐园般的美好辰光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很多时光是在其外祖家唐家坵度过的。那里的山水草木和众多亲人都给他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

毛泽东出生后，因为文氏前两胎都夭折于襁褓，外婆特别珍爱这个小宝贝，硬要把他放在自己身边抚养。外祖母儿孙满堂，把更多的爱给了这个“根基不稳”的外孙，在一家人的悉心照料下，非但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早夭，反而长得又白又胖，外婆就认为他命好“八字”硬。直到8岁上，才由父亲接回韶山冲读书。

当时，毛泽东的外祖和两个叔伯外祖一共有10个儿女和20多个孙儿孙女，尽管人口如此众多，却都在一起生活，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直到1927年才分家。毛泽东深得舅舅、舅妈的关怀和器重，将毛泽东兄弟与他们的儿子排行并列，泽东为23，泽民为24，泽覃为26。大舅文玉瑞（1853—1920年）排行第七，毛泽东自幼拜他为干爹，深得他的厚爱，每当毛泽东来到外家，必食同桌，寝同床，要求严格，视若亲生。二舅文玉钦（1859—1929年）排行第八，性情温和，品行端庄，他读过几年私塾，知书达礼，在家开馆授徒，对毛泽东成长极为关注，带他在那里旁听，励其上进，毛泽东受益匪浅。1929年2月22日，湖南军阀许克祥部的一个班持枪包围唐家坵，在一阵枪声后，将文玉钦捆绑押至株木塘，后关入颜家湾，经多方营救，方保释脱险，此后遭疾，于同年5月21日去世。

毛泽东的十几个表兄，还有一些表弟表妹，都是他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出去放牛、打猪草、拾野粪，日子过得很快活很称心。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如姨表兄王季范，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他们都大毛泽东10岁，教毛泽东读书识字，既是兄弟，又是师长。由于大家相处得非常和睦愉快，这使“石三伢子”常常乐不思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起来，生怕接他回去。但是，长辈对他的特殊厚爱，也引起了姨表兄弟们的羡慕和妒嫉。在热闹和优越感的背后，而又时常敏感于别人的脸色的群体生活，使他养成了活泼而沉静，多情而又倔强的性格。

唐家坵，毛泽东“外婆的澎湖湾”，留下了他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文家的人回忆，毛泽东的性格从小活泼无畏与众不同，每当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时，年仅2岁左右的毛泽东就在屋里呆不住，非要到外面的雨中去。文家的外婆、舅舅和舅妈们自然不肯，但毛泽东大吵大闹。长辈们想方设法哄他，全不管用，只好打把油纸雨伞，把他抱到雨中，听豆大的雨滴敲得伞顶乒乒乓乓作响，看着雨帘中白茫茫的一片，这小“石三伢子”兴奋不已，手舞足蹈。

一天，毛泽东邀了表兄弟们以及邻居一大群四、五岁的孩子，到外边大路上玩游戏，他们玩“过家家”，孩子们敲“锣”打“鼓”，“婚嫁”事办得有模有样，不一会儿，孩子们又玩起了“老鹰抓小鸡”，毛泽东扮演着“老鹰”的角色，只见他忽而猛虎下山，忽而声东击西，一只只“小鸡”相继束手就擒。

正在孩子们玩得起劲的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童心萌发，决定逗一逗这些可爱的孩子。

“你们这些淘气鬼，是从哪里拱出来的？为什么要在这大路上耍呢？看

我不把你们的耳朵，一个个地割掉！”老人故意板起面孔走近孩子们，他晃了晃手中的小刀，好象就要捉人割耳朵了。

孩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吓坏了，非常害怕真的被割掉耳朵，一个个撒腿就跑。只有戴着一顶小红风帽的毛泽东没有逃，他竟迎着白发老人走去。

老人一把抓住毛泽东，虎着脸说：“逮住了一个，好，先从你割起！”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捏着毛泽东的耳朵。

毛泽东却不害怕，歪着头说：“老阿公，你何理要割我的耳朵呢？我爹打得赢你，要是割了我的耳朵，他会砍掉你的手！”

几句话，把白发老人逗乐了，他用双手把毛泽东高高地托起来，高兴他说：“说得好，出言不凡，将来定有出息，老夫不割你的耳朵啦！哈哈！哈哈！”

老人哈哈大笑着走远了，孩子们又凑到了一块，大家都佩服毛泽东的胆量，这个问：“石三，那个老信子为什么不割你的耳朵呢？”那一个问：“石三，你为什么不怕他呢？”

“怕什么，他又不敢动真的！”毛泽东回答。

还有一天，毛泽东在外婆家同一群伙伴去放牛。当他们把牛赶到了枞角塘对面的山上吃起草时，便来到了河套田塍上割草。

割了一会儿，一位先生模样的田塍主人来了。主人说：“放牛伢子呀，听着，草你们暂时别割了，我先出个谜语给你们猜，猜对了就让你们割，猜不着就把草给我留着！”

“那好，你就出吧！”毛泽东接口道。

这位主人慢条斯里道：“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似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小伙伴们沉默片刻后，你一言我一语地猜了起来，“是磨刀石。”“是铁钉。”“是粉丝。”“是豆腐。”

“都不对。”这位先生微笑着摇头说。

此时此刻，唯有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在一边思考，一边用镰刀在地上画来画去，当伙伴们因为老是猜不出而愁眉苦脸的时候，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道：“这四句合起来，是打一种东西，就是邹家冲石灰窑里烧成的那种石灰。”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这位主人连连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赞扬道：“不错，不错，还是文家的外孙聪明些。”

与毛泽东一同玩大的文四阿公回忆说，有一天，他和毛泽东俩人来到龙潭坵山坡放牛，他们来到毛泽东在怀抱时寄拜“石头”干娘的巨石旁边，当毛泽东玩到高兴时，便爬到设在这块巨石上的“雨坛庙”前，对着神像撒尿。迷信的文四见状赶紧制止，“石三相公，你快莫到那里拉尿，那是菩萨，等会菩萨会显灵的！”“显灵？啊？”毛泽东听他这么一喊，停了下来，略一思索，却哈哈大笑，说：“显什么鬼灵，我不信，我偏偏还要撒一泡试试，看他到底显不显灵？”文四哥奈何他不得，只好将他从巨石上拉下来。

毛泽东活泼、沉思、无畏的性格在唐家坵表现得淋漓尽致，远远不同于一般孩子。

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冲经滴水洞旁的滑油潭去外婆家，走到大坪石砚冲口时，突然有一少年双手叉腰拦住了去路。这人是唐家坵一带有名的富绅赵家的少爷，长得高大健壮，身着绫罗绸缎，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经常在孩

子们和乡亲中仗势欺人，毛泽东经常去外婆家，早有所闻。

赵某傲气十足地说：“我晓得你是文家的外甥石三，读了几年私塾，人家都说你文思过人，今天我要考考你，是不是名符其实！”

“你爱试就试吧！”毛泽东毫不示弱，也两手叉腰。

“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出一个问题，若是你能答出来，就让你过去，若是答不出来，咳咳！”赵某冷笑道：“你就得大方框关小方框，请从这里过！”，赵某跨开双腿，做出一个请毛泽东从他胯下过的姿式。

毛泽东不慌不忙道：“行！要是我答出来了，你也得大方框关小方框。若是不同意，你就让开，若是同意，随便问吧！”

赵某想了想，很自信他说：“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沉思着，想起了每月初一和十五随母亲在自家神龛前焚香和烧的纸钱，神龛里供奉着赵公元帅和天地君亲师等牌位，他心中忽然一亮，脱口便说，“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子的孙，有理无理的理与李同音。大宋皇帝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毛泽东话中有话，含沙射影，赵某听后满脸怒气，却无从发泄，只好耍赖，“有理无理的理与李同音不同字。不能算你赢，也不能算我输。我们互相抵消。”

毛泽东见已经出了口气，谅他赵某日后也不敢在他面前找刺，便就此罢休。毛泽东来到唐家坵，跟表兄弟们谈起这件事后说：“逢善就莫欺，逢恶就莫怕。”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少年时代开始，似乎总有一股不信邪和偏要对着干的心理气势。他的自信，他的顽强，显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后来，在他的思想、个性日渐成熟以后，其性情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唐家坵附近有个保安寺，经常有人去焚香求佛。那也是毛泽东和小伙伴们常去的地方。后来佛寺改办成学校，寺院内栽种了一种凤仙花，当地俗称指甲花，指甲花盛开的时候，五彩斑斓，绚丽夺目，逢这时，毛泽东和小伙伴最爱到保安寺玩，或者采花、赏花，或者采集指甲花的果实。

成熟后的凤仙花果实，稍一用力，裂片便会旋转，种子随即弹出，不择地肥地瘦，随处生根，尤在盛夏季节花叶繁茂，笑傲骄阳。目睹指甲花强盛的生命力，已经读了几年“四书五经”的毛泽东文思涌动，得诗一首，于是从保安寺回唐家坵的路上，童音变成一串琅琅儿歌声：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毛泽东借花言志，志趣高远，其坚韧的人格意志和崇高的思想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同文泮香、文润泉、文运昌、文枚青、文南松诸表兄弟，同桌共餐，同床共被，同劳动游戏，同读书识字。后来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假日也多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他和表兄弟之间情深意长，每次放假回唐家坵，他总要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点时新食品带回分给诸表兄弟。

有一回，毛泽东在湘乡大坪的章公桥店铺里买了点“笔杆子糖”带到唐家坵，几个表兄弟亲热地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毛泽东从袋子里取出糖，数了数，每人两很正好分完。可是最小的表弟却缠住毛泽东不放，吵着高低要多要些。

毛泽东心想，糖是一根也没有了，可是话还得向他们讲清楚，于是，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晓得吗？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斗昏庸的官府，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照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他的话语说服了大家，平息了“风波”。

唐家坵好，外婆家亲。毛泽东于1911年春进入了湘乡驻省中学，从此走上了一边求学，一边探索真理的革命道路，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后来尽管天南地北，戎马倥偬，但他仍时常眷恋着唐家坵的山和水，思念着外祖家的人和情。1937年11月27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信，说：“我为全社会出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二、回到上屋场，毛泽东头一次挨了父亲一巴掌， 他却不哭，也不跑，只是怒目而视

1973年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对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说：“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对他造反，‘四书’、‘五经’中说，除非父母爱子女，否则他们就得不到子女的尊重。”应该说是父亲和塾师“很严厉”的专制和刻薄埋下了毛泽东反叛的种子。毛泽东最早的反叛，是针对父亲而来的，是因为父亲“压”出来的。当然，少年毛泽东受到的压抑，不只来自这位老人，还有传授孔孟之道的私塾和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由于父亲受几千年宗法思想的影响，外出当兵的耳濡目染，使他滋长了强烈的占有欲。在家里他独断专行，一门心思用在农事和生意上，全家也必须跟着他转。家里同唐家坵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氛围。父亲如同千斤顽石，沉重地横隔在这棵幼苗上。加之其它的压制，以及父母性格的强烈反差，使将要步入少年的毛泽东心里产生了严重障碍，变得执拗而倔强。在和父亲发生冲突以前，毛泽东是在唐家坵的温馨和上屋场的母爱中养大的，他从未挨过打，穿着开裆裤，一会儿捉蟋蟀，一会儿做游戏，每到大清帝国慈禧太后的生日，他在家里还能破例领到一只红鸡蛋。看到堂屋里神龛前香烟缭绕，鞭炮声声，他还会发出格格的笑声。这样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他终于长大了，也懂得了一些事，在自家，父亲一刻也不让他闲着，从六岁起，就开始做家务活，扫地、放牛、捡柴，后来逐渐做些稍重的活，如挑水、种菜、喂猪、舂米，以及一些田间劳动。

开始劳动时毛泽东觉得挺有趣，因而也很勤快，然而父亲安排的事没完没了。生性好玩好学的“石三伢子”免不了也想“躲懒”，有时事没做完，不是不见人影，就是埋头看书。

这是毛顺生最不愿看到的，他相信“棍子底下出好人”和“不打不成才”的古训，找到毛泽东后，伸出结满了老茧的手掌，终于第一次打了儿子一巴掌，并严厉地责骂儿子。他想让儿子永远牢记，不做事就要挨打挨骂，而挨打挨骂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他以为毛泽东会痛哭起来会告饶，或者向母亲“求援”。

可是，他估计错了，挨了打的毛泽东蹶着小嘴，只是怒视着父亲，站着不动，也不哭。

据毛泽东在韶山钟家湾私塾的一位同学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在学校里调皮，被塾师先生告到父亲那里，自然，毛泽东又挨了一阵打。第二天，他背着书包，提着饭篮照例去3华里远的钟家湾上学，他一路上闷闷不乐，见了同学也不搭理，独自一人沿着韶河朝私塾走去，大概是眼前又浮现起塾师的严厉和死板，记恨着父亲不通情理的打骂，走着走着，突然一挥手，把饭篮摔到河里，把满腔的愤懑发泄到了饭篮上。

三、一进私塾，因天资聪颖被称为“省先生”，后来逃学， 想去城里，在山里转了三天，也没定出韶山冲

1902年，8岁的毛泽东被父亲送至家门口的南岸私塾，在塾师邹春培的点读下，从《三字经》开始，接受发蒙教育，1904年秋，转学于韶山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咏生。1905年在韶山冲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是周少希。1906年，又转学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1907年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晚上帮父亲记帐，劳动之余，在晚上的小桐油灯下，仍广泛阅读，博览群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又复学于韶山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塾师是毛岱钟和毛麓钟。这样，少年毛泽东在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在旧式私塾里读了六年书，其间七进七出，在韶山一带，实属罕见。

当初，毛顺生送子去上学，无非是想让儿子学些本领，帮他记得帐算得数，日后继承家业。到后来，由于自己没什么文化，以至在一桩柴山公案中败诉，眼睁睁地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因此，他后来培养儿子读书，还想使儿子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不用吃睁眼亏。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读书，会在日后往自己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南岸蒙馆，开学的第一天，父亲把毛泽东领到南岸恭拜塾师，50多岁的邹春培老先生，把毛泽东引到墙下神龛面前，说：“这是孔圣人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圣人作揖，日后，圣人就会保佑你文思泉涌，连中三元。”毛泽东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老先生高兴地对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

入学后先从《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幼学》、《论语》、《孟子》。邹先生教了半辈子“子曰诗云”，没有碰到这么聪颖的孩子，对毛泽东这个学生打心底里满意。这一天，他跑到上屋场毛顺生家，男主人不在，只有毛泽东的母亲在门口的塘边洗衣服。邹先生高兴地对文氏说：“顺生婶，你家石三伢子有些特别呢；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你猜他怎么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我感到奇怪，就问他：‘你爹把你送来读书，不点书怎么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我不信，叫他背几章，他倒背如流，我又点了几章，新点的和还没有点的书叫他背，他也都能背下，还能懂得意思，简直奇了。原来，你家石三已经学会了翻《康熙字典》呢！还有填红蒙字，你伢子也特别呢，要他填，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你说怪不怪，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他根本不要我怎么劳神，你晓得不，大家都给他起了个浑名，叫‘省先生’！哈哈，哈哈……”母亲文氏听了，心中也好不高兴，若这样下去，学富五车，名登高科当不是难事。

然而，还不到两年，不愉快的事就来了。盛夏的一天，南岸蒙馆的小阁楼上，闷热如蒸笼，灼热的气浪透过大人伸手可探的瓦缝直往楼内钻，到了下午，热气更加逼人。孩子们脸上沁着豆大的汗珠。邹先生不停地摇着芭蕉扇，吩咐道：他即刻外出有事，不在蒙馆，学生务必温故知新，操练大楷。不得擅自走动喧哗，待会儿他回来将点读新课一《论语·先进》篇。

邹先生走后，有的学生开始打闹起来，毛泽东全神贯注地读着经书，仔细预习着先生将要点读的新课，读着读着，他心有所悟，计上心头，于是与邻座的小伙伴咬起了耳朵，如此这般……

一会儿，十几个蒙童溜出了南岸私塾，站在杨柳依依的南岸塘边，望着微波涟涟的池塘，孩子们如出笼的小鸟，跃跃欲跳。毛泽东没有犹豫，三下五除二，扒光身子，第一个扎进碧水清波中，其他孩子也相继下水，戏水弄波，玩到兴处，早把先生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到私塾见阁楼上悄无声响，心想，这回孩子们倒听话。待他登上楼，里面空无一人，朝窗外一望，但见学生们正在水中玩得开心。他气得急忙下楼朝塘边走去。铁青着老脸。

回到蒙馆，孩子们垂头丧气，听候先生发落，惟毛泽东神态自若，一点也不躲避先生责备的目光，先生用戒尺拍打着桌子，严厉地发问了：“谁让你们出去的，今天我要重重处罚你们一顿，是谁带的头？”

孩子们大难临头，面面相觑，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先生，你要打就打我，是我带的头。”邹先生瞪了毛泽东一眼，气鼓鼓地说：“你，你，你以为我打不得你呀！”说着举起戒尺向毛泽东打来。

毛泽东把身子一闪，躲过了，赶忙说：“先生，你要生气打人，也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打呀。”邹先生没好气地说：“好，你说！”毛泽东便打开已经准备在手上的《论语》，递给邹先生说：“先生，你看，在这先生将要教的书里，孔子问曾点的志愿，曾点答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曾点的回答很高兴，他说：‘吾与点也！’这不是孔夫子赞成少年到河里游泳吗？而且还要与学生一起去游泳呢？我们到池塘游泳，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邹先生嘎嘣半天，涨得脸红耳赤，本想训斥一顿，转念一想，便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他知道，背书难不倒毛泽东，凡点读的课文，他没有不能背的，那么罚对对子，看我不丢尽你的脸！

邹先生狠狠地说：“我出对子，你对出来，今天就算没你的事，对不出来，休怪我打你的手心！听着：‘世上万般皆下品’。”

毛泽东：“思量惟有读书高。”

邹先生快问：“濯足。”

毛泽东：“修身。”

邹先生又失算了，有些气急败坏，这天，邹先生早早地给学生放了学，自己怒冲冲地到上屋场找毛泽东的父亲，说：“你家润之了不得，他的学问比我高，我教不了啦，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毛顺生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偷着去游泳还与老师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拣起了一根楠竹丫子，向南岸私塾跑来，一看见儿子就劈头打来，毛泽东深知父亲的性子，脾气一上来，准有一顿死打，刚 10 岁的他一溜烟转身就往山上跑去。

毛顺生追到山坡上，眼看毛泽东跑远了，骂道：“你跑，我看你跑到哪里去！除非你永世不回家！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他不想回家，也怕回家，到哪里去呢？他忽然想起表哥给他讲过县城里有很多大瓦房，洋货铺，还办了不打人的洋学堂，何不到那里去看看。毛泽东就朝想象中的县城方向走去，结果在山坳里转了 3 天，离家才八里远，还是没有走出韶山冲。毛顺生四处托人寻找，最后遇到一个砍柴的老人，才被送回家。30 余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到家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四、毛泽东屡犯塾规，背书硬不起立，称老师“大哥”， 又是几进几出之后，于13岁上辍学了

正是由于这次顶撞了塾师，使毛泽东结束了在家门口南岸的读书生活。就在这年秋天，由父亲领着，送到了离家有两里远的关公桥私塾。乡间私塾的先生，一贯只给学生死记硬背，从不给学生讲解的。因此，一般学生对书里的意义往往知之甚少，读起来也就难于读熟，而对不能熟读的学生，先生们往往求助于体罚——用楠竹做的竹板、竹丫、木尺，打学生的手心、屁股，从而迫使学生强记。这固然是封建制度下的通常教学法，而个别老师也是籍此藏拙。关公桥私塾的这个毛咏生先生，年纪比南岸的邹先生更显苍老，一天到晚执着竹板子敲得啪啪地响，对学生不是骂，就是打，是位有名的“恶先生”。毛泽东对于这一套死板凶恶的教学法极为反感，既然他敢于顶撞父亲，敢于顶撞邹先生，又何必怕毛先生呢？当年迈的毛咏生先生给少年毛泽东点读课文时，毛泽东总是要盘根问底，要求老师详细讲解，可怜年事已高的毛先生，肚里的墨水也就那么多，因而常常被这聪明至极的小学生问得无言以对，只得顾左右而言他。一次，老先生一本正经地对毛泽东说：“先生点书，你多听多读，少多嘴多舌，问个不停。”毛泽东立即笑着说：“先生可以动手打人，学生怎么不可动口请教先生？”毛先生对这个特殊的学生感到有点无可奈何，过了半年，他把毛泽东叫到房屋，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这个你回去给你爹，从此，你不用再来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离家不远的桥头湾私塾和钟家湾私塾又读了一年。这个天真、活泼、聪颖而调皮的“省先生”令每一个塾师又喜爱又头痛。在课室里，老师叫学生背课文，从来都是先生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学生则是恭恭敬敬地站在对面，摇摇摆摆地背书，然而轮到毛泽东，他却搬过一条凳子大模大样地在先生面前坐下，先生不悦，说：“你一个人怎么就不同些，给我站着背！”毛泽东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辞：“先生你能坐着听，为什么我就不能坐着背呢？”毛泽东每每坚持要坐着背时，对这个倒背如流而又倔强的学生，先生啼笑皆非，更令先生恼火的是，毛泽东对先生点读的四书五经等经史书籍并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看《精忠传》、《水游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严禁学生看，但毛泽东不但课外看，还常常带到课室里看，老师讲台上点读，毛泽东在下面偷偷地看，为遮人耳目，居然把正书放在“杂书”上面，干起蒙骗老师的小动作，却又时不时被老师发现，老师为了惩戒他，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依然难不倒这个调皮的学生。

一天，同学们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毛泽东端端正正地坐在席位上，先把老师点的经书读熟了，接着，悄悄地从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传》来。他又把《论语》摊开，压在上面，做出认真读经书的样子。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先生已经悄悄地站在他背后。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正被“林冲雪夜上梁山”那段故事深深地吸引着。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传》抢走了。

毛泽东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情知大事不好，只见先生鼓起眼睛，恶狠狠地怒斥道：“你……你大胆妄为，违反塾规，偷看杂书，欺骗先生，这还了得！”

这一次，毛泽东手心上添上了几道鲜红的竹条血印，虽然钻心般痛，他

却强忍着，没有哭喊，也没有眼泪。

第二天，毛泽东没有来。

从此，这个课室里，永远少了一个聪慧而顽皮的学生。

12岁的毛泽东，已经四进四出私塾了。在这些严师的言传身教下，他的智力大开，才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即使是晦涩古拗的篇章，他也能倒背如流。同时，对于私塾里的那一套，打手心、打头、打脚、打屁股、罚跪等体罚教育，毛泽东反感透了。他的心灵在抵抗、在反叛，他发誓一定要找一个不打人的学堂读书。

有这么一个桀骜不驯的儿子，毛顺生常常感到气恼，但作为父亲，他却依然希望儿子通过上学能有点出息，绝不希望就这么辍学在家，儿子年纪尚小，在田地耕种和生意场上，又不能帮他什么忙，闲极无聊，说不定还会在乡邻间惹是生非，弄得他也不得安宁，关到学堂里，即便学不成什么自己也省心。

时至1906年春，这一天，毛泽东被叫到父亲跟前，父亲说：“石三，爹给你找了个先生，是你的排房兄长毛宇居，是井湾里一阔人家开的家塾，收纳外阜好学生，在韶山一带，是有名的东家，离家是远了点，但有男工招待茶饭，女工洗刷衣裳，生活过得极好，到了那里好好学，日后成进榜秀才，做爹的也觉得荣耀。”

二月初间，毛泽东担着书籍行李，随父亲去了学堂。谁知，虽然老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言传身教，年岁不大却俨然一老学究，但讲起课来却仍是村师的办法，讲而不解，对古今中外的人物，他最崇拜的是孔夫子，认为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最有用的学问，其余都是没有用的“杂书”，特别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古典小说和戏曲，在他看来，那更是误人子弟的杂书，因此严禁学生阅读。这些令毛泽东大为不满。加之，毛宇居仅比毛泽东大12岁，父亲一走，毛泽东便开口闭口叫毛宇居“大哥”，从不叫先生，全无师道尊严。这样一来，毛宇居感到很不满意。

有一回，宇居先生交待学生在课室里温习功课，不得随意走动和交头接耳，生性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授新课，他将到屋后一个僻静而阴凉的大树下，在那里读书记性好。先生没有答应。但等先生稍一外出，毛泽东即刻便溜了出去。

几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不仅背会了课文，而且还看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看的书，还顺手牵羊摘回来一些野果。他先给每个同学分了一份，然后给“大哥”也留了一份。毛宇居很生气，厉声责问道：

“谁叫你到处乱跑？”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背书囫圇吞枣、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从容答道。

“放肆！”毛宇居脸涨得通红。“那您听我背书好了。”毛泽东赌气道。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毛泽东，便把他唤到教室外，指着天井说：“我要你给我赞井，赞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

毛泽东自觉理亏，便绕着天井转了一圈，但见层层青砖砌的天井里，清水一汪，卵石片片，几条同学们从溪沟里抓来的鱼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来来回回地游动，他觉得大哥太不近情理，自己被父亲送到这里，真如这些被同学们送到井里的小鱼，没有半点自由。他沉思片刻，一首打油诗即从口中吟出：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围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同学们听了，纷纷围拢过来拍着手说赞得好。

毛宇居满脸尴尬，意识到自己的教学确实存在着弊端。他暗自佩服这位才思如此敏捷的学生，便放毛泽东走开。井湾里距韶山冲上屋场足十华里，因离家较远，毛泽东在这里读寄宿。据当时一同在毛宇居手下读书的郭梓材回忆说：学生除了泽东以外，我，我哥哥梓阁，义兄耿侯，堂弟桂五（又叫桂五麻纱），等等……泽东同学从小异常聪慧，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既不喜欢读《三字经》，也不喜欢读《四书》。老师要惩罚他，他就和老师“捣蛋”。他喜看各种小说。那时候，他是一个仅十多岁的小孩，但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领导者了。他不但带我们和老师造反，反对那种旧传统，而且打游戏仗，他也起着一种组织作用，由他当指挥，发号施令，叫我们冲锋。同学刘洪授回忆说：“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他待人很有礼貌，但敢作敢为，他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毛宇居也回忆说：“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子集，他最爱看的是那些《精忠传》、《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

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春光似箭，转眼到了冬至。宇居先生是毛家族长之一，要进祠堂会谱吃酒，私塾就放假了。毛泽东回家，劳动之余，与小伙伴们嬉戏玩耍，或看看“杂书”，倒也自由自在。

又要进学堂门了，毛泽东却十二个不愿意，逢人便说：“不想那八两银子的秀才功名，秀才背时，现在一文不值。”这话传到父亲毛顺生耳朵里，毛泽东遭到一阵严辞唾骂。母亲曲意相劝。父亲又提了一篮子鱼肉鸡蛋，定要送他去上学。毛泽东百般无奈，只得随父亲上路，走了两三里，想到私塾那枯燥的生活，那“井”中之鱼，突然间对父亲说：

“爹，我实在不想再去那里读书了，你就依了我吧？”

“石三，爹辛辛苦苦赚钱供你读书，为的是你好，你倒把我的苦心当苋菜水，你去不去？”毛顺生不禁火从心来，他逼问道。

“不去！”毛泽东一脸犟气。

“到底去不去？”

“不去！”

“好呀！你这犟子，老子好久没打你了，看我今天不把你打扁！”父亲怒气冲天，放下竹篮，扑过去就打。

好汉不吃眼前亏，毛泽东拨腿飞跑。

父亲迫不上儿子，火上加恨，又怕在众人面前失面子，气呼呼地吼道“好，你跑，你跑，老子的钱不是屙屎捡来的！”说完，扭头就往回走。

毛顺生回到家里，大发雷霆，照例向妻子出气，责骂她不该养这不孝之子，平日都是她惯坏了。妻子也只好习惯地安慰安慰丈夫。

毛泽东走近家门时，母亲早在门口等候，她满面焦容，流着泪对儿子劝

说道：“石三，你不该这样不懂事！你爹再也不会送你读书了，以后，你只能和犁耙打交道，看一辈子牛屁股。你干爹和八舅晓得了，也会帮你爹骂你，你想想，谁不望你读书成名，知书达礼，你却要这样，真是个不听话的淘气子，唉！”

毛泽东知道母亲会说这番话，他毫无愧色，和声细气地说：“儿不是不想学习、逃学偷懒，而是不愿在学堂里坐牢一样读死书。我不是不领父母的好意，而是讨厌那不明时局的古板的先生，老是‘之乎也者’的那一套来愚弄学生。回家种田，也不是丑事……”

就这样，毛宇居的私塾里，终于少了一个不喊“先生”而喊“大哥”的学生。毛顺生的田地里，多了一个瘦高个的小“长工”。

毛泽东在毛宇居门下读书的最大收获是读了《左传》。这本由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著的史书，是一部反映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活动，总结各国兴亡和战争胜败教训的编年史，这是毛泽东对经书类相对感兴趣的一本。由于他学得扎实能背能写，并能融汇贯通，因此，他后来才受益匪浅，并由此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有增无减，到老不衰。通过对中国史书的广泛涉猎，毛泽东熟悉了古代不少战史战例，为他后来的战略战术思想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增添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

五、辍学后，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同父亲的抗争变得机动灵活了。做损己利人的事时，同母亲配合默契

毛泽东辍学后，像小长工一样在家里地头干了两三年活。虽然累，但没有了在学堂的那种枯燥和体罚，劳动之余，还能看一些书。在家，能发生抵触的对象主要是父亲了。小时候，他对父亲的不满，除了生闷气，只能是用非常隐蔽的方式来表达，甚至不惜在父亲面前撒谎。逐渐长大了后，不再那么怕父亲，敢于公然顶撞，随着学问的长进，学会了以理服人，据理力争。在父子间的各种冲突中，往往以儿子的胜利而告结束。

韶山一带，田畴肥沃，稻米丰富，经营稻米的人大都只做大宗买卖，从种粮者手中低价收购贩运到银田、湘潭等地，赚得较高的利润。只有极为精明的毛顺生，才不在乎生意大小。在韶山冲有很多人人家，靠租佃富人家田养家糊口，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要到毛顺生那里去买些稻米，熬粥充饥。毛顺生对这些穷乡邻从不拒绝，总是笑脸相迎热情相送。但是，只有文氏知道丈夫的“和气生财”之道。原来，毛顺生自有算计，在他看来，别的财主不屑一顾的这些“小买主”，虽则是穷，在这些穷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大的赚头，但是，他深知积少可以成多，积溪可以成河，因此，他常常短斤少两，有时还要保留点水分。另外，他还有他的“小算盘”，卖米给这些穷乡亲，只要能保住本，他就赚了，因为加工稻谷的副产品——糠、碎米是喂猪的上好饲料，喂几头猪，一年下来就是好几十块白花花的银洋。

在毛顺生眼里，这些零买零卖的乡邻，只是他赖以赚钱的顾客而已，但是，对于菩萨心肠的妻子文氏，乡邻永远是友邻，她对丈夫那一套“精明”很是反感，总是以乡村妇人特有的厚道，予以同情。

一天，一个乡亲买了几升米走后，妻子对丈夫说：“孩子他爹，这些人饭都吃不饱，可怜哩，你就不可把米升子摇紧点呢？”“你懂个屁，吃不穷，用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毛顺生显然很不高兴，干巴巴地挤出这句话走开了。

文氏说不动丈夫，也就不再做声。毛泽东在一旁全看在眼里，望着不停地咳嗽着走去的父亲，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他悄悄地告诉了母亲。此后，凡是农民来上屋场买米，母子俩总是尽可能避着毛顺生，由毛泽东自个去量米，每一升都堆起量，每一斗多给一些，逢这时，母亲在门外放哨，若是毛顺生来了，她就赶紧咳嗽，发出“警报”，机灵的“石三伢子”就赶快采取相应的措施。

母子俩配合默契，他们深知，毛顺生是惹不起的，轻则训人，重则棍棒相加。然而乡里乡亲的，日子过不下去，他们心里确实不好受，多为他们量一点，事虽然细小，正是从这些细小的事上，毛泽东开始了对父亲那种思想的反叛。

一年夏天，毛顺生因生意上的事情，急需要弄一笔钱给人家，尚差一百块银洋，父亲事多，脱不开身，因为都是生意场上的人，人熟地和，便叫毛泽东去取，地点是十里远的湘乡章公桥，一个也是经营谷米生意老板彭厚锡家。

少年毛泽东一大早就到了彭家，彭家正吃早饭，见是毛家的大少爷，便留请毛泽东与他们一起用饭，待毛泽东说明来意，彭家满口答应，当即就拿出了一百块银洋，毛泽东正在清点，见一个老太婆蹒跚地走了进来，径直走到彭老板跟前，恳求道：“他大叔，我没有早饭米了，求您借给我两块

钱吧。”

彭老板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有些不耐烦地说：“前些天，不是借了几升米给你吗？你看这是最后一百块钱，全借给顺生公了，你另想办法吧！”

“求求你啦，你者福大，请您再为这老婆子想想办法吧。”

“说过了，现成的米都快完了，钱也没有了，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毛泽东明知彭家有米不借，见此情况，心中有些不满，便接过话茬问道：“您家住哪里？有几个人吃饭呢？”老太婆见这少年生得眉清目秀，又彬彬有礼，于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原来，这老太婆家就在附近，孤身一人，家里仅有几亩薄田，因无儿无女，每年春种秋收，都得请人，一年下来，所剩无几。毛泽东见她确实可怜，便从扎好的包里取了三元钱给她。

老太婆千恩万谢，说：“三元银元可买一担多谷，这个夏天就不用发愁了。”

回到家里，父亲接过钱，数了一遍，发现不对数，莫不是数错了，他想。于是，又放到桌上，一五一十地点了一遍，确实少了三块，毛顺生火了，喊道：

“石三！你过来，怎么只有97块，你说，还有三块哪里去了？”

毛泽东自知父亲不会饶过他，于是低着头，走到父亲跟前，把在回家路上就编好的话讷讷地说给他：

“包钱的纸烂了，因为不小心，在路上掉了三块到塘里去了。”

“你会洗冷水澡，怎么不去摸？”父亲追问道。

“我去摸了，水好深，我摸了好久，冒摸到。”

“你，你，这么大了，真是没用。”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打人。毛泽东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要不是母亲来做保，耳光是挨定了。

一年秋天的下午，农民们为秋收秋种正各自忙碌着。

毛泽东家的稻谷是晒在屋后的晒谷坪里，邻居毛茂生的谷晒在房前面的小坪里。初秋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阳光普照，忽然一下子刮来一阵森凉的风，翻腾的乌云转眼便遮住了阳光，接着豆大的雨点马上砸得瓦片叮咚作响，人们慌忙丢下手里的活，都往各自的晒谷坪跑去。其时毛泽东正在阁楼上看书，他一轱辘从楼上爬下来。猛然，他看见前坪里邻居毛茂生的妻子毛四阿婆一个人正在抢收稻谷，两个幼儿站在门口的阶基上看热闹。毛泽东二话没说，钻进雨里就帮她干了起来……

稻谷收完了，雨还在沥沥淅淅地下着，大家的衣服全湿透了。毛顺生看见儿子的衣服也在淌着水滴，好生奇怪，便问道：

“石三，你跑到哪里去了，收谷子时没有看到你，为什么衣服也打湿了昵？”

“我在前坪里帮邻居家收谷子呢。”毛泽东平静地说。

“你倒好，吃里扒外的家伙！吃自家的饭，把自家的谷子扔下不管，你晓得不，我们自己的谷子被大雨冲走了不少。”父亲认为，吃人家的饭，得帮人家干，吃自己的饭，得先为自己想。然而，毛泽东却不是两年前的了，除了受母亲的影响，加之又进私塾读了些书，明白了不少道理，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怕父亲，小小的年纪，却不急不慢地说：

“爹爹，毛茂生家的田是佃的，田里押进的银子是借的，扮了禾以后，交了租还要还息，‘禾镰上壁，就冒得饭吃’，如果下大雨再损失一些，那就更不好过日子，我们家吃谷有剩余，损失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呢？”

“胡说八道！”毛顺生火冒三丈，说：“我家的谷子都冲走了，你吃什么？”

毛泽东不高兴地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哼，读书把你读糊涂了！”父亲斥责一句，无可奈何地走开换衣服去了。

母亲走了过来，抚着儿子的头说：“伢子，你做得对。”毛泽东刚才受了父亲的责备，心中很是不快，经母亲这一安慰，也就会心地笑了。

快过大年了，父亲吩咐毛泽东到附近一个人家去赶猪。

这猪的主人是位老阿婆，她家靠租佃糊口，每年总要喂几头猪，卖几个钱度荒。她把猪卖给毛顺生时，说好了价，还付了定钱，并说好过几天再来赶猪。时间一晃过了五六天。一天，晚饭时节，父亲从银田寺街上回来，一进家门就对毛泽东说：“你明早快去把猪赶回来，一早就去。”

毛泽东有些不解，“急么子？”

父亲望望门外，压低了声音：“猪价又涨了，小心人家反悔，你快去快回。”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洗漱了一下，一声不响地朝那户人家走去。

一进门，老阿婆见是毛泽东，手里还捏着一杆大秤就明白了来意，不由得长叹了口气。毛泽东见状，便问道：

“大清早的，你老叹什么气呢？”

老阿婆说：“该得你家发财，是你父亲运气好啊，猪卖早了，就早了那么几天吧，唉！……”

“你要少得好多钱哩！”

“是啊！我要吃几块钱的亏，这就叫命，命苦哟！不过，像我们这号人家，一块钱不得一块钱到不了手，一个钱要当几个钱用噢！”

毛泽东听了这话，看到她家的生活着实清苦，他思量了一会，对老阿婆说：

“你家的猪我不买了。打个倒算盘，少定了一头猪，你把定钱退给我。”

老阿婆心里很感激，却不好意思答应，便说：“这猪是你父亲在这里定好的，钱也收了，虽说现在猪价又涨了，我不卖怎么能对得起你父亲呢？这怎么行呢？”

“我看行，你又喂了这些天，费了工费了料，还费了神，要是还按原来说好的那些钱，你是吃亏了。你把定钱还给我，我不赶猪，我回去跟父亲讲讲理……”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赶回猪，只带了老妇人退的五元定钱。回家的路上，他心里有些高兴，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妈妈一定会赞扬我的。高兴之余，心里却也有些发怵，这样的事，是父亲极不主张的，这可是断了他老人家一次财源，父亲肯定要发脾气，挨一阵责骂是少不了的。

回到家，父亲见他两手空空，便先发问起来：“怎么搞的，猪呢？”

“没有赶回来。”

“为什么没有赶回来？是她家不肯吗？”父亲有些生气了，追问道。

“不是她家不肯，是我不肯，我把定钱拿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原由说了一遍。

父亲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你，你这小子真没用，钱到手了还不会赚，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

毛泽东面对不讲理的父亲，心里有些不平，父亲怎么这样不近情理，只知道发财，发财！于是说：“做生意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人家也要吃饭。”

“人家吃饭是人家的事，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逼，当时讲好价钱，是双方自愿的。”

“自愿也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何况人家那样穷！”

“你做不得事，还犟嘴！没出息的东西，这份家业，早晚要败在你的手里。……”父亲越说越气，母亲眼看形势不对，给儿子使了个眼色，便专拣那些消火的话劝慰起丈夫来。

一场“赶猪”风波就这样勉强收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与进京的堂弟毛泽连谈及这些往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六、为了争得读“野史”的时间和保全人格的权力，毛泽东对父亲以死相挟，最后终于达成了一个个“和约”

毛顺生把儿子送进私塾，为的是让他能识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能帮自己写信记帐，也就行了。他不曾料到，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进私塾，从此就迷上了书本一读而不可收，凡是韶山冲及其附近找得到的书，他都千方百计地找来读，哪怕是和尚的经书，也不放过。辍学回家后，对书的瘾头比在学堂时还厉害。读到精彩处如痴如醉，旁若无人，常常耽误了父亲让他做的事。毛泽东的父亲成了冲里的“小财东”后，人情来往增多，有时门庭若市。一年开春不久，父亲邀请了一些生意场上的人到家里来吃饭。父亲吆喝毛泽东，要他倒茶端烟招待客人，毛泽东没听见，父亲火了，气冲冲地一把抢走了他手中的书，喊道：“你是聋子啊！？叫你你为什么不同意？”毛泽东平时就讨厌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更讨厌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便没好气地说：“我在看书，没听见。”“你看书？这就是你看的书？”父亲拍打着手中的那本书，那其实是一本旧小说。父亲很生气地将书高举着扬了扬，然后掷在地上，当着许多客人说：“一叫他做事就变得又聋又瞎，就是这么个好吃懒做又不孝的家伙！”父亲啐了一口唾沫，接着又骂了一句很难听的粗话。“你怎么这样不讲理，当众侮辱人？”毛泽东对父亲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什么？老子骂都骂不得了！竟敢顶撞起老子来了！”父亲的火气也更大了。“老子骂你，老子还要揍死你呢！”

“你讲不讲理呀？”

“讲理，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好，今天我就给你讲理……”父亲更加恼怒，抄起一根棍子直冲着儿子走去。

毛泽东见大势不好，撒腿就往屋外跑。他追出门，客人前来劝阻，也没阻住，仍气势汹汹地追赶着，边追边喊，“我，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逆子不可！”毛泽东逃到家前几十米远的两个塘间的小路上，父亲也追上了小路，他眼看着一阵毒打在劫难逃，跑到池塘边，突然收住脚，摆出一个就要跳塘的架势，指着水塘大声喊：“你再追，我就跳下去！”

父亲被毛泽东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也收住了脚，可还是扬了扬手中的棍子，“你想吓唬老子……”

“我不是吓唬你，你再敢打我，你再追进一步，我一定要跳下去！”

父亲失了主意，“知子莫若父”，他知道儿子比老子还倔强，说到做到，儿子虽会游泳，可这开春时节，水冷刺骨，不呛死也要冻个半死。他沉默片刻，站在原地喊道：“你，你回来！”

毛泽东朝池塘边迈进一步，毛顺生不禁后退一步。

这时候，母亲也急匆匆追了上来，她生怕儿子真的跳下去，赶忙上前握住丈夫的胳膊，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石三大了，他有自己的主意，你不要硬让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嘛！”接着又转过身对儿子说：“石三，你就向你爹认个错，你爹保证不打你。”

在这种情形下，双方提出了“和谈”条件。父亲坚持要他下跪磕头认错。儿子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可以单跪一条腿，并说，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下跪，跪下的这条腿是娘腿。结果，在母亲的劝说下就达成了这样的协议。

有了那桩池边“和约”之后，父亲虽然再不曾打过毛泽东，但是父子之

间的矛盾冲突却并未从此了结，相反，却愈演愈烈，而且，多少总是与毛泽东的读书有关。

毛泽东8岁开始进私塾接受发蒙教育，13岁至15岁时，则完全停学在家，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道劳动。当他挑着粪桶随长工下田时，父亲望着儿子瘦高而生气蓬勃的背影，心中为有这样的好帮手而暗自高兴，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儿子的心思并不在粪桶上、田地里。

5年的私塾生活，使他获得了较高的阅读水平，四书五经，虽则烂熟于心，但却并不感兴趣，他最喜欢读的还是那些野史和杂书，每天下地的时候，总是悄悄地带书，一遇机会，便溜到屋后的古墓后面，躲在一棵大樟树下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他迷恋在一百零八将聚义梁山泊的故事里；沉醉在三国争雄的历史画卷中；对于孙大圣，他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父亲怒气冲冲地站在面前时竟毫无察觉。

父亲虽大半的精力在外忙乎着经营稻米和猪牛的贩卖，但仍旧牵挂着那22亩水田，这可是他发家的根基。他发现田里的活计常常没有干完，儿子却失了踪影。他开始注意儿子的去向。有一天，终于发现儿子放下田里的活计，朝着古墓后边的那棵大树溜去，心中立刻火冒三丈。还是毛泽东不满十岁的时候，放学回来放牛，也是在这棵大树下，他自个儿在那里看起书来，读着读着就入了迷，牛跑到别人的菜园里吃了人家不少菜，他竟全然不觉，待到主人发现后，挨了人家骂不说，还到毛顺生那里告了状，让做父亲的也丢了脸……眼下，毛泽东竟又溜到了那棵大树下，这下被父亲当场抓住了！“这里好凉快，你真会享福啊！”父亲两手叉腰，右脚在地上猛一跺：“你不想干活了是不是？你是哪家的太子，还要不要吃饭！”父亲这一跺，倒当真吓了毛泽东一跳，可是，他看书正看得上瘾，瞟了父亲一眼，仍手不释卷，只是嘀咕道：“不是不干活，爹，我累了，想歇会儿再干。”

毛泽东哪怕是装装样子，把书收起，或者表现出惶恐自咎，作父亲的见了也可消点气，然而，父亲见他没有收书要走的意思，火气就更大了；“有你这么个歇法吗？一上午冒看见你挑几担粪！”毛泽东不得不放下书，皱了皱眉；“我挑了，一大早我就起来挑……”“挑了几担？”“至少七八担。”“这么近的路，半天就只挑五六担？亏你还说得出口！”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望了望父亲那铁青的脸，沉思片刻，问：“爹，你半天能挑几担？”“20担。”“我看挑不了那么多吧？”“没有20担至少也有15担，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就开始操持家务了，你身在福中不晓得福，你就不想想你是做什么的？种地的成天看书顶个屁用呀？如果你还要吃饭，就马上给我挑粪去！”“好了好了，整天只知道发脾气训人。”毛泽东挑起粪桶结束了这场冲突。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吃过午饭，毛泽东顶着烈日挑着一担粪箢箕下了地。父亲见状，不无得意地对母亲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哟。”

可是，下午偏西的太阳还有老高，儿子又失踪了，这一次父亲毫不费力就在老地方找到了他。毛泽东果然又坐在那棵大树下，两手捧着书放在膝盖上，一副忘乎所以的样子。

“你的魂儿被牵走了？老子说的话你把它当作耳边风！”父亲满是老茧的大手捏着儿子的耳朵，“什么破书，你就不知道学好？”

“爹，你放手，我哪敢把你的话当耳旁风。”毛泽东一边扳开父亲的手，一边气鼓鼓地说：“你要我做的事都做好了！”

“我叫你做什么？我要你作田，要你挑粪，我冒叫你到这里来看这些杂

书！”

“我是按你说的作田、挑粪，可是，我也要看书。我做完了田里的活，你凭什么不让我歇气看书？你要我做事，我依了，你不要我看书，我不能依，我只能依你一半。”

“你挑了多少？”

“15担！”

“骗鬼，你！”

“你不信，你就到田里去数，如果少一担，你再到这里来，任你处罚。”

无可奈何，父亲憋着口气，匆匆去田里数了3遍，是30小堆猪草粪，不多不少，15担，半天挑完十五担猪草粪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儿子还不足十五岁。

干涉儿子看“杂书”，毛顺生记不清这已不知是第几次了，他曾经没收过，儿子却另外又找些来看，收也收不尽，不但白天打柴、下地、舂米或放牛时看，晚上还常常看到深更半夜。夏晚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人躺在床上，头伸到帐外面看书；冬天，就干脆不放帐子，躺在床上看。毛顺生舍不得那点灯油，同时也怕“杂书”对儿子影响太深，总是反对儿子晚上看书。于是，毛泽东常常等父亲睡了以后，才开始看书，用一块黑布把窗户遮住，为避免父亲发现他房里的灯光。毛顺生终也无可奈何，他不得不屈服于儿子的顽强意志之下。

精明强悍的毛顺生有时心里在流泪。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个儿子，一手把他拉扯大，自己在外面跑生意，拼命经营，一面还要兼顾家里的水田，常常早出晚归，为的无非是有一份像样的家业留给儿子；供他吃穿，供他读书，无非是要让他承接父业，辈辈兴旺。然而，儿子总是不领情，不买帐，甚至越来越与他所希望的相违背，正经书不好好读，叫他去湘潭县城族伯毛槐林的“宽裕行”粮行当学徒，没呆几十天，又擅自跑了回来；叫他好好在家作田，却被杂书迷了心窍……唉，真是崽大爹难当啊！

七、六进私塾——在父亲吃了哑巴官司之后。这次的老师，一位学兼中西，一位是饱经沧海的隐士，毛泽东由此学问大长

在家里过了两年半边劳动边读书的时光之后，一个偶然的事件，又使毛泽东再入私塾。

原来，父亲因山林纠纷与人打官司，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有理，毛顺生却囿于言辞，有理也说不清，结果原告变成了被告，眼睁睁地让人家占去了一片山地。这一次痛失山林，促使他下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多读书，并且期望儿子能多读一些有用的书，既成为自己家业的扩充者，更要成为自己家业的捍卫者。在这种情况下，1909年秋，已进16岁的毛泽东，由父亲送到了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的乌龟井塾师毛岱钟家里，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因两年半的田间劳动，他已经有些厌烦，因为在家能借到的书都看完了，他极想再找个好老师学些新鲜点的东西。在乌龟井这里他读了半年，随后又转读于毛家的祖居地——东茅塘毛麓钟开办的私塾。

在此之前的五年私塾生活，一方面启迪了毛泽东的智慧，陶铸他的才学，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有了深切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他对中国的旧式教育有了切肤的感受，从心底里产生着强烈的反叛情绪。加之他广泛地涉猎中国古典小说，小说中的古代英雄人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反叛的意识，使他也敢于反叛自己不能接受的旧教育，这使得他在任何一个私塾都没能呆上多长时间。

可以说，这最后一年的私塾学习，教学方法和内容与以往大不相同，先生以渊博的知识、新颖的思想进行启发式教学，使毛泽东读了不少以往未曾涉猎的书，也想了不少问题，思想大为开放，最终产生了一定要冲出韶山冲的强烈愿望。

乌龟井的毛岱钟先生，毕业于长沙湖南官立法政学堂，是韶山冲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尤其是东茅塘的毛麓钟，是韶山唯一的秀才，又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这两位塾师，见多识广。然而，毛泽东更倾慕于毛麓钟的声望和学识，只在毛岱钟手下读了半年书，便又一次背叛父亲的意愿，特地背着书囊，来到了毛麓钟在东茅塘面山楼开办的韶山唯一的中西合璧式的私塾。

毛麓钟的名望在韶山一带有口皆碑，他“对于各种经书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为典丽，每试辄冠首”。他的诗赋，有人抄去应考，竟也被录取了。清末，毛麓钟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而去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深为不满，愤然辞职回乡，闭门隐居，并取别号“韶山小隐人”。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惨败，毛麓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对满清政府的愤慨转为反抗，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政治态度转而赞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常说：旷观宇宙，竖画地理前因后果，一无可恃，而可恃者惟在我横画山川；古往今来，一无可恋，而可恋者惟在目前。目前之事维何？即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激，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树立于世界之林。并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办新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开始联系地方进步绅士在韶山兴办都学，开启民智。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与毛麓钟是五服内的堂兄弟。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及其子毛顺生原来也住在东茅塘，1887年才迁到上屋场，毛麓钟与毛顺生

两家原来来往比较密切，加之，毛麓钟的才学毛顺生也早有所知，因此，对于儿子毛泽东不顾自己的初衷，执意要拜其为师，也就听之任之。

毛泽东拜的是这样一位老师，自然受益匪浅，毛麓钟的思想、学识、人品无不深深地影响着他，毛麓钟则更是喜欢毛泽东这个资质俊秀、学业之好可谓凤毛麟角的学生。

在毛麓钟的 10 余名学生中，他认定这个来自上屋场的本家学生极有发展前途，十分关心他的学习，一有闲暇，毛先生便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把自己在外的经历和见闻告诉毛泽东，叫他热爱名山大川，胸怀广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毛先生还悉心给毛泽东点读《史记》、《汉书》、《纲鉴》及历代著名诗书辞赋等古籍，除此之外，还读了《日知录》等许多时论和新书。由于毛泽东的记忆超人，课堂的授课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先生只好常常给他开“小灶”——单独授课。毛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以发为文章，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少年毛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学问、道德、文章，都使他深为倾服。

《纲鉴》是明朝人王世贞依据《紫阳纲目》所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这本书使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了一个轮廓的印象。《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终身精诣之书，他提倡实地考察，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有深远影响。

毛泽东在这里学习半年时间，比别人所学的东西都多，感悟颇深。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读的时论和新书，使他感受到了中国海禁大开，列强侵略，国家危亡的现状，他开始萌发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读书从小就有个习惯，善于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在博览群书的同时，他开始思索一些重要的问题。早在停学劳动期间，他就发现他读了这么多的书，“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这些书里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农民当不了书中的主人公？带着这个问题，他询问了很多人，有同学，有老师，有少者，也有长辈，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的怪问题。为此，他纳闷了两年。自从在毛麓钟先生手下读了一些时论和新书，他逐渐有所启迪，有所省悟，他仔细分析古今书籍的内容，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赞颂的是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让农民替他们耕种。种田的农民，象他隔壁邻居毛茂生，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多余的钱去读书识字？就是识几个字，又哪有可能去著书立说？所以，写书的一定不会是农民，看书的也没有几个农民。他大彻大悟，立志要发奋读书，长大以后，一定要写农民的书，要帮助农民都能读书！无疑，少年毛泽东已朦胧地意识到农民及其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1910 年夏，毛泽东已是一个 16 岁的翩翩少年，也正是在这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大闹了韶山毛氏祠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离开了他最后一个，也是他最敬爱的塾师，结束了 6 年的私塾读书生活。

对这 6 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6 年孔夫子”，1964 年 8 月 18 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周恩来曾经讲道：“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

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的确如此，六年私塾为毛泽东打下较深厚的古文功底，使他的知识更广博，使之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然而，更为值得研究的是，旧式的中国人，人人都经过了旧式教育，四书五经的灌输和熏陶，而像毛泽东那样从形式到内容上，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继承的同时，能够联系中国的现状指出症结、做旧文化叛逆的尚不多见。

八、当他朝神龛上的“司命府君”灌了三杯香茗，见没反应时，毛泽东便在信仰上走向了母亲的反面

凡是到“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的人，无不在毛泽东父母卧室那张母亲遗像前驻足感慨：“毛泽东简直太像他母亲了。”从五官乃至到神态，都能感觉到母子之间遗传基因的造化。非但如此，毛泽东受其母亲的影响，对其母亲的爱戴，也是众所周知。然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加深，少年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背离了母亲，与她所信奉的、她的意愿越来越远。

上文提过，当年文七妹嫁到韶山冲毛家时，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与唐家坵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相反，韶山冲是闭塞而寂寞，平时难得热闹，况且毛家加上文七妹，也就四五口人，日子实在寂寞难奈。这里的一切与娘家真是天壤之别，于是文七妹时常回娘家小住，往往要住到丈夫来接。然而，老母贺氏谆谆告诫女儿：这都是天王菩萨和生辰八字注定的，有的人八字好，就享一辈子福，有的人八字不好，就受一辈子苦，人一辈子，事事都有菩萨管着。

面对上屋场的现实，在娘家的劝诫和影响下，再加上多寺的韶山香火甚浓，文七妹终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佛教宣扬人生充满痛苦，只有信仰佛祖，视世界万物和自我为“空”，才是解除痛苦的“法门”。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因果报应、克己忍让和轮回之说最易接受，并深信不疑。因此，文七妹对于枯燥寂寞的新生活，对于夫权至上的丈夫，对于她所不喜欢的眼前的一切，都能淡然处之，对于她来说，只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那就是信神拜佛。她确信只有神佛才能保佑全家平安，才能使自己来世幸福。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其故居堂屋的神龛前，对身旁的随行人员说：这就是我和母亲每月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这是事实，当年的神龛上，供奉着观音菩萨、天地君亲师、司命府君、列祖列宗等牌位，母子曾在此焚香、化钱、磕头敬祭天地、祖宗，总是依时按节，从未间断。

在母亲的熏陶下，毛泽东自懂事起也迷信神佛，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如同人们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因此，他对父亲不信神佛感到很不可思议，以至很反感。他9岁时曾和母亲一起，跟父亲认真讨论过该不该信佛的问题，并力劝父亲信佛，但没有效果，这使他很失望。后来有一次，父亲行走在山路中，劈面碰到一只老虎，他正不知所措，老虎却掉头走了。他以为这是冥冥中有神保佑，这才对神佛态度有所转变。

在毛泽东15岁时，母亲生病他却没去请乡村郎中而是给神佛菩萨许愿，并为之专程去两百公里以外的南岳衡山进香朝圣，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母亲之至爱，以及他迷信神佛之虔诚。

随着几年私塾生活的启蒙，毛泽东接受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毛麓钟老师和韶山进步人士李漱清的影响下，毛泽东对神佛的信仰愈来愈动摇，再加上他对问题要刨根问底，穷理彻源，在不自觉中，在这方面毛泽东开始走向母亲的反面。

在韶山乃至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家中每到朔望日早晚，都要烧香奉神，如逢过年、元宵节和七月中旬，在10天至半月内，早晚供奉神佛和列祖列宗，是家家户户的祖传惯例。毛泽东到了16岁左右，便开始厌烦了这一套老例规。虽然母命难违，但对这时的毛泽东，则多少有些免为其难了。

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忙着蒸斋粿、泡香茶，燃香点烛，虔诚

敬奉“司命府君”。各家神龛上，“九天真厨司命太岁府君之神位”赫然醒目。

毛泽东懂事不久曾问母亲，为什么家家都要在这一天敬奉“司命府君”呢？母亲亲切地告诉他：“今天是‘司命府君’上天的日子，所以人人敬奉，以求平安、吉祥。”

毛泽东还是弄不明白：“司命府君上天去作什么呢？”母亲谦和地答道：“司命府君上天是向玉帝呈奏人间的善恶，玉帝根据他的报告帮助好人，惩治恶人。”说罢她见毛泽东眨巴着两只大眼睛在冥思苦想，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北宋吕蒙正怀才不遇时，身居破窑，一贫如洗。大年三十日晚上，他见家家都敬“司命府君”，于是也泡了一杯香茶，燃了一根线香，虔诚地向“司命府君”祷告：“一盏香茗一朵烟，恭贺司命上九天。玉帝若问凡间事，蒙正夫妻实可怜。”吕蒙正感动了玉帝，日后考中了进士，发迹当了太宗和真宗的宰相。所以，后来，人们越发敬奉“司命府君”，求他在新的年里保佑人们大吉大利。

母亲文氏讲的这个故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跟着母亲认真地焚香、磕头。

又是一个大年初一，他遵照母亲的吩咐，一大早就来到堂屋的神龛前，准备撤下先天敬奉“司命府君”的香茶、斋粿、供果。他望着方桌上满满的三杯香茶，望着神龛里每天依旧的神佛像，他忽然有些发愣。如果神佛有灵，为什么他们从不赏脸喝一口呢？桌上摆的那么多供品，如果真有神佛在上，为什么他们从没动过一下呢？为什么乡亲们都敬神佛，如隔壁毛四阿婆这样的人家，也像母亲一样供奉神佛，却并没有得到保佑，旧观无改情势依然，难道这不是自欺欺人，自讨苦吃吗？父亲从不相信这套，却也无病无灾，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是谁在保佑他呢？

他对神佛的作用越来越产生怀疑。蓦然，他灵机一动，将三杯香茶朝“司命府君”的神像和神位纸上泼去，他调皮地想，如果神佛有灵，就应该接受他这三杯茶的敬意，如果神佛怒其不恭，那么他也甘当受惩。自然，茶水顺着神佛、神位纸流到地下。

毛泽东没有受到神佛的惩戒，过了一会却受到了母亲的责问：“石三，你怎么这样？这么放肆，会遭报应的！”母亲有些惶恐，也有些自疚，要知道，神佛对于母亲，是最神圣的。毛泽东想，如果母亲知道了自己是怎么想的，一定会很伤心，于是机敏地笑道：“妈，你天天供奉这些神佛，是不是您礼未周到，他们才都不喝您的香茶吃您的供果呢？我就帮您补补礼，一个个地请他们喝，这些菩萨老爷却不开口，仍是不赏脸。”母亲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她只好诚心向“司命府君”神像作揖认错，祈祷大神莫计小过。自这事起令她伤心的是，这个儿子就像他老子一样，对敬神拜佛越来越漫不经心。

对于神佛，毛顺生是由不信到似信非信；毛泽东则是由信到越来越不信，文氏原来对丈夫的耽心，也越来越被耽心儿子所取代，而且常为儿子的这种变化，这种背叛，深感灰心和焦虑。到了1919年，母亲病重，毛泽东就不再求神拜佛，而是多方求助医药，今天毛泽东故居卧室里挂的那张母亲与儿子的合影，就是毛泽东于1919年春接母亲到长沙治病时，特意到照相馆照的，这既是文氏仅有的照片，也是母子唯一的合影。

不仅是对神佛，而且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一些作法，毛泽东少年时起

就深恶痛绝。

像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妇女一样，毛泽东母亲的脚从小被层层裹脚布包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脚女人”。

有一次，毛泽东和母亲一路同行到唐家坵。唐家坵距韶山冲上屋场虽只有10余里路，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小脚的母亲走起来十分吃力，走不了多远，得坐下来休息，时不时落在毛泽东后面，“石伢子呀！等一等，慢点走！”

母亲越往前走，脚越迈不上劲。毛泽东见状，心中非常难过，便“唉”地叹了一口气。

“石伢子，你叹什么气？”母亲好生奇怪。

“我想外婆跟你怎么这样过不去！把脚包得这样小，连路都不好走！”

“咯又怪不得你外婆，她的脚不也是包得这样小么？从古就这样传下来的，你不要胡说。”在母亲看来，古已有之的事是理所当然。

“咯样古来的传法真害人！害人就要不得”，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娘，要是小脚的媳妇，我就不要！”

一路上，毛泽东都在纳闷：像娘一样的女人包成小脚为的是哪一桩呢？又不好看，又不中用，而且害死人，分明是一种恶俗，想着想着，一首打油诗就吟成了：

“包起脚来像骆驼，自己解开也不乐，别人掀起笑呵呵，听唱一首包脚歌。包起脚来懊幽幽，走在路上喊哎哟，别人嫌来自己痛，听唱一首包脚歌……”

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为“三寸金莲”，对于像母亲这样虔诚的佛教徒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她无从知道，这种恶俗，乃是封建社会用以戕害妇女，使她们达到“三从四德”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富有个性的少年毛泽东，从母亲的身上，使他认识到这种传统习俗的恶劣，是恶劣的，就要反抗，就要改变，虽然他还不曾认识到缠足是维护封建夫权政治的有效手段，不曾认识到深层的原因，但他毕竟嘲讽了这种恶俗，这对于一个生长在闭塞山村里的少年，不能不是一种大胆地反叛行为。

文氏一生极为勤俭善良，为人达到了一种至真、至善、至美，正因为心中有了佛，她宽容一切，对冷清寂寞的韶山冲的生活环境，她能宽容，对丈夫的暴躁、专横而较少温情，她能宽容，对大儿子调皮、闹事，她能宽容，在日后，她最疼爱的大儿子要离她远行的时候，也没阻拦，只是将热泪默默地往肚里吞。在她晚年，本该享受天伦，却遭受疾病折磨的时候，她依然冷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没有丝毫的怨恨……

虽然毛泽东的外形相似他的母亲，然而，他的性格、特质，除有他母亲的成份外，还有他父亲的成份。正因如此，毛泽东由幼年时对母亲的盲从，发展为稍长后的理性分析，他继续保留了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母亲素有的勤劳俭朴，憨厚诚实，待人慷慨，乐于助人，这一直延续至他的一生；但他却较缺乏且背离了母亲的“宽容”——母亲赖以与外界万事万物和谐相处，赖以与丈夫和和睦睦的待质。

母亲文氏，从来是随遇而安，因而力举非暴力——对于一切，哪怕是最不能为她接受的丑恶的事物，都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对待，她总是力图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用循循善诱的方法去劝导，其对于人生，特别是她的丈夫，无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正是佛教、儒学和道学所倡导的。如前所说，佛家主张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儒家提倡乐天知命，安

贫乐道，顺应时势；道家则讲求清静无为，儒、佛、道相容相摄，熔铸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造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性情和心态。许多中国旧式文人，甚至不少的英雄好汉，就是因为不敢逾越这一步，而面圃终生，而恶人反而逍遥无忌。毛泽东，却勇敢地越出了这一步，如没有这个胆略，纵有满腹经纶，恐怕只能成为可怜的韶山隐士，从这个角度说，他在背离神佛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承接母亲宽容、忍让和惯于逆来顺受的秉性，这似乎也是种必然，这同他独特的个性是难能两全的，否则，就不是今天的毛泽东。

九、在舅舅面前公然嘲笑了孔夫子，其经书却熟记在心，虽不喜欢，但临终也没有完全忘怀

毛泽东早在南岸私塾接受发蒙教育时，即点读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虽则能背，却并不深懂，以后在其它私塾读书时，又继续深入地学习了《论语》，逐渐明白了其中不少事理。因此，他后来概括其私塾生活时，曰“六年孔夫子”，__并说他“熟读经书，可是并不喜欢它们。”__

大约是在1909年一个桃花盛开的时节，少年毛泽东带着茶叶等礼物到唐家坨看望外婆、舅舅和舅妈。文家多有读书人。俗话说，三个屠夫讲猪，三个秀才讲书。文家大都是知书达理之人，向外婆、舅舅、舅妈请安后，毛泽东的干爹七舅他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毛泽东读书的事上来了：“石三，到如今你已读过五六年书了吧？在我们这里，娘亲舅大，做舅的不能不多说你几句，你明事理，敬老尊贤，但性格执拗，对父亲和先生欠缺理解和体谅。在家从父母，学堂听先生，家门冲进冲出，学堂门出出进进，这不行啊！”毛泽东对这样的话，在父母亲、邻里那里已经听得多了，并不急于搭理。八舅继续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一味反对先生，不读经书，真是不对。你反对老师，就是不尊敬孔圣人，你记得你家的神龛上，就有‘亲师’吧？你上过学，先拜圣人，次叩先生，这是起码的礼仪和孝悌忠信，只有这样才能成个好人，你的性格要改呢！”要是父亲这样一说，父子之间一场舌战是不可避免的，在舅舅面前，毛泽东显得文质彬彬，他和颜悦色地说：“干爹呀，世界尽是人做成的，您老人家晓得不？邻里乡亲不是家家都有神龛，家家都贴天地君亲师吗？初一、十五，谁家不行跪拜礼，敬呀，敬呀，结果呢，富贵的照样富贵，金银满箱，谷米满仓，贫穷的照样冒得饭吃，拜之敬之，不亦乐乎，用意相同，亲师却毫无应验，孔圣人对我未必就有什么恩赐吧……”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众舅舅、舅妈都忍俊不禁，毛泽东一时兴起，越说越起劲：“干爹您老刚才讲要多尊孔圣，否则是违反亲师的大过，你且听我说，作为圣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种种事情，应该全知全晓，方曰圣人吧！有一天，有个叫樊迟的求见孔圣，请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圃，孔子又说‘吾不如老圃。’樊迟无可奈何，走了。孔子认为学农林是小人做的事，自己没有农林的学问反而又轻人重己，还算得上什么圣人呢？”

“石三，你可不要胡言乱语！”八舅见外甥竟然越说越奇，责备道。毛泽东却接过话头，继续道：

“这哪是胡言乱语？干爹和在座各位，都读过《论语》的《微子》。孔子他老先生，一次衣冠楚楚，端坐车中，周游列国时，碰到一位楚国人，作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孔子下车，想与这人交谈，老农避而不答。他自楚返回时，不知道路通往哪里，派门人去向农人打听，这个老农听说是鲁国孔圣人，就说：‘既然是圣人，应该无路不知呀！’未予答理，于是又问一弱农人，这个老农听说是孔圣人，不恭不敬地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准以易之？’仍旧做他自己的事情。孔子又向前走，门人跟在后面，又遇到一位长者，门人对这位长者说：‘子不见夫子乎？’那位长者不慌不忙，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仍旧干他手中的活，讲起孔圣人的尊荣，你们看，连碰了好几次钉子，既曰圣人，人人要敬之爱之，认真接待方才合理，但是，他老夫子重君轻民，重己轻人，

所以为人们所不齿。既然当时人们就不尊敬他，现在我石三不敬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番话，把舅舅他们说得目瞪口呆，盯着这个简直不可思议的外甥半晌无言。可见，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确也有点“遗世独立”的架势，但他对孔子和儒教的认识还处在直观和表面的层次上，只能作为“圣贤书”读厌了时的一种调侃。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孟的“经书”，就是统治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毛泽东的思想精髓里对封建文化虽带有一定的叛逆性，但也摆脱不掉这种绝对权威的影响。就从他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期留下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1917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8、9处之多。在《伦理学原理》一书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如“良能”、“良知”、“尽心”、“知性”以及“养吾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圣人通天达地；明贯现在、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这就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孔孟的绝对权威被否定了，但四书五经的影响并未有消失。作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文化遗产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延安时期的煌煌大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而且，他并不满足于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范围。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划，重要章节他不仅自己读，还批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读，他的房间里，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那个特大的木板床，也被古籍占去了半榻，可以说，成年以后的毛泽东，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否定中有肯定，实属批判地继承。

十、长沙饥民暴动之后，毛泽东大闹祠堂，造了族长的反，父亲从此不敢再让他上学了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对农民极富有同情心。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一直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激烈搏斗的重要地区。从广西出发的太平军在湖南五进五出，点燃了湖南农民斗争的烈火。而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又是湘军，湘军的上层军官在攻破天京后纷纷升官晋爵，仅长沙新增的“官保第”达13家，湘乡县因“军功”而获二品以上官爵的近两千家，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至于湘军的数十万兵勇则被遣回乡，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其中不少成为无业游民。在这种情况下，湖南成为秘密结社最盛的地方。这些会党，比如哥老会，是反清斗争的一支巨大力量。

太平军刚刚被镇压下去，哥老会便在湖南各地斗争迭起，先后有曾广八、赖荣甫在曾国藩的老巢——湘乡发动的起义，彭四铁匠、向萌和在湘潭发动的起义等，虽然屡遭失败，但哥老会的组织却不断扩大。十九世纪末，哥老会成了维新运动的追随者，唐才常1900年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就是在两湖等地的会党为主力的。自立军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于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以刘揆一任总指挥，马福益任副总指挥；马福益就是洪江会的著名领袖。1905年，马福益再次企图举事失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翌年，哥老会在革命党人的策动和支持下，又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萍浏醴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对于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对于唤醒广大人民的觉悟，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对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影响最直接、最深的，还是长沙的饥民暴动。

1909年，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成千上万的饥民涌入长沙，而那些豪绅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到1910年4月间，由原来的每升米26文钱涨到76文。长沙南门口有个卖水为生的工人黄贵荪，好不容易攒了76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下锅，等她到达米店时又涨到每升米80文，她只得回去借了几文钱凑齐再去买米，店主却因她钱中杂有几文不通用的钱币，拒不卖米，傍晚，她又向邻居借换了几文通用钱币，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这个妇女买不到米，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绝望中便含愤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后，悲愤已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齐投江自尽。

此事发生后，饥民们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平价糶米，施行赈济，却遭到了横蛮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一举焚烧了官府衙门，可最终暴动者的头颅被清政府挂到了旗杆上悬着“示众”。

其时，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他从长沙逃出过境韶山的难民中，得知长沙饥民暴动和惨遭屠杀的消息后，心里非常激愤，和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他总觉得造反的人也像自己的邻里乡亲一样，为他们受到残酷镇压而愤愤不平。后来他回忆说，这件事，“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事情，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韶山的生活是封闭而压抑的，而正是这封闭而压抑的生活，也使毛泽东那躁动不安的心神和无畏而倔强的性格被磨砺得更加成熟。

长沙的饥民暴动虽被镇压，但暴动的余波仍在冲击湖南各地。长沙暴动后的端午节，韶山也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随后又“闹了祠堂”。

那是在端午节前后，韶山冲的米价突然飞涨起来，稍后，那些米商和财东大户，全都把谷米囤起来，不卖了。因为闹了抢米风潮和饥民暴动之后，湘潭和长沙的米价涨得更高了，他们把谷米送到银田寺下河，装上木船顺流运到湘潭和长沙去，可以多赚一倍的钱。这样一来，最难熬的是贫苦农民，要是往年，他们还可先借点钱来熬粥度饥，眼下，只好靠着野菜掺和米糠过日子，有些人家连米糠也没有，只得卖儿卖女，逃荒讨米。正如那首韶山民谣所写：“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正是这个时候，韶山冲的毛氏祠堂里，还锁着 100 多担积谷。按祠堂的规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平崇救济乡亲们的，可是，族长毛鸿宾却想把这批谷子运到银田寺下河，这样可多赚下一百多银花边，自己装腰包。

这件事，被扛着犁耙下地路过祠堂的毛家穷人毛承文知道了，他当即冲进祠堂，质问毛鸿宾，并要求立即开仓平崇。毛承文平时就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农民，远近的乡亲都知道他敢在地主、族长面前“冲杠子”。前不久，他曾带领没有饭吃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涌到地主、富户家和族长家里“吃排饭”，吃了这家吃那家。毛承文还怀疑毛鸿宾在主修族谱和祠堂时贪污了公款，要求清算帐目。毛鸿宾早就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只是尚未找到整他的机会而不予理睬。而这次见毛承文竟然冲击祠堂，责骂族长，是一个惩治的好借口，就喝令亲信打手，把毛承文五花大绑，还要打开祠堂大门，召集全族老少，准备以破坏族规的罪名严惩毛承文。

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便和同学们一起赶到祠堂，祠堂的中下厅里已经挤满了百多号看热闹的人，族长的两边站着他的三班六房，气势汹汹。人们在喊喊喳喳地议论着。

一会儿，坐在上厅太师椅上的毛鸿宾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惊堂木，拉长着声音说：“大家听着喽！本族刁民毛承文，煽众闹事，诽谤殴打本族长……”

被押在一旁的毛承文听族长这么一说，愤怒道：“放屁！你……”未等毛承文把话说完，两个汉子急忙上前掩住毛承文的嘴，塞进一块粗布头。

族长身旁一个年高体弱的长老也站起身来，清清嗓子，大声道：“古人说：‘万恶淫为首，万善孝为先！’我们毛家向来讲究忠孝节义，这个毛承文，至今还咒骂族长，无法无天，依我看，是应予以严惩，以正族规！”

这时候，人群里已鸦雀无声，毛鸿宾见长者的话已凑效，得意地捋着下巴上那撮小胡子，跟着高喊：“大家听着，毛承文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罪大恶极哩！按族里的老规矩，重打 50 大板！来人呀，给我打！”

“慢着，不能打人！”一个响亮而略带童稚的声音从人群中发出，人们循声望去，原来是毛顺生的大少爷毛泽东，有人惊异，有人在嘀咕：“好大胆。”毛泽东顺势挤出人群，走到族长面前。“你，你要做什么？”族长面对早已以闹学堂而“闻名”的毛泽东，绷着脸说。

“承文哥在理，打不得！”“打不得？他诽谤、殴打本族之长，犯上作乱……”“承文哥在祠堂外，你族长在祠堂里，他平白无故，怎么会诽谤你、殴打你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原因对大家讲清楚？要打，也要讲清楚再打！”

“你爹都没来做声，你少管闲事。”族长仰着头，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这时，人群开始沸腾起来，有人在附和，要族长把事情讲清楚再打人。

毛泽东环视喧闹的人群，走到台前说：“我是伢子，大道理不懂，但我晓得，一只手遮不住天，千人抬不动个‘理’字，就是犯了朝廷的王法，也要问问犯人的口供哩。”几句话，人群静了下来，有的在点头。

毛泽东继续讲：“族长应该让承文哥讲话，把人家捆起来，为什么还要封人家的嘴巴子呀？大家讲一讲，这难道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吗？”台下有人喊：“冒得这样的的规矩，要让人家说话！”“让毛承文讲话！”一个汉子把毛承文口里的布扯出来。人们这才从他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走到乡亲们面前，大义凛然地说：“我族‘家规’里有这么一条：公项银谷，其出入每年凭众清算，记载公簿，以示清洁，如有肆意侵噬，除追还赔偿外，立行斥革论罚！现在的事实，大家又都清楚了，身为一族之长，全不把乡亲们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心想赚昧心钱，主修祠堂和族谱，连个帐本也不敢见人，这些，不是明明违反了族规吗？予以严惩的难道不应该是他族长大人吗？……”

族长见势不妙，大喊：“造反了！造反了！”又冲到毛泽东面前，咬牙切齿地说：“石三伢子，你有本事，你等着瞧！”说完拂袖而去。

于是，在几个长辈的主持下，当即开仓平糶。

不久，毛鸿宾的族长交椅坐不下了，他成了韶山毛氏家族下台时最不光彩的一位族长。闹祠堂这天，毛顺生因在外地做生意而没在场，他回来后，被毛鸿宾告了一状，一听说这件事，他不由得火气直往上蹿，匆匆赶到东茅塘，怒气冲冲地拉着毛泽东就走，说：“石三，你小时候闹学堂，如今你闹祠堂，再过几年，说不定还会闹公堂呢！这书你不能再读下去了！”就这样，毛泽东无可奈何告别了最后一位塾师，跟着父亲回到家里。

十一、毛泽东最后一次违背了去米行当学徒的父命，留下一首《赠父诗》 挑着担子毅然走出乡关

从长沙饥民暴动，到韶山冲出现的风波，一桩桩，一件件都振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阶级对立的模糊意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他们的自发性斗争。通过无数事实的教育，他越来越觉得农民受苦最深，非把农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对农民的阶级感情，正是推动他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促使他最终彻底反叛旧的封建土地制。

儿子大闹祠堂，对于一向遵奉族纪族规族长的毛顺生来说，无疑是不能容忍的，使他感到颇失面子，因此，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花点钱“打点打点”，去给毛鸿宾赔礼道歉。毛顺生对儿子的前途颇为担忧，再这样读书读下去，往后不知道还要闹出什么大乱子，他决定把毛泽东再送到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湘潭“裕盛米行”去当学徒。这样的安排，首先，儿子不会再在韶山冲里给他闯祸；其次，去湘潭当学徒，会有老板管着；再者，学会了做生意的真本领，将来可帮自己开辅创业。

到城市去，对于一个长在小山沟且未出过远门的少年来说，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姑且不说那发家致富的本领，仅就那十里长街，繁华的水陆码头，几层楼高的洋船就足以对山村少年充满着诱惑，毛泽东早就听人说起，湘潭是一个很繁华的水陆码头，他也知道，湘江是一条很美的河，前不久，他跟毛麓钟先生读唐诗宋词，其中有不少赞美湘江的诗句，如“欸乃一声山水绿”，还有“为谁流下潇湘去”等等。但是已经十六岁的毛泽东所考虑的已经远不止这些了，虽说那天父亲告诉他这件事时，他未置可否，但过后一深思，从父亲身上，他太了解那些生意人了，穷苦人拿了几个血汗钱，到米店来买三五几升米，老板还要短斤少两，大斗收进，小斗量出，有时还要发水掺沙，每当灾年欠收，置人们死活而不顾，把谷米外运赚大钱，也不愿平崇赈济穷苦人。这种昧良心的本事，作为从小受母亲慈善心肠影响的毛泽东，理所当然不愿去学。因此，毛泽东又一次也是在韶山冲最后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决定不去米店当学徒，要继续读书。

促成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因素还在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少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劳动——读书——再读书的过程，通过劳动的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使他的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穷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抱不平的思想感情愈来愈强烈。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当时带有浓厚忧患意识和爱国色彩的书，又受到巨大的教益和启迪，开始了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大闹祠堂，再次违背父命，正是这种思想和觉悟升华的表露。

这个时期，给毛泽东的思想带来巨大影响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东茅塘私塾的毛麓钟先生，其二，住在韶山冲下端李家屋场的“过激派”教师李漱清，其三，唐家坵正在外求学的表兄弟们。

唐家坵的七舅和八舅，是半耕半读的人，毛泽东从小寄居在外婆家里的那段日子，即在舅舅那里受到了最初的传统熏陶。在湘乡教小学的表哥文运昌和在长沙教书的姨表兄王季范，他们都是回来度暑假的，带回了外面风云变幻的时代气息，带回很多毛泽东最爱读的时论和新书。正是这些书，毛泽东读了又读，使他认识到了外面风起云涌的世界，认识到韶山冲原来是

多么渺小。

到了 1910 年夏，毛泽东的足迹虽然还没有越出韶山冲，但他的思想却已飞驰得很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起韶山冲之外的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

毛泽东早就养成了晚上挑灯夜读的习惯，不论是三九寒冬，还是盛夏酷暑，他都坚持不懈。他从唐家坵的表兄那里借来的两本新书，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开拓了毛泽东的视野。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似亦存乎人而已矣。”

冯桂芬还通过中西对比分析，勇敢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改革宗旨。他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主义的先河。到 20 世纪，这些主张

虽然已大大落后于时代，但处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当他读到这本书时，仍然感到很有启发。中国何以不如“小夷”的问题，以及“虽蛮貊，吾师之”的宗旨，对他来说，都是很新鲜的。

当时，毛泽东最喜欢读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属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前后花费了 30 年的心血，于 1893 年，也就是毛泽东诞生的那一年出版的这本《盛世危言》，郑观应议论时务得失，提出改良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概貌。其《自序》写道：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把开议院、保商务、重技艺、兴学校作为“富强”之本，较之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发展，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也有所区别。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更注意讲求“西法”，积极主张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经过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和 1900 年的自立军运动，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在当时已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地处闭塞山冲的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他还觉得新鲜；特别是郑观应“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决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但如何变法，的确是一个需要仔细思索的问题。这些宣扬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书籍，大大启发了毛泽东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对他的反叛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他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其影响更巨大更深刻。20 余年后，他曾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时候，“维新派”人物李漱清在外地求学从教，后于1909年回到韶山，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回到故乡后，他反对神佛，积极主张废除庙宇，改办学校，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以振兴中华。这些维新主张自然遭到当地豪绅们的激烈反对，污蔑他是“过激派”，但是毛泽东却非常佩服他的学识，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经常去找他谈心、借书，求学问教。在那里，毛泽东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恪守在韶山冲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更不能昧着良心去做投机商人，他要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之中去。他心中产生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要继续上学！”这个愿望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心思，那段时间里，他几乎都在焦虑、烦闷之中。

恰在这时，表兄文运昌来到韶山冲上屋场，他理解毛泽东的志趣，告诉表弟，湘乡县城那边有一所中西合璧式的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设的课程很丰富、很新颖，中西文化，无奇不有，老师中还有留过洋的，去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知识，这些新鲜知识不同于私塾里的经书，今后会大大地用得上的。

文运昌的一番话，在少年毛泽东心中，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这位大他10岁的表兄在那所学校读过书，而且学识非同一般。文运昌向毛泽东具体介绍了学校所教课目，并鼓动他去该校报考读书。

文运昌的一席话，坚定了毛泽东投奔新学的决心。但是，要征得固执的父亲同意，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此时此刻，毛泽东外出求学的决心，已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之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能使父亲就范的计策。

原定毛泽东去湘潭学徒的日子临近了，母亲的心里乱糟糟的。儿子头次出门，做娘的就心慌。夜里，她把儿子的换洗衣服从箱子里、柜子里翻出来，一件件地打点着。毛泽东悄悄地走到母亲身边，轻声地说：“妈，我宁愿做一世的作田人，也不去学那坑人的米店生意。湘潭我不去了！”母亲慈祥的脸上挂满了忧郁的神情，她从这几天儿子那闷闷不乐的神色，已猜出了七八分缘由。她感到很为难，说：“石三，你晓得你爹的脾气，他定了的事，那是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的，不去怕不行哩！”毛泽东坚定地说：“要去就到湘乡去，到东山学堂去！”这可是一个难题，母亲感到很耽心，送儿子到湘潭当学徒，这是丈夫打的如意算盘，现在已废了科举，又不能读书做官了。况且去读书，首先得交一大笔学费和伙食费，当家的怎么会答应呢？转念一想，儿子长大了，他自有他的主张，也不好强求，他的脾气同他爹一样，拿定了的事，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想到这里，母亲忧郁地叹道：“唉，要你爹答应你去湘乡读书，只怕做不到。父子又要顶撞起来，我这个做娘的里外难当啊！”“妈，你莫叹气。”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俗话说得好：‘娘亲舅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把舅舅和老师都请来帮我说话，爹不会不同意的。您就准备一桌酒食吧！”母子俩相视会心地笑了。过了两天，太阳当顶的时候，毛顺生和二儿子毛泽民从土地冲稻田里耕地收工回来，只见家里已来了不少客人，当中有唐家托的两位舅子文正兴和文正莹，两个外侄文运昌和王季范，还有两位稀客，一个是东茅塘私塾里的老师毛麓钟，一个是李家屋场的新派读书人李漱清，另外还有堂叔毛钟楚。毛顺生心想，一不

是过年，二不是过节，来客莫不是欢送儿子到湘潭去学生意吧？客人既然来了，就当然热情接待。然而，毛顺生绝对没想到，儿子请来这么多的客人，原来是存心与他作对，当说客的来人众口一词，都说润之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又有“四书”、“五经”的功底，若是进了洋学堂，开拓开拓视野，日后定会大有出息。

尽管毛顺生生性执拗，但这次寡不敌众，经过客人们酒筵上的一番番劝说，他终于不得不出让步，改变初衷。众人的开导，使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便当众答应了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小读书。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对小家庭束缚的最终解脱，争得了自己自由意志的发展。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友人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表明他与父亲给他安排的那种经商赚钱的重利盘剥道路的最终决裂。诗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发现了这首诗，他惊讶不已，并将此事告诉了文家。这样，毛泽东改写的赠父诗得以留传。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外祖家在上交革命文物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拿出一本秘密珍藏的毛泽东读过的书，书里夹着一张纸包着的毛泽东与亲人们的合影，纸上留着毛泽东的手迹，正是这首诗。

这一原作诗篇，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只是为了适合自己的情况，稍加改动，将原诗的“男儿”改成“孩儿”，“学不成名死不还”的“死”字改为“誓”字，其他未作变动。

据初步查证，原诗为日人西乡隆盛所作。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青年时代砺志好学，习文练武，具有远大抱负。明治维新时期主张改革，是尊王倒幕派的主要代表者。他写的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我国一些改良派活动家鼓吹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派出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后创办刊物，兴办学堂，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及其代表人物，大力宣扬改良主义的潮流而传入中国的。

赠父诗虽然属于改写，但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砺志好学，胸怀救国救民伟大抱负的坚强精神。这在当时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刚刚跨入青年时期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1910年，一个田野飘香的秋日，毛泽东挑着行李和书籍，依依惜别了养育他的生身父母，还有造就了他并开始背叛它的毛氏家族，去50里以外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此时此刻，16岁的毛泽东不知是否想到，五百年前的始祖毛太华“投锄从戎”时的情景？

第七章 挥手自兹去，乡关总是情

一、由湘乡至长沙，虽考进省立师范，却难以安分，为母病国忧而南北奔波

若将毛泽东的 83 年作一个分期，1910 年之前，是他的人生第一个重要时期，即“超早期”。

在他的超早期中，毛泽东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他的家族和他的家乡——虽然这种了解还多半属直观的，但这已为他以后全面了解社会进而改造社会奠定了基础。

1910 年秋，毛泽东出了乡关。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行进路线与他祖宗来到韶山冲的路线正相吻合，只是方向相反。

数百年来，毛氏家族走出乡关的不在少数，或经商，或谋生，或求学，或从军。经商谋生者，如迁长沙的毛瑞子孙，求学者如毛福生、毛麓钟。最为显赫者，当推清咸丰、同治年间，数十名投入湘军的毛氏族人——他们血战疆场，许多人死后尸骨无收，但也有少数几位做了大官，如花翎提督毛正明、毛有庆等。但是，这些效命沙场的人，却成了历史的悲剧人物，他们除为捍卫边陲出过力外，更重要的是随了曾国藩、左宗棠剿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之出乡关，其意义深远、广泛得多，使同姓氏内任何一个人（如毛亨、毛茌、毛遂、毛贵、毛奇龄等）都黯然失色。

湘乡城，是一座历史颇为悠久的古城。城郊牛形山，即毛泽东四世祖母的葬地，发掘过一片规模十分庞大的战国古墓群，从东北至西南绵延十余公里，计五千多座……西汉时，长沙王王子刘昌亲任湘乡侯，三国时出了个蜀参军蒋琬……至近代人文更盛。

城内外，云门寺、褚公祠、东山书院……古迹甚多。这是一个文化氛围极浓郁的地方，古典文学、书法艺术有极深厚的传统。以东山书院为例，它在东台山下，涟水河畔，为一片田园环绕。远远看去，古趣盎然；入内，只见马头墙，琉璃碧瓦，令人赏心悦目，还有护城河围绕；过河，为一麻石小桥，桥形曲折，石径通往书院正门，可见书院主体屋脊竖以宝瓶，正面墙绘二狮、二鹿，喻阳刚与阴柔，院门竖石鼓，鼓面奔鹿呼之欲出。

这一座始建于光绪十八年，即毛泽东出生前一年的书院，迎接了中国在本世纪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而对于毛泽东，东山书院成了他出乡关之后的第一站。

1911 年 4 月，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带头剪掉了“受之父母”的、又是属于满清统治标志的长辫子，这比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早了六个月，由这件事，我们便能看出，从封闭落后的韶山冲，到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长沙城，环境的变更，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折。当然，这种转折在韶山冲，因为进步书刊的启发，因为李漱清先生的引导，更因为毛泽东对清庭统治下最低层民众疾苦的认识，而早就奠定了基础；性格上、个人品质上也为此作了充分准备。

反过来，若是毛泽东在入长沙以前，没有性格与思想的一系列准备，他绝不可能如此大胆，如此迅捷地、毫不犹豫地带头剪辫子。

因此，毛泽东的这种果敢行为，并不是出自模仿，而是一种自觉的叛逆表示。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的革命军：新军，编入 25 混成协 50 标第一营左队。此时的政治倾向已相当明显。

对于毛氏家族来说，由清咸丰、同治年间毛有庆、毛正明这一批人加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回、捻起义，维护“大清”天下，到毛顺生当兵无所作为，而至毛泽东随同新军参加辛亥革命，造清廷的反，这过程本身便是一个大飞跃。

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到十七岁，羽翼未丰，参加新军他实际上只是做了中国封建帝制解体的见证人。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如果没有马上取得成功，指形式上的成功，革命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期，则毛泽东亦将在军中呆下去，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许就要重写。但事实上，小溥仪才当了两、三年皇帝，就被蒋翊武的炮弹震下了宝座——毛泽东便退出新军，因为比他还小十多岁的宣统帝，已不须他再去费什么力气。

毛泽东决定继续求学。然而，大动荡的时局使毛泽东一时有些茫然。他一连报考了几所学校——1912年春，他做了他一生中大约是唯一一件最合父亲心意的事：他报考了商业学校和高级商校。父亲接到这信时高兴万分：儿子终于决定将要做“大商人”了。

如果毛泽东真的进了商校，对于一心只想以经商发家的父亲，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支持！父子前嫌便会一笔勾销，上屋场也许朝着繁荣的路上迅跑，毛顺生在儿子从商业学校毕业后，也能一享清福而延年益寿。

为什么毛泽东忽而改变了一向对于“做生意”的厌恶感，而想当“商业专家”呢？那当然绝不是因为他屈服父亲的压力（他的写信，也确有讨父亲喜欢的意味），这首先反映了18岁的毛泽东，思想还远未成熟，他还未确立将从事何种职业，他身上只是有较为明确的求知欲与爱国心，却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再有，毛泽东萌发“学商”的念头，也是受了当时形势影响——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在谈实业救国，学校五花八门，多与实业有关——他除报了商校外，还报考了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校……

话说回来，毛泽东如果真进了商业学校，也不会成为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只为家庭的自私商人。

父亲的兴奋仅持续一个月——毛泽东终于不愿与“赵公元帅”多打交道，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仍然迷恋那种全面的、正宗的教育形式。

这对父亲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打击——毛泽东像一只风筝，飞上高空，父亲手中的拉线断了，再也管他不着，他变成了一只任意飞翔的雄鹰。

不到半年，毛泽东干脆什么学校也不进了，寄居在湘乡会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这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独立不羁、蔑视程式化教学的性格——因为他觉得学校成了他高效率摄取知识的障碍，至少在当时他认为必须过一段自学生涯。

父亲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停止对儿子的资助。父子之间，相距百里之遥，冲突却仍在继续，乃至激化。儿子没有屈服，硬是撑持了半年。1913年春，他停止自学，进了不收学费，伙食费也很低廉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后与一师合并），至此，毛泽东在经济上也摆脱了父亲的牵制，而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由人。1913~1914年间，毛泽东是否回过故乡，目前尚无资料可证，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父子两不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父子之间更加疏远了。但母亲，却永远牵挂着毛泽东的心。1915年6月25日，毛

泽东写给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止有回家一法。从这几句话看来，父亲的经济制裁倒是起了作用——虽然师范学校平时不要学费，但亦断不会向学生提供休假费，所以毛泽东只得回韶山冲去，尽管回去后，又要见父亲的冷眼。这次回家，实际上在8月15日（阴历七月初五）。到了1916年，毛泽东便由不想回家，而到梦魂牵系了，因为母亲已开始生病。文氏因长期忧郁和劳累，加上韶山冲的封闭和营养之不足，这位孕育了伟大人物的母亲，得了当时难治的两种病：喉炎，淋巴腺炎（蛾喉和瘰痢病）。这在韶山冲恶劣的医疗条件下，使毛母渡过了一段极痛苦的晚年，并终于夺去了这位最普通又最伟大的母亲的生命。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对萧子升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增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的毛泽东，完全沉入了对病母的深深忧思之中。而这种忧思，又与周围凄迷的环境、纷乱的时势交互融汇。这种情绪逼使他“明日开弄，决行返舍”。他于当月的25日动身返回韶山。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宵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衡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鹤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比较这两份信的内容，我们能够知道，毛泽东在1916年前后，便已逐渐将家愁国恨结合在一起了。第一封信，因为尚在省城，因“滞于雨，不得归”，加上军阀混战，更不敢冒险回韶山，而“病母在庐，倚望为劳”，使他陷入浓浓的伤感之中，只得独自一人，孤寂地住在学校里。老天终于开了脸时，他便即刻动身，于27日上午到达韶山冲。母亲蹒跚着出来迎接儿子。父亲、母亲都仔细打量着这位22岁的长子——他同一年前一样，穿着长衫，留着平头，他的脸部显得更加饱满，他的外形已显出了最初的伟岸挺拔。父子目光对视，似乎依然有些互不相让，但父亲已明显地增加了慈祥，儿子也渐学会了理解与宽容，——父子之间的“对峙”在毛顺生的晚年已经淡化。毛泽东在家过了一个暑假，亲人团聚，和和乐乐，7月12日，毛泽东动身返校。到了1917年，毛泽东的行动证明他的志向已经相当明确：当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各方面的素质也已日渐成熟，他已开始稳健地向前迈进，他的母校第一师范当时评价他：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敦品）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自治）长于国文词章（文学）长于演讲，论辨应对（言语）应变有方，办事精细（才见）；冒险进取，警备非常（胆识）。他在400余人的物竞选中，以得票最多，荣获头名，正如10多年前在南岸获得一个“省先生”称号一样，德意志建国时期一名智勇双全的名将“毛奇”被冠到他头上。然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却陷于两难之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逼使他决心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的繁务之中，但他的父母还在，他作为长子，却远游长沙，不能侍候左右，每年纵有寒暑假，也是来去匆匆，近年来，母亲又身

患重病，……

虽然有父亲在家撑持，虽然大弟弟泽民已 21 岁，小弟弟泽覃有 13 岁，可以作父亲的帮手了，毛泽东因此尚可安心，但母病加重时，他便再也安不下心了。

6、7 月间，毛泽东又回到韶山，但只住 10 来天，便赶回长沙，因为他已与萧子升约定暑期徒步漫游湖南。

1918 年，母病恶化、其时，母亲已被她的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接回娘家。毛泽东于该年 7、8 月回韶山探母，但他的事业又使他不得不舍下已 51 岁的母亲，于 8 月中旬回省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北上，准备赴法勤工俭学，8 月 19 日，他到了北京，次年春天又急急返湘。

1919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匆匆离京，14 日到上海，送走第一、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后，4 月 6 日回到长沙，大弟泽民已按所嘱，扶病母在长沙就医，他急赶到医院。

在毛泽东与母亲相聚的最后一段珍贵时间，他和弟弟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后，也是唯一的一张合影。

从照片上看，毛母文氏脸部已明显可见病痛的阴影，这种阴影却丝毫掩盖不了老人家佛一样的雍容，她的双眼，是那么纯洁无暇，她把她的爱无私地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乃至乡邻。

然而，照片的背景是黯淡的，天国已向她召唤了。

文氏在长沙疗养期间，亲睹了由大儿子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湖南新文化运动，这是老人家一生中见过的唯一一次大世面。

辛亥革命从形式上摧毁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从文化的深层对封建制度来了一次大扫荡，马列主义也因此传入中国，中国历史以及毛泽东个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还未来得及引进西方最先进的医术，毛母文氏，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患病的中国人一样，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

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由北京开始，引发至全国各大、中城市。长沙，以毛泽东等为首的大批爱国青年向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文化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毛泽东十年前在他的故乡即已开始了这种攻势，但那时他仅仅是凭一种本能，单枪匹马，在私塾里，在毛氏宗祠，在父亲和族长面前，作最初的尝试。现在，他以故乡的经历为基础，以他少年即有的锐气，以新增的一种稳健，冲锋在前——毛泽东在韶山曾经努力反抗而只获得他个人成功的东西，比如婚姻制度上的父母包办，教育上的死记硬背，文法上的不打标点，文体上的文言文……都将为新文化运动的滔滔浪潮所淹没。

1920 年前后，是毛泽东事业的重要开端，对于他的家庭，却是最不幸的阶段。母亲于 1919 年 10 月 5 日溘然长逝，丧礼按韶山风俗进行了，父亲以及其他乡邻，都未曾想到文氏 50 刚过就别离了人世，以至于不曾预先择好葬地，但风水观念又使得他们不愿草率将这位慈祥的老人下葬，于是，灵柩停在了上屋场东侧晒谷坪上，由泽民守灵。

毛泽东回到了长沙。悲哀转化成动力，母亲那纯真、博爱的胸怀，促使他为了真理，更加努力地去奋战。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和直接对手是军阀张敬尧。

1918 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混战，南败北胜，皖系军阀张敬尧于该年

3月入湘任都督，张氏入主湖南后，作恶多端，“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这是人民的呼声。湖南民众掀起了驱张运动，毛泽东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场运动从1919年8月《湘江评论》和学联被封后开始，到12月初进入高潮。毛泽东奔了母丧，丧期未滿，即带孝北上，于12月上旬率驱张代表团，18日到达北京，其声势之浩大，震荡了北京全城。

到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才离京，历时4个月。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到北京。驱张运动胜利之后，毛泽东“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一晌，25天才到上海”，他以主人翁的姿态巡视了中原大地。

7月上旬，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

在他领导着驱张运动节节胜利的时候，他的家庭又发生了一场大变故——父亲去世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张毛泽东与父亲、堂伯父及弟弟的合影，这便是毛顺生毕生最后的仪容。

照片上，毛泽东右臂缠黑纱，他的脸部表情告诉我们，他尚处在失去母亲的悲哀之中；父亲已明显消瘦，他浓黑的眉毛，凸起的颊骨，显示着他性格上的倔强；然而，他是从小儿子泽覃扶着的，他的腰已显得弯曲无力，他只得双手握拳强撑双膝上——老人家从17岁时开始劳累，到33年后的此时，已非常憔悴。

这张照片，摄于毛泽东服丧期内；母亲去世后，毛泽东于10~11月间接了父亲，由堂伯父毛福生和弟弟陪同到了长沙，一来替父亲治病（父亲患了严重的伤寒），二来让父亲开开心消除悲愁。

毛顺生在省城目睹了驱张运动的盛况，为此，他极为担心——10多年前，儿子在故乡就专门与他，与先生、族长作对，如今公然与堂堂的湖南都督干起来了！毛顺生在忧虑中回了韶山，毛泽东则率团北上，父子从此永诀。1919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阳历1920年1月23日），即文氏过世后仅仅3个半月，50岁的毛顺生老人，又追随他的妻子去了。他临终也未能合上双眼——他年岁不大，发家之梦才实现一半；两个儿子没有送终，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毛顺生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一生备历艰辛，照料了妻子和三个儿子；但长子老是不合他的心意，晚年，他已感受到了苍凉，妻子的去世给了他最大的打击——他们自1880年前后一起生活，至1919年已40年了！妻子灵柩尚在坪上，似乎在等着他。毛泽东既未送终，又未奔丧，此时他正奔走于长沙武汉和北京之间，1921年春节，他才带着泽覃，走到父母坟前。

二、毛泽东回到韶山，把祖辈家业一朝抛散，家国融为一体。几年以后，他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毛泽东彻底抛弃上屋场这个小家庭，是在父亲去世之后。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在父母坟上祭扫之后，他便将他父亲33年艰辛创下的家业散给了穷苦乡亲，把弟妹们全部带出了韶山。关于这次毛泽东回来的事情，他的表弟文东仙后来回忆道：1921年正月初，毛泽东同志到了唐家坵我家里拜年。他对我父亲讲：‘舅舅，我这次是到湘潭贴招生广告，顺便回来打一个转，看看您的，我还要到宁乡去贴广告，不能久住。’第二天，我和文南生同毛泽东同志一道到毛泽东同志家来了。正是初八，毛泽东同志母亲生日的这天晚上，炉火烧得通红，毛泽东同志、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王淑兰、文南生、文东仙等，一边烤火，一边吃东西，一边谈家常。毛泽东同志对毛泽民讲：‘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接着，毛泽民同志从民国六年讲起：“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一次；八年死娘、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了，二十亩田的谷只能糊口。钱从哪里来？就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便问：‘是不是欠了别人一些钱呢？’泽民答复：‘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的几张票子。’泽民还说：‘牛，别人喂了；欠人家的票子总要钱兑。’‘能抵销的有些什么东西呢？’泽民说：‘能抵销的是家里有两头肉猪，仓里还有两担谷。’

王淑兰在旁边抱着小孩，有时插话帮腔。毛泽东同志听了弟弟、弟媳介绍的情况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强盗来抢东西，败兵来要东西，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而是天下大多数人有的灾难。叫做国乱民不安生。’

毛泽东同志稍停了一下又说：

‘这几年来，你们两口子在家受苦了，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遭强盗败兵抢劫的事是免不了的，今后还会有。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俩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安生的地方，润莲细时在屋里搞劳动，冒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家里发出的票子，你就写一个广告贴在外面，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定几天内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别人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搞春耕生产了，不能逼人家去卖牛啊！别人欠了我们的帐就算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动用了，最好留到春耕的时候，平价崇给上下屋的人，要从那些最冒得的崇起。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去。’

毛泽东同志又说：

‘我不会住好久，请你们作好跟我走的准备。这就是我的意见，同你们商量好不好？’

泽民听了哥哥的话之后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但准备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作好的呀，是不是请你跟我作一个计划，你还多住几天，商量一下：田写给哪个作，房子给哪个住，安排好了就一起走。’

毛泽东同志说：

‘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作田的住。你作主找人就是了。家里的事你们安排一下，我不能久住了，还有公事要办。’

‘你们去长沙，不要带多了东西，只要带被盖和要穿的衣服。如果东西带多了，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最后，毛泽东同志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从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去送给左右邻居，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出去请人来帮助作准备。晚上毛泽东同志又请来一些比他辈份和年纪大的客人吃晚饭，以表感谢之意。

初十那天，毛泽东同志吃过早饭后就走了。毛泽东同志走后，大约过了个把礼拜时间，毛泽民、王淑兰带着孩子去了长沙。”至1921年初，毛泽东最后完成了他的杰作：家与国的融合。此前，毛泽东都是在为这项伟大工程而艰苦努力。他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代表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那种小家庭的维护者，虽然他本身是勤劳，坚韧的，但他从来都未能把目光投向他个人及他家庭以外的空间，他始终局限于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为小家而不是为大家的狭隘圈子。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自古以来，要作到家与国的融合，天下为公，岂是一件易事？

1921年正月以后，韶山冲上屋场空空落落了，毛氏家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甚至对毛顺生的儿女们感到可怜：家，不成其为家了，破败了，一份好端端的产业！

他们哪里能知道毛泽东的高远志向！

毛泽东离家后4年，即1921年~1925年，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单是毛泽东，他已经走出湖南，站在全中国政治航船的船头，成为掌舵人之一。他创立了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他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但湖南韶山仍旧是他的大后方和坚实后盾，他以此为依托，巩固他在全中国尚不稳固的地位。并以其为实验地，检验他自己正逐步形成的理论之正确与否。

1925年正月，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又回到故土，“刀耕火种”，进行了艰难的拓荒。

韶山，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已出现五、六万亩良田，塍中沃野连片，山冲梯田重叠，谷米哗哗流出，而生产者却只占少量的土地，有许多几辈都是佃农。尤其到了清末，成涤泉等人的土地兼并，造成了韶山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

毛泽东最为关注之点即在于此。他回到故乡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也在于此。

我们不妨把毛泽东1925年在故乡的活动作一扼要归纳：

2、3月间，毛泽东等在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20多个；

3、4月，杨开慧在毛氏宗祠创办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此后发展到20

多所；

6月中旬，毛泽东发展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下旬，建立20多个公开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同时还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区分部。

7月30日，毛泽东暗中组织的上七都教育会、学委会在郭氏祠堂改选，将韶山的教育大权夺归农民手中；

毛泽东支持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等人领导中共韶山支部、银田特支，进行平崇阻禁；

八月，共青团韶山特别支部成立。

在故乡的六、七个月中，毛泽东对他十多年前，即1910年以前最有切肤之痛的所有社会痼疾，举起了他的“手术刀”，概括起来，主要是：农民的思想觉悟问题、受教育的权利问题、社会地位问题、阶级对立问题。而毛泽东的矛头所指，却是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的族权、政权、夫权、神权。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公然将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办到了宗族的圣地：毛氏祠堂，而且带了男男女女，本姓外姓的人们在这里出出进进，昔日祭祖的庄严肃穆之所，现在整日喧哗熙闹，——没有人推选毛泽东为族长，但他却成了事实上的首领，不只是毛姓人们的首领，而是百家姓氏的首领。在韶山，毛泽东第一次打破了宗族界限，让外族人进入毛家祠堂，也无视宗规族法，大胆让女人家进祠堂，并且动员她们放脚，反对丈夫权威，学习文化知识——毛太华、毛清一这些昔日敬为神灵的老祖宗被冷落到了另一边。

由1910年以前与父亲无休无止的冲突，到1910年大闹祠堂，到1925年组织农民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些带有反叛意味的行为，尚是不成熟的、本能的，单枪匹马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家族制的根基，而1925年，毛泽东已掌握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而且已有过长达15年的知识积累和参加“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湘区工人运动和国共合作的实践经验，因此，毛泽东在故乡已是得心应手——没有人能阻止他的革命然而，毛泽东也深知：只有让农民自己起来，自觉地革命（而不是被迫），才能使这种革命成功。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让农民从思想上认识到他们痛苦的根源，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是谁，对敌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因此，毛泽东在故乡作了极为细致的工作。他所完成的主要使命，也是1925年他取得的最大成功即是唤醒了民众，农民在他的呐喊声中振奋了，由庞叔侃、毛福轩、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等人领着，向封建的制度烧起冲天大火。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全中国范围内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绝不可能容许“国中之国”的存在；一个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它必然进行本能的反扑。

毛泽东在故乡的“扇风点火”，不但激怒了本族内家族制度的维护者（如“四大扇”：毛鸿初、毛崇圃、毛明德、毛吉臣），更引起了韶山当地政权的把持者成胥生的恐慌。

成胥生，原名绥生，名曰猷，字叔升。此人即大官僚、大地主成涤泉的小儿子。其父在陕西绥德任知州时，和小老婆崔氏（成涤泉共有七个妻子）生了他，故名“绥生”。父亲在任所贪污救灾款数十万两白银，回乡后置田12000多亩，分成6份，三兄弟、三儿子各一份。成氏家族成为韶山首富。

成胥生凭借老子的威权和万贯家财，当了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即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把持乡政，始于1913年。他有枪械二、三十条，又利用姻亲，找了湘军师长叶开鑫做靠山。自订田息鸡、田息草、田息肉、壮丁费、身份证费、草鞋费、救国捐、烟灶捐……一二十种苛捐杂税，盘剥乡民。

成胥生，便是韶山封建制度最强硬的支撑者，毛泽东的最大敌手便是此人。

虽然成胥生与张敬尧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毛泽东深知“地头蛇”的狠毒，所以他回乡后便十分谨慎地从事。正月里，他借拜年之机，走东访西，了解民众疾苦，又籍此办农民夜校，启发觉悟，再组织农民协会，雪耻会，由秘密到公开……

成胥生终于明白：韶山冲的毛润之，矛头所指，正是在摧垮他的团防局，再捣毁他们成家以及其他大地主的庄园——他感到了巨大威胁，于是写了一封信，密告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赵省长便令湘潭县团防总局派兵往韶山捉拿毛泽东。

毛泽东迫于赵恒惕的追捕，离乡“问道入粤”。在广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此后一年多，除从事国、共两党的党务工作外，中心活动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故乡7个月，给他提供了最切近、最新鲜的素材，加上1910年前的17年，则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的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创立了他的农村革命理论，代表著作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等。他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借此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传授给各地的农运骨干，并使之在新的实践中受检验与发展。随后，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委书记，与党中央书记陈独秀有了意见分歧，分歧的关键即在农民运动是否过火，是否需要加以限制——但他不愿作无休止的争论，他以实地考察来维护农村革命的声誉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回到湖南长沙，20日，他在欢迎他的大会上说：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

确实，此次回乡，毛泽东再无须以“养病”为名了，他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于1927年1月开始了他的实地考察。4日乘船到了湘潭城，5日到达银田寺。

在银田寺白庙那一棵古银杏树，他连夜召开群众座谈会，帮助农民协会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

6日，到了清溪寺。这一座千年古刹，观音菩萨，关圣帝君，牛头马面，二十四位诸天、十八位罗汉……不再受到农民的顶礼膜拜了。7日，他在韶山冲毛震公祠和毛鉴公祠这样说：

“有人讲，近一年来，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我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农民，把压迫了他们几千年的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过去，大家信八字，信风水，希望老人死后埋个好地方。民国十四年，我回来，一些人讲：你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闹起来啦，

只几个月，土豪劣绅一齐倒了台。难道我们一下交了好运，坟山一下子贯气了么？巧得很！乡人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得很，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都不曾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农民闷了成百上千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被毛泽东吼出来了，农民想干而不敢干，或者没有干成功的事，由毛泽东领头干得轰轰烈烈了！

毛泽东带着农民，不但彻底打破了家族界限，破除了佛神、迷信，而且组织了农民武装，公开地与土豪劣绅开战——银田寺杀人刽子手，团防局长汤峻岩被处决，保产党头子张茂卿呜呼哀哉，成胥生也被吓得上了西天……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公开亮出造反大旗，发动秋收暴动，建立了以井冈山茨坪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这个时候，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内容已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关山远隔，梦魂常索。乡情人情，鸿雁频传毛泽东难了之情

1927年1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以韶山为实地考察的第一站，由毛福轩和表兄文润泉陪同他走村串户。这次离开韶山，竟一别30多年没有回返。

此后，关山远隔，行所无定，战事频仍，音讯难继。一有机会毛泽东便打听家乡的事情，同亲朋故旧取得联系。1937年，表兄文运昌听说毛泽东和红军到了延安，便趁长沙学生莫立本投奔延安之机，托他给毛泽东带去一信。毛泽东终于与家乡取得了联系。他激动之余，立即给表兄回了封热情洋溢极富情理的长信。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有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

虽然如些，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坵诸位兄嫂侄子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七日

拳拳之心，依恋之情，全在字里行间。但是，山河破碎，大敌当前，毛泽东只能把这种感情深埋心底或付诸笔端。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的部队开进韶山，毛泽东的家乡解放了！10月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韶山土音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韶山人民获悉，奔走相告，欢喜若狂。一封封书信像雪片一样，带着父老乡亲对领袖的敬仰和祝贺，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关怀，带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热爱，飞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住处。

面对堆积如山的家乡来信，毛泽东逐一地阅读着，批划着。乡亲们的乡间俚语，勾起了他的缕缕思乡之情，他遥望江南，如见故土，如见故人，心潮翻滚，百感交集。此时此刻，毛泽东多么想回家乡看看啊！但是，江山初定，国事繁重，正如他给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所说：“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他殚精竭虑，操劳谋划，根本没有时间南下省亲。然而，工作最繁忙，也不能没有回信，否则，对不起诸亲友！对不起父老乡亲！毛泽东铺纸泼墨，一一复信。

表兄文运昌曾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流落湖南安乡等地，以教书为业，亦事农桑，当他欣闻润之表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老人高兴得老泪纵横，赶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去信，一方面向毛泽东报告他们文家昔日的悲惨遭遇，一方面向表弟表示由衷的祝贺。信中称颂“大哉主席，巍巍乎，荡荡乎，德并禹汤文武，风高宋祖唐宗，钦佩之至，障仰之至！”随后，文运昌又连上几书，追忆旧时交情，反映乡间情形，关注主席的有关情况。

收阅文运昌的信，毛泽东欣慰莫名，但他仍以国事为重，直到从苏联出访归国后的1950年4月19日，才深表歉意地给表兄复信。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来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他思亲心切，担心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住老家的表兄弟，多次询问文运昌的情况。1950年5月7日，他在致表兄文润泉的信中询问道：“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5月12日在致表兄文南松的信中，他又一次询问道：“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直到后来文运昌复信给他，毛泽东才放下心来。

就在给表兄文运昌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还有两封信致湖南的亲人，一封是写给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去年十月十二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一封是写给湖南华容的姑表弟贺晓秋。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在外家表兄文运昌给毛泽东写信祝贺的同时，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从报上看到毛泽东任职的消息，心潮澎湃，高兴万分，他夜不能寐，文思泉涌，以《导师颂》为题，作七律十首，其中两首诗云：

其一——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弱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失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逾道。

其二思想行为自得思，开诚领导广推为。

成军百万皆精炼，立法三章更创奇。

人道信心遵马列，谁知济众媿牟尼。

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毛宇居另写了一封颇富热情的信，并诗作一起寄给毛泽东，以示诚挚的祝贺。毛泽东收阅后，趁毛泽连、李柯由京返湘之机，捎去了回信，虽寥寥数言，却表达了对毛宇居及其他父老乡亲 and 合族同宗的关心和问候。信写道：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合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封封散发着翰墨清香、勾画着那独特神韵的信笺，带着毛泽东的拳拳赤子之心，像鸿雁一样，频频从北京飞向韶山，飞向三湘四水，毛泽东通过“鸿雁传书”，探知乡亲们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以此作为体察民情、了解国情的一条重要途径。他还随信汇去一笔

笔稿费，解决了不少乡亲们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其他力所能及却又不违反原则和纪律的问题。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表兄文润泉：“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托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当他得知文家不少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时，随即寄去了一些钱，聊以救济。

5月8日，毛泽东又致信毛逸民：“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以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毛泽东十分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邹普勋是毛泽东发蒙塾师邹春培的儿子，住南岸，他们既是同窗，又是邻居，到解放之初，邹普勋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毛泽东得知，很是牵挂。1950年5月15日，他接连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写给毛宇居的，信写道：“迭接数函，极为感激。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第二封是写给邹普勋的，请毛宇居转交“为祷”，信中说：“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第二天，毛泽东又给自己的老邻居毛爱桂写了一封信：

爱桂先生：

来信收到，令兄爱堂于1927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他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

此复，并候合家清吉！

毛泽东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毛爱桂家是毛泽东祖上从东茅塘搬到上屋场来定居时的第一个邻居。1925年2月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时，12岁的毛爱桂经常为毛泽东在家秘密集会站岗放哨，大哥毛爱堂是农运骨干。这年底，毛爱堂离开韶山，追随毛泽东前往广东，从此以后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毛爱桂才向毛泽东写信打听其大哥的下落。毛泽东没有忘记邻居一家，5月中旬打发岸英回乡省亲时，便交待他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隔壁邻居，在岸英离京赴湘途中，毛泽东写了这封信。

毛爱堂烈士抵达广州后的履历，由于解放初年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民政部门未予登记，毛爱桂因而没有得到烈属应有的待遇，于是，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阅后将信批转到了湖南省委，由于有毛主席作证，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毛泽东对老邻居的深厚感情更体现在解决其生活困难的问题上，1952年，毛爱桂眼疾严重，已近失明，老伴有病，儿子泽林才14岁，家里生活苦不堪言。在此情况下，他只好又向毛泽东写信求援。没有多久，毛爱桂便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中说：“要你儿子出来搞一点随时随意的工作，我亦十分高兴，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这样，毛泽林通过组织部门的介绍在株州参加了工作。

毛泽东对毛爱桂一直关怀备至。1954年秋，邹普勋应邀到北京与毛泽东叙旧，毛泽东问及毛爱桂一家的生活状况，并托他带回4丈衣料给毛爱桂。1955年毛爱桂还应邀去北京，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

张友成是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朋友。1951年9月他进京见到了毛泽东。

回乡后，他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常写信去北京，反映乡间情形。1952年夏，韶山一带出现粮缺猪贱等情况，乡政府为节约粮食，禁止村民酿酒，张有成平时嗜酒，因而将上述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于1952年7月7日复信：“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缺猪贱，近月好些否？……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以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7月11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毛宇居：信中再次提到这件事，“……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闲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征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1952年，毛泽东六婶病故，堂弟毛泽连又腿摔骨折，毛泽东对此非常关心，几次写信给毛宇居了解情况。在这年10月2日的信中，他写道：“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新币一元——引者注），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信中还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视钱财轻，视情义重。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对去北京作客的堂弟毛泽连深情地说：“在战争年代，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为了保护我，保护我的家，吃了很多苦，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忘不了他们。”对这些乡下亲友，毛泽东希望他们与众乡亲一样，听党的话，遵纪守法，在生活上则关怀备至，解囊相助，他常随信寄去自己的稿费和工资，帮助贫苦的父老乡亲，在毛泽东的文稿书信中，记下了如下赠款数字：

1951年11月15日，托毛宇居一次性带给韶山故交谭熙春旧币200万元，邹普勋100万元，堂叔母六婶100万元，邻居张四维和毛华珠衣料各四丈。1952年12月21日，给湖南省立一中的老同学易南屏300万元。1954年10月19日，给韶山私塾时的同学郭梓材300万元。1955年2月10日，给湘乡东山学校的老同学毛森品200万元，5月1日给张四维200元（新币）……没有“入帐”的更是不少。

书信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领袖和乡亲的感情紧紧联结在一起。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给湖南的亲朋故旧和父老乡亲亲笔回信200多封，其中写给韶山的近100封，有时一天多达四五封，给毛宇居就达10多封，乡亲们的一切都萦系在毛泽东这位韶山赤子心头，每一封信，都饱蘸了他对故土的一片挚爱深情。

四、1950年，一位高个男青年来到韶山，说：我奉爸爸之命来拜望各位……乡亲们热情接待了这位“王子”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忙于筹划建国大计，一时无暇回乡看望，除自己写信，还特意委派他的长子毛岸英回韶山探望父老乡亲。1950年5月26日，毛岸英乘车由长沙到达湘潭县七里铺，然后下车策马，沿着他父亲走过无数次的那条乡间土路，向西北方向走去。或许，他对这一幕已记不清了：1925年正月十四，他不到3岁，由父母、叔父带着，在湘江边上，坐了云湖驳子，溯涟水而至湖江口，上云湖河——那条发源于韶山山脉的河。他的弟弟岸青，倚在母亲温暖的怀里，依稀于梦乡中感受着水的流动；而他，好奇地爬到船头，坐在泽民叔叔的膝上，看这河，看河弯弯曲曲，看河倚山，看河傍村，看广阔的原野和原野边缘的青山……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岸英再度回乡。“爸爸，我已按您的吩咐，回到您阔别了23年的故乡一阵春雨淅淅沥沥洒下，好似饱经磨难的母亲迎回了飘泊在外的游子，雨滴是热泪。岸英从袋子里翻出一件旧雨衣披上，脱了鞋，牵了马，向韶山冲走去。韶山冲的人们，热情欢迎这位一身农民打扮的“王子”——他们从他的身材上能寻到毛泽东，从他清秀的面庞和单眼皮上能寻到杨开慧的影子。夜深了，人们都走了，岸英就在毛鉴公祠躺下来。次日，他到了父亲的上屋场的家里，他曾随父母在这里住过7个月，接着又到了祖居地东茅塘。之后，翻山过坳，到了外曾祖家唐家坵。关于到唐家坵的情景，在文凤良著的《毛岸英唐家托省亲记》中叙述道：

1950年5月，身受父命来看望韶山乡亲的毛岸英同志，身着深蓝卡叽布服，在省委交际处联络科毛远翔同志和湘潭县毛特大同志的陪同下，各自牵着一匹遍身赤色的高头大马，踏着矫健的步伐，沿着滴水洞的山路，经滑油潭，翻过八亩田坳上，跨过七亩坑和龙潭托，直达大坪唐家坵外婆家看望各位亲朋戚友。

一串串清脆的马铃声，惊呆了唐家坵的男女老少。当毛岸英迈步跨入唐家坵地坪时，毛远翔和毛特夫老少挥臂喊道：“毛岸英同志来了！毛岸英同志来了！”

文润泉、文运昌、文枚清、文南松等几位老人急步迎上前去。随后，文伴香十阿婆，运昌十六阿婆，枚清十七阿婆和南松廿阿婆，以及他们的子侄文孝根、文九明、文炳璋和笔者，还有唐家坵西头的老少，共约40多人，一齐蜂拥上前……岸英一一与之亲切握手，然后由大伙簇拥着步入唐家坵正厅。

“今天我是奉爸爸之命，特地从北京前来拜望各位伯伯、伯母的，向各位伯伯、伯母请安的。”

正午时分，由文南松、文运昌、文润泉、文枚清和文伴香十阿婆等五家合办的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便宴，张罗就绪，岸英一行在各位老人和我的陪同下一同入席，共进午餐。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相祝酒，大家异常亲热。酒过数巡，文润泉老人笑中含歉地说：“按照我们的风俗，招待贵宾最时兴用蛋糕席，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到过，现在已是中外闻名了，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备办，真是深为抱歉啊！”岸英欠身答道：“诸伯过谦了。”他指着席上的肉炒小鲜笋片和肉焖时鲜嫩蕨以及肉炖于香

菇三道菜说：“这些就是道地的山珍了，美味胜佳肴吧，在北方是很难尝到的，加上这肥鸡鲜鲤，已经是最丰盛的了，诸伯如此用心，小侄就不敢当了。”

午餐后，岸英步入文润泉等老人的卧室。

少顷，主人举行了一场别具情趣的茶点会，由文南松等五位老人拼凑起来的十余样自制的茶点，诸如醋浸藟头、大蒜、刀豆、蒜条和精心晒制的紫苏、梅子、山楂饼、盐姜、盐菜以及临时炒出的花生、黄豆、芝麻、南瓜子、红茹片等，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毛枚秀先天从她娘家滑油潭八亩田和七亩坑的山谷中采摘的一大盆鲜红发亮的酷似杨梅的草莓子和状如鹅卵的白色大茶阿苞，琳琅满目堆集一大桌，桌边摆满了清香扑鼻的芝麻豆子茶。

文润泉老人满怀激情地叙述了毛主席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动人心弦、情趣横生的故事……

文南松和文运昌两位老人又将冒着“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的危险，精心珍藏了近三十年的毛主席父母亲的遗像，毛主席兄弟分别和父母亲的合照以及1915年毛泽东的亲笔还书便条，1937年毛主席给文运昌的五页长信，一并交给了岸英……

时过申刻，灿烂晚霞发出万丈光芒，把大坪的山水染映得通红通红。岸英在毛运翔和毛特夫的陪同下，依依难舍地向亲人告别。他们牵着骏马，经樟木冲、黑石寨，从芭蕉潭过坳，经滴水洞返回韶山。这是岸英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唐家托就这样，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托，探访了久别的故乡，又把韶山的情形带到了北京。他刚刚回到父亲的身边，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9月，“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推进，战火燃烧到中国东北边境，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遭受侵略的威胁。这时，毛泽东几十年养成的英勇无畏和深谋远虑，再度表现出来，他终于巨臂一挥，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的故乡，也又一次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战歌，韶山人捐献了一架“毛泽东故乡号”飞机，又有大批热血男儿走上沙场，到1952年，50名韶山优秀男儿把最后一滴血洒到了那片热土上。5月的韶山之行，成了毛岸英与韶山的永诀。10月，他随彭德怀司令员首批跨过鸭绿江，11月25日，他被美军飞机的燃烧弹炸中……毛泽东，在他成为共和国主席之后，经历了他个人生活中自失母、失妻以后的又一次巨大痛苦。但，这位巨人以他惊人的毅力和克制挺过来了——他知道，毛岸英已不只属于他，而属于人民，儿子，不过是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人……

五、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迎送了一批批称兄道弟的故乡客。还指着坐于上席的三老对女儿说：你们得叫太老师呢……

1949年10月的北京，艳阳高照，金风送爽，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喜迎建国后的第一批家乡来客：一个是堂弟毛泽连，他与毛泽东同一曾祖父，也是毛泽建烈士的胞弟；一个是姑表弟李轲。他俩代表家乡人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派人护送专程进京看望毛泽东。“主席三哥！”“表哥！”毛泽连和李轲用不同的称呼唤着毛泽东，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他们握手问候。兄弟之间久别重逢，分外高兴。毛泽东对客人关怀无微不至，派女儿李敏、李讷姊妹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见毛泽连眼疾严重，派儿子岸英、秘书田家英送他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治疗，并且亲自过问治疗方案。动手术前，毛泽东关切地问堂弟：“泽连，医生讲，为治好你的右眼，必须挖出已经坏死的左眼珠，挖掉之后，可以换只假的。”“可见光不？”毛泽连问。“不行，只保不破相。”毛泽东答。“那又何必浪费钱呢？”毛泽连说。

听了堂弟这样朴实的话，毛泽东心里很满意，也更加动了怜悯之心、爱护之情，对他更是体贴入微。住院一段时间后，病情有所好转，毛泽连要求出院，医生不同意，转告毛泽东，毛泽东打来电话：“暂时出不了院，要好好休息，以后还要做手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毛泽连的右眼总算保住了一丝光亮。李轲也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在另一家医院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痔疮。不久，两人高高兴兴地回到韶山。

1950年，表兄文枚清等进京看望毛泽东，叙谈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他讲到毛泽连的困难，当时，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3个孩子，眼睛又不好，家底又薄，大家认为毛泽东的亲属中要数毛泽连最困难。毛泽东听了，亲切而认真地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也不光只泽连一个人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会尽力资助点。”

以后，毛泽东时常写信了解毛泽连的情况，并从自己稿费中开支，委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连续十余年给毛泽连寄上二百到三百元不等的钱，帮助他度过困难，直到1962年湘潭县民政局把毛泽连作为烈属予以抚恤为止。

1951年9月，毛泽东派人到韶山，接塾师和堂兄毛宇居进京。应邀同行的还有外祖家老表文枚清、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张友成。9月23日抵达北京时，毛泽东已派车在火车站迎候。当晚，毛泽东留家乡客人在他住处共进晚餐，还将儿子岸青、女儿李敏、李讷叫到跟前，一一给他们介绍，说：“这是从韶山家乡来的，是你们的伯父，快行礼。”

毛泽东搀着毛宇居走进饭厅，歉意地说：“没有好菜吃，很是对不起。”毛宇居笑着说了句韶山俚语：“人意好，水也甜嘛。”

毛泽东右手扶着毛宇居，左手拉过一把椅子，请毛宇居坐上席。“不合适，不合适。”毛宇居连连摆手，诚惶诚恐地说：“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使不得。”

毛泽东笑道：“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坐上席，是应该的。”“岂敢，岂敢！我愧为人师，主席主席，当然应该坐上席。”毛宇居还是不肯。

“那是在平日开会或出席重要宴会，今天是在我家里，我们都是韶山冲的。”毛泽东坚持要让毛宇居坐上席，说：“这里没有外人，数你年纪最大，你应该坐上席。”

几番推让，毛泽东硬是让毛宇居坐了上席，他还念叨着《增广贤文》上的两句：“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毛泽东一边与客人拉家常，一边斟酒敬菜，询问家乡的有关情况。

毛宇居一行住在中南海外边的招待所里，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仍不时派车接他们进中南海，抽出很多晚间叙谈，谈家乡和一些老人们过去发生的事情，谈他自己的读书生活，谈国民党挖他的祖坟……宾主谈笑自若，难舍难分，有时竟不知不觉到天明。

10月1日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毛宇居等人送去观礼证，请他们参加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出席国宴。随后，又派人陪他们游览北京名胜，还特意安排他们到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和已收回的外国领事馆，让他们感受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

在京期间，毛泽东见天气渐冷，于是给每人买了一件皮大衣、一双皮鞋。他看到毛宇居牙齿不好，吃饭不便，便派秘书陪毛宇居到医院换了假牙。

1952年冬和1958年，毛宇居受托两次进京，请毛泽东题写韶山学校和湘潭大学校牌，均受到亲切接见，如愿以偿。

1952年9月，韶山师友李漱清、邹普勋和毛泽东在省立一师范时的校长张干、教员罗元鲲不期一同抵京，应邀前去拜会毛泽东。9月26日，师友重逢，惊喜交集。

李漱清年逾古稀，与毛泽东分别20余年，如今他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皇上”，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他抿着嘴微笑着，全然没有当年两人间那种“激进”而随意的书生意气。

“你们来了几天啦？身体好吗？”毛泽东伸出手来让四位师友入座，问道。

“主席，我有点害怕！”李漱清讷讷地说。

“老朋友，随便一点，怕什么？”毛泽东笑容可掬。

“见了皇帝老子，我心里就慌！”

“如今还有什么皇帝老子，皇帝老子也是人嘛！”

毛泽东的随和让4位师友感到轻松而愉快。接着，毛泽东又对李漱清说：“我小时候受到您的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李漱清谦虚道：“哪里，那时我不过是个‘过激派’落魄文人而已。”

不一会，毛泽东把李敏、李讷等孩子们喊了出来，说：“你们平时讲，你们老师如何好，如何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呢！”他又诙谐地说：“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大老师。”他的风趣把大家都逗笑了。

只有张干的脸上显得有些忐忑不安。1915年，毛泽东曾不满张干的“统治”，率领学生反对他，闹起了轰动省城的“驱张风波”，张干十分恼怒，下令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但由于受到进步老师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的极力反对，毛泽东才免于开除。后来，张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得知他生活贫困，曾寄钱予以接济。想到这些，张干眼睛湿润了，他终于向毛泽东说出了已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主席，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

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接着引用这句古诗，说：“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呀！”

毛泽东诚恳的话语使4位师友感动不已。

中午，毛泽东用湖南风味招待四位师友，席间，频频为他们夹菜敬酒。饭后，亲自陪他们参观中南海、观看了电影。晚上，毛泽东派人给住在饭店的师友每人送来一份礼物：盖被、褥子、布毯各一床，枕头一对，枕巾、面巾各一条，还有袜子、香、肥皂、牙刷牙膏等。

毛泽东还派人陪他们游览北京名胜，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大夫为他们检查身体，并请他们出席了10月1日阅兵式，在天安门上观看了国庆节焰火。临别时，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饯行，合影留念。毛泽东的师友之情在4人心中留下了美好难忘的纪念。

1955年4月，毛泽东堂弟毛泽荣、表侄文炳章和烈士毛新梅的弟弟毛先梅一同来到北京。次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家乡来客，中午，在丰泽园为客人设宴洗尘。桌上备的是几样家乡菜：一碗湘笋炒肉，一碗青椒，一碗豆角，一碗雄鱼汤，外加一个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

宾主寒暄一番后坐定下来，毛泽东先给乡亲们敬了一杯酒，然后共进午餐。家乡菜既简朴，又合口味，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吃饭的习惯与众不同，他吃了几口饭后，又给大家敬酒。

“主席，我们都吃饭了。”韶山农村的习惯是饭前喝酒，吃饭后便不再喝。乡亲们遵循老规矩。

“饭上加酒，哪里有？”毛泽东说了一句与家乡风俗相悖的韶山土话。接着，他又给每人敬了一些肥腻腻的红烧肉，乡亲们谦让着，毛泽东又笑着说了句家乡土语：“烧酒子怕肥肉子，随便吃吧！”

大家被毛泽东的风趣逗乐了，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谈笑，气氛非常愉快热烈，就像平常在自己家里团聚一样。

“主席最喜欢吃什么菜呢？”毛先梅好奇地问起毛泽东的嗜好。

“主席三哥最喜欢吃红烧肉。”毛泽荣1953年来过北京，多次和毛泽东同桌共餐，已经了解了毛泽东的不少喜好，他抢着回答。

“主席有空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文炳章说。

“那好，那好！”毛泽东很兴奋，略一停顿，他随意问道：“你们现在条件好了，能经常吃到肉吗？”

这可把乡亲们问住了，大家沉默着，半晌没有做声。事情一言难尽，毛泽荣写信要求来北京，原本就是要来“告御状”，可“主席三哥”今天情绪这么好，现在该不该向他讲呢？生性直率的毛泽荣终究有话憋不住，他首先打破了沉默，令毛泽东大吃一惊：“主席三哥，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冒得吃哩！”

当时，全国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粮食普遍增产增收，但是，为了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成，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规定每个农民每天定量1斤外，其余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1斤米对于一个作田汉来说，一餐还凑合，一天哪里管用？加之一些农户吃粮没有计划，到4月青黄不接的时候，韶山有40多户人没有饭吃。

毛泽荣向毛泽东如实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深感问题严重，当即打电话请在家的中央领导人来听取毛泽荣的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办法，并在来年

的工作中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50年代，毛泽东多次给韶山亲友写信，请他们带着乡间急待解决的问题材料进京，交待他们是“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但是，当地有些干部出于某种考虑没有这样做，乡亲们到了北京，只好据自己所知，如实向毛泽东反映一些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毛泽东勉励他们说：“你们放肆讲，你们的意见好，我作参考；你们的意见不好，就只我一个人听了。我不是韶山冲里的主席，我是全中国的主席。你们每年写一封信来。给中央办公厅写，我收不到，就给王季范写，由他转交给我。”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同样波及了韶山。毛泽东邀了毛泽东表弟文东仙从韶山出发，再次进京告“御状”，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们两人，高度重视了他们反映的不正常情况。就在毛泽东汇报情况一个多月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指示坚决纠正“共产风”，坚持按劳分配，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又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纠正。”翌年3月，毛泽东派胡乔木率中央工作组作实地调查研究，不久，韶山乃至全国的公共食堂被陆续撤销。

通过进京来访的故土亲友了解乡间情形，明察下情，是毛泽东走群众路线，改进党和政府工作偏差和失误的特殊工作方法。毛泽东总是不放过任何一次家乡亲友来访的机会，向他们详细了解各种乡间情形，并对桑梓之地倾注了无限深情。

1956年10月，表兄文运昌、文润泉、文枚清等征得毛泽东同意，又一次从家乡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作客。一见面，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别的，是想从你们身上了解农村的有关情况。”

当时全国合作化运动已进入高潮，翻身农民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毛泽东问文润泉和文枚清今年粮食收成情况怎么样。文润泉说，“今年粮食是丰收了，但六月（指古历）天冒下雨，干得要死，到处都车水抗旱，累就硬累哒。你晓得的唐家坵前面六亩滩那丘有名的干鱼脑壳田，要五六梯水车才车得上水，好多人屁股都磨起了泡！”

毛泽东被乡言土语说笑了，向站在一旁的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听到了吗？这是从书本里学不到的！没有农民种田，我们就冒得饭吃。”接着，他又问道：“乡里组织入社的情况踊跃不踊跃？你们都入了社吗？农民对政策有不有反映？是好还是不好？”

文家兄弟众口一词：“都很好，一声号召，全都入了。”

毛泽东听了家乡的喜人变化，心情十分愉快，又发出了一连串提问：乡里还有不有种油菜和拖泥豆的习惯？农民想不想喂猪？仔猪、架子猪和肉猪的行情分别怎么样？……问题很多，也很细，文家表兄逐一回答。

毛泽东还记起儿时从韶山冲到唐家托外婆家，过滴水洞后要经过一个叫芭蕉潭的地方，那里有一片油茶林，问还在不在。当他得知还在时，高兴地说：“还在就好，油茶栽一次管用几十百把年，一劳永逸，不像油菜每一年种一次。油茶要大力发展。”毛泽东谈兴很浓：“韶山山多，要靠山吃山，还有棉花和苧麻，农林牧副渔都要发展，只有稻谷加稻草就不好。”

毛泽东还问乡下春节还要不要龙灯、狮子灯，并说：“初一崽，初二郎，

初三初四拜团坊。从前一个保一个庙都有灯，早的初一，晚的十一，都会出来玩灯，那才热闹啦！”他沉浸在青少年时代难忘的回忆中，然后说：“闹新年、闹元宵，玩龙舞狮，是农民的一种娱乐活动，还可以锻炼身体。”

会谈在十分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不觉到了晚餐的时候，毛泽东留客人一起用餐。客人们感到这一餐比往年那几次要丰盛，席上除了一般的荤菜和蔬菜外，还特意上了海参，备了茅台酒和葡萄酒。

“今天冒办别的菜，就是有点海参，大家多吃点。”毛泽东说。韶山客人以前只听说过海参，乡里最好的席面是“蛋糕席”，“海参席”是他们心目中最丰盛最高档的筵席，今天有幸吃到，大家很是开心。

谈笑间，毛泽东问：“仙女峰那个庵子还在不在？”

仙女峰是韶峰的别名，半山腰有座“仙女茅庵”，其周围有名之曰韶峰四绝的飞来船、四方竹、白石泉、六朝松等名胜，是韶山八景之一。毛泽东少年时代随母亲去进过香，至今记忆犹新。文枚清告诉他庵子还在，只是有些破旧了。

“我还想上去看看哩！回韶山，我一定要去爬仙女山。”毛泽东爽朗地笑道。

“好啊，主席。我们接您，陪您一块去。”

“那好，我们来个登山比赛，看哪个爬得赢些。”毛泽东心情十分快乐。

秋天的北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文运昌一行于10月初进京，因毛泽东工作太忙，直到10月底亲人们才得以团聚。毛泽东见他们穿着单薄，饭后叫秘书请来裁缝，给每人定做了一套棉衣棉裤。11月8日，毛泽东为亲人饯行，又从自己稿费中开支，让他们为唐家托生活贫困的亲友带去1千多元救济款。临别时，毛泽东对在部队工作的堂弟毛泽全说：“泽全，你不是在华容、安乡做过长工吗？你明年秋收后到那里去。”又对在中南矿冶学院工作的表侄文凤良说：“凤良，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你明年放暑假回去走一趟。”然后郑重吩咐这两位年轻人：“你们下去后要详细了解一些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包括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和牢骚，再来向我报告。”

毛泽东热情邀约乡亲们进京，据统计，从1949——1965年间，受到毛泽东邀请或征得他同意上中南海丰泽园作客的韶山乡亲达60余人次，其中毛宇居、毛泽连、毛泽荣、文运昌、文润泉等前后去过很多次。每一次，毛泽东无一例外地以礼相待，但这并不能了却他的思乡之情，尽管工作繁重，他仍无时不想抽空回到生养他的故土走走、看看。1958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塾师毛麓钟之子、时任湖南省计委副主任的毛泽普在会议期间到丰泽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向他悄悄透露了自己的心愿：“泽普，我一件事情要托你办一下，你回去后告诉你们省委书记周小舟，我准备回家乡看看。住的地方简便一点好，有个卫生设备就行了。”毛泽普一听，高兴极了：“好啊，乡亲们早就盼着您回韶山冲呢！”

六、三十二年后，领袖还乡，没有煊赫的车马仪仗，只有游子的诚朴和童心旧情

自 1927 年 1 月，毛泽东视察罢这里的农民运动，最后离别韶山，直到 1959 年 6 月 25 日，也即建国 10 周年前夕，他才抽出余暇，又投入了故乡的怀抱。这一别就是 32 年。

关于这次回乡，多有文献介绍，我们只来着重看一看毛泽东三天行踪中一些耐人寻味的细微之处：

单身只影。随同毛泽东到韶山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书记王任重、周小舟、徐启文，但没有一个亲人——当他坐的小车一进入银田寺，他让司机放慢了速度，他是不是想到了一幕往事？34 年前的 1925 年，他、他的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合家回乡过元宵节，那是多么的温馨……可是，现在，当年在银田寺一同上岸的 5 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了，即他和多病的幼子岸青，而岸青却没能同来。

但是，他在沉思与伤感中依然感到踏实，因为，他的面前，是一派喜人的景象：已开始黄熟的稻子在夏风里荡起千重浪万顷波，农民，在田垌中平和而安闲地杀草，扯稗子，开沟排水，人民的幸福使他忘却了个人的哀愁……

拜谒父母。毛泽东回到韶山冲，在与毛氏宗祠一水相隔的卢家湾松山 1 号安顿下来。26 日清晨 5 点，茂密的林子里，鸟儿啾啼，除此之外，一切静谧如画，毛泽东独自悄悄起来，走向父母安眠的地方，他走了好远，人们才追出来。

象鼻山上，曾被何键士兵烧光的树木，柴草又长了起来。在灌木丛中穿行了近半个小时，他到了父母墓前——这两位操持了一世的老人，如果还在世，该分别为 89 岁和 92 岁了。

毛泽东一生中一桩憾事，也许是他认为对父母没有尽到孝心，两老临终，都没有见到长子。现在，当毛顺生、文七妹两老的 66 岁的儿子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在天之灵当会理解儿子的一切了——尽管他们牺牲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两个孙子，但他们仍旧会为儿子建立的伟大功业而骄傲。

毛泽东深深地向父母鞠躬，又将一把松枝插在坟头，盖住坟顶上那个大洞眼，说：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乡情亲情。毛泽东从父母墓地下下来后未径直往上屋场去，他慢慢踱到土地冲最里端的李家。毛泽东少年时上山看牛、砍柴，总要到这户邻家玩耍。他在这里坐了好一会，他问到人们的吃饭问题，深为温饱之虞忧虑。即使对“四大扇”亦流露出可怜之情。原来，1925 年毛泽东在故乡闹农民运动，触犯了本家族内一些士绅的利益，被称为“四大扇”的毛棠圃、毛明德、毛吉成、毛鸿初，与毛泽东势不两立，甚至向成胥生告密，为许克祥、何键的士兵带路，捉拿毛泽东。当他听乡人说 4 个人中只剩了毛鸿初仍在守庙，其余都死了时，便叹了口气。在李家，毛泽东还见到他最近的邻居、儿时好友、南岸同学邹普勋的儿子，但邹普勋本人却已去世了，毛泽东忆起往事，说：

“好久不打牌了。过去，我经常和你父亲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呢！”

毛泽东与众乡邻合了一张影。

在上屋场。从遥远的北方“紫禁城”来的毛泽东，站在这栋土砖青瓦的凹字形建筑前，格外感到一种温馨。17 岁以前的岁月，跨过清代光绪到宣

统两个皇帝统治时期，上屋场是一本暗色封皮的书，写满了毛泽东童年、少年的喜怒哀乐；这部书的作者，便是祖父、祖母、父母、弟妹和他自己。

场面颇有些特别：韶山冲各姓氏的人们站在地坪里欢迎，毛泽东在自己家门口倒成了客人。

毛泽东走入上屋场的大门。他站在堂屋里，望着墙壁的神龛出神——那儿曾有供母亲信奉的观音和父亲信奉的财神以及毛家的列祖列宗。

到了灶屋，毛泽东凝视着里面的陈设：弧形的土灶，黑色的饭锅、菜锅、木盖的瓮坛，呆头呆脑的瓦壶，方形的地炉，长板凳、碗柜子、饭篮子、茶叶篓子、水缸……每一样东西都让他忆起与父母、弟妹朝夕相处的日子。

在父母的卧室，他呱呱坠地的地方，伫立在父母像前，眼睛湿润了……他深情地抚摸着架子床，大布青纹帐、蓝色印花被……

在他自己的卧室，他也伫立了好一会。

之后，慢慢地出了大弟弟泽民的房间，便到了屋后。

一颗童心。毛泽东离开上屋场，由一个小学生领着，顺了塘边柳荫下的小径，经过他读过私塾的地方——南岸，到了一座小桥上。

在这位巨人的脚底，溪水清清亮亮地潺潺穿过，绕到韶山嘴下，继续往东北而去。几缕炊烟袅起，毛泽东对着远处的仙顶峰，深深吸了口清新的空气。

一群孩童，从张家山树丛中拱出来，簇拥着他往山上走去。在操坪里，他弯下高大的身体，小学生蒋含字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系在他的脖子上——这位寻觅到了童心的老人，被一张张笑脸包围了，仿佛有无数花朵，怒放在一株伟岸的大树上……

毛泽东和孩子们笑得那么甜蜜，那么纯真，谁能想到，他在孩子们这个年龄，在南岸、在关公桥，在钟家湾、在井湾里……那些令人窒息的私塾里，哪能见到这么多笑脸！

孩子们，再也不须重复他过去的残梦了！

进祠敬祖。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走进毛氏宗祠，里头已空空荡荡，祖宗灵位早已不见，但他，还是向着原先安放毛氏家族一派祖毛太华、二派祖毛清一、毛清四牌位的地方鞠了3个躬。

是的，毛泽东不应该忘记这几位祖宗，是他们带着毛氏家族，由江西而云南，由云南而湖南，由湘乡至韶山，其间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由元末明初到清末民国初，整整500年，到毛太华以下第20代，终于孕育出这个家族乃至中华民族一位最卓越的人物。

灵泉沐浴。滴水洞、东茅塘、毛震公祠一带是韶山毛氏家族震公一房的发祥地，亦即毛泽东的祖居地。从滴水洞峡谷内淌出一弯小溪，人们在洞口筑起一座大坝而成韶山冲第一座水库，水质清淳，冬温夏凉，松、竹倒映其中，格外一种清幽。

毛泽东在震公祠前下车后，健步如飞，上了高坝，下到水里——这一湾碧潭，南有龙头山高踞，葬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北有虎歇坪巨鼓，有毛泽东祖父毛恩普安眠；滴水洞西山麓，即为毛泽东外祖家唐家坵。毛泽东便在这样一个地方轻舒猿臂，英姿大展，他时而仰泳，时而蛙游，时而潜行，时而漂浮……毛泽东整整游了两个钟头，直至暮色降临才上岸……

毛泽东非常迷恋这个地方：

“将来我老了，退休了，就在这里盖一栋茅屋子住。”

松山团圆。对父老乡亲，毛泽东一直怀着挚爱与感激之情。

6月26日傍晚，他用自己的稿费办了五、六桌酒菜，请了40多人来作客。

太阳已收起它的金箭，只留下一抹红晕，装饰着黛青色的山顶，一抹岚光，挂在松、竹、梅的枝丫。

毛泽东的私塾先生毛宇居、毛新梅烈士之妻沈素华、在南京雨花台壮烈捐躯的毛福轩的妻子贺菊英、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毛泽东童年伙伴、文氏诸表兄都来了。

毛泽东向大家祝酒。

众人举杯畅饮。

历史，真正地完成了一个大团圆……

第八章 毛泽东的思想和艺术之根

一、幼年，秉承于外祖家的性格因素和父母身上的遗传因子

毛泽东出世不久，父亲因为出外当兵，就将他寄养在唐家坵外祖父家。这对于毛泽东，是一件极其微妙而意义深远的事。因为，老天似乎有意将他的父亲远远支使开了，这就使早慧的毛泽东，在受父亲影响之先，接受了他母亲、外祖母、舅父舅母、表兄弟们的影响。与一般的人不同，毛泽东受“母系”影响是在他刚刚知事的年龄，即三、四岁时开始；而且，这种影响，是一种没“父系”——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干扰的纯而又纯的影响！

若要问毛泽东超早期——幼儿时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纯粹地浸泡在慈祥、友爱、博大、宽容之中。这种温馨，没有严厉的父亲监视和喝斥，而只有一圈暖暖的春光裹挟着……

多数人的婴、幼儿时期都是在父母交互影响下度过的。设想父亲如果没有外出当兵，而是同母亲带了毛泽东在上屋场生活，那将会是什么景况呢？

上屋场的氛围，是一种阴冷的氛围。在世纪的末日里，毛顺生感觉到了生活的巨大压力，因为，自从他随了父亲由祖居地东茅塘迁到土地冲，父子明显感到了势单力薄——父亲毛恩普身体不好，在他47岁的年龄，就将一家重担推给了17岁的儿子，而毛顺生接在手里的家业，仅仅是几间烂草房，祖父传下的几亩薄田也早被父亲典当出去了——毛顺生，陷入了生活的绝境：父亲、母亲需要他供养，他自己与妻子也需要吃饭，而且，他们还将有孩子。

毛顺生赖以维生呢？

一种极大的冷清、忧郁，甚至悲哀，已笼罩了上屋场十几年！

毛泽东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世上，而且如果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屋场度过他的婴、幼儿乃至童年时期，不用说，他会因营养的严重缺乏而体质极差，更重要的是，他也会渐渐形成那种孤僻、忧郁的性格。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人生第一步走得非常耐人寻味。他在1902年之前，亦即8岁以前，差不多都是外祖家度过的。

上文已述毛泽东外祖家人口众多。人多则热闹，热闹中又和乐，因此唐家坵的气氛是开朗的、乐观的。从最长的一辈：毛泽东外曾祖母贺氏，到最晚的一辈，表兄文运昌、文润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样一个拥有40多口人的四世同堂大家庭，能在乡村的偏僻角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农村自然经济因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大地主阶层的土地兼并而纷纷破产，唐家坵，却以40多口人，100多亩田的大家庭完好保存，而且还在显出勃勃生机！

然而，还必须指出一点，唐家坵并不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层。这是因为，它的田亩数量虽不算少，但人平均也只有二、三亩；更重要的是，文家人人都劳动，生计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双手来维持的——这是唐家坵自文作霖老人去世，贺氏领家人奋发图强以来就形成了的习惯。

那么，维系文家这样一个大而团结的家的力量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有了这种基础，才使得上屋场有可能受到它的资助，不仅是陷入重重困难的毛顺生喜得贵子的时候，唐家坵给了他很大资助，而且，在文氏坐完月子之后，才有可能带了毛泽东长期居住在娘家。可以说，一段时期里，唐家坵成了毛顺生的经济后盾，这种后盾帮助了13岁就远嫁韶山冲的文七妹和她的丈夫，逐渐摆脱贫穷，从而也使毛泽东不但童年、少年生活上不愁吃穿，而且给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读书机会。

更重要的一方面，乃是唐家坵拥有一种极宝贵的精神内核，这就是对真与善的潜在追求，勤勉、宽宏、乐善、好施便是其表现。而对于外孙子毛泽东来说，他还避免了一般中国人所难免的“正统观念”。也就是说，他在唐家坵从未感觉到他是个“外”孙，他绝没有过林黛玉住贾府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人皆言“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但是，一百年之前的唐家坵，这种观念竟然不十分明显——至少在对待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上是如此。

这种中国大家庭最优秀的品性可根究到毛泽东的外祖母。她是中国乡村的一位极常见，却又极难见的一位伟大女姓。她的身上没有那种泼妇式的尖刻、吝啬、懒惰，也较少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她自己曾领受过她的家娘慈祥的爱，便又以此来对待她的子女、孙儿，而毛泽东，甚至比表兄们更多的机会领受了这种爱。虽然这种情况也让同辈们羡慕甚至嫉妒，但，兄弟们也受了上辈的影响：天性善良与宽容。

总之，也许是因为毛泽东本人的可爱，他在他的外婆家，一律地被外曾祖、外祖、舅父、舅母、表兄姊妹视为掌上明珠。

唐家坵培植了毛泽东纯正的，属于劳动人民特有的勤劳、朴实、善良的根基。尽管这种胚芽还极其稚嫩易折，甚至于表现还不明显，但，凡是有生命的事物——动物、植物，其生根发芽状态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

好芽子不一定能长成参天巨木。但，不好的芽子绝对长不成栋梁之材。

思想与品性无法通过遗传由父母授予，但一个人的原始素质：体质、聪明度，乃至由血汁引起的性格趋向，是与遗传密切相关的。

当父母各自的两条曲线：心理与生理之线处在最高峰，而周围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状况又最佳时，他们孕育的子女一定是生理素质最好的子女。

毛泽东生来的身体素质的确是极优秀的，加以他婴、幼儿、童年时期主要在他外婆家度过，他的天性毫无压抑地得到发展，他的性格趋向也未被限制。

那就是说，毛泽东的确从小就表现出强健、聪颖与好动的特性。

从外形来看，毛泽东既像他的母亲，又有与父亲相似之处。

脸部柔和的曲线，善意的大眼睛，不浓的眉毛——一身的俊秀，极似母亲。我们看他的照片，越是年轻的时候，便越与母亲形貌接近。排开毛泽东铮铮的男子汉气概，他身上也的确存在阴柔之美。

然而，如果没有注意到毛泽东与父亲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个大错。

毛泽东魁梧的体格，是与父亲相同的——即使1919年冬，毛顺生公已遭失妻的打击而身体几近崩溃，但他的坐姿依然是倔傲的。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得了父亲的遗传。

从胆血汁来看，毛泽东表现出来的气质，有很大一部分与父亲重合——这是指的那种阳刚之气！只要仔细观察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张与父亲的合照便可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三兄弟中，毛泽民最像他的父亲，而毛泽覃最似他的母亲——毛泽东兼有父母的特点……

毛泽东同母亲的异同前文已叙述过。比较一下毛泽东与他的父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异同。

毛泽东的一生，同样体现了他父亲的主要特征。这不仅是遗传的结果，

而是后天影响造成的。这表现在，毛泽东与他父亲一样是强悍的，坚韧的，倔傲的，无所畏惧的，这比父亲表现得更明显，更强烈，更有魅力。这是因为，毛泽东将受父亲影响得来的这些气质，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事业结合到了一起——而不是像父亲一样仅仅为了一个小家，这是毛顺生望尘莫及的。毛泽东正是在与父亲的对抗之中不自觉地受父亲影响的。

首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有勇气，也有能力敢于与年龄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尊长人物作对，之所以能无视家长威权，族规族法，其根本原因，其原始动力乃是在于，毛泽东业已在外祖母家形成他的对人生、处世的最初的看法，那就是以真善美来衡量一切，尤其是以“善”与“不善”来看待事物。善的，就是对的，不善的，就是错的。在毛泽东看来，外祖母、母亲行善、助人，而父亲却是自私、利己——对与不对便已十分清楚。

这种善恶观，自然还是极朴素的，具体与直观的，远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也就是说，毛泽东以外祖家来对比自己家，以母亲来对比父亲。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毛泽东迸发了他强烈而自发的爱憎，从而产生了反抗父亲自私、专制的愿望与力量。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进一步验证了外祖家对他所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毛泽东在与父抗争中磨硕、强化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不能排除毛泽东在血汁上受到了父亲遗传因子的影响。现代生理学与心理学证实了这种影响——就是说，毛泽东的血型与父亲有交叉之处，因而其气质，先天就有交叉之处。但这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父亲为了发财，丢弃了早年他所具有的真与善（只是相对而言），他的自私、专横便强烈地表现出来，这引起了儿子极大的不满——因为早熟的毛泽东，到童年、少年时期就有了与父亲不同，而与母亲相同的爱憎观。而父子之间观点相左时，父亲便企图凭了他的尊长地位以强力制服儿子，儿子却又缺乏母亲的忍让顺从，于是以硬碰硬：宝剑，在坚硬的石上磨得铿锵作响。

其三，父子之间也并非总是无休无止的冲突。

毛顺生身上，至死保存了一些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勤劳、节俭的习性。他基本上没有不良嗜好，更无恶劣习气，他主张做人正直，他之发财，虽有自私的成份，但他的自私是相当有限的。他绝不会去干杀人亡命的事，也不会像成涤泉那样昧良心发大财。而且，他之自私，也非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一家之私——毛泽东愈到后来，愈能理解父亲的呕心沥血，实在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家人。

因为毛顺生是站在毛泽东面前，所以显得矮小了，站在当时社会一般人面前，却并不矮小。他的精神、气质、品质，实在也有许多优秀的地方。

毛泽东，在抗争中也学会了妥协。1910年的出乡关，便是抗争与妥协的统一。他愈来愈懂得：他的敌手不应当是父亲，而是许多更可恶的人。后来他才晓得，他毕生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乃是一个社会制度。

这样，毛泽东在故乡已初步形成的个性、人格、品质大大地丰富与延伸了，而渐渐形成他的独特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最初便有很浓烈的个性、人格、品质成分，所以它具有极大的魅力。我们可以将毛泽东 17 岁的年华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一）直观地，感性地接受母亲、外祖母的影响，包括个性、人格、处事、为人。这是一个朴素的、本能的低级阶段。大致以 1902 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冲为界。

（二）第一阶段的深化、延伸，由对真善美的直观、感性而渐上升至理性，即随同母亲信佛，接受佛教思想的某些观点；时间是 1902 年至 1906 年前后，即从入南岸私塾到出井湾里私塾。

（三）认识水平的提高。私塾给毛泽东以知识，他更依靠自学获得的知识，开始认识到佛教与现实生活脱节而愚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在与父亲的冲突中，他更认清了佛教的弱点，儒家的奋发进取逐渐占了上风。

（四）更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彻底抛弃了对佛的形式上的信仰）。毛麓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批儒家经史子集，尤其以真儒的人格潜移默化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最后这位私塾先生，所推行的是一种温和的儒教，因而较之毛顺生严酷而“通俗化”的儒教更容易为毛泽东接受。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从新派人物李漱清那里知道了天下形势，特别是听到了许多既不合佛，又不中儒，而是另一种崭新姿态的思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既然毛泽东已经作了上述极其充分的准备，主要是思想上的准备，1910 年秋，他便足以冲破家庭、家族、家乡的束缚，迎着时代的呼唤而大步向前了。

二、从童年、少年的萌芽期起，推证“毛泽东思想”形成之轨迹

将毛泽东的婴、幼儿、童年、少年时期称为毛泽东的“超早期”，是因为，这17年与以后的66年相比，时间只有其1/4，这段时间，仅仅是性格的形成时期，真正的事业远未开始。

1910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约略分析如下。

1910年的毛泽东，虽然已有较确定的价值观，他的思想土壤中已渗入了真善美的种子，虽然他正直的人格与品性，鲜明的爱憎和刚强、韧性、倔傲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已基本形成，但这一切还较为稚嫩——他之出乡关，尚带有负气出走的成份，也为强烈的功名感所鼓动，因此，要成为一个伟人，还需要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到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他的知识、阅历又得到进一步提高。1911年到了省城长沙后他才开始进入思想和人生观的飞跃时期。

（一）1911~1921年，毛泽东完成了他的科学知识（主要是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知识帮助他锤炼着自己思想，他的由佛到儒再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之转变业已完成。除了佛所主张的真善美的内核，从他的身上已完全没有了佛的痕迹，他在信仰上背逆了母亲，但母亲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仍然保存着，甚至深入到思想深处而无可改变。同时，他精心钻研了儒家的伦理，这得力于他的老师杨昌济，从他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他已进入儒家伦理最深层，但他强健的消化能力，没有使他不可自拔，在这一点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又帮助了他，可以说，在儒对佛进行了有力修正之后，“资”又对“儒”进行了修正——但是，与佛、儒一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有它的先天不足，甚至严重缺陷。

那么，彻底而全面地将上述三种哲学思想加以改造的任务就落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参加和领导了这一场革命运动的毛泽东来说，也是极关键的一步——他得到了一件能将他此前业已吸收的许多哲学思想（精、芜并存）加以最大改造的武器，由此开始，他不但从“佛光”中走出来，也从儒“网”中脱开，还背离了资“圈”，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到1921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标志着他的思想之升华已经完成。

下一步，主要是将他已接受并坚决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并在其他许多人参与之下，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1921~1927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奠基时期。我们在这里不多论毛泽东在党建、工运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而着重分析毛泽东的农村革命的最初尝试——1925年和1927年在故乡韶山的革命活动，因为，农村革命理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乃是毛泽东思想最具创造性，最为闪烁光芒亦最大的成功之所在，我们要讨论它的意义还有一点，那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超绝凡俗地将农村作为他加在革命天平上的一颗重重的法码，是因为他对农村有最切深的了解和体验——他的“超早期”，不但使他最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苦难，农村的落后，在与1910年以后之所见所闻的对比中，认识到农村革命之必须与首要，农民若想解放自己，

必须把统治中国的四大绳索：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彻底摧毁。而且，因为毛泽东是一位由农村、农民中脱颖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由知识分子中脱颖的革命家——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三位一体，就他个人来说，他的根深扎在中国农村，他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因此，从农村开始他的革命，既最为便捷，又最有把握。而农村革命之初，他选择了他的故乡。其时，故乡的情形是，它仍然处在沉默与落后之中——正如中国其它许多偏僻的乡村一样；不用说辛亥革命，只是让这里的人们少了脑后的辫子，就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五四”运动，也并未在这里引起大的波澜——政治觉悟的启蒙，期待着毛泽东来完成。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他七、八个月的时间，他取得了成功——故乡的经历告诉他，中国革命的基点在农村！对于这一点，他在几十年的斗争生涯中坚定不移。1925年以后的一、二年，他足迹遍及故土以外的各地乡村，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认识，1927年，他徒步考察了10多个县，沿途开调查会、演讲，他的农村革命理论几近形成。

（三）1927~1937年，毛泽东武装斗争理论形成时期。武装斗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而毛泽东又对此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以农村的武装斗争带动城市的武装斗争，这是毛泽东超早期与家长、与族长的斗争哲学的延伸，更是毛泽东农村革命理论内核的具体化。

（四）1937~1949年，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全面形成和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及参与到这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的亿万人民，共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毛泽东的“超早期”所具有的人生价值观和思想的萌芽，与整个的毛泽东思想不可伦比，但，毛泽东的思想的整个形成过程，超早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自然，“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二者有前后相承的关系，而且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交叉。

因此，至少在研究领域，必须将毛泽东的“超早期”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轨迹勾勒如下：唐家坨家风熏陶了幼年、童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然地接受佛教的某些影响；

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受的佛教影响作了修正；

深入地研究了儒家哲学；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让毛泽东从儒家中走出；

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进行了全新的洗礼；

毛泽东由接受马列主义到运用马列主义，再到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

三、山冲里的世风和传说，薰陶出毛泽东坚贞而率真、淳朴而多情的个性

韶山冲自明初开发以来，她的原始荒凉悄悄褪去，那猛烈的虎吼也经山林与山谷这个巨大音箱的处理，而变成与悠悠的韶乐相配合的鼓点了，风，穿过竹林，呜呜咽咽，那就是民间传说的八仙吹箫，山泉在石上叮叮咚咚，如同扬琴清脆地清响；忽而一声狗吠，带出一串鸡鸣，茅屋顶升起缕缕炊烟……在竹林间，在溪水旁，悠扬的山歌子此起彼伏：情妹哎住在花山——花坳中身穿哟花衣系花裙脚穿花鞋哎踩花地手摇花扇扇花风花香呀引动少年君这是韶山的情歌，歌中涌动着一种纯情，韵里跳动着一种童真。细妹子，貌不差，不涂红，似桃花；不打粉，粉节花；不洒香，胜桂花；穿件衣，蝴蝶花；

系条裙，玉兰花；

穿双鞋，似莲花。

长大了，对人家；

不对头戴纱，——

不对浪子家，对个老实人，同心共创家！这是韶山人的审美观——不务繁华和虚荣，崇尚自然；这也是韶山人的人生观——不爱富贵，只图朴诚。历代还传颂着许多极有魅力的故事。据说，韶峰上，藏着一个生长千年的杜鹃花王，有缘的人才能见到。韶峰下，住了个采药的独身老人，叫刘义，他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却不取报酬。这一天，他攀在山岩上采药，看见了一朵篮盘大的映山红，正惊讶时，那花忽一阵颤动，从花蕊上拱出一个美丽的姑娘——她问：老人家，有何事相求？老人回答：没有。姑娘莞尔一笑便不见了。刘义采了一大篓山药，下到山坳里，走入病人家，人们一见他便惊呆了：刘义已白发转青，牙齿长出，返老还童了！这事被官府知道了，便派人来追问刘义。因为官府也知道韶山冲里有个杜鹃花王，因此肯定她是被刘义碰上了。可刘义见官后，却死活不肯说出花王藏在何处。官府便将他打入大牢。这一天，刘义正在牢中愁闷不能出去救助病人时，一朵小小的映山红忽而飘进了牢门，刘义不禁双泪涟涟——他又变成一位老人了，狱卒再打开牢门时便惊呆了：他们以为这老头不是刘义，真刘义已偷梁换柱地逃走了，狱卒忙飞身去追赶，牢门也忘了关，刘义趁机走了出去。

这时，杜鹃花王飘飘而下，将他驮起，驮往山林……从此他们便在山里云游，散播花种，一到春天，韶山冲便是满山满坡火一般的映山红……

这一类故事，在韶山就象满溪的鹅卵石，随手可以拾得几枚。

毛泽东外祖家唐家坵附近，以赵、章、文姓居多，那里的人们大多朴实善良，千百年来辛劳耕耘，艰苦劳作。他们又极富于想象，毛泽东童年时听到了许多瑰丽诱人的故事：

章姓人家生了个俊美的伢子，取名叫峻峰，隔河相望的赵氏生了个秀气的妹子，叫雯云。

峻峰长大了，学得门木匠手艺，以艺养家，以耕带艺；雯云也长大了，更加聪秀，纺织桑麻，都是里手。两人每每在河中石上，照同一面清澈的水镜，看镜中同一轮丰满的圆月，洗锄耙，洗衣裳……他们彼此都有了情意，但都不讲出。

湘乡龙洞，躲着一条孽龙，它本是一个妖人变的，竟也垂涎于二十里外

受云的美貌，于是吞云吐雾，韶山的上空，烟尘滚滚，在混乱中，它一把攫住了雯云。

峻峰见状，飞身一跃，抡起板斧，奋力砍向龙头，孽龙鲜血溅满峻峰一身，定睛看时，孽龙已逃走了，雯云也不见峻峰拼命追赶，一直追到龙洞，一股冷森森的恶气直窜出来。峻峰毫不犹豫地摸进了洞，斩杀了守洞的众小妖，入到最里端，只见受云正趴在一汪清泉边哭泣，泪珠掉在水中，叮叮叮叮，峻峰便一把背起雯云出了洞：

“你快回家，我再进去杀死孽龙！”

峻峰再次入洞，寻到孽龙住处，见它正在痛苦不堪地裹伤；峻峰大喝一声，挥斧便砍。

“呜——”

一股毒气熏来，峻峰扑地而倒……

那雯云却还守在洞口，她等了好久，仍不见峻峰出来，不禁又双泪涟涟，终至于昏厥过去。

待她醒来时，四下打量，发现自己已到了一座大庙下面，一位仙人飘飘然走过来，说：姑娘，庙内有一石匣，你只须揭下符咒，你的情人即可得救……

仙人一飘就不见了。雯云抬步，只觉万分艰难，原来她已三天三夜未进食，未喝水，她只得一步一步往上爬，挪往那高踞峻岭绝顶的大庙……

终于进得庙中，果见一石匣横陈，雯云依仙人吩咐做了，就有一道金光闪出，匣中蹦起一条五爪金龙，瞬间又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甲士。甲士驮了雯云，飞上苍穹，一会，便降到龙洞，金龙挥舞兵器杀入洞中，一阵酣战，金龙与孽龙竟同归于尽了。

雯云在洞外等呀等，峻峰却音无音讯。雯云知凶多吉少，大哭不止，泪水流成了河，竟然引动了山洪，龙洞中水哗啦涌出，一只神龟游了出来，峻峰正骑在它的背上……

这个童话般的故事，很容易在一个幼童心里播下真善美的种子。与现实生活更接近的，是关于智者李二的传说：

李二是个贫苦农民，但他为人非常乐观，最善用机巧，与强权和富豪作对，往往戏耍得地主老爷们啼笑皆非，恼羞成怒而莫可奈何。

韶山冲东 20 多里的银田寺（今属韶山市），是韶山最古老的集镇，镇上店铺很多。镇子依云湖河两岸而列，那云湖河，就是从韶山冲流过来的。

镇上有家“济生药店”，老板姓向，手下有 5 个伙计，李二是其一。可是，向老板近来不喜欢这个李二了，因为他鬼滑，又看不得不平的事，老板决意将他开革出去，但又不敢明目张胆，便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办了一大桌酒菜，一来招待众伙计，二来以鱼头暗示谁将不再留用——原来，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老板席上的鱼头，对准了哪个，哪个人下年就不用来了，这给主、雇双方都留了面子，免得难堪。

老板的鸡呀、肉呀、酒呀都摆好了，5 个伙计都焦急地等那鱼。向老板笑盈盈地过来，端了那红烧鲤鱼，左转右旋，鱼盘停了下来，鱼头竟不偏不倚对准了李二。

大家都松了口气，只盯着李二，看他如何应付。李二满不在乎地拈了筷子，戳了戳鱼头：

“向老板真是客气，办了这么大一桌菜，”他夹了片鱼肉尝了尝，“好鲜！不过，老板，你看，这鱼有些不吉利……”

“什么？”

“这鱼掉了眼珠——有眼无珠！哈哈！”

老板仔细看那鱼，果然没有眼珠，只有两只黑洞洞的眼眶。

“是你搞的鬼？老子分明是亲手买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哈哈！老板，今早晨你把鱼挂在勾子上，正好来了个买药的，我看药方子，里头有一味珍珠粉，可店里没有。我就记起你老人家平素教导的，取下那鱼，挖出鱼眼，研成粉末，哈哈，鱼目混珠！老板，这一次我实在照你的做了，为什么还要辞退我呢？”

向老板被击中要害，满脸通红。呐呐了半晌，想若是辞退李二，他到外头将他发财的“秘诀”一宣扬，药店的生意全没了……他赶忙亲手将鱼端了下去。

“对不住，对不住。”

伙计们一齐大笑。老板将鱼端入厨房，仔细翻看，却寻出了两粒圆滚滚的鱼眼珠……

对这类戏耍生意人的故事，毛泽东一定是颇为喜爱的，因为他自小就不惯诸如他父亲那样的刻薄自私。他也曾和母亲一道，为了这些事与父亲抗争。

韶山冲也有一个关于李二的传说：李二喜爱韶山冲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他再也不愿看冲外一件又一件的恶浊了，便与者父一同搬进了冲里。韶山冲口有个乡绅，乡绅有个儿子，耍赖泼皮，远近有名，人称彭赖。

彭赖带了几个随从，前来李二家，他要见识见识这个刚搬来却不懂规矩，不去拜见他的李二。

李二夫妇接了彭赖坐下：“少爷，请稍候，我已在张罗酒肉。”

李二妻子端上热茶，彭赖喝下肚去；又端上一碗，照例喝下去，一连三、四碗，仍不见酒菜，彭赖的肚子咕咕大叫——茶水将早晨的食物全化光了。

彭赖大怒，令人进去看看，回报不见李二，只见屋里桌上有一大钵芋头。彭赖一挥手，他肚子饿，顾不得别的，端了芋头便狼吞虎咽，吃得所剩不多时，忽听一声大喊：“开席啰！”大鱼大肉齐上。李二出来，转头一看：“哈，少爷，你怎么吃起这东西？——连狗都不吃的啦！不信，你看。”李二将钵子置于地下，狗过来嗅了嗅，果然不吃。彭赖正有一只热芋头卡在嘴里，作不得声——只见乡邻都入了席，彭赖已吃饱了，更被气饱，一甩手就走了……李二的故事，总数不下百十个，很久以前，就在韶山一带流传着，几百年来，为农民们津津乐道，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这反映了韶山的世风极其淳厚，他们疾恶如仇，极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惩恶扬善。一个地方的风俗，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所起到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往往对于造就特定的人才产生不可言传的影响。毛泽东就是从韶山冲清亮的泉水间，葱郁的山林间走出来的——他率真，他多情，他有时强烈似火，他有时又怀乡恋旧。杨昌济先生曾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这位培育了一代伟人的教育家，似乎在他的学生还未成名之时，即已注意到韶山的山水和风俗，对孕育英杰将起到的作用。

四、毛泽东的生活习性：红辣椒、红烧肉、铁脚板、水上功夫以及丰泽园 72 个补丁的睡衣……

毛泽东的生活习性是地地道道的韶山特色，而且通过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母亲的言传身教，而打上了上屋场的印记。

对于父亲毛顺生来说，他恪守着“好吃如小赌”的信条，为了积累资财，他领着全家过着清教徒式的日子——除了四时八节和来客的日子，桌子上是不见荤腥的，就连食用油也是从山里摘了茶籽榨出来的清油。不过，这与毛母文氏之吃斋信佛是非常相宜的。最能忍受这种生活的是母亲，最能克制自己食欲的是终日为生计奔忙的父亲，而最不可理解如此节俭的是孩子们。毛泽东和他的两位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生理上的需求使得他们非常嘴馋，他们极盼望过年过节与来客，但那样的日子毕竟不多，他们便只得自己下河入溪捉鱼虾泥鳅，以改善伙食，但这些东西一旦为父亲看见，也将充公，变成熏制腊味留以备用。

这样，毛泽东“超早期”里的饮食，便几乎全属于“素”的范围了，我们不妨列举韶山冲保持至今的一年四季的食谱如下：

主食为稻米，杂以红薯、蚕豆。菜蔬品种繁多，四时皆有不同。

初春淡季食白菜、牛皮菜、离笋等等，茎、叶均食；待白菜开花时，有将近一月的白菜笋旺季，除掐下炒吃，还晒成干菜或制成泡菜入坛。

仲春至夏秋，南瓜、冬瓜、丝瓜、苦瓜、茄子、苋菜、辣椒等纷纷成熟长大；

由秋入冬，菜蔬锐减，只有萝卜、白菜，冬苋之类了；严寒天气，只得从坛中取出干菜、泡菜炒吃或打汤；也有贮存芋头、红薯、白茹的，随时即可取出食用。

韶山人餐餐不可少的只有一样：辣椒。毛泽东吃辣椒很有名，这是他在故乡养成的生活习性，也是父亲所唯一不加限制的食物。耐人寻味的是，简单的饮食谱，最初由父亲强制实行，后来却成了毛泽东的习惯，甚至到了他已成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有足够的条件讲究饮食时，他也不改。红烧肉，在他是最好的补品；辣椒，终身嗜吃；苦瓜、茄子、马齿苋、芋头之类是最常见的菜。我们不妨将他 1966 年 6 月在韶山冲滴水洞居住时的一份食谱列出：红烧鲫鱼，火焙米虾炒辣椒青炒马齿苋、苦瓜烧肉雄鱼头打葱汤干饭二两、烤玉米一只或稍加面条。毛泽东一天两顿的习惯，甚至也是在故土养成的。过去，韶山的农民们为了节省粮食，常常是一天只吃两餐（闲时尤如此），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就以这种克勤克俭精神振兴了唐家坵的家业，毛顺生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上屋场的困顿。

可以肯定，没有由父亲近于严酷的要求而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毛泽东不可能在以后数十年中，面对恶劣的环境而从容自若。

同样，毛泽东的穿着也保持了他在故土时的一些习惯——这种习惯的实质精神亦即俭朴。不必看延安时期毛泽东穿着打了两个大补丁的衣服给八路军将士们作报告，我们只要拿了毛泽东住过时间最久的两个地方：韶山冲上屋场和北京中南海作一个比较，便能知道，从 1910 年到 1976 年，横跨半个多世纪，虽然毛泽东已由一个山村少年变成了昔日皇宫的主人，但他 66 年前艰苦朴素的精神一点未变。上屋场他的卧室：架子床、板柜，家织粗布蚊帐、印花被、蓝被单；书桌、墙壁上的桐油灯……

中南海他的卧室：木板床，床上一边高一边低；枕头上打着补丁了……两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缝补的次数已难以算计——一件有72个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一双底已磨穿了拖鞋，一根用作拐杖的竹棍……在世界上的诸多伟人中，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为节俭，不务浮糜的人了。虽然以他地位之尊，以他稿费之丰，足可以气派得多，但他却永远穿着他那几件旧衣服，只在外头套上数量有限的“中山装”，这种服装，一度曾被人讥为“毛式服装”，成为“寒酸”的代名词，殊不知，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并不需要华贵的服饰来装点。他的形象却比任何自命不凡的人要高大。可以说，毛泽东在故土的超早期中，连衣食习惯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衣食住行中，还值得着重一提的是，从他年幼时开始，练就了一双行万里路的铁脚板。

毛泽东是个乡间孩子，与所有农民的孩子一样，崎岖的山道，蜿蜒的田间小径，下水入山，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赤着一双足，可以履尖石，可以踏荆棘，砂路上飞奔，树丛中乱窜，都不在话下，久而久之，脚掌竟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

脚力的练出，除了繁重的劳动而外，便是直到五十年代初，韶山的交通状况还极落后，进出韶山，除了坐滑杆、乘轿子，就只有云湖河水道的小舟。可是，滑杆与轿子，是富人家和有权势的人们的专用品，毛泽东往返故乡，只有一次坐了轿，那就是1925年8月间，湖南军阀赵恒惕捉拿他，他扮成了个“郎中”呆在轿里躲了过去；而云湖驳子，由鳌石桥或银田寺出发，即使顺水而下，也须要一整天的时间才到得湘江，这太慢了，逆水而上就更不用说了。因而，性急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步代车。

1910年之前，未出乡关，他走过的最远的路是翻山过坳去唐家坵。1910年秋，他挑了被卷，徒步50多里，第一次到了湘乡县城；次年他又回到韶山，接着走了更远——到达长沙，此后寒来暑往地探望父母、乡亲，回来多半是由长沙登舟，至湘潭上岸，然后大步往西北，走90多里，回到上屋场。再返省城，则多是顺云湖乘舟而下。

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有意识地徒步旅行，要算1917年，他与萧子升“削发行乞”，行程近千里的那一次壮举；

第二次则是1927年他由戴述人等陪同，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他一生中最为壮烈之举，则是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由闽赣西行进而北上，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以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业已练出来的铁腿，走过了天下最难走的路程。

8岁以前，即在外祖家时的劳动，其实就是种娱乐。

带着个小铲或柴刀，表兄弟们一大群，唧唧喳喳，跳跳蹦蹦，扞那星子一般散布于早春干田的黄花草；待青青草长，待紫云英绿，打滚、翻跟头、摔跤，重述从外祖母、舅舅那里听来的故事，哼母亲教的儿歌……吆了牛，徜徉于田间、山径，采野果、玩游戏。在不知不觉中，猪菜扯满了篮，野粪收满了筐，耕牛吃饱了肚，箬箕装足了柴……之后，小和尚一般到泉边汲水，小当家似的到塘里洗菜……嘿，儿时的乐趣，让毛泽东享尽了！

1902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转折，因为，从此，他必须收敛他的“痴顽”了，他面临着一位严厉父亲的管教；劳动强度开始加大，劳动本身也便失去娱乐的意义，而变成了一种务实的、功利的生产活动。而对于毛泽东一

生，却还有一系列积极的意义。

1902~1910年，八、九年间，毛泽东的劳动锻炼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轻微劳动时期，即1902~1906年间，毛泽东读私塾期间，主要劳动是当父母亲的帮手，看牛、喂猪、打柴、扫地、担水、烧火、煮饭等，繁重劳动时期，即1907~1909年，父亲停了儿子的学，带强制性地把毛泽东当作劳动力使用，一方面是因毛顺生田产增加，确须增加入手，另一方面是对儿子不眼管教的惩罚。对于这种惩罚，虽然毛泽东很反感，但他采取的仍是积极的态度，而这两三年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涯，也成了他一生中与泥土、与泥土上生长着的农民最最贴近，可以说是完全融合的一段生涯，对毛泽东一生，也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毛泽东已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预者，因而使得他能最自然地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他从犁田、耙田、下种、插秧、扮禾、晒谷、入仓、舂米……之中，真正领会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父亲的原意在试图以劳动教训儿子：看，下苦力与做生意哪一桩更容易发财！你不跟我学生意上的事，就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吧！

不料儿子虽然觉得劳动辛苦，干起来却是极认真，而且，毛顺生将儿子拉过来的目的不但没达到，反而将毛泽东推得更远：一个奇妙的对比是，毛顺生随着资产的不断增加，他越来越离开他最初所属的贫农阶层；他的儿子，却因劳动，反而愈来愈从感情上走向贫农阶层了……这对他一生的影响在于，毛泽东将他的根，更深地扎入了土地，扎入了土地上的农民，因而在他的大半生革命生涯中，他把基本点着眼于农村——他的农村革命理论，即萌芽于他对农村、对农民的状况（阶级状况、社会状况、自然状况）之理解与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立足于乡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虽居闹市、处“深宫”，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农村，他所制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虽然有许多操之过急的地方，还曾带来不少损失，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他领导中国农民，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超早期里最有切肤之痛的问题，都已解决，或正趋解决，如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吃饭问题，农村交通落后问题，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问题等等。

有几项由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农村政策或发出的号召，很值得理论界联系他的超早期来进行探讨：即带有浪漫色彩的人民公社，普及得令人惊讶的合作医疗，农村教育和广播网，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晚年对体力劳动的重视程度，他对知识青年近于严厉的要求，竟然与他父亲当年对他的态度有些相似……

劳动，对于毛泽东的另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它极好地铸造了毛泽东铁塔一般的体格。

毛泽东高达1米81的身躯，他浑身强健的筋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流击水的气魄，除了遗传因素，后天的锻炼是最主要的作用，这种锻炼中，又包含了他超早期中的劳动，挑担，对他是最好的杠铃；烈日曝晒，如同日光浴；舂米的碓坑、木架，胜过当今的健身器械……

劳动，造就了毛泽东健壮的体魄，更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从娱乐这方面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务实内容的加入，它便渐渐退驻毛泽东全部生活的一隅了，至少纯娱乐的活动，在毛泽东是不多的——唯一

一件由童年保存到少年、青年、中年，直至晚年的娱乐是游泳！

毛泽东似乎天生就与水有不解之缘，他的名字“泽东”之“泽”，“润芝”之“润”就带了“氵”——智者爱水，这是一句古语，毛泽东的确是一位智者，也毕生爱水。

毛泽东第一次戏水，可能还是在他外祖家门前的那口池塘里；有定论的，则是韶山冲毛泽东自家附近的南岸塘，在那里他曾背着私塾先生偷偷下水嬉玩，又曾向父亲威胁跳塘自杀——南岸塘，成了毛泽东超早期中，唯一为父亲干涉不到的一个乐园，他在那里，便成了一条鱼，尽情享受水的温柔，也深深体验到了水对鱼的重要。

到了湘乡，涟水——宽有一里的涟水，是毛泽东一生初涉的第一条大河，此后在桔子洲头，到中流击水……他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也征服了中国最大的江河湖海。

《沁园春·长沙》、《水调歌头·游泳》、《浪淘沙·北戴河》等瑰丽的诗篇，即记述了他与大风大浪搏斗的壮烈情怀。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回到故乡，下到滴水洞那一汪灵泉里……1966年6月，73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在故乡畅游……

五、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形成，得自于孙悟空和梁山好汉的“真传”以及《三国演义》的军事谋略

毛泽东嗜书与阅读的种种习惯也是从故土起步，慢慢形成的。

毛泽东读书有几大特点：

钻与挤。毛泽东善于从钻与挤中获得阅读时间，这与他超早期的经历有关。毛泽东的真正启蒙，是五、六岁时在他的外祖家，真正作为启蒙老师的乃是他的八舅文玉瑞，因为这位慈爱的舅舅在家开了个蒙馆，教他自己的孩子与侄儿，毛泽东也在一边旁听，舅舅许多时候还单独教会了幼年毛泽东许多东西——明白了这一点，便会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回到韶山冲后，领悟力比其他同龄孩子高，被称作不要先生教的“省先生”，同样也就能理解毛泽东为何一再不服邹春培先生的“管教”。

幼年——学前的教育，使毛泽东不断地超越自己，也超越同龄人。

然而，从1907年被父亲强令回家开始，求知欲极旺盛的毛泽东感觉到了时间的珍贵：白天，再也不属于他了，而属于繁重的农活，大树浓荫下的忙里偷闲，常常引来父亲的训斥——他只能利用晚间了，而晚上的时间，却被黑暗统治着，他要点灯，父亲不许，他只得用被单蒙住窗户不让光线透出，即使闷热的夏天亦然，总提着一颗怕被父亲发觉的心——于是，他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在最短的时间里阅读最多的书离开了韶山冲，虽然严厉的父亲不可能再来限制他了，千头万绪的事情却缠上了他，而他，凭借着在故土业已掌握的高效读书法，仍然能以惊人的毅力在日理万机中偷闲读书——一直到他去世。

从习惯上来说，毛泽东晚间通宵工作的特点，正是1907~1909年，他在上屋场形成的——这又引出他的另一个与他敌手相比是明显优势的地方：众人皆睡，他独醒；众人皆醒，他独睡——这在军事战略上似乎也有特殊意义。

三部古典名著与毛泽东的一生有何关系？

毛泽东接触最早，并熟谙于心的中国古典名著是《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

毛泽东不但自己阅读了，而且还与人津津乐道，在以后的作文说话时，也常常引用其中的故事或原话。

从个性来说，毛泽东很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的聪明与好动，他的疾恶如仇，如果说，超早期的毛泽东还是不成熟的孙悟空，成年以后的毛泽东则是已握有金箍棒，具有巨大威力的孙悟空了！

三部小说中，《西游记》又是毛泽东最早看过，而最为其浪漫色彩吸引的一部——同样，被当作言神志异的鬼怪故事，父亲、先生都竭力反对毛泽东看这样的“杂书”，然而毛泽东却着了迷——他领着一伙看牛顽童，时常在韶山冲山林中演“孙悟空在花果山”……尽管有多种多样复杂的因素，毛泽东一生中那种浓郁的浪漫气质，对妖魔鬼怪的蔑视与痛恨及手下毫不留情，乃至他神秘莫测的军事艺术，实在与超早期中精心读过的《西游记》有不可忽视的联系。毛泽东认识“造反”是怎么回事，是从《水浒》开始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极让他佩服，虽然他在晚年评水浒时，对《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特别是作者给英雄们指出的“招安”道路至为不满，但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书中主要的英雄好汉们。可以说，他在还未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他的许多反叛行为是受了这本书鼓舞的，而那种造反精神，却是为其终

生所推崇的。毛泽东之上井冈山，自然非林冲等人上梁山可比，但两者之间的确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实在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时的毛泽东已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自己也开始形成一套明确的创造性的理论。他领导的几次反围剿与当年梁山好汉的反围剿情形也就大不相同，他也没有受招安，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败的原因却不在他身上。《三国演义》是毛泽东读过的第一部“军事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以“兵书”的形式深远地影响了毛泽东。这部“兵书”中，形象地再现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例，闪烁着智慧与艺术之光，尤其是孔明与周瑜的用兵技巧，无疑深为毛泽东信服而在他自己的用兵中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毛泽东军事艺术内蕴很深，《三国演义》肯定对这种艺术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由《西游记》中幻想式的驱魔灭妖英雄孙悟空，到《水浒》里逼上梁山的众好汉，再到《三国演义》的中原大逐鹿，似乎也可联系到毛泽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生活轨迹……毛泽东晚年之喜爱《红楼梦》，则是这种生活轨迹的延伸。

六、毛泽东的浪漫而多情，使古体诗返青，得益于韶山星星般多的神话传说和情歌民谣之滋润

毛泽东全身带有根强的艺术气质，毛泽东一生也充满着艺术个性：语言的艺术，书法的艺术，政治的艺术、军事的艺术……

毛泽东故土韶山，是一个艺术气氛极其浓郁的地方。

造物主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它塑造了韶山这一方奇山秀水，既使用了阳刚的大写意，又运用了阴柔的淡墨——在高耸挺拔之中，又有蜿蜒回旋；在轻风习习之后，是电闪雷鸣；青山不老，绿水长流；野芳初发，鸟鸣嚶嚶……大自然，给了“艺术”以最初与最恰切的注解。

韶山，在她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便处在这种“自然艺术”状态，直到传说中舜帝南巡，才开始出现人的艺术，最初的人工艺术形式，便是口中相传的神话，关于这些神话，我们可以简明地作一个概括：

舜帝狩幸韶山。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揭示了韶山人文的初始状态，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表达了人们对圣明君主的景仰和对大自然之美的歌颂。从发现的古墓葬和“韶山”之得名以及韶山的地理位置（在舜帝由黄河中游南下苍梧的最近路线上）可证这个神话并非无根无据；

韶氏三女升仙。产生于唐代，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唐，历时三千余年，这漫长的时日里，几乎没有再产生神话，说明唐以前的韶山，人口极其稀少；直到盛唐，由长沙来了一些僧人（男僧到了清溪寺，女僧到了韶山冲），才又出现了新的神话。韶氏三女，或称桓氏三女，桓氏为长沙旧姓，大约因在韶山修道，而改以韶为氏。三女升仙，自无科学根据，但唐代有女僧在韶山修道，却是可肯定的，因为唐代留下的佛事场所除清溪寺、韶峰庵外，还有宝安寺。这个神话已由儒味的舜帝南巡，转化到道教色彩的“升仙”上去了。因了这个神话，韶山在现实中带上了浪漫色彩；在这个神话基础上，便又连带出其它的相似的一些神话。

八仙吹箫。传说八大神仙，每在清晨或傍晚，在“韶山”附近的滴水洞中咽咽吹箫——其实那悠悠的箫声，乃是空气流动时产生的狭管效应：滴水洞一带群山盘来绕去，幽谷深深，这便成了一件巨大而美妙的多管乐器，经风神这位乐师一吹，自然妙不可言。千百年来，迷信的人们将八仙吹箫处当作一块风水宝地，苦苦寻求，毛泽东出世了，人们便说这块宝地被他的祖宗（毛祖人或毛翼臣）葬中了。

女仙采药。人们说，在大雾天里，偶尔可看见有袅袅婷婷的仙女，攀缘在高崖上寻找灵芝。从舜帝妃子寻其夫至韶山（韶山也有丛丛斑竹，即系其泪滴成，又有胭脂古井，传为其以泪洗面处）到韶氏三女升仙，再到女仙采药，韶山又带上了一种女性之美。

鲤鱼寨的神话及峻峰与雯云的故事，杜鹃花王的神话。这三个故事已不同于虚空而无据可查的传说。除了略有因果报应之外，主要在对比中揭示了孰丑孰美，并含惩恶扬善的成份，有了明显的进步性，并带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因此，这几个神话多半产生在明、清时代。古云湖两牛（龙）相斗。内含极深广，有强烈的暗寓和讽刺意义。狮子复活神话。明显地是鞭挞清代末期以成涤泉为代表的大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的事实。至此，韶山的神话已只具有浪漫主义的形式，其内容却是现实主义的了。神话，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现实内容，更寄予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因而能鼓舞人们追求光明灿烂，

而它的浪漫主义色彩，则直接培养与引导了在神话环境里生活着的人的艺术思维：一旦此人本身具有某些艺术天性，再加上一定的知识修养，艺术人才便产生了。韶山历史上便曾出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才，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有大量的民歌民谣昭示着他们的艺术成就。韶山人，包括毛泽东，接触艺术的形式是从儿歌开始的。

月光光月光光，夜光光，河里担水洗衣裳。

一姐洗，二姐浆，打发哥哥进学堂。

学堂远，兑笔管；

笔管粗，兑篦梳；

篦梳滑，兑腰带；

腰带花，兑冬瓜；

冬瓜木，兑菱角；

菱角尖，尖上天；

天上铜锣响，地下紫罗鞭。每当明月初上的夏夜，三、五岁的韶山孩童，听虫儿啾啾，看星眼眨眨，觉凉风习习，有流水声，有人语声……这时，慈祥的老阿婆便唱起来了，一边轻摇着蒲扇，赶走小孙儿身边的蚊子。这是一首极为清淳的歌谣，它的艺术特征浑然天成，而又至为浅近，孩童出口成诵，乃至长得很大了也还记得。这儿歌中，飘逸着温馨，充溢着友爱，又诱发着孩儿对“学堂”的向往。艺术手法也丰富，最明显的是流畅，明快的韵律；此外，叠字，顶针，对偶，借音……这实在是学前期艺术教育的最好教材。至今在韶山流传甚广。与此相似，而更有谐趣的是《啄木公》。啄木公，啄上塍，啄只鲤鱼二斤半。爷要买，崽要看，娘要留哒过月半。接哒公公婆婆吃餐饭。吃的么子饭？红米饭。么子红？朱砂红。么子朱？络朱。么子络？茶络。

么子茶？

山茶。么子山？桤木山。么子桤？老介桤。

么子老？张果老。么子樟？檀樟。

么子檀？酒坛。么子酒？腊酒。么子腊？黄腊。么子黄？鸡蛋黄。么子鸡？麻鸡。么子麻？苕麻。么子柱？伞柱。么子伞？蓝伞。么子栏？牛栏。么子牛？水牛。么子水？泉水。么子钱？烂铜钱！婆孙一问一答，妙趣横生。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首非常“土俗”的儿歌，“土俗”之处在于，歌中讲道的数十种事物，全是农家所常见，尤其末了以“烂铜钱”嘲弄了钱财权势。下面再引两首。

鹭鸶叫鹭鸶叫，干大塘；麻拐叫，水泱泱。伢子哭，哭学堂。妹子哭，哭家娘。今年六月栽桐树，明年六月制嫁妆，制起嫁妆嫁姑娘。

摇啊摇摇啊摇，摇哒伢子捡柴烧。一天捡一担，十天捡一樵。天晴有柴卖，落雨有柴烧。比起来，韶山的民歌民谣比儿歌意味更加深远，对人们的教化作用也更大。罗仙寨，马口坳，金眼埋下十八窖。窖窖十八缸，缸缸十八块，块块十八斤，寻哒救穷人。正月才讲起，二月吃借米。三月餐打餐，四月难过关。五月借团谷，六月饿发哭。七月禾熟了，八月吃半饱。九月吃红薯，十月了得住。十一月有得钱，十二月过不得年。这是韶山农奴痛苦的心声，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最富表现力的是韶山情歌，每每在插田扮禾季节，在山间，在田野，韶山的青年男子们，扯起他们清悠而浑厚的嗓子，放声高唱，唱得布谷鸟也嫉妒，唱得黄皮鸟（画眉）也慌张：情妹哎住在花山

花坳中，身穿哟花衣系花裙，脚穿花鞋呀踩花地，手摇啊花扇扇花风，花香——引动——少年君。这首情歌基本上是用山歌形式唱出来的。但对山歌的机会并不很多，因为在儒家思想浓厚的韶山，追求自由和热烈的爱情理想更多的是隐藏在少男少女心中，他们暗暗地吟唱：想郎想得着了迷，枫树叶子当茶煎，猪栏面前放把草，牛栏面前放瓢糠，堂屋里挖土栽茄秧。情妹下河洗茼蒿，洗起茼蒿满河漂，下河莫吃茼蒿水，上河莫吃水茼蒿，不成相思也成痂。牵牛藤爬上枇杷树，枇杷树绕牵牛花，牵牛缠树死不放，哥今恋妹要成家。等郎等到五更天，一团墨黑不见天，灯盏无油燃不久，心中好比滚油煎，眼泪当油灯又燃。铜打香炉铁丝缠，跟定情哥一百年，情哥九十九岁死，我决不多活小半天，来生来世结良缘。就全中国范围来看，民歌是永远不枯萎的花朵，其永远的生命力在于，她与现实生活最为切近，她源于生活，因而不需雕饰，如荷花出水，人民爱她，唱她，于是长盛不衰——同时，她又往往能给文人艺术注入新的血液，自古至今，最为杰出的艺术家，总是最善于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由西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到建安风骨，由唐诗到宋词，莫不如此。毛泽东作为中国现代一位杰出的诗人，一位让中国古体诗歌之树返青的诗人，便是在故乡这片艺术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可以肯定，民歌民谣，培植了毛泽东最初的艺术细胞。

七、对毛泽东有直接影响的韶山文人诗以及韶山诗仙毛兰芳隐迹

外人描绘韶山的诗不算，韶山本地出现文人诗，是在清中期以后。超早期的毛泽东，除深受民歌影响之外，还直接地受了这些文人诗影响。《韶山毛氏二修族谱》中即保存了大量诗词，如：

一勾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

灵秀聚钟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

韶峰撑起半边天，一峰如断一峰连。廉贞竹祖钟灵秀，抽颖横飞塔岭烟。矗起太乙燃藜杖，纵横呵护拥蝉联。连排十八芙蓉幕，卷帘钩角月灯悬。盘旋楠木峰头落，珍珠一络蛛丝穿。别开生面张堂局，寝庙于斯亿万年。四围罗列千官仗，一水回环玉带缠。湖堤南岸重关锁，虎踞龙盘气凛然。馨香俎豆河山寿，人物风土三代前。食德服畴先泽厚，家有藏书郭有田。这首七言长诗，附在毛氏宗祠图后，既描绘了韶山冲自然风光之雄壮，又寄寓了儒的意识。其情调是激越的，充满着奋发向上的精神。在这里，韶峰如柱，韶水钟灵；湖堤南岸，虎踞龙盘，写尽了韶山的阳刚雄奇之气和阴柔秀逸之美。我们读毛泽东的若干写山写水之诗，能看到他早年从这首诗中得到过影响。虽然毛泽东的诗意境更开阔，场面更壮大，但前后相承的关系还是明显的。可以肯定，超早期的毛泽东，在吟诵唐诗宋词等中国传统诗歌的同时，也研读过由他本族中诗人们写的关于韶山的诗歌——而后者比前者更使他感到接近和亲切。七二芙蓉族南岳，庆源南岳峰头落。磅礴苍苍数百里，万水千山隐隐跃。湘乡上踞鲤鱼峰，矗兀空中耸楼阁。度峡飞来书堂山，玉笋联班尖似削。

黄田坳断帐大开，祖山胎息出帐角。

灵钟倒地木呈祥，亿万斯年祖墓托。

灵源涌出蕊珠泉，古木参天胜岳麓。

蠡斯蛰蛰瓜绵绵，福泽无边天地阔。

桑麻卷轴甲楚南，雍肃一堂征亲睦。

这是《毛氏二修族谱》中另一首七言长诗，排除它的风水迷信色彩和儒家伦理观念不说，艺术上也颇有可称道处，最佳者为其气势磅礴，大开大合——毛泽东的诗词，是与此相通的。

毛氏家族中可曾出过优秀的诗人？

从全国毛姓来说，诗人学者的确不少：大小毛公，毛直方，浙中三毛……韶山毛姓，自明初迁来，数百年中，主要精力用于开荒种地，而随着基本生活条件的解决，他们开始注意继承这个家族乃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清咸丰以后，毛姓中除出现了好些湘军将领外，还产生了几位颇通诗词书画的文人，他们的作品即被光绪七年（1881）修的《毛氏族谱》保存下来。

超早期的毛泽东，凡韶山能找到的书，他都拿来读了，《毛氏族谱》当然也在其内。

《毛氏族谱》中的大量诗词，其主要作者，乃是毛泽东的堂曾祖父毛兰芳。

韶山有八景，即韶峰耸翠，仙女茅庵，胭脂古井，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凤仪亭址，石壁流泉。每景皆有一词，词因景生，景因词名：

韶峰耸翠

峭壁插霄间，扑压群山，箭韶流响白云关。绝顶才宽三五尺，秀挹天颜。

仙女去尘寰，石上苔斑，风梳雨沐绿云鬟。万古头颅新色相，月挂金环。

凤仪亭址乐奏九成期，瑞应于斯，亭空风去几多时？破瓦颓垣天爱惜，烟幕云帷。远翥欲何之，琴瑟维持，高冈又长绿桐枝。圣德巍巍天地永，正好来仪。

仙女茅庵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筑当年。道成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莲。晨钟暮鼓边，惊醒尘缘，高僧无事抱云眠。何必普陀观自在？面壁依然。

胭脂古井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胭脂笑问为谁妆？色即是空空即是，春雨斜阳。一派玉琼浆，寒碧冰芒，无纤尘染影岚光。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石屋清风砖瓦莫为功，栋宇凌空，神工鬼斧石琼宫。九转丹成仙去后，剩得清风。云雾卷帘栊，彩挂晴虹。月明灯火澈宵红。金屋几多沉草径，笑倒仙翁。

顿石成门门户别开奇，两石为之，一关不许野云驰。春色满林关不住，摇曳生姿。雨过碧玻璃，雾锁烟司，闲花野鸟各支持。若得当年由也宿，夫复何疑？

石壁流泉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佛幡高挂五云边。半点红尘飞不到，石上因缘。撑起半边天，清洁澄鲜，水晶帘卷万家烟。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仙。

塔岭晴霞峰峦泼翠鲜，岭断云连，横中一塔插空天。晴光暮色霞烘里，玉烛摇烟。风雨自年年，破补苔钱，春风无主鹤高眠。好欲招来询甲子，沧海桑

田。八景之名，最初得自于韶山土生土长的一位诗人——毛兰芳。毛兰芳的诗、词、文，由《毛氏族谱》保存下来的有数十首（篇），除八景词外，还有仙女庵四绝诗：

六朝松

亭亭特立势凌霄，万古清风万古涛。

沾得圣朝新雨露，怕人问说六朝豪。

飞来船

飞来此地几经秋，舵卷帆收也去不？

料得苔钱难满载，一船消尽古今愁。

四方竹

问篁何事异寻常，志欲圆兮行欲方。

耻与闲花争色相，留真面目寄仙乡。

白石泉

白石嶙嶙一派泉，空山涵印月中天。

红尘不许丝毫染，流向人间洗劫缘。总的说来，八景词与四绝诗，带有浓厚的佛教意味。从艺术上看，用词遣句极精细，足见作者的古典文学根底之深——毛兰芳可称得上韶山冲在毛泽东出现以前一位最了不得的诗人了。那么，毛泽东与毛兰芳有前后相因的关系吗？《毛氏族谱》四修卷九载：“毛祖基……清从九县丞，字兰芳，号春谷，一名过顺，别号韶山懒道人。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正月十二寅时生，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二月二十八寅时没……”毛兰芳一头连着19世纪中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过湘军的下级军官，并立了军功，与大部分遣散回乡

的湘军将士一样，他回到韶山冲极感失望，看破红尘，知原先怀了报国之志外出，不过是一场空梦，与其他许多人参加哥老会不同的是，他晚年遁入空门，终日浪迹“韶山千亩之间”（“韶山千亩之间”是他作的一幅折幅长画，这是历史上韶山冲第一次上画面），或与僧人厮混，或独自吟诗作画，终于坐化升天。

他的另一头，却连着一条重要的人材链：他回乡后在东茅塘首创面山楼私塾，培育出了好几位人才，一个是他的长孙毛福生，为清国子监监生，一个是他的次孙毛麓钟（原名禄生），为韶山冲自古以来唯一的一名秀才。

毛福生、毛麓钟都是毛泽东的堂伯父（毛福生与毛泽东有合影，即毛泽东、毛泽覃与父合影照中另一位老人），毛麓钟则是毛泽东毕生里最好的一位私塾老师。

毛兰芳对毛泽东的影响还在于：他亲手培育出来的孙子，是毛泽东的老师！

毛兰芳用过的大量书籍和他自己的作品使毛泽东受益殊深，因为 1909 年，毛泽东在停学两三年之后，来到了祖居地东茅塘，在他堂曾祖父创办的面山楼读了将近一年的书。虽然兰芳公在毛泽东出生前一年就去世了，但他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乃至诗词艺术技巧，很自然地通过毛麓钟而熏陶了毛泽东。

八、从工整的正楷到洒脱的狂草，从严谨的对子到气势磅礴的诗词，印证着他极富个性化的艺术轨迹

作为一个诗人、书法家的毛泽东，终生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土无疑是他的艺术之源。当他在外婆、母亲怀里荡漾，当他被舅舅举过头顶，他呀呀学语的“课本”，便是那些哼唱了千百年，代代为人口传，却不曾见于书本的儿歌。这虽然是一种初级与朴素的艺术，但它也的确称得上艺术——毛泽东在这种纯净的韵律中起步了。

稍稍年长，他开始接受内容更为深广的艺术形式：婆婆姥姥们，给他讲关于女仙的神话，关于舜帝的悠悠韶乐和湘妃泪……应该说，当时的每一个韶山人，都浸泡在淳朴天然的艺术的氛围里，但，老天对毛泽东却是格外地垂青：在1902年以前，他不受任何管束，与他活泼的性格和强壮的身体一样，他的艺术思维也在外婆家获得自由发展；而1902年他回到韶山，虽增加了严厉的父亲，但他得到了十分珍贵的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毛泽东便得以从口头艺术（儿歌、民谣……）的海岸，游向书面艺术——中国文化的海洋。这是当时韶山绝大多数孩童所得不到的机会，这也就成了毛泽东迈向艺术之路关键性的一步。在私塾里，他受到了正宗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对于先生来说，他们授以课读，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识字，其次是儒家礼法，最高一步才是艺术导引。6年的私塾生涯，毛泽东完成了这3个方面的任务——他以他资质的聪慧，从他此前业已打下的基础，以超过了他同窗共室的人的速度和效率，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汲取着营养，并开始开出最初的艺术花朵。从南岸的诗对：“修身——濯足”；“牛皮菜——马齿苋”到井湾里的《赞井》诗，他于此开始起步。书法，也由填红到临摹欧阳询、钱南园，从这一时期他留在《诗经》《论语》封皮上的墨迹，可看出毛泽东最早的书法，是非常工整秀穆的。毛泽东在私塾练出的背功，写功，不但使他记住了大量诗、词、散文和书法范本，而且使他受益终身——他毕生喜爱并不断创作的诗歌艺术，散文艺术，书法艺术，口头语言——艺术无一不是与故土6年的“孔夫子”密切相关的。自然，与毛泽东的个性和思想同步，他的艺术之路，在他的超早期里还只是刚刚开始，以后的路途更加迢遥。以诗词而言，超早期中，还是较为简单的言志，艺术形式也还稚嫩，到东山高等小学堂，《咏蛙》诗已显出走向成熟的趋势。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诗，具有民歌式的朴素明朗；毛泽东到长沙后，他的诗艺更趋为成熟，但拟古的痕迹较浓，书卷气与学究味也增加了，如：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觥觞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这首诗用典颇多，凝重而意境不如他后来的诗词开阔，充满爱国激情，但尚未完全从个人的功名感中走出。从《贺新郎》开始，毛泽东由诗跳到了词——由此开始，词成了最适合毛泽东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艺术形式；诗艺也由仿古到自由挥洒。再看毛泽东的书法，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仍保留着欧体风味，到1915年夏的《明耻篇》题志，字体拉长，带了行书特点，1916年《致萧子升的信》则已是草书，有趣的是，稍后，毛泽东又爱上了隶书和章草，1917年春《致白浪滔天信》、同年夏的《一切入一》序、八月的《致黎锦熙信》……

直到毛泽东的中年，他的书法艺术才真正显现端倪，而在晚年达到炉火纯青：已由正楷、隶书、章草、行书而入狂草，被人称为龙飞凤舞的毛体——这种体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可与张旭、怀素相媲美的！

与诗词、书法艺术一样，毛泽东的散文艺术、口头表达艺术也日臻完善。

概括起来，毛泽东的艺术轨迹是这样的：

从韶山时期的朴实无华但较为稚嫩，到长沙时期的儒雅厚重，而至南征北战的气势磅礴，最后回复自然，而独创一格。

尾记 再生的火凤凰——韶山的变迁及永久魅力

1927年9月，毛泽东被“逼上梁山”，而他的故土，也由此开始，直至1949年9月，经过了漫漫的22年血与火的洗礼。

民国16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4月17日，韶山特别区教职员联合会罢课，在清溪寺召开讨蒋大会，29日，各界人民又在板凳岭召开反日反蒋，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会，5月27日，银田寺举行反帝讨蒋示威大会，韶山两区农民协会成立了自卫军总指挥部，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成仲清、郭任奇统万余农军，会同湖南工农义勇军中路军其它各地的战士，进攻长沙，受阻后退驻韶山，以被收复的封建堡垒大塘湾为司令部，继续斗争。

5月29日，许克祥部3路攻入湘潭，遭义勇军痛击，韶山农军寡不敌众，被迫化整为零。血雨腥风，笼罩着这一方赤色土地。

1927年前后，韶山共有数十位热血男儿壮烈捐躯，其中包括了毛泽东亲手培育的农运骨干，韶山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贺尔康、蒋梯空、谭震凡、谭天明等。李耿侯、彭绍辉等人随毛泽东参加秋收暴动，其中李耿侯血染井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韶山又有杨开慧、毛泽建、毛泽覃、毛福轩等牺牲在异地他乡。

一个长时期内，毛泽东不能再回故乡。许克祥士兵在韶山大肆烧杀焚掠。民国18年（1929年）1月30日，毛泽东的家产被宣布抄没，士兵们放了一把火。一股青烟在上屋场升起。

1927~1937年十年间，共产党组织在韶山的活动几被完会中止。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2月下旬，邹祖培从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经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回韶山，次年1月，他与毛特夫、王南秋在韶山冲一个隐秘的地方——毛震公祠堂后的木梓山青山坳内，重建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支部，韶山的共产党组织又恢复过来。10个月后，韶山人民公开亮出了抗日大旗：成立了毛朗明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韶山有20余人壮烈捐躯，其中，韶山冲就有属于震公一房，派系为“恩”辈的少将团长毛岱钧，血染江西庐山。

1944年5月下旬，日军占领长沙，6月20日，由宁乡方向，侵入韶山；8月16日，又有一股沿湘宁大道，经韶山往湘乡。这两次都是过境的侵略者，到了该年10月，日寇便盘踞在银田寺、狮子山，历时10个多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死500余人，伤残80余人，毁房28栋，抢粮194241石，抢牛1569头。韶山，经历了“马日事变”后的大屠杀，又遭受了日寇的蹂躏，但，共产党——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党组织如同生命力极强的“野草”，在国民党与日寇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并且逐步掌握了韶山地方的乡保政权。1944年11月，毛浦珠、李勋启率中共清溪区委的自卫队，突袭狮子山日军，又在如意亭、新田坳痛击日寇；12月，共产党人打入了清溪乡公所。1945年7月13日，王震三五九旅南下到湘潭，派人到韶山接走了毛泽东的侄儿毛楚雄。伟大的抗日战争也在这一年胜利了。1946年，中共湘潭湘宁边区县工委发动共产党员参与乡政权竞选，庞柱中当了清溪乡长，刘伯庚任乡民代表会主席，毛义为乡队副，庞甫元等当了保长，这样，韶山在全国解放战争尚未全面展开的时候，差不多就已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毛泽东20年前播下

的革命火种，又在故乡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4月21日，我解放大军渡过长江，挺进湖南，8月，进入毛泽东的故乡韶山：__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村解放了

7月29日解放了常德，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两将军在长沙起义，我们就绕过了洞庭湖南岸，继续向益阳、宁乡进军。到达宁乡，大家就很自然的想到我党我军的领导者，有不少是三湘（乡）湘潭、湘乡、宁乡的子弟。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谭政、陈赓、蔡畅以及土地革命时期牺牲了的黄公略都是这一带人。因此对这一地区，不禁涌起了肃然起敬的感觉。尤其成为大家讨论中心的是：快要到毛主席家乡了。每个人心里都盘算着——我们能首先解放毛主席的故乡，有无尚的光荣！8月15日在宁乡到湘乡的进军途中，任务和情况都是很紧急的。我们沿着这两县之间被破坏了了的公路__上前进，经过湘潭县西北边境，走过了离韶山村还有十里的地方——如意铺__，谁都想绕一个弯子到那里去看看。可是任务是不容许的，大家觉得非常遗憾。然而，就在这一个日子，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凶地，被歧视了20多年的韶山村，平静地恢复了她的自由。她——毛主席的故乡解放了。

韶山村人民，虽然还没有看到解放军，但村民们听到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从四面八方跑到我军通过的道路上去迎接。满途的标语，沿路的茶水站，家家户户的红灯，学生们由教师领着到部队访问

在湘乡，我们和坚持地下游击战争的湘中第一支队第五团的同志们会师了。18日，他们派人从离湘乡县城五十里的韶山冲，热情而兴奋地接来了毛主席的堂兄弟和两个侄子（指毛泽连，毛远翔、毛远忠）。这是当时途经韶山的4野第41军宣传部长李恩求的报道。另有一篇通讯写道：

韶山村解放了，这和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市的解放又是另外一种意义。

初秋的夜晚，天还是那样闷热，队伍沿着山路急急行军。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村。

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

此处离毛主席的家15华里。

从这里起到韶山村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象过年一样。

老乡们是那样高兴地欢迎着毛主席的队伍，这往往使我们想起了进入首都北京时人民狂热欢迎的情景。曾经受过毛主席亲自检阅的战士们，现在又到了毛主席的家乡，人人都感到无尚的光荣，当我们在新开岭，在梅河口，在辽阳，在鞍山，在锦西，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们就牢记着：“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为人民翻身打天下的队伍。”

现在，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可爱的毛主席故乡。韶山人民受苦忍辱，在死的恐怖下斗争了20多年，今天看到自己的队伍，也从心底发出喜悦，他们为战士们仔细照亮难走的小路，还谆谆嘱咐：“同志，慢慢走啊，慢慢走啊！”

战士们受到这样亲切的招呼，都笑着说：“到底是毛主席的家乡，看老乡们多热情！”于是，“坚决消灭蒋白匪帮，解放全国人民”的口号声立时迸发出来，像钟声一样索回在韶山。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

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

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起来。第二天下午，各排选出一个代表，由王团长率领去参观毛主席的家。东茅塘和上屋场风景优美……我们刚刚到那里，毛主席三弟毛泽覃的岳母周老妈就从一间年久失修的茅屋里出来迎接我们……“20多年了，他已离开这里20多年了！他今年该是56岁了，身体不知怎么样？”

当崔清队同志把毛主席在北京阅兵的彩色像片展开给他们看时，乡亲们不约而同的欢呼着：“啊，胖了，胖了！”20多年来，毛主席家乡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已是满目疮痍，但是故乡周围环抱的山岗，沿屋相绕的松竹，门前清溪的碧流与英勇朴实的人民，却还像毛主席一样雄伟地屹立着……10月17日，长沙专区《建设报》记者寒山发表《我看过毛主席的家》，18日，长沙专区各界代表慰问团，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5兵团警卫连两个排又专程探访了韶山，不久，中宣部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毛泽东故居拍成了影片，韶山第一次走上银幕，走出了“韶山”。

1950年1月12~14日，苏联电影摄影师勃拉斯可夫、格希略夫，具有开创意义地第一次将毛泽东故居、韶山冲风景介绍到中国以外，他们也成了历史上进入韶山冲的第一批国际新闻摄影团。

次年，故居经过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人们沿着新修的湘潭七里铺至韶山冲的公路，纷纷前来参观学习。1953年，是有参观人数统计的第一年，这年接待国内观众1.48万人，外宾166人，以后以加速的形式逐年递增，1953~1965年共达669,034人，年平均5.1万人。

徐特立——访问韶山的第一位著名的革命老人；

陈毅——访问韶山的第一位共和国元帅；

继他们之后，胡耀邦、彭德怀、谭政、朱德、董必武、罗瑞卿、谢觉哉，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李富春、粟裕、贺龙、张云逸、程潜、李维汉、胡乔木、刘少奇、叶剑英、彭真、溥仪、郭沫若、周恩来、陶铸、李先念、邓小平……先后在韶山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到1990年，韶山共接待国内观众2535.74万人，港、澳、台同胞，华侨38504人，五大洲141个国家、地区国际友人10801批，82601人。其中国家副总理级以上的42人，党派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260余人，党政军副部以上的587人，驻华大使130余人。

1966~1978年，1940余万，年平均149万。

1979~1990年，600万，年平均50万。

40多年中，韶山出现过3次人潮高峰：

1966年10月中旬起，日平均3万，最多一天5.6万，全年290万！

1976年，毛泽东逝世，9月10日~10月9日，共达28万，最多一天4万，全年175.39万；

1978年参观者开始猛降，1980年降到低谷，仅23万，然而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连年增加，尤其是1991年3月，江泽民访问韶山，揭开第3次高潮的序幕，这一年，来韶山观光的游客达105万人。1992年1—6月，韶山已接待60万观众。

韶山，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巨人之先，只曾有文人学者叹咏这里的瑰丽风光，直到毛泽东闻名天下，才人与地俱传了！

韶山的永久魅力在于，她既有独特的人文，又有秀丽的自然，而且还有

特殊的地理位置。

她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北 $4^{\circ}21'$ ），四季分明：春天田苗秀蔚，夏日翠色深沉，秋季枫叶烂漫，冬来瑞雪无垠。

目前，韶山已形成以韶山冲为中心的风景区格局。

韶山冲风景区包括韶峰景区、滴水洞景区、毛泽东主席故居景区、湖堤洞景区。韶峰亦称仙顶峰、扑头山、仙女山，在韶山冲南，山形如柱，直上云霄，撑起半边之天。它与十八罗汉山，石鼓峰相连，如帷幕，作为韶山冲的天然屏障。

韶峰往西，石鼓峰下，慈悦庵遗址现存一株雄株古银杏，树龄在 300 年以上，亭亭玉立于半山腰。

再往西，木梓山古树参天，溪水潺潺，毛泽东四世祖毛震安眠山内，山下有毛震公祠，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前一古井，井前三棵古枫，枫下，韶河之源迤邐而出，溯水而上即滴水洞。

该洞实为一幽秘山谷，谷内松、竹繁茂，杜鹃花，兰花等奇花异木和各种珍禽异兽极多。谷口拦腰砌起大坝，将一汪好水蓄住。水滨砌别墅，毛泽东七十二岁时在此“隐居”过 11 天。

滴水洞南北相峙着龙头山、虎歇坪，为毛泽东曾祖父、祖父葬地，其历代祖先亦多葬这一带，传为八仙吹箫之地。

滴水洞一带还有登龙台，石人抱子，鹰嘴石、滑油潭，黑石寨等景点。建有八景亭，八景词碑、虎亭、虎雕等。

更引人入胜者，恢复了毁于 60 年代初的滴水洞——“滴水清音”。“花明楼无楼，滴水洞无洞”之叹语，已成历史。

滴水洞外，为毛氏震公一房聚居地。

滴水洞六、七十年代驻扎重兵，戒备森严。1986 年对外开放，这标志着韶山由单纯的革命纪念地向综合性的风景名胜旅游地的转化。

毛泽东故居上屋场位于韶山冲中部土地冲，松竹苍翠，石径蜿蜒。

上屋场约建于 19 世纪中叶，当时是一栋土砖砌墙、茅草盖顶的简陋农舍。光绪四年（1878 年），毛祖人买下东头 5 间半，由其次子毛恩普居住。后毛顺生将它扩建为 13 间半瓦房，即退堂屋、厨房、横屋、毛顺生夫妇卧室、毛泽东卧室，毛泽民卧室，毛泽覃卧室、农具室、碓屋、谷仓、牛栏、柴屋、猪栏及堂屋的一半。

上屋场坐东南朝西北，呈凹字形，韶山当地称“一担柴式”。占地面积 566.39 平方米，建筑面积 472.92 平方米。

故居门楣“毛泽东同志故居”题词为邓小平手迹。故居内生产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堪称一座乡村博物馆，对于了解清代、民国时农村情况极有参考价值。

故居前池塘一口，塘内植荷花；横中一堤，将大塘一分为二，过堤往象鼻山，林内葬有毛泽东父母，有游道通墓地。半山上建眺峰亭。

与上屋场相邻，为毛泽东一生中所进的第一所私塾——南岸；南岸北，韶河水滨有韶山嘴，山上苍松如盖，山形如龙头；其南为毛泽东题词的韶山学校。韶山学校背靠松山。

松山内建韶山宾馆；松山东，隔一谷地，为引凤山，引凤山上曾有引凤亭，今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山下有毛氏宗祠、毛鉴公祠，均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堤涧在黑石寨与枫梓山之间，韶河流入涧底，涧口筑大坝，两岸青山，倒映碧水，湖光山色，引人入胜。

狮子山在韶山冲外不远处，状酷似狮，头部怪石嶙峋，狮身绵延；雄狮腰侧又卧一母狮，两狮间为球山，如狮子滚绣球；山上有燕子洞、四人抬宝等景点。狮子山东 5 公里为银田寺，寺院内今存一雌株银杏，年年挂果，传与韶山冲银杏为夫妻树。

韶山属于近城旅游区，半径 60 公里之内，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株洲、湘潭能最捷近地向韶山产生强幅射。

连接湘西北与湘西南的最近交通线过境，早在 1938 年即筑有湘宁公路，现已拓至 12 米宽，将 107、320、319 条国道联通，西南经湘乡往邵阳，到昆明或经湘潭下衡阳，到广西桂林；西北经宁乡、益阳往常德、大庸或去湖北，东北到长沙、岳阳……韶山是理想的中转站。湘黔大动脉正从韶山以南 20 公里处通过，韶山铁路与之接轨，每日往返长沙、株洲、韶山间的韶 1、韶 2 次列车与全国各地沟通。

在湖南风景名胜网络上，韶山处在湘中旅游圈的中心。毛泽东主席故居，刘少奇主席故居、彭德怀元帅故居构成一个金三角。韶山边界至该两地只有 20 公里和 40 公里，有车直达。

在这个金三角内外，密集地分布着陈賡、萧三、曾国藩、左宗棠、王闾运、齐白石、黎锦熙等名人的诞生地和湘乡、湘潭、长沙、宁乡、益阳等文化古城。

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努力，韶山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风景名胜旅游地的出现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韶山的大自然从明初开始获得了全面开发，但因为阶级的分化，土地的兼并，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到 1949 年，韶山工、农业、交通、邮电、通讯仍极为闭塞落后。作为农业保障的水利，除寒潭坝“左荫八百，右荫三千”之外，只有自然原始的云湖河及其支流，3149 口山平塘、357 处水坝蓄水与排水，抗旱工具是 25 条水车及筒车。

这些中国奴隶社会时就有的原始器具，虽然古趣盎然，却对老天降下的灾祸往往是无能为力。

水稻是韶山的传统大宗农产品，千百年来，品种单一，老化，又只是一熟制，因而产量极低，亩产仅四、五石（一石 58.5 公斤），韶山人民长期为温饱困扰。

韶山与全国一样，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本来在明代已有了萌芽，比如银田寺，商业和手工业就已有四、五百年历史，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工商业仍然是当初的规模，工业，仅有 10 多个门类的小手工业和一些作坊，以及几处小煤窑，总产值 10 万元，只占工农业产值的 2.5%。商业虽在银田寺、如意亭、郭家亭、瓦子坪等处较集中，共有店铺 197 家，但经营范围与规模都极为有限。

落后的交通状况，是造成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与世隔绝，贫穷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它处在潭、湘、宁三邑边，境内除曾有湘宁公路通车仅一年外，便只有几条乡间土路及古云湖水道与湘潭城等地沟通，陆上运输靠肩挑背负，或土车装载，水道有云湖驳子，但载量不大，行驶缓慢。

此外，宣统二年（1910 年）韶山始有邮政，亦仅设几处代办所；银田寺

有一台手摇电话机，线路常常中断。

建国以后，农业，兴建 49 座大小水库，整治 4199 口山平塘，和 37.45 公里的韶河河道，修建了韶山灌区，其支渠络绎境内各乡镇。球山、银田等地打了 10 多口水井——水旱无虞，旱涝保收了，人们再也无须祈求龙王赐雨或请杨四将军镇妖。推广两熟、三熟制，农作物品种众多，杂交稻大面积种植；农药、化肥、拖拉机、耕田机、打稻机……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90 年，韶山市粮食总产 58,725 吨，亩产（单产）422 公斤，农业总产值 7246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3.63 倍。粮食总产量、人平产粮数比 1949 年增长 4.21 倍和 2.77 倍。农业机械化程度在湖南省属发达地区。

工业部类众多，轻重并举，摒弃了手工操作，全市有工业企业 670 家，其中全民 11 家，集体 6 家，村办 54 家，个体 519 家。乡镇企业已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1990 年工业总产值 13,659 万元。

交通面貌改观，除有韶山铁路（境内 21 公里）外，湘宁、潭韶公路在境内长 22.2 公里，此外，县道通车里程 67 公里，乡、村道四通八达。

邮电事业发达。邮政、电报、电话与全世界各地直接沟通；并拥有现代化的一流通讯设施。程控电话正在推广。

金融、保险业务繁忙，四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分支机构。商业网络以银田镇、清溪镇为中心遍布每个山村，共有商业机构 1159 家，其中全民 65 家，集体 97 家，个体 997 家。

文教卫生事业方兴未艾，省办 2 所院校，市办 2 所高中，乡办 10 所中学，村办 58 所小学；在校学生 13178 人。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书店为人们提供着精神食粮。市设韶山医院、乡有卫生院，村有医疗点，人人都有了医疗保障。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韶山的“两地建设”，而纪念地建设和风景名胜旅游地建设反过来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建国之初，韶山的管理，接待由韶山村、韶山乡、湘潭县韶山招待所、湘潭县韶山管理所承担；1963 年，中共湖南省委在韶山冲设立省直辖韶山管理局，下设韶山纪念馆、韶山宾馆、韶山园林绿化所、宣传处、接待处、外事办，分管纪念地、风景旅游区的规划、建设、宣传、接待。

中国国际旅行社韶山分社接待外国旅游者，中国旅行社韶山分社接待来韶山参观的团体，包括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负责联络、导游，安排住宿；1989 年，它们成为国际旅行社集团、中国旅行社集团的成员。纪念馆是宣传、陈列毛泽东生平、业绩的专业性博物馆，负责毛泽东等人的文物、资料征集、整理、研究、陈列、宣传和毛泽东故居、南岸、毛氏宗祠、毛鉴公祠、毛震公祠、毛泽东塑像的管理。韶山宾馆为省涉外定点服务单位，有职工 100 多人，总面积 1 万平方米，内设高、中档床位 344 个，餐厅、宴会厅 5 个，大中型会议室 14 个，舞厅 1 个，影剧院 1 个，友谊商店 1 个。松山一号，滴水洞一号为高级别墅。

1991 年 6 月 25 日，韶山正式置市，随后建立了市旅游局、韶山旅行社，与省韶山管理局有关机构配合，韶山的旅游业走上更正规化的道路。

韶山，这块三湘灵秀地，以其无穷与永久的魅力，更加为世人瞩目了！

附 录

1. 韶山记

（见《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

卷二，清光绪辛巳即 1881 年编印）

韶山，楚南一名山也。祖西华，面南岳，《盘古舆图》按：轸宿在玉衡。天文昭曜，其辰在巳，星在荧惑，五行在丙，天市在西垣，次舍在鹑尾，细度在轸十六度也。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濛回地涌，水飞雪浪之花，崑崙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凤音亭，丹凤衔书；胭脂井，紫龙吐沫。上麓天马凌空，岱上灵鱼不老，褒忠贞女来朝，相随鹏山白鹤，崩护石人抱子，引将东鹜凤凰。乌台石龙，草衣崖畔，湘西狮子，石羊入山。左湘潭，右湘乡，风云际会；前金紫，后龙王，雨露同沾。登望而咫尺星沙，转盼而韶山罗列，青草湾，金鸡观，秀丽花园；铁陂塘，枫梓山，恢宏乌石。平地斑竹，竹山青葱四季，南岸创石，石峒雄壮长天。黄田、白田，月城山之保障；黑泥，花桥，桃树山之前朝。钓水洞，鲤鱼寨，鱼龙变化；青山寨，文林寨，虎豹风生。太乙观，中放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女仙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九天韶乐，时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依圣境。果然特地乾坤，信道斩新日月。不仙不道，眉山盘谷风规；产乐产花，桃洞天台景象。浩月是长明公不老，白云乃不速客频来。绘动风常清，山麓松垂露，轻洗妖氛。

宁与尔达翁毛子家相对而望，隔山峰，性相同，而恒乐山水，琐琐烟亚，淡淡邑邻。因思祖而念宗。同年修谱，缘上仑而下岭，信口记情。余与达翁，为龙为蛇，既已谢阳秋之太史，呼牛呼马，一任彼月旦于时人。以文章为游戏，将希刘勰逃禅，看齿发之衰颓，自信鲍昭守道。今睹峰峦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苏，半亩何如金谷。孔孟以经常济世，不欲炫奇怪以骇时；佛老以妙道度人，每藉神通惊众。惟阅此山，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四时之景恒周，一道同风永远。乃述题数语，聊缀七言：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山右布衣周定宁谨识。

（附韶山图见附图 1）

2. 毛氏一修族谱《序》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首）

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中；境之奇者，亦出乎耳目之外。湘之西有韶山，山峻以复，泉洁以长，茂林修竹，云气往来，中可烟火百家，田畴沃壤。循流而下至铁陂，两山相峙若门，然毛氏聚族于此，传十数世，风俗醇厚，储蓄殷饶，古传桃源莫过焉！若使在中原贵游之地，其不入道子之画、柳州之记乎？此境之奇者，出乎耳目之外也。六国时有毛先生遂者，值赵平原君好客重士而卒略先生想其交游淡泊，容貌质朴，无以动人者，及其数言定纵，使赵重於九鼎，然后服。毛先生之奇绝，非门下数千人所及。此岂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中乎？余常谓：惟奇人雅爱奇境，惟奇境实产奇人。毛先生自归赵后，不知复游楚而衍子孙於楚否？何韶山一区有似乎脱颖者为之卜筑也。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则虽不在耳目之中，而已非常见所及矣！余先君避乱韶山，为外祖瑞芝公之婿，瑞芝公乏嗣，止诞余母，与外祖母俞夫人教以妇职，慈严交尽，余兄弟读书粗就，实有赖焉。余不及见瑞芝公，余母毛夫人，常为炯道瑞芝公及旦卿公之贤，皆有一言九鼎之风，惜其丁乱世而以山林老。毛氏自二公外，不乏魁梧奇杰之士，而家乘阙然无所徵考。今舅氏修葺家谱，属余为序，余去韶山百里，又以宦游走京师，未暇登山临水，细领其趣，而谱牒所载，亦未能亲序，其事独望有人焉。览古慨然，家修廷献，思有裨於国家，垂名於青史，则韶山虽幽，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非独毛氏之光，推原所自抑亦予之光也已。

举人愚甥戴炯拜撰

毛氏二修族谱《序》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首）

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以军功官入楚省，惟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行，解组时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两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时同宗人命传公之子全山，亦以军功拨楚，卜于七都五甲石~~样~~焉。乾隆二年丁巳，族尔达彝生诸公创修宗谱。

3. 毛氏家族《源流记》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首）源之远者流之长，根之深者叶之茂。仰托其流之长叶之茂者，溯其源之远而愈溯其源之远而益远，究其根之深而愈究其根之深而弥深。斯繁徵博引，任意搜罗，凡可为光扬谱牒者，不计远之远深之深而滥采焉。不知世远年湮，宗分派别不失诸浪，即失诸诬，其不敢浪者，实不敢诬也。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毛亨、毛萇注诗训诂，西河遗派，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迄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考其源根，历历可据，承其年代，派衍如珠之串，如蝉之联，不惟震惊一时，实足赫耀千古矣。乾隆二年，尔达、彝生诸公创修族谱，奉太华公为始祖，盖法夫子删书，断自唐虞，虽前有典坟不录之意，惟于例言开始载吾族，接西江，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生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让公就养，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的派。而始祖太华公位下书载：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育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官楚，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复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开种铁陂等处，编为民籍。此外别无他见。尔达公并无自序。惟特英公自记序中有载：太华公称隐君子，其从滇来楚俱同。则吾族远祖让公，始祖太华来从江右，籍落湘南，可谓源远流深，存实昭信矣。迺自乾隆二年丁巳，初修后，遥遥百余年，未获续修。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族老万庆、六和，绳祖倡族二修，刊发凡例，定期会集亲供，无如旷典有待遂尔中止。咸丰二年，父老传集阖族入祠，定立续订派系，公立合同，族谱有难，遽续房谱，听各为谋，第不许更乱派系，以免异同。自是震公房房谱，得修於咸丰五年乙卯，有源流序存真说，深公房房谱，得修于咸丰七年丁巳，源流虽本老谱，浑略不详。瑞公房房谱得修於同治七年戊辰，亦有源流考。鉴公房房谱，亦修於同治七年，亦有源流考。备考指讹会核，合稽祖始祖，祖宋工部尚书让公，同一致其载：休公生子七，秩爵迁潭，不相符合，殊难足信。至石猗房，全山公一支，本自命传，同籍吉水，同迁云南，同来楚省，其同宗或亦不诬。考据尔达公会宗说载：有其时同族人命传公，乾隆丁巳春族谱，戊午夏册至谱已告成，因编次谱，后俟续修，刻入正谱。据石猗房嗣孙廷佐、廷德自志毛家湾坟山记：吾祖命传公之子三，长子全山，原籍江右仙茶乡，后徙云南，因开辟黔省，全山顶朴，洪武垛籍奉调贵州平坝卫，以军功拨入楚省，标立湘潭三十九都石猗_墩等处，给田四百八十亩。因传为毛家湾则始迁石猗者，全山公确也，宗同谱同，由是五大房之名旧矣。兹续修何敢议焉？第据一派衡之，则我太华祖几与全山公等平书，不惟形强附其於众，论何展转思维，而必使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也。酌遵宗谱始祖太华一派起，连书至四派开其先，旋从全山起一派，亦连书至四派，安其次从五派起，一体连书，惟分列震、瑞、鉴、深、石猗五房，以提其经，则既不失太华公为我阖族四房之始祖；全山公亦不失为石猗一支之始祖，而体裁亦觉近宜也。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创修者，当为后之续修者计，续修者，可不为后之三修者计乎？夫黄渥岂真忘前苦，于只知七世老泉，何容略远碓乎？信在迂眉，后之贤能辈出，按诸三十年一修之例，而及时为裘之集

貂之续，即此鸦之涂少释狐，之疑大为虎之蔚而谅，窥豹之斑，以补其鸠拙之不及，则拜 见 多矣！

光绪七年辛巳岁仲冬月下浣之吉

阖族公识

（毛氏世系源流表见附图 2）

4. 毛氏宗祠记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祠堂记》)

《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必先立祠堂。於正寝之东为，五龛，以奉先代神主旁亲之。无从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朔旦则参，时食则薦是祭之，重於祠也昭昭矣。吾族自前明由豫章来楚，卜居湘水，落旦韶山，相吉於韶峰之左，枕山而立祠焉。其制精，其法备，前为牌坊，规模壮丽，正中大书“毛氏宗祠”，遥望厘然。左右平列“韶灵”“毓秀”四大字，光耀照目。祠门上建匾额，亭门前立两石鼓，高数尺，大围许，崇圣学也。门内，高建戏楼，中台可容数十人演庆，匾题“鉴古观今”。楼柱咸有题联，其书入风出雅者，左右两马门也。台之左右两楼，小窗多明，为优人装饰披挂之所。楼之下，即为下晋，宽达敞然，舆马辚集无虞隘。左一厢为庖厨地，右一厢为酒饭舍。东西两回廊夹丹墀，墀中设阶级，历阶五级而跻之升大厅。厅纵横堪布数十席，气象堂皇，整齐严肃。为阖族办公、讲约、祭祀饮福设也。厅视下晋高逾三尺余。厅后中树塞屏，匾题“聪听彝训”，屏高仰望，不无落帽。承枬四砥柱，大拱抱，制有镂金联，联语可当座铭，祠公碑文鳞接，安厅壁，炳炳烺烺，可摹可诵，从屏际左右角门入，洞达天井，别有清气，东廊悬钟，西廊树鼓。践东阶，步西阶，载上之为寢室地。较中厅高有四尺奇，履其阶，眼界豁然，神明肃然，怵惕之心油然而生矣。中建享堂，庄严一座，历代祖考之神主列焉。颜曰“敦本堂”，有上接云衢，俯临无地之胜。堂左为主祭齐宿所，堂右为经理钱谷室，祭器分藏其间。主座下阖之为全壁，辟之为重门，进为内享堂，灿然一龛香火，历代祖妣之神主居焉。座面山立天井，数武围墙，不卑不亢，竹影摇窗，松风入户，四时花鸟不尽，清幽有与天地相永者矣。左入则为助祭分献齐室，右入则为与祭嘉宾坐次，登斯堂也，有低徊不忍去云，噫制何精也，法何备也，遥遥数百年完璧依然，土木何巩固也！前人垂裕谋深虑远也，然其心苦矣。溯其祠之建，在乾隆二十八年，主其祠之成则次琦、育万、体仁、彝生、诸公也。敬为志诸。诸嗣孙 礼载 敦伦 同识

有庆 玉羲

(毛氏宗祠图见附图 3、震公祠图见附图 4)

5、毛氏家戒、家劝、家训和《百字铭训》

毛氏家戒十则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游荡

人有耳目能听能睹，人有手足能蹈，能舞，具此官体，不农不贾，饱食暖衣，逍遥过午，弃尔诗书，荒尔田圃，家计萧条，基业易主，自此嬉游，有玷尔祖。

赌博

人惟懒惰，遂交赌友，赌尽家资，一无所有，三五成群，将为盗藪，且引匪徒，钻墙窥牖，非盗即奸，中构亦丑，博棋好饮，不顾父母，不此之戒，祖岂尔佑！

争讼

争长竞短，都是客气。讼到公庭，大爹小的。出与人言，扬扬得意。不知当官，籲天抢地。倘或理亏，受刑系累。幸而胜焉，也要破费。莫逞雄心，免贻后悔！

攘窃

冥窃暗偷，谓莫予见。一朝败露，捕拿到县。招认受刑，皮穿肉颤。差役起赃，辱及女眷。饱捕亡家，东逃西窜。死不入祠，生有何面。凡我子孙，莫沾钱断。

符法

法打包身，磨拳擦掌。打降行凶，强牵强抢。犯法遭刑，捷如影响。为首为从，那个漏网，大则抵伤，小则笞杖。不思肌肤，父母生养。忘身及亲，你去想想！

酗酒

世上是非，多起放酒。加以贪杯，愈丧所守。乱语糊言，得非亲友。甚至醉时，胆大如斗。酗酒放风，裂肤碎首。醒后问之，十忘八九。何如节饮，免致献丑！

为胥隶

人在乡村，闲言存养，一入衙门，便如魍魉，一票一籤，几斤几两。只讲盘子，不思冤枉。少不得意，一索三掌。怒气冲天，报施不爽。快活赚钱，休作此想！

为僧道

邪说异端，莫如僧道。高者谈元，卑者应教。昔圣昔贤，辟佛辟妙。倘非虚无，何故抹倒。人有五伦，僧归一扫。尽如此辈，人类绝了。邪正两途，各宜分晓！

谋风水

既有天文，必有地理。得之有缘，非可妄取。近听术人，动谋风水。他人祖塋，恃强破毁。或牵或骑，连讼不已。死既不安，生何利矣。戒之戒之，牛眠在迤！

占产业

凡人产业，各有抵址。窥其唇联，奸谋顿起。得寸思尺，造契造纸。曾不数年，弃如敝屣。向所越占，几能到底。拱手让人，落魄而已。何如守分，

免受嗤诋！

右家规家训家戒，不惜苦心苦口，撰书成言，厚望同宗循其规，听其训，守其戒，共为一族之孝子慈孙焉。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知其道不远矣。

敦本堂公识。

家劝十则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培植心田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愆，到处有人称羨。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坠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品行端正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侮法有何长？但见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孝养父母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鸟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若还忤逆悖天伦，只恐将本雷震。

友爱弟兄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竞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和睦乡邻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教训子孙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库，不许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为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

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难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馀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婚姻随宜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务繁华，曾见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无休，诵读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勤劳本业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机巧。

毛氏家训八条

（见毛氏三修族谱卷六）

孝悌乃百行之原。凡子逆父、弟犯兄，必有先见之端，亲房自能觉察。如有此种子弟，亲房会同房长，登门晓谕。倘仍不化，传祠惩治其分居。卑幼忤漫尊长者，亦一体究治。

夫各有妇，妇各有夫。如有贩卖异姓生妻，从中渔利及掠为己有者，传祠惩治。族内若有夫故，妻顾守节者，兄弟不许逼嫁，亦不许转房。其或从戎多载未有确实凶信，毋得擅行改嫁。

女婴不许溺送，幼媳不许磨凌。如有悍妇丧心，轻视女婴幼媳，责在家长，处治不贷。

士农工商各居一业。如有毫无执业，游惰好闲，衣食不给，势必流为盗贼，甚或放飘诱众，酿成巨祸。此种子弟无迹者，房长带祠惩治；有迹者，捆解，父兄毋得袒护。

近来教匪、会匪邻县邻族往往多有。族中无知者，倘入教匪会匪，察知

其实，重行惩治。

宰牛相会、聚赌抽头、吃食洋烟等事，不独有违宪禁，实为败坏风俗、废弛执业之由，招惹歹人之藪，族中有此，一经发觉，分别究治。

遇事聚众行凶坐拼，强牵强掘，碎毁什物，甚至投塘溺水、放火焚巢等事，无论与同姓异姓相争，传祠究治，以翦横蛮。

房族之内，无论何事肇衅，致启争端，由房族首拨人排解。论理不服，舍理论情不服，再论亲亲之谊，毋得越族成讼，恃刁者，公同稟究。

毛氏家族《百字铭训》

（见毛氏三修族谱卷六）

孝悌家庭顺，清忠国祚昌。

礼恭交四海，仁义振三纲。

富贵由勤俭，贫穷守本良。

言行防错过，恩德应酬偿。

正大传耕读，公平作贾商。

烟花休入局，赌博莫从场。

族党当亲睦，冤仇要解忘。

奸谋身后报，苛刻眼前光。

王法警心畏，阴功用力襁。

一生惟谨慎，百世有馨香。

6. 毛氏族谱对毛泽东兄弟及其上三代的记述 (摘录, 见毛氏四修族谱, 民国辛巳 1941 年编印)

祖人, 字四端, 清道光三年癸未九月三十申时生, 光绪十九年癸巳十月初三辰时没, 葬韶山契买七都七甲茆蒿冲, 后改葬滴水冲龙头山沟^有中乳。

配周氏, 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月十二时生, 光绪二年丙子五月初十辰时没, 葬韶山滴水冲铁子山穿坳。子二: 恩农、恩普; 女一: 适沈。

——录于《中湘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九)

恩普, 字寅宾, 号翼臣, 行四, 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二十七辰时生, 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十七寅时没, 葬韶山滴水冲大石鼓。配刘氏, 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八月初二未时生, 光绪十年甲申四月二十六戌时没, 葬韶山东茅塘回阴^有尖峰下。子一: 贻昌; 女二: 长适张, 次适贺。

——录于《中湘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一) 贻昌, 字顺生, 号良弼, 行一, 清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一辰时生, 民国八年己未十二月初三辰时没, 葬韶山南岸楠竹^有。

配文氏, 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辰时生, 民国八年己未八月十二辰时没, 葬合夫冢。子五: 长次殇, 三泽东, 四泽铭, 五泽覃; 女二殇。

——录于《中湘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三)

泽东, 闾中肆外, 国尔忘家, 字咏芝, 行三,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元配罗氏,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 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没, 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有。

继配杨氏。随夫在外, 生没候归录。

继娶贺氏, 随夫在外, 生没候归录。

泽铭, 琳玠齐名, 字咏莲, 行四, 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十一未时生。

娶王氏,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月二十二未时生。

泽覃, 中学毕业, 字咏菊, 行六,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七戌时生,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阵亡于江西瑞金。

娶周氏,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月十一辰时生, 子一: 远大。

——摘自《中汀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五

7. 文氏家族源流简介

文氏家族，据 1937 年所修《高冲文氏支谱》记载：“文氏由蜀迁吴，”后“由吴”迁江西，经过九代，才从江西“迁楚之湘乡。”湘乡文氏家族始祖为伯琦。

文伯琦为第一代，经过淙^瑀、岡、天佑、必忠、渊宗、益选、楚用、朝冕九代，到第十代大贵，才开始列入派系。其派系诗是：

大明嘉应国，万年道德绵。

正士朝期上，英才望拨先。

诗书为甲第，礼乐绍薪传。

在昔垂忠义，克绳仰象贤。

从第十代大贵——明义——嘉官——应僎——国青——万谟——年扬——道中——德明——绵薰，到毛泽东母亲，已是第 20 代。

《高冲文氏支谱》又记载：

“道中之子德明，字作霖，清嘉庆二年丁巳七月二十九日申时生，年二十七，道光四年四甲申七月十四日申时没，葬凤音四都峡口区严家冲屋对岸。”

文德明“配贺氏，清旌表节孝，懿德详传。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七月初七日亥时生，寿八十八，光绪八年壬午七月初六日申时没，葬湘潭七都七甲韶山桥头湾屋右首龙眼塘背。”其“子三：绵芳、绵薰、绵姜；女一，适喻。”

“德明次子绵薰，字芝仪，创住唐家坵懿行传详，清道光元年辛巳八月初十日寅时生，寿六十七，光绪十四年戊子二月二十九日卯时没，葬湘潭七都五甲钟家冲内罗家^宅屋左下，”文绵薰“配贺氏，孝慈淑慎，道光年丙戌六月二十日巳时生，寿八十三，宣统元年己酉六月初二日午时没，葬凤音四都石岭区石岭上首笏箕^墚，”其“子三：正兴、正莹、正材（殤）；女三：适钟，适王，适毛。”

“适毛，”即嫁毛家，也就是嫁给毛顺生为妻。

8. 毛泽东革命家庭简介

毛泽东的家庭有两个发展阶段：先是农民家庭；1921年春以后成为革命家庭。1921年春节期间，毛泽东教育亲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要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舍小家为祖国。舍自己为人民。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引导下，亲人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革命壮烈牺牲。毛泽东全家革命，满门英烈。

大弟弟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党和毛泽东派他去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到广州农讲所学习过，从事过革命统一战线工作。1927年秋至1931年秋，先后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10月，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等职。长征中，他是红军十五大队总负责人和北上先遣工作团负责人之一。在陕北期间，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春，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之一，并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和民政厅厅长。1942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强不屈，坚持斗争。次年9月，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英勇就义，时年47岁。

小弟弟毛泽覃，生于1905年9月25日。1918年跟毛泽东到长沙读书。1923年党和毛泽东派他到湖南常宁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7年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并在广州、武汉等地的国民革命军中，从事过党的工作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营党代表等职。1928年4月，毛泽东派他去耒阳迎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1929年，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闽西，先后担任过工农革命委员会吉安办事处主任、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公略县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转战武夷山脉。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29岁。

夫人杨开慧，长沙东乡板仓人，生于1901年9月26日。1913年随父杨昌济到长沙读书，1918年又随父到北京，与毛泽东建立爱情。1920年初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先后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板仓坚持党的地下斗争。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敌人酷刑和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堂妹毛泽建，生于1905年10月。从小由毛泽东父母抚养。1921年春，随毛泽东长沙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到湖南省立第三师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任学生中党支部书记。1924年至1927年，在衡阳、衡山等地，和县委书记陈芬——爱人一起，从事农民运动，曾任这两县县委的妇运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衡阳、衡山、耒阳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

命和游击战争。1928年春，参加湘南起义。起义大部队上井冈山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英勇就义于衡山县城，时年24岁。

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1930年与母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1年被送往上海由党的地下组织抚养。不久，上海组织被破坏，和弟弟岸青、岸龙曾一度流落街头，过了五年“不堪回首”的流浪生活。岸龙因病夭折。1936年，党组织找到岸英、岸青，并和其他革命后代一起被送往苏联学习。193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43年入党。在军事院校学习时，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初回国后，遵父意到延安农村劳动锻炼。1947年至1949年，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先后到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1950年春，离开中央社会部，到北京机器总厂工作，任厂总支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同年夏，回湘看望乡亲；秋，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25日，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时年28岁。

侄儿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生于1927年8月13日。共青团员。小时候就刻苦学习，热爱祖国，决心“继父之志，报父之仇，”立志“做一个改造社会的人物。”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在《小朋友救国方法》作文中写道“我们小朋友也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驱逐鬼子兵。”1945年9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参加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后随部队北上，任中原军区干部。次年秋，在护送张文津、吴祖贻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于陕西省陕县东江口，时年19岁。

